此书献给
“文革”期间
曾在这里经历“监护”的——
薄一波、彭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李井泉、陆定一、万里……
等十多位元勋们。

特监轶事

刘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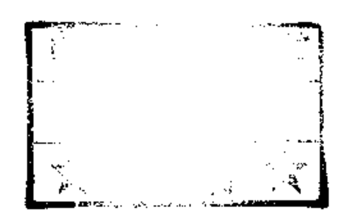
人民中国出版社

特监轶事

刘　烊　著



200302216



人民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133号

特监轶事

刘烨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管道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50千字
1992年10月第一版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 7—80065—156—8／K·057　定价：6.40元

九曲跌宕百折不回
昭颂先辈激励子孙

一九九一年四月

荣高棠

荣高棠为本书题词



化斋宗为本书审稿



彭德怀被揪斗

彭德怀在狱监里的“自述”手迹





修葺前的梅园
建筑外貌





彭德怀元帅

贺龙元帅

当年曾被监护的部分将帅



罗瑞卿大将



黄克诚大将



谭政大将

当年曾领导护路部分将帅



陈再道上将



王尚荣中将

当年曾被监护的部分将帅

内 容 简 介

《特监轶事》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这是著名作家刘烊继长篇小说《李莲英与西太后》、《狼精》等之后的又一部新的力作。

作家就是当年中央警卫部队的指导员，在“文革”令人痛心的年月，曾亲自参加“监护”彭德怀、彭真、贺龙、罗瑞卿、陆定一、万里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作家和他们朝夕相处数年，所见所闻非旁人所知。对于元勋们在“特监”如何生活，如何与林彪、四人帮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及与这场历史大混战有关的特监内外、军营内外的情况，都如实地记述下来，有许多历史情况属首次面世，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令人震颤，令人沉思。

该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警卫战士的眼睛和作家犀利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大苦大悲、大趣大乐趣意横生回味无穷的画卷。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悲剧喜剧闹剧滑稽剧。它最后留给人的是有益的深思和象球体一样的人类将如何运转。

该书由当年被囚禁的元勋审稿并题词。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特殊任务……………………………（5）
第二章　神秘而戒备森严的小院…………（11）
第三章　B克——黑色的大屁股
　　　——在士兵的心目中，它是伟大旗手的代名词…………………（21）
第四章　江青视察记…………………………（36）
第五章　初探囚灵
　　　——囚室初逢彭大将军…………（50）
第六章　小卫生员与大囚犯
　　　——他被指责是和人家睡一个被窝的问题……………………（60）
第七章　伟大的马克思　伟大的麻庞艾
　　　——这种大大小小的人是国家最危险的人……………………（71）
第八章　二探囚灵
　　　——他说，啊！隔绝不了，你不是也留下了一些书吗？历代烧书的多了，哪个隔绝了？……………（83）
第九章　周总理命令我们抢彭真…………（91）

第 十 章　军心不可侮　民心不可欺…………（100）
第十一章　难得战士心
——彭老总双手捧着红枣，注视良久，两颗热泪从身经百战、志如铁坚的大将军眼里滚落下来……（109）
第十二章　乱世英雄
——他大吼道：党在哪里？党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组成的，十个党员九个倒，十个党员九个臭，那还叫党吗？……………………………（116）
第十三章　三探囚灵
——大元帅仰天长叹：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日昭昭！！！……（128）
第十四章　四月槐花白如雪…………………（140）
第十五章　潴龙河水浪涛涛…………………（147）
第十六章　牢笼雄狮（一）
——夜半歌声情悠悠，震撼了贺胡子一颗寒透了的心…………（156）
第十七章　党里出了鬼　中央出了奸臣
——排长杨树理背负着武汉司令陈大麻子跳窗逃出重围…………（165）
第十八章　四探囚灵……………………………（177）
第十九章　林彪选秘书…………………………（186）
第二十章　牢笼雄狮（二）
——黄克诚横眉冷对宁折不弯，荣高棠紧闭铁嘴青山永驻……（203）

第二十一章　牢笼雄狮（二）
——王尚荣怒斥专案组　贺胡子棒敲林彪像…………………（215）
第二十二章　以正义和人性良心为笔　以鲜血为墨写的报告……………………（226）
第二十三章　马明芳抚伤哭先烈………………（234）
第二十四章　大胡子夜访海青天
——铁骨铮铮　针锋相对…（241）
第二十五章　宴请陈青
——特监里有一个包龙图…（254）
第二十六章　班禅挥泪表心迹…………………（267）
第二十七章　大囚犯给小狱卒起名字…………（275）
第二十八章　五探囚灵
——他预断毛林必分………（283）
第二十九章　已约年年为此会　故人不需赋招魂……………………………………（291）
第三十章　我要走了…………………………（297）
附　录：九曲跌宕，百折不回，
昭烈先辈，激励子孙。
——访当年曾被监护的中顾委常委萧克…………………（300）
后　记　……………………………………（306）

引　子

最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在最艰难的时刻，这样说道：

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无情的，它不会向什么人献媚。你应该记住：最公证的是人民！

革命后的一场空前绝后并震惊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在九千六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滚滚地燃烧着。这火，似有眼也似没有眼，烧人、烧物、烧灵魂；既燃名人领袖，也烧云云众生。

按照过去的惯称，无论工农兵学商，还是地富反坏右，无论真正的真人好人，还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总之是，八亿人等，毫无例外地投入到这场大革命的洗礼。

有的，被洗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有的，被洗得筋断骨折，终身残废。

有的，被洗得如痴如呆，精神错乱。

有的，被洗得山穷水尽，自投黄泉。

有先洗的，有后洗的，有洗别人的，有被人洗的，有的自愿洗，有的被迫洗，有明洗，有暗洗，有互相轮着洗。

有的洗死了。

有的洗活了。

有的洗得人不人鬼不鬼，一落千丈。

有的洗得一步登天，一荣俱荣。

有的越洗越糊涂。

有的越洗越清醒。

有的至死糊涂。

有的至死清醒。

但是，无论清醒的，糊涂的，活着的，死了的，好的坏的，香的臭的，流芳百世的，遗臭万年的，都被历史无情地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让我们打住这切腹地感叹，转入正题吧！

黄昏时刻，一辆外号“黑色大屁股”的美国B克卧车，

象疯了般地突然撞进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B克象醉汉一样，剧烈地抖动一下黑色的躯体，屁股向上翘了两翘，骤然停在军营第二排平房前。立刻，车门大开，从车上闪出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战士每人腰里别着仿苏式五四手枪，手中端着仿苏造的七·六五步枪，同时"咔嚓"一声，刺刀弹出，明晃晃的刺刀，一左一右正对着车门。这时，从车里走出一个看上去还算健壮的老人，老人仰首挺胸，目不斜视，在两把刺刀指向下，走向第二排平房的第四间小屋子里。

这是一个假阴天，太阳半掩在一片乌云里，乌云外露的半面太阳仿佛是睡着了，又仿佛在精心地窥视着人间大地。

部队刚刚吃过晚饭，有的人在打篮球，有的人在聊天，看到突然光临的B克，不由得把目光投向车门，并窃窃私语着：

"B克又来了！"

"又一个老帅被押进来了！"

"他是谁？"

"啊！是他？！"……

由于被关押的元勋们越来越多，被指定为临时特别监狱的京西什坊院一座小小的院落已经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坏人"。因此，有的元勋被关押在云岗，有的被关押在半壁店军营，有的被关押在罗道庄，有的则作为"中转站"，暂时放在这座几易其主的半壁店古老的兵营。

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地处早在大清朝就被称为居庸关的咽喉要地；军阀混战时，是旧军阀的混战司令部；之后，又成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解放战争时期，又作了国民

党华北剿共司令部；而今，它不但是素称御林军的中央警卫部队所在地，而且，兼为收押共产党元老们的临时特监！当年曾经警卫过元老们的忠诚的战士们，忽然间变成了看押元老们的“狱卒”，这事儿，这味儿，这根底因由儿，谁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历史的大误会？还是历史的大笑话？还是历史的必然？而必然的最根本因素又是什么呢？

只有时间和历史才能作出公正的回答。

只有人民才能作出公正的回答……

一、特 殊 任 务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

一场史无前例的震撼宇宙的大火正在铺天盖地的燃烧着，疯狂了的人们正在把扭曲了的历史和现实推到了疯狂的顶峰，神州大地的每一根神经，犹如注入了超量的高级毒素，整个大地在癫狂着、痉挛着。

好象狂暴的精神病人也有片刻的安静，古老的城堡在连续喧嚣了几天几夜之后，暂时地平静下来，它或许是癫狂得太累了，或许是平静中蕴藏着更神秘更疯狂的癫狂。

此刻，正是凌晨一点整，古老的计时称谓叫做子时。

就在子时，我做为中央警卫部队某团五连指导员，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凭着军人的敏感，我断定有紧急任务。

果然，电话是团长王夫打来的，命令我和老连长管东春立刻跑步到团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军人的动作当然是神速的，我用了不过十秒钟时间便着装整齐，带上五四式仿苏手枪，推醒了对门屋里的老连长。他粗鲁地骂了一句脏话，象往常那样，边骂边快速的着装。

军营静悄悄的。除了门卫有两颗桔黄色的馒头灯以外，到处一片漆黑。一九五八年春天，老连长带领我们几十个刚入伍的新战士，在军营内小马路两旁栽的白杨都长高了，但此时此刻所有的杨树在凛冽的寒风摧残下，不时地发出奇异的摇拽声，象是阵阵阴森可怕的鬼狐抽泣。

天空中还有几颗不肯隐去的星星，它们眨着灰朦朦的眼睛，似乎在揣测着地球东方这场大火会不会烧到天上去？

“星星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我仰首望着遥远的星辰，为天上的客人寻找着理由：不错，它们也目睹了这场越烧越烈的大火，彩旗如林，口号震天，万岁声不绝于口，打、砸、抢、抄、抓、侮辱游斗，早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且，还声言要把这场红彤彤的烈火烧到香港，烧到台湾，烧到越南，烧到朝鲜，烧到蒙古和苏联，直到烧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红彤彤的新世界。

“乖乖！那么地球都烧红了以后呢？不是该轮到烧它们天上了吗！”

其时，星辰若真的有灵有眼，它的确会看到这场疯狂的大火已经开始在许多国家迸发着火星——

驻某国的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红灯制成“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标语。当该国官员提出质问时，大使馆造反派骄傲而自豪地宣称：我们要让你们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居然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并在驻国一建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字标语，以至东道国提出抗议，有的官员抗议说

中国要颠覆我们么？！

更有甚者，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人家不同意，造反派便集会抗议，因此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当地官员说：“你们一向口头说不搞革命输出，这不是强行输出吗？”

也有的驻外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上硬性塞给人家“红宝书”，毛主席像章，象搭配什么劣等商品一样，当对方拒绝时，便挥拳辱骂，引起公愤。

还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驻某国使馆造反派，独天下之大滑稽，强行拦住过往的蒙着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自做多情多义地宣传“要解放思想”，还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和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地轰出帐篷。

为了更有效地宣传中国这场大火的威力，造反派居然当着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仅且隐去其名）的皮鞋扒下来，挂在他的脖子上，令他下跪、爬行。

就在八月二十八日，狂热的造反派团团包围了英国代办处，那里的警卫任务，也是我们中央警卫部队担负着。当周总理接到我们的报告后，立即叫陈伯达、王力赶赴现场劝说，但他们坦然地喝茶、聊天，有意拖延时间，致使造反派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政治影响——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英代办事件”……

象这样的大火谁见过？

象这样的革命谁见过？

象这样狂热的疯了般的革命行动谁见过？

古今中外，无论什么主义，什么社会，什么党派，谁敢

试比高低呢？

如此看来，星辰也担心这场大火会烧到它们天上去，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耳边大叶杨摇拽的声音更惨了。

老连长突然说道："真他妈活见鬼！"

他粗鲁地骂了一句，边跑边扶一下黑边眼镜。

我有些吃惊："鬼？——哪有鬼！"

"我觉着到处有鬼，你没听到鬼嚎吗？"

老连长正憋着一肚子气。昨天晚上他奉命带领战士们去制止武斗，不但军帽和军衣的扣子在混乱中被顺手牵羊抢去了，还吃了不少拳脚，吐沫喷在眼镜上，使他什么也看不清，折腾了一天半夜，好不容易平息了两派武斗，想不到这两派头头眨眼间又戏剧般地联合起来，一致冲到国防部某军事机关，官兵们手挽手组成了五道人墙，使他们无法冲进去。聪明的小将们抬来一块铁板，扛在战士们的头上，他们象潮水般踏着铁板从战士们的头顶上涌过去。老连长和九班战士翟民山个儿最高，他们承受得压力最大，许多人头皮磨破了，此时如果有谁一垮下来，许多官兵就可能被捂死在下边。老连长大喊道："他妈的，顶住！谁顶不住我枪毙他……"

回来后老连长一摔腰带说："他们打人，打死也不要我们去制止，可他们自己互相打起来，却要我们去垫背，这是什么鬼差事！真不知道这革命是姓马还是姓驴。"

连部离团部很近，几分钟后，我和老连长管东春便出现在团部作战值班室里。

值班室的气氛十分严肃，三个大窗户都用紫红色的窗帘

遮住，一副一面墙大的市区作战地图已经打开。团长王夫和政委李大胡子以及作战股张股长和两位参谋早已端坐静候，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只烟，屋里狼烟雾气。

没有平日的寒喧和半句废话，当我和老连长“报告”敬礼坐下后，政委李大胡子开门见山说道：

“根据上级指示，具体说，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看押特犯。这个任务十分艰巨特殊，师首长决定交给你们连，会后，你们立即开支委会，天亮后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下午七时以前做好一切准备，今夜零点拉出部队，正式接受任务。”

我一字不拉地作着笔记，老连长沉静地听着，他不识几个字，开会只凭脑子记。

“按照周总理和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的话说，是‘监护’，也叫看护，按照中央文革首长的话说，叫‘看押’，在执行任务中，你们要多动脑筋，自己去理解。”李大胡子猛吸一口烟，继续说道：

“如果说，过去我们不理解需要转一百八十度的弯子的话，那么这次恐怕要转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我和老连长的目光不约而同的碰在了一起，我想，这不过是说明事态非常严峻的一句形容词。

自从“我的一张大字报”公诸于世以后，部队的政治教育内容几乎全是“转弯子”和“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一个最最最”以及“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教育。现在又要转三百六十度，我的脑海里不由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李大胡子用深邃而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盯住老连长：

“记住总理的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丢，三要保证他们不被造反派抢去，四要保证部队稳定，严守秘密，一切无关的人一概不准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也不准进入执勤点。——这，是总理亲自交待给傅司令员的……”

“连亲娘老子也不准说！”团长王夫眨着机警的小眼睛，声音低沉而沙哑，“等会儿由张股长给你们具体交待有关纪律规定。要特别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警卫部队调动一兵一卒，也要经过毛、林、周三人。任何人不得调动一兵一卒，这是口头传达的指示。有情况要及时报告，并设有专线直接和团部联系。至于看押对象，到时候你们会知道的。”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在回去的路上，我和老连长禁不住猜测起来，部队要拉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看押的将是谁呢？

二、神秘而戒备森严的小院

当天午夜零点整，我们悄悄地开进了一座从来没有见过的神秘小院。

小院座落在北京西郊，名叫什坊院，在公主坟左边约七百米处，站在高处，可以和公主坟遥遥相望。

这是一座非常隐蔽而幽静的小院，它依偎在一座人造假山的怀抱里，山上长满了榆树、枣树、梧桐树和落叶松等。朝东开的大门口两旁，还有密密麻麻的垂柳、洋槐和马绒花树，从远处看去，你无论如何也难以发现这里隐蔽着一座神秘的小院。

院墙是经过改造的，有高墙铁门，三米高墙上新加了二尺半高的带电铁丝网，质地精良的铁丝还闪发着乌光，我想那一定是第一流拔丝厂的最新产品。

最显眼的是，院子正中那座面朝东的二层小楼，小楼全是红木结构，楼顶呈鱼背形，两出水，黄瓦飞檐，巧夺天工，远远看去，好象是一只跃跃欲飞的展翅大鹏。

小楼的红木走廊暴露在外，楼的两厢各有一排新改建的红砖小平房，两排小平房与小楼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字形

的小院。每间小平房有一面小门和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的一小窗。

原来，这就是我们看押特犯们的所在。

如果站在二层楼道上，可以看到整个院落和每间囚室。

其实，这还不算整座院落。以小楼为界，又分为一宅两院，后院，也就是西院，还有朝西开的院门，院门有三排约六十间青砖小平房，三排房又与小楼构成了一座长方形的院落。院子有两个篮球场那样大。这就是我们警卫战士们的住所和出操上课的地方。

听我们政委李大胡子说，这里曾经是清朝末年一个落魄王公的小行宫。一九一一年清朝下台以后，几移房主，抗日战争时期，是侵华日军驻屯军司令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华北剿共司令部，也是他们关押共产党大员的地方；解放后，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住在此地。可是现在，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对人类的捉弄与讽刺，它居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共产党关押共产党大员的绝密监狱！也就是说"御林军"保卫的对象忽然又成了看押的对象！真是天翻地覆瞬乎间。我常常把自已视为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和"走狗"，然而，这"信徒和走狗"此刻也不免又一次糊涂了。我万万也没想到，即日起我们看押的人，原来都是老字号的开国元勋，而且许多人还是我过去曾经亲自警卫过的对象！他们当中，既有三总部、大军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又有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最小的，也是个部长或京津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争年代，是疆场的骁将，敌人监狱的铁汉以及被敌人高官厚禄收买不成的共产党大员，他们不是一个或几个，而是一批，为数

在几十人以上的一大批，这一批革命的骨干或中坚。现在居然成了一批反革命骨干或中坚。我们承认是老转弯，老跟不上。

这个三百六十度的弯子，转得我晕头转向，直到这时，我才真正领悟到李大胡子政委那"转三百六十度"的话是不过份的。

看着这美丽豪华的小楼和趴在地皮上的一间间小囚室，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这沉重不仅仅因为被关押的人的职位太高，还因为在我的脑际里已经绞绕形成的矛盾，做为指导员的我将怎样来完成这看押特犯的艰巨任务呢？要知道，直到基层，也是党领导一切，我是连队的支部书记，就连我的老连长，也得听我的，这叫"党指挥枪"。我若一着儿不慎，便有送掉双重生命的危险。正直良心和乌纱想同时拿在手中是非常困难的。

我望着四号囚室，不禁暗暗惊叹了一声：啊！对了，大名鼎鼎的他，就关押在这十二平米的小屋里，我们一提到他，当然是按规定说"四号"。

紧挨着连队炊事班大伙房的，是第一号囚室，我从第一号默默地思索着，背诵着——

第一号囚室　　　　陆定一

他的中宣部被批为阎王殿。我想，中宣部被批为阎王殿，他当然的是阎王爷了。

第二号囚室　　　　黄克诚

他是一位落了佩的还不如鸡的凤凰总参谋长。大概，光落佩还不行，还得拔毛。

第三号囚室　　　　谭　政

第四号囚室　　　　彭德怀

第五号囚室　　　　孔　原

第六号囚室　　　　彭　真

第七号囚室　　　　马明芳

第八号囚室　　　　王尚荣

第九号囚室　　　　班禅额尔德尼

第十号囚室　　　　荣高棠

第十一号囚室　　　孟用潜

第十二号囚室　　　万　里

第十三号囚室　　　陈克寒

第十四号囚室　　　冯基平

第十五号囚室　　　罗瑞卿

第十六号囚室　　　邓　洁

第十七号囚室　　　李井泉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很顺口，喊得遍天响。

第十八号囚室　　　赵建民

第十九号囚室　　　贺　龙

这个妇孺皆知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胡子突然变成了“两把菜刀当土匪”。他虽然在别处（云岗）看押，也是由我们连的一个班担任，当然也毫无例外地进入了统一的囚徒编制序列。所幸的是，在总理保护下，由他的老伴薛明陪伴他在小黑屋。这是特监唯一有家属伴随的囚徒。

第二十号囚室　　　刘　仁

第二十一号囚室　　陈再道

“旗手”总是恶狠狠地称陈再道为陈大麻子。

第二十二号囚室　　郑天翔

第二十三号囚室　　赵　凡

第二十四号囚室　　林　枫

第二十五号囚室是……

关押的人太多了，我背着很吃力，当我实在想不起来时，便掏出笔记本看一下，就象小时候背书一样，我必须很快地记住他们的代号和名字，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也有任何罪名都没有，被稀里糊涂弄进来的。他，就是第九号囚室的班禅额尔德尼大活佛，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不知是一种什么命运的戏谑，把一个虔诚的佛教高僧和老牌的共产党人关押在了一起。

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个人，朱德，他虽然没有被关进这里，但林彪早就讲过，"朱德什么本事也没有，他就会抓小鸡子吃。"但他老了，实际上早就御职了，他侥幸做了"监外被监者"，而且，他的"扁担"也是上了林彪的肩上。但是，老诚而忠勇的朱老总却对大惑不解的警卫员说："过去的就过去了。现在扛在谁的肩上都无所谓。"

特犯的名单，我基本上背过来了。我想，我应该用记忆的名单和囚室里的人对对号。

做为一个中央警卫部队的战士，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多次见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些人还亲自保卫过。但在此时，我恨不能立刻一赏他们的尊容，看看他们的心灵，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什么态度，我猜测着：

他们是坦然镇定的吗？

他们是惊慌绝望的吗？

他们是怨愤冲天吗？

他们是低头伏罪悔恨不已呢，还是满腹委屈地在痛苦与

焦急中期待？

我站在四号囚室的窗前，不由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不知为什么，有一个人最使我这个小小的基层军官最为关心。

其实何止我一人呢，有许多战士都在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和眼神在关注着他。

囚室的小窗糊得很严实，就连苍蝇和蚊子也休想偷越“国境”。

不过，小窗的下端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正方形的小洞孔，洞孔上挂着一小块白粗布帘子，那是用连队的擦枪布做的，有的是用炊事班的蒸笼布做的。小洞孔看上去就象河北农家窗户上专开的猫眼儿，因为猫喜欢夜间活动，它还要拉屎拉尿，或者“跑猫子”。这里没有猫，它是“现实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窗口”，战士们叫它“观察口”，洞窗虽小，尚能看清楚囚室的每个角落。按照上级要求，哨兵还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猫眼，每隔一分钟观察一次，看看特犯是在规规矩矩，还是在乱说乱动，或者，在妄想逃避惩罚而图谋自杀。因为战士们曾被告诫：有的犯人把被子或褥子撕成布条，搓成绳子，用来在床头或窗户上自尽。在讲警卫专业课时，战士们还听说，这些人有丰富的越狱经验，当年他们之中有的人坐监狱时，把喝的水节约下来，用以把土墙弄湿，然后挖个洞逃跑。还有象彭真、刘仁等等，他们很会做敌工工作，会宣传善鼓动，他们的舌下功能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彭真，素有彭铁嘴之称，“我们要站稳立场，防止被敌人拉下水。”

战士们对此震动极大，因此，全神贯注，万般警惕，生怕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

政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他们纯真得令人感动，他们忠实的感情会令人掉下热泪。

忠于职守是军人的天职，每当他们上岗值勤时，便发动起所有的，据说是上百万根神经功能线，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神圣的使命中去。他们的眼睛总是瞪得大大的，连眨一眼都不敢，他们为此总是神经过敏地不到规定的时间便掀开猫眼，仔细地观察着囚室里的情形。

当然，战士们的职责还不止这些。他们还必须在交接班前，把所观察到的一切，其中包括举足，抬手，打饭，吃饭，喝水，大小便，咬牙、皱眉，打嗝儿，欢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一丝笑容），叹气，打哈欠，挠痒痒，说梦话等等，总之一切言行与表情必须全部的，一丝也不能拉掉的记录在案，交到上边。别看这些吃、喝、拉、撒、睡的鸡毛蒜皮事，据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叫对特犯的“全面透明监视”，这些生活记录，除了哨兵和我们四个“连座”以外，任何无关的人，不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利多大，也是不准一一阅的。

至于说“梦话”，这也是特监里的一大要事，据我们的副指导员小麻子庞艾发挥说：“梦是心头想，梦中吐真情，这些老家伙们要是有什么图谋不轨，一定会从梦中透露出来。”因此，他格外提醒战士们，“要特别注意记下这些老家伙们的梦话。”

望着那小小的猫眼，我忽然又想入非非了……

我恨自己天生不是搞阶级斗争的材料，身为看押连队的指导员，我为何这样心虚胆怯，杞人忧天呢？

一声口哨“嘟嘟”的传进耳畔。我看着手表，正是午后

一点半，按照一周训练进度表，老连长管东春带领战士们去后院进行手枪第一次实弹射击演习。

小院当中，除了哨兵，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正在值勤的七班战士刘云山，见我迟迟滞留在院里，便走过来，敬礼之后，静等着我的什么命令或指示。

我摆摆手，示意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冬日的阳光淡黄淡黄的，好象经不住寒冬的冲袭，无精打采，半死不活的。

囚室里不断传出咳嗽声，那声音又憋气又沙哑，听起来象拉风箱。还有的囚室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终于用有些发抖的手，慢慢掀开了四号小窗上的猫眼儿。我的目光落在了端坐在鸭黄木椅上的他。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看上去还算健壮的老头儿，方圆脸，大眼，浓眉，光着头，有点弓背，看样子站起来也不过一米七高。

他的表情是木然的，象一座雕塑，似乎已超脱凡尘，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引起他一点兴趣。

“反党？”

“反毛？”

我心里激凌凌打了个寒战。

真是不可思议，这个驰骋疆场，威震敌胆，数十次出生人死，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死也不回头的老将军，他为什么要反党反毛呢？为了名利地位？可他在多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含糊过，敌人高官厚禄都买不动他呀！

我的大脑有些凝固了，蓦地，我仿佛看到千军万马，从囚徒的胸怀和头顶上飘然冲杀出来，拼杀着，呐喊着，我听

到了人马嘶鸣，看到了硝烟利刃，炮火连天，在高处，在半空中，一个响彻环宇的声音伴随着一个高大的形象：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主席赋诗对他的评价，尽人皆知。

他为什么要反党反毛呢？

我实在找不出答案。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

他还是那样纹丝不动地端坐着，象一个遁入空门正在静心打坐的慈善的出家人。

我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想要进入囚室里去，去触摸一下这个令人百思不解的囚徒的心灵，我甚至在想，如果我处在他的情景，我会在想什么呢……

我知道这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除非特犯违反监规，以及在生活上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指令外，一概不能和他们谈其它问题，就是说，不准随随便便和他们说话。

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觉悟高的人，我既没有当过五好战士，也没有立过功，我也毫不认为我是个高瞻远瞩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我不是木头，我有我的思想，我就是不相信，和反革命说话就成了反革命？和叛徒说话，就成了反党反毛分子？

我天天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讲路线，讲阶级斗争，讲防修反修，讲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实，我这个政治指导员，也是满脑子问号，一肚子

糊涂浆子，我不过是天天在这里昧着做人的良心，自欺欺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所以，不论我还是谁，不是自欺欺人，也该是忠极则迂。——为什么我不理解的却硬象个教员一样讲给别人理解呢。

唉！我暗暗叹口气，不由的想起李大胡子的话：“任务特殊，情况复杂，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你是全师最年轻的指导员，你知道为什么在近百个连队里专门挑选你们连来担负这个特殊的任务吗？我知道，你过去警卫过他们，你要把自己的感情和一切不理解约束在政治纪律中，从大局出发，且不可感情用事，给整个警卫部队捅出漏子。”

不错，自古以来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我终于克制了自己，没有进到囚室里去，我放下了小白布帘子，象例行公事那样，继续去察看第五号、第六号囚室。

但是，我一定要钻进囚徒的心灵中去。这个愿望象一颗熟透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心窝，我不知道为什么。

三、B克——黑色的大屁股

——在士兵的心目中，它是伟大旗手的代名词

大约是下午两点多，小院门口出现了一辆卧车，车窗用紫褐色纱帘遮着，看不到里边的人。

卧车比大红旗和吉斯轿车稍短点，一码儿黑，车头很低很小，车尾却很大，从后边看去，整个车体就象个大绵羊尾巴，又象倒扣过来的鸭子屁股。战士们头一次看到它，还以为它的头是尾巴，而尾巴是头呢。

这是一辆专门用来提审特犯的交通运输车，美国造，朝鲜战场上的俘虏品，名之曰：B克。当年，我们老团长王夫从毛主席那里要了一辆伏尔佳，虽然这辆车跑起来发飘，也算不容易了，因为当时只有部长级干部才能坐这种苏造进口车。王夫没坐上一年，被卫戍区某位首长用陈旧的老B克换去了。别看B克老了，跑起来很快，伏尔佳望尘不及。从怕劫犯人的角度考虑，车越快越好。

B克是历史的见证。我们一看到B克，就想起了有关 旗手的传说。据说，我们的旗手还是个老来俏呢！她不但进口了法国的假发、意大利德黑兰的假乳房，而且，还异想天开的要花上万元进口英国的大屁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的大屁股难道也比中国的美吗？副连长孙旺 解 释 说，“一定是洋人的屁股轻松柔软更富有弹性。因为洋人吃的比中国人好——牛奶，面包加黄油；而中国人吃的是窝窝头大咸菜！”我当时听了害怕得要死，我对孙旺说：“你小子好大胆，诬蔑旗手，要坐牢杀头的呀！”孙旺眨着鬼眼睛，连一副小黑脸小黑眉都很生动，他使劲吸着烟说，“私下传说吗！你本事再大，你还能挡着群众的私下传说吗？你能割掉亿万人的舌头吗？你能把亿万人的心都割出来用政治显微镜照个清楚吗？”

好象我是个被赶下台的暴君，正被他控诉。孙旺似乎终于发现我是指导员，口气缓和中仍然带刺地说：“不过，理解点说，中国年开六秩的一介老妪，栽上洋头发，装上洋乳房，再安上洋人的假屁股，也算得上是土洋结合洋为中用了。”

传说毕竟是传说，而且传说的很粗俗。但人各有憎爱，有什么道理强迫人把憎爱颠倒呢。纵观古今，那些操着生杀大权的帝王将相们，有几个能够真正地强奸了民意呢！他们最终不能！这样想来，孙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不知道与这个传说有什么联系，反正战士们给B克 起了个名副其实的雅号——黑色的大屁股。只要一看到B克 来了，就免不了私下议论一番：

“嘜！大屁股。”

“看！大屁股又来了！”

按照规定，提审特犯要专用军用的B克，还要摘掉军用绿牌，换上地方白牌，以免惹眼。而且，由警卫连派一名干部和两名战士随行，车上还有固定的座次：干部坐在大屁股前边，与司机并排，特犯被两名战士夹在中间，坐在大屁股后边，待案犯提审完毕再押回特监囚室。自从我们连进驻小院特别监狱以后，中央文革专案组便开始提审特犯。四十多名特犯，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专案组。名之曰：中央文革专案组，简称中央专案组。

起初我们认为，这些成批成批的特犯，在社会上七揪八斗，性命难保；现在他们被我们监护着，就象进了保险柜，外人既不知道，更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至于他们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发展，一定会在英明的领袖和正确的政策指引下甄别清楚。因为党经常这样告诫我们：我们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我们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其实，我们想的太简单了，阅历的浅薄和政治上的单纯，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引到了天真无邪的世界里，在意识的荧光屏里，除了黑便是白。我们只习惯用直线的目光看待一切。当然，天真和简单也不是永恒的。我们这些大头兵毕竟不是木头，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原是幕后的东西慢慢地通过一定形式在前台表现出来，我们中央警卫部队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恰恰便是这前台和后台之间。

今天我们通过专用电话接到的命令是专案组提审28号。

凡提审特犯，在一般情况下，均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副连长孙旺带领战士前往，这是连队干部的分工。

由于有些专案组对特犯非常狠毒残忍，动辄拳打脚踢，

打得鼻青脸肿，目睹的战士十分反感，他们的逆反心理使上级十分担心，因此，指示我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队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并要我们集中时间学习林彪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指示。但是，越学越讨论问题越多。问题越多，谁也解释不清，只好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对老连长管东春说：“28号专案组最不讲政策，他早被打的浑身是伤。这次提审28号，我想亲自去看看，以便掌握情况，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

老连长摘下黑框眼镜，用衣角慢慢地擦着，好半天不说话。

他没有文化，他常说，戴眼镜的都是文化人，老子斗大的字不认识半升，不知爹娘怎么搞的叫我也戴上了眼镜。听说五七年送他到军校学习，他象夏伯阳一样，说自己是菜汤里的烂山药，晃来晃去没意思，还不如在连队呢，他就这样跑回来了。直到五八年我当文书时，还替他写家信呢。他人很正直、沉稳，已经38岁了。我从给他当战士爬到当文书、秘书、组织干事，而今，我又奉调回到五连当指导员，他依然是连长，成了我的搭挡。我总是有点不好意思，似乎中国传统的辈份不能变。我从下级变成同级，这不是变辈了吗。

他对我的到任，既高兴、尊重，又有那么点慈父般的家长式作风。但我们的心是相印的。

“好吧。”他终于戴上了眼镜。他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眼镜摘下来，直到考虑成熟了才戴上讲话，这和他平时的粗暴没文化一点儿也不相称。他垂着眼皮，露出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说，“你去看看也好，和孙旺一块去。咱们是臭当兵的，不能干涉人家，只能用语录去说话。政治工作上操场上食

堂，现在又来了个什么政治工作上大屁股……”他说的很难听，但我敢担保他是党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28号被两个战士架上了车，不知是被打的，还是因病，总之他走不了。大屁股冒了一股烟，拉着我们，经过万寿路，绕过五棵松，故意白转了一大圈，这才开进了北京西郊罗道庄一座小院子。

这座院子是中央警卫部队三军仪仗队——即仪仗营的驻地。六四年刘伯承元帅的小儿子胖墩曾在这里当兵。这小子那年十来岁，体重已达一百五十斤，又矮又胖。刘伯承本来是叫他到连队锻炼的，可他贪玩，整天抱个皮球，不愿上岗，也不愿操练，连队干部也不敢硬管。但他不调皮捣蛋，很活跃，逗人喜欢，干部和战士们把他当成精神调解剂，小玩物。那时我和其他人一样，曾怀着好奇心来仪仗营看看元帅之子，所谓“将门虎子”，所以我对这座小院是熟悉的。

院子与两年前没多大差别，三排小平房，一面红砖院墙，构成中间一大片空地，空地便是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孤零零的、生了锈的篮球架和一副单杠。

下车后，由专案组的人指引，押着28号走进左边朝南开的一排平房中间的一个小屋子。

屋里的窗户用报纸糊住，木板门上有一小块玻璃。屋里有一张二屉小桌，桌子周围有三、四把椅子，桌子前边有一个小方凳。正面北山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像两边用粉黄二色的纸写着标语，一条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条是向毛主席请罪。那笔体拙劣的再也无法形容，就象几条死了半月的大麻虾，尤其是“严”字，那一撇撇到了标语的最底角，活象大麻虾上还挂着一条黑色的蛔虫。

28号走进屋里，很知趣地自动面对墙站好，似乎那标语是老祖宗早就留有遗训赐给他的一样，规规矩矩地站在标语下边，头扎进胸脯里，腰弯得跟标语上那条麻虾一样，默默地请着罪。

28号姓邓名洁，是个部长，什么部不清楚，他是特犯里职位最低的，年约六十多岁，一个连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的矮老头，宽脸，给人感觉象豆腐房里的老师傅。他穿着一身旧棉衣棉裤，旧棉衣是连队换装时炊事员上交的，不但满是闪光的油渍，而且袖口、膝盖和裤角、肘部都露出了棉花，上身没有衬衣，下身没有衬裤和裤衩，一身破棉衣又肥又大，棉裤腿挽着一节，就象小说里的帅克一样，有点既可怜又滑稽。

听说他已经没了家，儿女们没有下落，老伴也被逼得不知下落，所以没有人给他送衣服和粮票来。由于造反派、专案组连续批斗，他原来的衣服撕扯破了，浑身血迹。当把他交给我们连的时候，怕给部队造成不好的影响，团长王夫和政委李大胡子临时擅作主张给他把血衣扒下来，仓促间找了一身旧棉衣。在司务长陈青给他换衣服时，我和老连长都在场，只见他身上有许多伤痕，有当年日本鬼子留下的，也有当今的，还有新伤未愈的。每一块伤疤，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问号，这伤疤在我们心里构成了许许多多至今还未彻底弄清的问号。当时老连长故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喃喃答道：

"敌人怕我忘了，给留下的纪念，也有……"他很机敏，似乎又很胆怯地不再往下说了。

在介绍特犯情况时，我们还得知，他十八岁时就是中心

县委书记，当过省委书记，中央某部部长，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敌人曾悬拾万现大洋重赏要他的脑袋，拾伍万要个活的，本人投靠自首给个高官。

现在，他是被中央文革专案组正在审查的叛徒、假党员、变节分子，一贯的右倾、一贯的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等等共九大条罪状，每条罪状里还有三、四条或七、八条具体罪状，就象十八层地狱一样，每个地狱还有许多小地狱。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次，他正在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忽然间台下有人大喊一声："他是个叛徒！他反对毛主席！他出卖了许多支部书记，瓦解了十几个支部！"这几句话也不知谁喊的，但非常的灵，就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书，立刻有数十个造反派一窝蜂般地冲上主席台，从此他便成了专政对象，是政治还是儿戏，谁也说不清，谁也不敢说。

小屋里很冷，刚生的炉火不但不暖和，而且因为返风还冒着倒浸烟。28号咳嗽的浑身一抖一抖的，我感到地球在抖。

当咳嗽停止时，28号象栽在那里的一座泥胎，面对标语纹丝不动，从后边看去，很象个土里土气的正在讨饭的老乞丐。这情景使我感到很悲凉，悲凉的我，就象小时候看到我那在逆风中正乞讨的老父亲一样。

几分钟后，专案组开始审问。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中年人，一胖一瘦，胖的象个上下一般粗的油桶，瘦的象麻杆，他们都穿着军衣、戴着新的帽徽领章。他们都披着军大衣，另一个年轻人也穿着军衣，但没有帽徽领章。两个中年人腋下都夹着黑色的公文包，高仰的头显得威严而不可

一世。油桶和麻杆一进屋，便旁若无人的坐在椅子上。油桶把公文包往桌子上一丢，点燃一支烟，他抽的是“恒大”，我烟瘾很大，他这一反射我连忙掏兜，点上了一只“战斗”，我这个连干的工资，充其量只配抽“战斗”，一盒“战斗”一毛五。尽管这样，我每月抽去的烟钱相当于我母亲五八年三年的口粮。“战斗”已经使我感到很对不起我死去的父老了。

我和油桶互相对峙着，一人吐出了一口烟儿。他的烟是白的，我的烟白中带黄，又干又呛。胖子似乎很看不起我这个大头兵，用不耐烦的口气说道：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吧，有事再叫你们。”

要不是和他站在对面，我真会以为这是个女人呢，他的声音比我二嫂的声音还细！

我断定他们是假军人。文革以来，包括江青在内，许多人忽然间穿上了军衣，军衣身价突然倍增，谁穿上一件，谁似乎就从此革命了，就跟《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割去了辫子从此革命了一样。可惜，一个真正的军人姿态，应该是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而这两位专案大员，连一点起码的军人姿态都没有，他还礼的时候，吊弓着腰，五个手指扎煞着，就象用五股粪叉正要去插那颗圆脑袋。

后来证实，我猜的一点不假，他们是临时抽调的冒牌货，而且为了给特犯施加压力，还拉进一个造反派首领，这样，凡出现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可以统统归为“群众运动和群众行动嘛，可以谅解的。”

随行提审特犯也有规定，我们只负责看押，保证安全返回。当把特犯交给他们时，战士们总是嘱咐几句：“要文斗

不要武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提审完毕再押回驻地。

这次提审，两个战士见有他们的指导员在场，好象气壮了一些，一本正经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说话的眼神一点儿也不示弱。

油桶大脸一松，小嘴一咧：“好吧，你们去休息吧！”

两个战士走了，副连长孙征拧着脖子，斜着眼睛，关顾了一下两位专案大员，也退出去了。

天气很冷，滴水成冰。我站在门外，又点燃一只“战斗”，把头接近那块小玻璃。

“转过来！”油桶发着命令，声音越大越象个老棒的太监：

“坐下！”

“继续交待你的叛徒罪行和攻击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滔天罪行！”

28号邓洁转过身来，坐在早就准备好的只有一屁股大的小方板凳上，然后又欠动着身子，毕恭毕敬地说道：

“我早报告过，我不是叛徒，我在上海没有出卖几十个支部，我更不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你不配叫同志！”麻杆吓止道。

“是。林彪。”

“你太不老实，太放肆！中央首长的名字，是你这个叛徒随便叫的吗，你玷污了首长的名字。”油桶捻着手里的木棍。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已经攥住了一根干巴柳木棍子，有二尺长，象交通警察的指挥棒。

“林彪同志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你竟敢说，要没有太阳呢，怎么会见影！这是不是你说的？这是不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没有太阳怎能立竿见影”的话，是罗瑞卿总长在六四年针对林彪突出政治的言论提出的，他为此大难临头，也正关在这里。邓洁也有此说，原来上边对林彪的话持异议者并非一人。

邓洁说：“是我说的，但不是诚心反对，是我水平低跟不上首长的话。”

“你是死不改悔，站起来！”

“你在上海到底出卖了多少支部？多少党员被杀？”

“我一个也没出卖，真正出卖的，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我已经报告多少次了，中央在肃反时也作过结论了。那个叛徒现在还埋在……”

“胡说！”麻杆打断邓洁的话，“你是逃避罪责，嫁祸于人。”

孙旺这时回来了，也对着小玻璃朝里看。

那个年轻人脱去了军大衣，顺手抄起油桶手中的柳木棍，两步跨到邓洁跟前，猛一抬脚，把邓洁连人带凳子踹倒地上，接着又把凳子放好，自己坐上，同时，把穿着皮鞋的两只大脚放在邓洁的头上，象水车一样，一边使劲蹬着，一边用木棍敲打着他的后背说：“不尝点厉害的你是死不回头！”邓洁的头随着他的大脚皮鞋一起一落的，鼻口开始出血……

孙旺“忽”地推开门。

“请不要这样。你们把他打坏了，我们怎么交待？周总理和傅司令给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他们不死不伤不跑。人打坏了打死了怎么把问题搞清楚？！”

三位专案大员一脸不悦，鼻子里放出了一丝冷气。油桶使了个眼色，年轻人又回到原来的椅子上。

我不想再看了。原来这高喊讲政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话全是他娘的鬼话。我不由试想，连正正堂堂的党中央毛主席成立的中央文革专案组都这么干，可见全国下边将是一种什么样子，难怪光我们连就一下子关押了这么多。这使我想到五八年上边号召打井，下指标，下边一夜间就便地蛤蟆坑，第二天便上报打了多少井。难道历史在以不同形式不同内容重演吗？

两个小时后提审结束了。

再看那个倒霉的28号邓洁，只见他脸色苍白，头上、嘴角上、鼻子上、脖子上、棉衣上到处是血迹，一股红血象条绳子从脸上流到脖项，鼻涕流到了嘴里，两个耳朵明显地支楞着，被揪的活象小胖蛤蟆（我们老家乡下的一种炸果子）。他一只脚不敢着地，人半死不活的。

我和孙旺交换一下眼色，一句话也没说，两个战士把他抬到了B克上。

当夜，孙旺跟我谈起白天发生的事。他告诉我，他们把邓洁打昏以后，还说他装死，一人揪住一个耳朵，使劲往上提，就这样愣把他揪起来，耳朵的筋给抻断了，所以两个耳朵垂得象蛤蟆。

“这哪象共产党干的事！”孙旺叹息着，“人被折腾几个小时，又出汗又流血，他要水喝，我赶忙去伙房端来一大

碗凉开水，那个胖子接过去，把碗放在地上，他们一人倒拧他一只胳膊，让他爬在地上象饮牛一样叫他喝，而且脚踹着背，这不是现代法西斯吗！”

孙旺一拍桌子站起来，见毛主席语录牌用粉笔写着“三忠于”、“四无限”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拿起板擦“呼呼”几下抹掉，抓过粉笔写上了七个大字：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七个大字后边划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那惊叹号是这样写的“！！！”，就象三把正在滴血的利剑。

我一直沉默着。

做为指导员，我能说什么呢，我既不能说服他，更不能批判他，那种自欺欺人的说教我再也不能昧着良心去重复了。我记得老政委说过一句话：需要用时间、血泪和生命来证明的真理，怎么可能用几句说教来代替呢？我倒是想，这种瞪着大眼说瞎话的说教究竟何时才能结束呢，我们的国家民族难道就这样地永远延续下去吗……

孙旺见我不说话，哼了一声，转身要走。此刻，副指导员庞艾走进来。他抬头看到语录牌换了词儿，并且有三把滴血的剑，老大的不高兴。因为原先那语录是他针对战士的情绪写的。他看看我，看看孙旺，又看看黑板，连小麻脸上的小白麻子都跳起来了。

“这是谁写的？”

“我！”孙旺瞪着血红的小眼睛，“怎么样？”

“好，上学不多，字满漂亮。不过，我刚写上，你为什么要换？”

“因为需要换！因为不换不行！因为不破不立！因为大

屁股太……”

不知为什么，他俩向来是死不对眼。

庞艾有两片好使的嘴，小嘴一张还打着响嘴：

“我说副连长，你怎么把提审犯人的刑车说成大 屁 股呢！咱们担负看押任务，你又负责警卫工作，这可是政治问题，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我的屁股坐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坐在中国人的道德良心上。你的屁股到底坐到哪去了？！”孙旺的小眼睛似乎瞪出了血。

庞艾惯于选武器，都说他有政治武器库。名 曰：庞 氏武器库。这会儿又选出了要命的尖端武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叛徒、特务等等，他们就睡在我们的身旁。你看现在，咱们和他们不是正睡在一块吗，不把他们打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能安全睡觉吗？”

庞艾的武器称得上重型原子弹，打得孙旺有口难言，只气得“你……你……”

庞艾象个旗开得胜的胜利者：“别你你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让我接着跟你说。”他又一咂响嘴说道，“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 客 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林彪同志也指示我们说，这场运动，就是要突出一个打字，好人打好人，是误解；坏人打坏人，是乱了敌人；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受锻炼。总之，打就好，乱就好，不打不

乱出不了红彤彤的新世界！”

孙旺刚要张嘴，庞艾又接上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说你站到哪去了？！”

孙旺终于挤上一句话，"那你说说看，毛主席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呢？百分之九十五又怎么解释？”

"是的。”庞艾方寸不乱，振振有词，"毛主席还讲了，矫枉过正，革命嘛，就是要过点分，不过分，能正过来吗？”

孙旺被噎得喘不上气来，冲到庞艾跟前，指着鼻子说道：

"好！好！你说的好。你左也是理，右也是理，反过来是理，倒过去也是理，你围着地球转八圈全是你的理，你是个真理疙瘩，你是真理的化身，真理的老祖宗！行吗？”

庞艾以胜利者的姿态冷笑着，"别冲动，要讲理嘛，有理不在言高。”

孙旺不知说什么解恨，此刻嘴没了把门的，突然冒了一句：

"你小子，他妈的就会给旗手端屎盆！”

"你诬蔑首长，我去告你！”

"你最好上中央去告，老子大不了进第45号囚室，可惜咱还没这资格呢！”

"你太危险！”

"你太卑鄙！我知道你是怎么爬上来的！”

"我看你迟早要栽跟头！”

"老子趴下也要象个人，不象你，活着也象个虫！一条

虫！”

孙旺的拳头已经攥得暴出了青筋，看样子就要打起来，我急忙劝阻：“算了，算了。这样吵吵闹闹叫战士听见多不好，你俩都要作检讨！”

庞艾虽然嘴横，也怕孙旺动武，因为孙旺是全师有名的擒敌技术能手。庞艾心虚地首先退出去；但出了屋门还在阴阳怪气地嘟囔：

“怪不得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要‘上批刘下批牛’，原来到处都有牛……”

四、江青视察记

当晚，师部礼堂演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我们离师部很近，步行只需半小时，因此，凡是看电影看戏我们都到师部去。按上级通知，执勤部队除了按规定留下执勤、守营的以外，其他人都要去看，这是政治任务。谁要是不去，就会被视为对文化大革命不忠，对毛主席不爱。

这一天，我们连我留营值班。孙旺装肚子疼不去，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说："又是'临行喝妈一碗酒'。老子不会喝，不去！"

想起孙旺和庞艾的一场争吵，我真替他担心，忙劝道："孙副连长，你说话也得注意点儿，现在反军势不可挡，各大军区兵种以上的首长，除了毛主席的老亲家二炮胖副司令以外，还有几个自身可保？你老子是军区参谋长，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敢……你这不是给他……"

孙旺鼻子里冲出一股冷气，说道："做人得有点做人的骨性，质性，不然那还叫人！国家坏就坏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阴阳脸、两面三刀、有奶就是娘、有草就是爹的人身上了。庞艾，在这一点上就是个完美无缺的典型。不然，他还不会

象侍候亲娘一样给旗手端尿盆呢！”

“给旗手端尿盆？”我有些吃惊，“你可不要瞎说，现在一句话当个反革命被杀头绰绰有余呀。”

孙旺往床上一仰，轻蔑地一笑：“怎么叫瞎说呢，这是真正的海内奇闻。当时你在团政治处，正去支左，没人给你说，你自然不知道。师长说：‘关于端尿盆的事儿嘛，我的意见不准给任何人说，以免影响首长的光辉形象。’不过，你是指导员，给你说说没关系。”

接着，孙旺活灵活现地讲了端尿盆的故事。

那天很热，孙旺正带领战士在烈火一样的太阳底下练擒敌技术拳。

谁也没有想到，旗手带着几个随行大员在师首长陪同下忽然出现在警卫连操场，并且要和警卫战士们开个座谈会。开什么座谈会？大家一猜就知道，她是一个点火放风的风火神。

旗手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衣，军衣死包在身上，紧巴巴的。但乍从整体上看，倒也显得苗条、潇洒。人配衣服马配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大热的天，她还带着新军帽，而且，按照她的习惯和爱好，不戴女兵帽，而是戴有遮荫的男帽，帽沿遮住了她那四四方方的大门楼头，挺胸撅臀，形象挺拔，猛一看象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女军人。可惜的是，她仰着头，梗着脖，迈着方步，拿着架子，加上一副茶色眼镜，显得过分地机械做作。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极其相似之处，她和清末的慈禧太后一样，特别喜欢打扮男相。

连队没有专门会议室，座谈会就临时安排在俱乐部里。所谓俱乐部实际没什么可“俱乐”的，只不过是连队的会议室罢了。

俱乐部里有一副陈旧的脱了漆皮、裂开了两条大缝的乒乓球台，这便是会议桌。

一进俱乐部，陪同的师首长一再解释，这里条件不好，请首长原谅。旗手摆摆手说：

“同志们呐！这就很好啦，在延安的时候，我听咱们毛主席上课，就坐在一个四寸宽、八寸长有两寸高的小 木 凳上，连屁股都放不下呢！革命嘛，就是要艰苦奋斗。太舒服了，太安逸了，太幸福了，那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会 变 修的。你们说是不是？”

“是。”官兵们异口同声。

旗手坐定后，摘下军帽，环视着在坐的人。官兵们也象看皇后一样，睁大眼睛注视着神秘可畏的旗手。她是主席的夫人，人们总是以一睹一品夫人尊容为荣。

警卫战士小道近道消息多，早就听说当年主席娶她时，政治局常委就有约法三章，其中“一章”就是她不能进政治局，一句话就是不能参政。主席也说过，“谁不愿意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呢。”现在主席夫人驾到，都想仔细看看天下第一夫人究竟何许模样。当然是有敬慕的，有感动的，有受见若惊的，有庆幸自己获得“独家新闻”，以便给战友同乡摆活摆活的，也有小脸蛋红红的热泪盈眶的。

但作为多数人来说，却特别注意观察旗手的头发、胸部和臀部。因为大家曾听说过，旗手爱美，特意进口了法兰西头发，因为法兰西姑娘漂亮，那么法兰西姑娘的头发也一定是很漂亮的。可是，无论大家怎么看，也看不出这头发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是原生的还是后安上的，总之那头发油光锃亮，整整齐齐，又浓又粗，绝不象六十老妪那样竹黄叶疏。

至于是否是假乳房和假屁股，就更难窥探庐山真面目了。

旗手连风纪扣也扣上了，她总想把自己打扮得风度不俗，气度不凡，一副不寻常的伟人模样。糟糕的是，天很热，俱乐部里人很多，战士们整天执勤操练，至少半月才能洗上一次澡，这里又没有她常用的空调，也没有电扇，室内闷热和汗臭，再加上全部是胶鞋的汗脚臭味儿，旗手显然是受不了了，她微微地皱了皱眉。一坐下来便脱去了军衣，露出了哆哆嗦嗦的黑色半袖小褂，不知为什么，她喜欢黑色，连手套都是黑色的。大热天为什么要穿黑的呢，黑色不是更爱吸收阳光吗？据说，穿黑衬白，这样就显得她更白了。她的皮肤的确很细很白，有人说她是学慈禧太后，用牛奶洗身才这样白的。

庞艾一直在寻机接近旗手，一见旗手酷热难耐，急忙把自己的扇子拿出来，双手毕恭毕敬地递过去。旗手说了声“我有”，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一把褐黑的小折扇。小扇看起来很平常，比普通扇子还短一点。其实，太不平常了。这把扇子是明朝末年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后来降清的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园园用过的宝扇。抄风一起，落到了叶群手里，叶群为了讨好旗手，又特意做了一把雕花扇盒，连同扇子孝敬了旗手。小扇两面各镶着三颗明珠，十八条扇翅，每条扇翅里都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小匕首。当必要时，便是得力的进攻武器和防身武器。但如果不使劲按动中轴使匕首弹出，你无论如何也难以发现内藏一排要命的尖刀。

旗手哗啦一下扯开小扇，一边扇着，一边象往常那样开口先说道：

“同志们！你们好！我代表咱们毛主席向你们问

好——"

她的声音很高，声不圆、腔不正，音拉得很长，显得丹田无力，底气不足，有点颤微微的，要是闭上眼睛听，会感觉她是在零下四十度的冰雪里被扒光了衣服，冻得瑟瑟缩缩时在说话，叫人起鸡皮疙瘩，只是听不到上牙打下牙的声音。

"同志们哪，前些日子，伯达同志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呢，当然就更小了，是小小小小老百姓，因为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不过是他麾下的一个小卒子。可是呐，你们可知道小卒子的性格吗？小卒子别看它小，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一旦过河，永不回头。我呢，既然做了咱们毛主席的过河卒子，就只有拼命向前了，你们都知道小卒子过了河是不能回头的，是没有退路的。就是说呀，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庞艾比师首长还积极，第一个带头热烈鼓掌。

旗手看看没人再鼓了，这才摆摆手接着说道："不过呢，我是主张一言堂，反对群言堂的……"

官兵们一听都傻了，她怎么居然和毛主席公开唱反调，主张"一言堂"呢？旗手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忙改口道："我是说呀，我是主张群言堂，反对一言堂的，一言堂有什么好呢，只有封建皇帝才搞一言堂，眼里实际上没有群众，唯独我尊。所以我要先声明，你们都可以说。座谈嘛，就是大家坐着一块儿随便说，不分职务高低；要是站着呢，就是一块儿站着随便说了，那叫站谈。今天大家都要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和英雄创造阶级斗争的历史嘛……"（英雄和

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是林彪说的，他俩如出一辙，后来受到毛泽东批判）。

所有的干部战士都着装整齐，大汗淋漓，没有一个人敢扇扇子、脱上衣的，因此热气、汗气笼罩室内。但真正难以忍受的不是这些大兵，而是旗手。旗手忍不住说：

“你们也脱了吧！脱呀，快脱吧！我这个人是通情达理的。男不露背，女不露齿，那是旧社会。”

听了旗手的关照，老连长管东春与师首长交换一下眼色，这才下令摘军帽脱军上衣。

旗手还是坐得那样挺直，她再一次动员大家：“你们就大胆说吧，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专挑他们毛病，找出来就写大字报，就写信，给我，给我们中央文革。咱们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入档案，你们更不必怕我在毛主席耳边吹枕头风的……”

师长的嘴角抽动了两下，好象吃米饭突然咬住了砂子硌了牙；年轻的战士们都在认真捉摸啥叫“枕头风？”

主张群言堂的旗手一个人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见没人说话，又出了新招：

“活跃活跃吧同志们，咱们唱样板戏，我带头——”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纠纠……

大家跟着唱起来，劲头很足，声音有高有低，有粗有细，高的高八度，低的低八度，有羊群出骆驼的，也有骆驼里出老虎的（抢拍急进，如猛虎下山）。

尽管战士们唱队列歌曲有排山倒海之势，但一唱这七拐

八折九扣的"改良品种"，就拿不准味儿了；好象张飞裹小脚难受得没法说。

再不好也要使劲唱，唱样板戏是政治任务，是立场问题。谁料到越使劲唱越走邪，到后来就象灵棚里男女老少集体吊孝发出来的声音一样，特别是那"千杯万盏会应酬"和"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两句，简直跟哭一样。

旗手用小扇打着拍节，越打越没劲，偶尔冲着一个太大的"骆驼"用小扇一指，"骆驼"如芒刺背，马上又变成了小羊。她倒有那么一点乐队指挥的样子。

好歹是唱完了。大家也感到唱的四不象，有些人忍不住笑了，会场倒有了点活跃气儿。

旗手长长地舒了口气："好，有感情，有气派，唱的有立场，我们就是要通过唱样板戏唱出感情唱出觉悟，唱出对毛主席的爱，唱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耿耿忠心来。"

说是开座谈会，搞群言堂，将近两个小时的会，全是她一人说。

庞艾隔着乒乓球台和旗手正对面坐着，他始终聚精会神揣耳恭听，目光自始至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旗手的眼神，就象听得入了迷一样。旗手一定是喜欢这样听她讲话的人，不时地把眼神集中一下这个脸上有浅白麻子的年轻军官。

其实，旗手开始很讨厌对面这个小麻子，不屑正眼一看，但后来见小麻子如此专注地听她演讲，这使她改变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你这个人怎么有麻子呀？你年轻轻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怎么会生麻子呢！"旗手左顾右盼，显得很奇怪。"解放前入伍，有麻子的我们也要，只要他抗日打老

蒋；解放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兵员多了，就不要有麻子的了，象武汉司令陈大麻子陈再道，就不能入伍了。你这麻子是怎么回事？”

谁会料到旗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通“麻子论”把庞艾说的脸一红一赤的，一时难以回答。

老连长站起来，代他解释道：“六四年大比武，那年他还是二排副。有一天搞大比武训练，他出了一身汗，脸上起了一层小热疙瘩，卫生员是新兵速成班培训的，缺乏必要的常识，给他脸上抹了一脸红汞，一下子抹轰了，住了两个月医院，出了院留下了一脸小麻子。本来在前一年他就回老家河南找好对象了，到回去结婚人家不认他了，说俺原来的对象是个小白脸，漂亮着呢，你一脸麻子，是冒牌的……”大家都听笑了。

老连长出于严肃，没有把这个小插曲的全部说出来。庞艾带着一脸小麻子出院后，一手揪住卫生员脖领，一手指着自己的麻脸骂道：“老子娶不上媳妇我日你姐！”他是河南人，河南人骂街口头语是“日你姐”，不骂嫂子。据三排副说，姐妹早晚是人家的人，嫂子是自家人。

人们听了老连长解释，哄堂大笑，连旗手也张开大方口笑了，她一笑一道胡同，连嗓子眼都看见了。

旗手“啊”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同志们哪，你们看罗瑞卿搞的这大比武，多害人。他害了许多人不说，还要把我军拉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上去，所以林彪同志说呀，罗瑞卿罗长子，这个人身长手长，他要抢班争位，篡党夺权，你们可要站稳立场，狠狠地揭露批判他们。”旗手说到这，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庞艾：

“你叫什么名字呀。”口气很亲切，象老娘吻着老生宝贝子儿。

庞艾犹似突然触电，受宠一惊地站起来，忽地敬个礼，小白脸连同小麻子都变红了：

“报告首长，我姓庞，名叫培孝，庞统的庞，培 养 的培，孝顺的孝，名字不好听，是我爷爷给起的，老封建。我早想改个革命的名字，原先指导员是天津人，他说‘改嘛 ’？革命不革命不在名字，你给希特勒改名‘希革命 ’也是希特勒！”

“庞统坐知县，手拿把攥，五百年前是一家，也许你是庞士元的后代呢，庞统很聪明，一大罗积案，不睁眼一会儿就审清。”

“不过，庞培孝——”她轻轻地摇着小扇，“这 就 是说，要培养封资修的孝子贤孙。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怎么能为封资修培养后代呢！我看还是改了好。同志们哪，可不要轻视一个人的名字，名字上也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烙印，名字也是一个人立场、观点的反映。所以呀，我就给自己起了好多个名字，给你们说说当然没关系了，你们就不要给别人说了，比方说吧，我用过大海呀，叫过俊岑呀，还有李涛呀等等，我现在的名字，还是主席给起的呢，意思是说，象水渊远流长，象山常在，我们的红色江山万年青。”

“所以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在接见革命左派、革命小将、解放军战士时就给许多人改了名字，象永革呀，永忠呀，卫东呀，何东呀，还有爱无呀，反修哇，等等等等吧。天津驻军，有个团级干部，说具体点吧，还是个政委呢，巧得很呐同志们，他也叫什么培孝，这说明封资修多

么根深，多么蒂固，多么的普遍，他们要一代一代传 下 去呀。所以我当时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杨继革，继续革命嘛。一个团政委，你培什么孝，又为谁培孝哇，这个问题不 搞 清楚，还怎么革命啊！我听说这个先前叫培孝后来叫继 革 的人，还真继续革命，当了师政治部的副主任了呢？”

庞艾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再敬一礼说道：“请首长也给我起个革命的名字吧？”

“好吧。”旗手略一思索，“我看呐，就叫庞艾吧，艾是三国蜀将邓艾的艾，他结巴，别看结巴，‘结巴灵，左手横，瞎子急了不要命 ’，邓艾足智多谋灵得很，别看你有麻子，有德有才，人不堪貌相嘛……”

战士们忍不住都笑了，麻子脸上飞起了一片红云。

旗手解释道：“艾音同于爱，取艾的音，取爱的意，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好！好！这个名字太好了！”庞艾又敬礼又招 手 ，“从此我就把培孝改为庞艾。谢谢首长在百忙中给我起了一个革命的名字，我一定不辜负这个革命的名字，不辜负首长关怀，不辜负毛主席期望。”

这时候旗手要解手。

以前旗手外出总要带上她那特制的进口恭桶，这次不知为什么没有带，也许怕在部队中影响不好吧。连队倒是有个独眼坑的女厕所，因为旗手来的突然，没有象往常那样一听说上边来人，便连夜大搞卫生，这次来不及了，只好匆匆打扫一下，实际上无论怎么打扫也是又脏又臭，大便坑暴露，臭气难闻，还有成群结伙的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大大小小的苍蝇，嗡嗡叫着，一蹲下去，便争先恐后地爬在人们的

屁股上爬着，痒痒的人难受，叫你既不能挠也不能拍，只好边大便边左右晃动着屁股赶苍蝇，这样的厕所怎能叫旗手进去呢？

正在战士看连长，连长看团长，团长看师长，师长直搓手这种为难之际，庞艾站起来敬个礼说道：

"首长，请吧，我领您去。"

庞艾胸有成竹，口气无疑。

旗手年近六秩，老年女人难以憋尿，只见她的脸一阵黄，一阵青，想必是被尿憋的。据说，憋大便燥热心慌，浑身无力，憋小便发冷如烧。眼看旗手憋得难以忍受了，见庞艾救驾，慌忙起身跟他去了。

庞艾的脑子就是比别人灵，他把旗手领到了文书办公室，旗手挺纳闷，到厕所怎么来到了办公室？只见庞艾从床下拿出脸盆毛巾和香皂，又急急忙忙把脸盆擦了一遍，放到地上，这才说道：

"首长，请在这方便吧，厕所太脏。"说罢走出去。

部队办公室不象住家，没有门帘没有窗帘，旗手早就憋不可耐了，哪还管这些，一褪裤子便痛痛快快地完成了一次人生的循环往复。

庞艾立了一大功。旗手临走时，隔着两三个人把手伸出去和麻子握手。

庞艾不胜荣幸，特别珍惜这只曾经握过伟大旗手的手，逢人便喜滋滋地去握握人家的手，并告诉人家这是一只握过旗手的手。

当他握住小文书的手时，小文书却骂道："副指导员，你也太那个了，怎么用我的脸盆给她尿尿，你怎么不给她用

你的！”

庞文严肃地说："伟人用过的一切东西都有纪念意义，将来把这个盆拿出去，说不定还值几万元呢！”

干部改名字需要有相应任免权限的上级政治机关批准，履行档案手续。旗手走后，庞文连夜写了庞培孝改名庞文的申请书，全文是：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要斗私批修。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敬爱的党支部、营党委、团党委：

为了紧跟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永远忠于毛主席，特遵照首长的指示，我申请把我的本名庞培孝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庞文（庞文的意义附后），特此申请，请批准是盼。

伟大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致

敬礼

申请人：五连副指导员

原名：庞培孝

庞艾写罢"改名申请书"，又工工整整地给旗手写了封孝忠信。这封信有八百字，写了三个小时，先后抄了六遍，前后用了三十多张纸，直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一笔一划都满意了，这才连同改名申请书装进信封，送到了连队党支部。

团政治处第二天下午便收到了二营党委和连队党支部关于庞培孝改名的逐级报告，还有申请书、孝忠信。他的孝忠信大意是说，伟大旗手接见了我，和我握了手，给我取了名字，这是我一生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这不但是我个人的幸福光荣，也是整个警卫部队以致全军官兵的光荣。我一定用革命的名字，去实践革命的工作，紧跟毛主席寸步不离……

团政治处的同志们都传看了这份表忠心书，有的说，看了叫人肉麻，麻得觉得做人都感到羞耻。当然也有人说，写得好，有感情，说出了战士的心里话。

政治处批准了他的改名申请书，并为此下达了一个专文批复通知，上写：

收到你营党委的报告和报来的副政治指导员庞培孝同志更名申请书，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庞培孝同志即日起更名为庞艾。

此复

团政治处

对于庞艾的表决心书，政委李大胡子明确地指示组织干事小高转告二营首长，"庞向首长表忠心，这是个人的事，组织不易表态，也不易代转。"

从此，庞培孝便改名为庞艾了。

“千真万确，他端尿盆端出了前途！”

孙旺说到此，长长地叹了口气，“庞艾这小子，就是他妈的不够揍，削尖了脑袋往上爬，只要能讨好，能升官，不要说拿脸盆作尿盆，就是叫他用嘴作尿盆，他也心甘情愿。”

真的没想到，庞艾的名字里有这么多名堂！难怪他张口中央文革，闭口旗手首长，原来他和旗手还有过不算浅的交往呢。

这一夜，庞艾端尿盆的形象在我脑海浮来浮去……

五、初探囚灵

——囚室初逢彭大将军

按照干部轮流值班表，星期六晚上正是我查哨。查哨是不能睡通宵觉的，无论春夏秋冬，每晚至少要起来一、二次，对此，我们这些兵头官尾都习以为常了。

一到星期六下午五点以后，干部们就轻松了一点。副指导员庞文一到周末下午六点，照例去永定路照像馆接老婆，然后两个人一块回到十三号院家里去。老连长管东春和三排长李璧正在下象棋，俩人杀得难分难解。下象棋是连队干部唯一的一点娱乐，因此不杀得天昏地暗精疲力竭是不罢休的，有时为了"悔棋"，连长还骂娘，而李璧总是把棋子往兜里一装，伸出小拇指说："不是说好了吗！谁悔棋谁是这个！"为此俩人对骂，发誓再也不和对方下棋。但一到星期六晚上，两个武夫就象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忍不住就又凑到一块去，发誓骂娘的事谁也不再提了。一排长肖月珠和二排长张保球自称是属猪的，熄灯哨一吹，便日终就寝。司务长陈

青一到星期六晚上就喝闷酒，酒是六角钱一瓶的青白干，每次喝二、三两，喝到一半再倒上一半水接着喝。他正因为老婆长的丑闹离婚。只有副连长孙旺，总爱到处找老乡战友打听小道消息，并搜集各种“文革材料”，坐在灯下反复研究。

我的未婚妻在天津，老实说她长得挺美，我感觉她是我心中的小太阳。白天忙个臭死，连想一想她的空都没有，可周末晚上，一没事就大不一样了，我躺在床上，两手托着后脑，想她的衣着，想她的两个小辫，想她的声音，想她那走路的姿态，青春如火，现实如冰，只好叹息一声爬起来，去查我的哨。

查哨，是可以自由出入囚室的。

我着装整齐，带上五四式仿苏手枪，灯光下自我验枪之后，拿上手电，下了小楼。

各班已经全部熄灯，只有几十间囚室还闪着昏黄的亮光。囚室开着长明灯，这也是对特犯的特殊规定：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夜间一律不准关灯，以便哨兵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监视与控制。

我在后院转了一圈，又回到前院。

远处“九一六”和“九一五”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的高音喇叭还在嗷嗷叫着，由于风向不定，时高时低时大时小的怪声怪调，断断续续传到特监小院，听不清是两报一刊社论还是梁效（即两校——清华、北大化名）的大作，总之，播音员除了念悼词之外，什么时候播什么文章都是声音宏亮，激情十足。

我不由自主地来到左厢房正中一间囚室门前，示意正在执勤的七班战士刘云山打开四号囚室。

刘云山是我的叔伯叔父，只有十七岁，胖呼呼儿的小个子，瞪着一双小圆眼，象个唐代小瓷娃娃。巧得很，他一当兵便分配到了我这个连，他排行老六，我叫他六叔，但他比我小十岁。叔侄同在一个连队，或者兄弟同在一个连队，甚至双胞胎的哥俩同在一个连队，这从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已经屡见不鲜了。象这种关系，只能是司务长打老子——公事公办。我当然地称他刘云山或刘云山同志，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才能亲切地喊他一声“六叔”，而他，也端端架子，大模是样地喊我一声小名：“虎子！”

刘云山很机敏，见我示意开门，遂即从裤子口袋“哗啦”一声，掏出一大串钥匙，把标有四号木牌的钥匙插进锁里。

看着这小院，这小门，这钥匙和这个持枪的战士，我突兀生出一种怪想，这怪想是我在六四年从《红岩》小说中就种下了根儿，我不是在自辱，我感到至少我在形式上有一种斯如“猩猩”的闪念，可我是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暗暗咒骂自己胡思乱想。

说实话，我是怀着一种近似探险感进了囚室的。

我示意刘云山在门外注意观察，我得提防上边有人来查哨找我的碴子，我还得提防我的助手副指导员麻庞艾，他向来喜欢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他的小报告、暗鼓捣说的活灵活现，如铁如真，只要能讨官僚主义的好，能往上爬，哪怕被踩的人是他亲朋密友、亲爹亲娘、救命恩人，他也在所不惜。非常遗憾的是，他不象那些投机者命运可嘉，他的官运很不好，爬的很慢，以他私下的话说，‘当兵十几年，大汗苦涟涟，只长胡子不长钱。’不仅如此，有时碰上“梗脖子

佬”不吃那一套，还落个不轻不重地摔一下，他没有料到，当官的不都是喜欢溜舔奉敬，这叫舔屁股舔错了位，舔在了马蹄子上，一遇这种情况，他又反转来恨不能把这匹马杀着吃喽才痛快。

我到五连，就充当了他心目中的这匹马——他曾对人说，要不是他来，指导员肯定是我的了。他是我的副政治指导员，我原谅他爱官爱得这么心切，人对事物有这种酷爱性，也算是一大特点，这总比生在社会上作“囊囊嗜”强，他有竞争性，他会从反面使人变得聪明起来。所以我并不过分责怪他。

我的思绪从麻副指身上移到了囚室。

四号囚室里有十五瓦小灯泡，由于电力不足，加上墙壁乌黑，屋里显着暗淡昏黄。我多少有些怯。这是因为雄狮被铁链拴住也是头雄狮，猛虎被囚在笼子里也是猛虎；我，不过是个大头兵，而且是个先警卫后又看押的大头兵。我不得不尽量镇静自己，尽量装得老练沉着而又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是个牢头，我象牢头察看囚室一样审视着每个角落。

囚室虽小，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平展无折，被子三折两叠，方方正正，标准的豆腐块，比我们的战士叠得还要好，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一个老兵之手。

室内有一张桌子，一把鸭黄木椅，一张木床及洗漱用具。桌子上放着几本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书，毛著有四卷和选印本及语录，还有《人民日报》，钢笔、铅笔，除此之外，别无它物。

桌子紧靠右山墙放着，因为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我尽可能站到他的右侧，观察他的表情。做为看押他的我，

我觉得既威严又可笑，既光荣又可鄙，总之，自我感觉忽然象个唱戏的，做作的极不自然；我一下子失了真，我的确是这样感觉的。然而，无论我如何做作，如何惶恐与不安，他都好象根本没有看见我，他象往常那样，依然端坐在鸭黄木椅上，身着蓝色的裤子，浅灰的上衣，棉布鞋，头戴一顶蓝色的克郎丁帽。他正在平静地读着一本竖排本大字毛选，用右手的食指捋着，一字字，一行行地看着，那认真的样子比刚入教室的小学生还规矩无邪。我探头注目细看，他正在读的是“井岗山的斗争”一文。

他的神态安然纯朴，浑厚而又略显沉郁，厚厚的八字嘴唇紧绷着，绷到了极点，给人感觉稳重如山而又冷若冰霜。

我心里一阵惊叹。

啊！我面前的他就是真真切切的彭德怀？他就是为人请命被罢了官的拧脖子诤臣的彭大将军吗？他就是那个在庐山会议上竟敢和举国之首的毛主席骂娘的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吗？他是被毛主席多次称赞过的彭老总吗？

当然是不会错的，做为过去曾经警卫过他的警卫战士何能看错呢，这不过是由于感到意外和吃惊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种心态。

我好象在做梦一样，不大相信他是我看押的囚徒，他究竟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

我又暗暗地叹了口气……

他好象根本没有看见我，就象压根儿我没进囚室一样。

我的脑子有点儿乱了。

反党？反毛？旧军阀？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阴谋家？野心家？里通外国、一贯反对毛泽东？总之，他要和

蒋介石同心为伍了？！……

不！在我们的印象和感觉里，他是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彭老总啊！这是怎么回事？

他象一座山，象一株苍松，象一座雕塑，无声无息，纹丝不动。

我的头突然象被什么硬物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手心和腋下渍出了汗水，心在咚咚地剧烈跳动，好象刚刚参加过百米赛跑。

奇怪的是，他头上的帽子那么多，罪行那么重，批了这么多年，而今又提出来批，可为什么在我们干部和战士中间恨不起来，批他不臭呢？为什么反而生出许多不解和同情呢？

他咳嗽了一声，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但并未回头，也未侧头看一看，只是慢慢地点燃一只“熊猫”牌香烟，猛吸了一口，继而，缓缓地、长长地吐出一缕轻烟。

看着面前无动于衷的他，我不由想起了那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库，公共食堂，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我想起了可怕的“瓜菜代”年月，人面如灰，肿的肿死，瘦的瘦死了。人不怜人天怜人，潴龙河水默默地把那些饿不可支、走投无路的华夏子孙们接走了，它永远无代价的把许多父老兄弟们接走了，他们和她们终于去了真正的天堂，他们永远地超脱了。亡魂都是在册的，在我们蠡县官方统计表里，写着“986个”直接饿死鬼！但在本人和所有的亲属档案里，都美名曰：“非正常死亡……”大约每一个亡魂组成了一个汉字，这汉字拼成了当年他那既臭名昭著，又或许万世流芳的为民请命的万言书。

我终于思悟到，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什么对这个罪恶深重

的四号囚徒如此爱过于恨。其实，我常常想过， 但不 敢 深想，那大脑深处的先天的和后天的警戒线是十分鲜红的，只要越过一点雷池，那便是不可思议的。

可能是因为我在他身边站得太久了，他忽然慢慢地侧过头来，无言地看看我，又点燃一只“熊猫”，大口大口地吸着。

“熊猫”是他固定抽的南京出的香烟。刚来这座小院不久，他提出要买烟。连长管东春破例准许每七天或十天派战士为他到永定路商场买一条“熊猫”。“熊猫”在小囚室散发着香味儿，我还是从他来这里后才知道竟有这么香的熊猫牌香烟。我想，大约一盒“熊猫”的钱可能够买一条我抽的“战斗”吧。

我实在忍不住想搭话，但又找不到话茬。我怕什么呢？我想，他虽然是个威震中外的大将军，我是个年轻的小小指导员，可我毕竟是狱头，是看押他的顶头上司了。

有了！我忽然想起我同年入伍的一个老乡，那时他是县委的一个小交通员，名叫王文要，他入伍的第三年就奉调去给朱德当警卫员。自从“大跃进”以后，两颗年轻而单纯的心对国运的所谓焦虑感，常常使我们不可抑制地彼此交换心声与秘闻，彼此倾吐着无处去说也不敢说的心底话。我们曾对天发誓，彼此说的话，谁要是往外传，出卖对方，去捞政治资本，谁就他娘的遭雷轰、挨枪子儿！这样的发誓就象吃了定心丸一样，使我们解除了彼此一切戒备，敞开了心肺。他曾经抄给我一首一九六四年底或一九六五年初，朱德写的几首不曾公开的诗句，其中有一首饱含了深深的焦 虑 。 现在，我不妨把朱德的这首诗给他听听，于是我贸然说道：

“朱老总有首诗，我看不懂。”我轻轻地、轻轻地吟着……

他正在指读毛选的手停住了，抬起头来，眼睛眨了一下，这一瞬间放出的光亮，就象夜间突然打开的电灯。但他没有说话，又继续看着毛选。

他不说话，对我是一种冷遇，这在特别监狱里是罕见的；要是别人，我可能会生气，会以“典狱长”的身份训斥他几句。可对他，我没有。我意识到，他并非出于轻视我。

“我是这个连的指导员。”现在我倒平静了，“从小受苦，一家八口人，两床破被子，没有枕头，和你小时候一样讨过饭（这是他在写的检查中提到的），吃过带皮的棉花籽，高粱帽、谷糠和树皮，两个哥哥饿的当了兵。”我想告诉他我的身世，拉拉感情，拨开大将军盘石般的嘴，探一探人间的秘密。

“我大哥是吕正操总司令的秘书，二哥还参加过你指挥的百团大战呢，后来在娘子关身负重伤，差点丧了命。我无限热爱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但是……”

他似乎听着，似乎没听，只是不停地挠着痒痒，挠了胳膊又挠腿，嘎吱嘎吱的，象我爷爷冬天在太阳底下，挽起破棉裤，使劲挠着由于常年不洗而形成的鱼鳞似的腿发出的声音。

我知道他得了皮炎。他们在这里没有资格洗澡。

“我知道你曾写过一首诗，是我的战友告诉我的，这首诗后来就成了一首反动诗。我小声背诵着——

青壮炼钢去，

锄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与人民鼓与呼……

“听我娘说，五八年庄稼长的最好，可是没人收，青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修水库，棉花白花花的一片没人摘，红薯用犁一犁，老婆婆小孩子一捡就拉倒；结果来年春天就开始挨饿……‘来年日子怎么过’，真是一点儿不假。”

他的手指不再指毛选了，微微抬起头，注视着墙壁。其实，他眼前似乎根本没有墙壁，那神态就象在注视着遥远的远方。

“你不要怕，我不是中央专案组的人。”我极力压低声音，声音有点发颤，“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是兵头指导员，我象千千万万个战士一样，庐山会议后，我们对你有许多不理解，比如说，你为何要反毛反社会主义呢？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说的那些话，是向党和毛主席进攻，那全国，包括我娘在内，七亿人不大都成了反党反革命分子了吗？”

“你问我，我去问谁呢？”我似乎成了四号，自己提出了问题，又在心里为四号辩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三代受苦从小根红叶红的人居然生出一股“邪气勇气”。我期望他不必对我有什么戒备，我始终认为我在囚室的言行是犯禁的，但我依仗根红，胆大包天了。不过，这是有意义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是猪，不是木头，他应该有自己的头脑、思想与思维。

我真有点居高自傲，我是否有点想在他面前显示一下自

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呢，我不知道。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哪怕是在表情上，肯定我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不一般的青年小军官。我的骄傲情绪和与众不同总是遭到大胡子政委的训斥。在囚室这个敏感的地方，我又一次冒险犯了老毛病。

我的代价是不小的，我期望他理解，我聚精会神，注视他的反映。他还是他，他似乎不在意地看了我一眼，是并非冷漠与蔑视的斜视，又恢复了原状，继续看着毛选。

蓦地，我看到他右眼的余光投向了猫眼，这种侧视的眼神只有受过标准队列训练的军人才会具备……

"浑蛋！"我急忙走向小窗猫眼处，冲着瞪圆眼睛朝囚室里探视的刘云山骂了一声……

在此之前，我来过四号囚室几次，我给他倒过水，叫卫生员给他看过病，但从来没说过一句话，象今夜这样，只有当刘云山值班上岗时才能做的。

我觉得四号对我没有恶意，但也说不上好感。

我看了看表，时针指向十点四十分。

我不甘心就这样在外围打转转儿，我要直来直去，说说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这两个谜在头脑中憋得实在是太深太久，太令人难受了。我是中国人。我是华夏子孙中的一员。我是个有良知的不算高级也不算低级的灵性动物。

想不到刘云山此时咳嗽一声，并啐了口唾沫，这是个信号。我急忙退出四号囚室，边走边大声说道：

"好好交待检查，免得皮肉受苦！"

六、小卫生员与大囚犯

——他被指责是和人家睡一个被窝的问题

我以为是团部或师部的干部来查哨，趋步到院里一看，是炊事班长郑有田，只见他穿着白裤衩，光着膀子，一手捂住屁股，一手捂住肚子，弯着腰，慌慌张张往厕所跑。

炊事班紧挨着一号陆定一的小别墅。“别墅”是战士们给囚室起的创造性的代名词，是戏谑，是讽刺，还是另有意味，没有研究。

这夜郑有田出尽了洋相，只见从炊事班到厕所的这一段路上，拉了长长的一道稀屎。他是个没大出息的大好人，籍贯河南省长葛县人，矮胖子，白得象契诃夫小说中的“洋脂球”，爱吃肉，特别爱吃大肥猪肉，吃罢肉又特别爱喝凉水。每次吃炖肉他又必然拉稀，下次还吃还拉，还拉还吃，循环往复，总之是记吃不记拉。他脾气很好，战士们爱和他

开玩笑，甚至骂他他也是哈哈一笑了之。所以给他起了个并非贬意的外号，名之曰：哈哈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兵，后边我还要提到他）。

闹了一场虚惊，我不放心，想再回到四号囚室，忽然又传来痛苦的呻吟声，那声音尖而嘶哑，好象是在受着重刑，听着令人心惊发炸。

声音是从十三号囚室传出来的。刘云山惊呆地望着十三号囚室，不知如何是好。

我这个小叔叔，并未因为我刚才骂他而表现不满，他分明懂得在部队"司务长打老子"——公事公办的道理。

十三号囚室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囚天下"。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副手。北京市被指责为以彭真为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窝子。旗手是这么说的。既是黑窝子的人，当然要沾黑窝子首领彭真的光，而一锅糊了。而刘仁更惨，他是当年华北地下城工部的头儿，城工部被打成叛徒窝，他是当然的窝主，因此，一副脚镣把脚骨都勒出来了。陈克寒受苦难熬，常常试图摆脱似的辩白说："我和彭真不一样，我不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其实他无意地给彭真做了反党反毛的旁证。围绕陈克寒被整得嗷嗷叫和扯咬彭真，有的班的战士曾有两种观点进行激烈的争论，其中有一派观点说："你不要一提叛徒就说罪该万死。咱们班十二个人，假如大家被捕了，都在受非人堪受的种种重刑，我敢打赌，十二人至少有十人受不住！"这一观点虽然非常可怕，也令人咂舌，因此，陈克寒还是得到了战士们的照顾，把他放到了十三号囚室，这是因为，十三号囚室离厕所很近，是穿堂厕所，也就是说，从

十三号因室后山墙开了个小门可直通厕所，陈克寒因不能走路，可以减少许多痛苦。

陈克寒经常疼得嗷嗷叫，我想这时一定是疼痛难忍了。我推门进去，只见小卫生员孙立达正给十三号陈克寒推拿按摩，他脱去了棉袄，只穿一件小白粗布衬衣，挽着袖子，一脸稚气，年仅十八岁的红红的小脸蛋儿上滴着汗珠。见我进来，只用眼神和我打个招呼，继续给陈克寒捏着双腿。

陈克寒胡子老长，人瘦得只剩下一把干柴似的骨头，尤其是两条腿，细得和麻杆实在没什么两样。不仅如此，他被押进小院以前，已经被整得瘫痪了，双腿经常抽筋，一抽起来，大汗淋漓，痛不欲生，抱着双腿在床上打滚，嘴唇咬破了多次，有一次疼得从床上掉下来。每次发作都面色苍白，无力地喘着粗气，常常叹气说："还不如死喽好。"人都快折磨死了，专案组却不准送医院治疗，也不准请医生看，理由当然还是那条"真理"：他是反党反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当然，还有那条三个一切：一切服从政治，一切服从阶级斗争，一切服从专案组。三个"一切"居然取代了另一个三个"一切"：一切英明，一切伟大和一切政策。

然而，做为忠心耿耿的中央"御林军"的警卫连干部战士们在进行了反复三忠于四无限教育以后，在学了多年阶级和阶级斗争论以后，在批了多次人性和人性论之后，"人性论"还居然深藏不死，善良和同情，正直和良心自打娘胎里带出来，任凭什么伟大的理论和强暴的力量，都无法消除干净。这真叫人深思却百思不解。我和老连长管东春还经常看到，战士们常常偷偷地，或者公开地去帮助这些正被批判审

查的囚徒们，给他们打水、扫地、送饭，帮助重病号或被打伤致残的囚徒脱衣、穿衣，背着象陈克寒、罗瑞卿这些难以走路的人到厕所解手，搀扶病残者上下提审车，甚至暗地里给他们传送家信。当有的特犯因病伤疼痛呻吟时，有的哨兵违禁进到囚室里去，站在囚徒的床前，默默地陪伴几分钟，做着无言的安慰。他们年轻而单纯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心灵上挂满了历史的一串串问号。他们在竭尽全力想打开这些问号，他们为此有的给上边写信以至被监禁审查后戴上个实在不算轻的历史的金属帽而中途复员了。当然只有在专案组的人在场或者上边来了人，他们才绷紧了一副阶级斗争的大驴脸，声色俱厉的象渣滓洞冷酷无情的狱卒……

看着陈克寒痛苦的表情，我觉得我们的战士是狡猾的，是朴实的。他们的狡猾和朴实都是一回事。这是政治，面对这生死攸关的严肃政治，我甚至反而象看了一场滑稽戏一样，顺着我的个性理解，把它统一起来——他们这正是真正忠于的表现，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这些囚徒都是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是决不会如此的。我们的小麻子副指导员就不一样，他一贯坚持上边说的不会错，咱们是当兵的，当兵的应该把思想都交给上边，什么也不要想，党和毛主席都替咱们想好了，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不会错的。遇到这种情况，副连长孙旺会当头一棒："你也学点马克思，学点辨证法，怀疑一切和相信一切说什么谁好谁坏，其实都是双胞胎！不信你查查历史，一对唯心主义的双胞胎！"

小卫生员孙立达终于用一身热汗和全副身心换来了暂时的安静，陈克寒不抽筋了，停止了叫喊。他喘着大气，睁开深凹的双眼，见我站在床前，略有恐惧地说："请不要批

评……不要批评他……哦……”

我默默地听着，看着，心里的滋味不好形容。他如此说是有原因的，因为麻副指导每次看到战士对特犯有所照顾，便大声斥责说“糊涂”“危险”“我警告你”“我给你处分”。

如果我不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小指导员，要在过去想见一见北京市长——哪怕是我遇到了天大的不幸或困难——也难于上青天。可现在，我对陈克寒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已经一落千丈成了我看押的囚徒。我相信拿破仑的一句话：战局瞬息万变。政治不也是瞬息万变吗！

我对陈克寒说：“你就算个俘虏，给你看病也符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你不要老叫喊了，你不能忍住点吗？你看罗瑞卿、黄克诚他们！”

黄克诚是条汉子，他把专案组顶得一愣一愣的。

陈克寒“是是”连声，可怜巴巴的。

回到楼上我的办公室，我合衣躺在床上，心里无论如何不得平静，我从小不能见杀人，不能见流血，没有弄死过一个蜻蜓或小蚂蚱，我因为无意中摔死了一个小麻雀而哭了半天。在我五、六岁时做了一件缺德事至今后悔不及——我曾经光着小屁股，用小鸡子对准蚂蚁洞撒尿，一霎时，灌死了一窝倒霉的小蚂蚁。可没过三袋烟功夫，小鸡子肿成了一条不小的紫红萝贝。娘说：“小王八羔子！往后可不许祸害生灵了，这是作孽。”是啊！我现在成了男子汉，成了一个基层指导员，可以说是千锤百炼了吧？可为什么我……我觉得我不配当指导员我在天天骗人，骗上级骗下级，骗自己也骗寄予我深望的母亲。

我是痛苦的，尽管我十九岁就作了个小军官。升迁是很

有希望的。

可是我有我违心的痛苦。我们天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又亲眼看见天天在虐待“俘虏”。身为指导员的我对马列，对毛著，对一切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自认为比别人读得更多，领会得更透，现在看来，领会得更透不如领会的不透，至少可以减少一些不理解的痛苦。可林彪独出新裁另辟新境，确实有独到见解和精辟的语言，他指示的遇到问题学毛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十六字方针，怎么就是解不开眼前的迷雾和心中的疙瘩呢？

难道我这个从小要饭三代受苦的人不热爱社会主义吗？难道我这个被毛主席共产党救出火坑的穷小子对共产党毛主席没有感情吗？……

“指导员！你给我处分吧！”

我抬眼一看，小卫生员孙立达站在我的床头，小圆脸嘟噜着，撅着小嘴，像个挨了欺负受了委屈的小毛孩子。

我忍不住笑了：“我为什么要给你处分呢？”我坐起来，奇怪地问道，“你犯了什么纪律？”

“我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不能当个警卫战士。”

我苦笑了：“好家伙，严重的路线错误！中央警卫部队×团五连的一个十八岁的小小卫生员，人称小大夫的孙立达同志，入伍才一年，居然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放娘那×的骚臭屁！你有什么路线错误好犯？我怎么没听到传达文件，也没看到两报一刊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呀？啊？！”

孙立达象个初谈恋爱初次会面的小姑娘，手捏着衣角说：“指导员，你不知道，副指导员昨天就开了团支委会，

说要给我处分，先叫各团小组讨论，然后报党支部审查，再报营部团工委批准。”

我真有点奇怪：“究竟为什么要给你处分呢？你不是被团支部评为优秀团员了吗？”

我叫孙立达坐下，他气哼哼地不抬头也不坐。一拧脖子说：

“副指导员说我敌我不分，界线不明，立场不稳，待特犯象亲爹亲娘，是路线问题，实质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我孙立达的屁股坐到叛徒、特务、走资派一边去了，还说，照这样下去，不光是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一起的问题，而是快钻进人家的被窝里去了……”

“要是钻进人家的被窝里去，那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流氓，你真是这样的吗？”我半开玩笑说。

“说我反对我就是反对呗。叫我打背包回家也行。”

孙立达已经有了对象，十八岁的小毛孩子就有了未婚妻，我得逗逗他，我说：

“说的轻巧！小政治帽子给你往葫芦瓢上一戴，你还想回家？叫你未婚妻来探监吧！”

孙立达真叫我吓了一愣，忙从上衣口袋掏出几张信纸递给我：“副指导员叫我先作检查，我写完了，指导员你看看吧。”

我打开一看，这检查也真有点特别，也真有点打背包回老家的意思。只见上面一开头写着：（原文）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林彪同志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庞副指导员又发展了林彪同志的思想，他在团支委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连的卫生员孙立达同志，不但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了一起，而且，快和人家要睡一个被窝了……”

“下边，就是我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们睡一个被窝的情形，请连首长、党支部和全连同志审查批判。”

“一、我爷爷是个老中医，我给我爷爷写信，要了治疗皮炎的民间偏方，偷着给四号彭德怀炮制了治疗皮炎的药！没见好，敲锣卖糖，各钻一行，我是卫生员，我想要钻一钻药学，学治病，四号的皮炎没见好。”

“二、我还给我爷爷写信寻问了治疗瘫痪、抽筋的药方，给十三号进行治疗，主要是推拿按摩，我每天给他推拿按摩一次或两次，抽筋一发作，我随时去，我违犯了毛主席关于‘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的最高最新指示。我还背着、扶着十三号陈克寒去厕所，正如副指导员说的，我把敌人当成了我的亲爹亲娘，我把毛主席和人民放到哪里了！”

“三、有一天，十二班战士杨大吼上岗，因突然肚子疼，部队去临时执行任务，抽不出人，我就替他上岗，在轮流放风时间，我看这帮子老头们那么喜欢放风，我就无组织无纪律的故意给十号荣高棠、三号谭政多放了几分钟，副指导员知道了，说我故意叫他们活得壮壮的，多活几年，好继

续贩卖修正主义，说我客观上是修正主义的小帮凶。我没想当帮凶，我只是没那么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立场，所以我只配打背包回老家种地。”

“四、有一次我替值班员和炊事班送囚饭，是我首先答应给七号彭真多留一个窝窝头，他过去多年习惯夜里办公，需要夜间再吃点东西。我违犯了纪律，副指导员说我对修正主义分子关心备至，如再生父母，没有一点警卫战士应有的立场，这是鼓励他们向毛主席向人民继续顽抗。”

“五、我曾对四号彭德怀说，有病别怕，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医务人员对病员应有的话，副指导员说，在特别监狱不适合。还有，我和营部军医助孙成辰叫十九号贺龙吃药治糖尿病，十九号不吃，我就和孙医助强迫他吃，副指导员说我连汗毛孔都麻木透了，想叫大土匪贺龙延年益寿跟毛主席接着斗。”

“六、我违犯纪律，私自和特犯们说过几次例行公务之外的话。按副指导员的话说，四号彭德怀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我孙立达也想亦步亦趋在特别监狱搞第二个裴多菲俱乐部，我自觉不自觉地当了这个俱乐部的主任。”

“我知道十一号孟用潜是刘少奇的秘书。有一次我和他说起三年困难时期，我说，我是山东牟平人，我们那里一人平均一分多地，要不是实行自留田，还不知饿死多少人呢！我说的最多的是和十三号陈克寒，因为我老给他推拿按摩双腿，他有一次问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今年几岁，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我说，你叫陈克寒，北京市副市长，还是市委宣传部长，你进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我泄露了秘密，违犯了保密制度）听传达文件，和报纸电台说，北

京市委是水泼不进的黑窝子。江青同志说，这个黑窝子烂透了，烂臭了，烂得一点也不能要了，非砸烂不可。他又问我，那你为什么还管我这个黑窝里的黑干将呢？我说，反革命也罢，做为医务人员我们上第一堂课就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毛主席教育的，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在几十年前就定了吗？里面也有这一条。他又问我，你不怕连累你？我说，怕，也不怕。他哭了，眼泪掉在了胡子上，我也跟着哭了。”

“七、我还告诉一号陆定一，十八号赵建民，四号彭德怀说，你们到这里来不要怕，虽然是被关押，但这比在别的地方好，这是总理给傅崇碧司令打过招呼的，总理可费了心思呢，要不然你们早落在造反派手里玩儿完了。”

“总之，我犯了路线错误，政治错误，请党组织严肃处分我吧！”

看了孙立达的这份检讨报告，我似乎进一步了解了我的战士，一个十八岁的小战士的心灵。我似乎在心里流了泪。我知道他并非想打背包回家，他是在求援。

孙立达见我看完了最后一页，这才问道：“指导员，你看……”

这时，老连长管东春从团司令部开会回来。我象找到了救世菩萨，忙说：“连长，你看，孙立达写检讨要打背包回家。”

老连长抓过信，一页两秒钟的流览一遍，说：

“你这字我认不出多少，你这心倒认识。小兔崽子，心眼还真不算少，把你这什么打背包的、路线错误的狗屁检讨烧喽，往后规矩点！长点眼！”

小东西象得了尚方宝剑，接过检讨书，哧哧两下，撕完后装进口袋，敬个礼跑出去。

我的结论是，老连长的家长式工作作风，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战士挨了骂却不恨他，而副指导员麻庞艾对谁笑谁也恨他，这是自有渗着血的道理的。

七、伟大的马克思，伟大的麻庞艾

——这种大大小小的人
是国家最危险的人

上午，由副连长孙旺带队，去后院进行擒敌技术训练。我翻看着特犯生活起居言行录，忽然想起昨晚的事情——我对六叔太失礼了。我娘从我小时流哈喇子时就常常教导我，要敬长尊，爱少小，不欺瞎瘸残人，我当了个小连座就骂我六叔混蛋，我娘若在天有灵不会饶我的。我命令通讯员单石头把七班战士刘云山叫来。

刘云山"报告"一声敬礼之后，看看屋内没有别人，象好兵帅克一样一挤眼一弄鬼脸，耍开了滑稽：

"虎子！有什么事？是上树捣蕃掰干棒，还是掏家雀、捅老鸹窝？"

我没有再敢撒横，我应该站起来，但是我不能，我是他的指导员。我内疚地说：

"六叔，你坐下吧。昨天晚上我不该骂你，即使你不是我六叔，我也不该骂街，给你道歉。"

"嗨！就这事？"他小声说道，"这怨我，不怨你，你给的我任务是放风啊……"

刘云山还没说完，八班战士翟民山全副武装走进屋，报告说：

"报告指导员，班禅额尔德尼比比划划说裆部疼痒，看样子是小便疼。"

刘云山退出去。我想，虽然是非常时期，但也不可不顾及少数民族政策。我命令卫生员孙立达去九号班禅的囚室去看看。

片刻后，孙立达回来报告说："指导员，我全检查过了，他的裆部湿烂，已经发炎。这是长时间没洗澡的原因。没别的办法，给了他几片去疼片了事。"

是啊，我们没有权利让他们洗澡，也没有权利送医院。在这种非常时期，举世皆知的是到哪里找民族政策的圆满落实？不要说是"大活佛"，就是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他自身能保吗？就是维护民族事务工作的刘少奇、周总理又如何呢？他们就是死在了这里，我这个小小的指导员又有什么办法！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我们一惯反对虐待俘虏，可我们对待眼前的"俘虏"（即便就算是束手的俘虏吧）为何也至于此呢？做为指导员，我感到已失去心理的平衡。

天气见热，囚室的夜晚要彻夜开灯。由于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特犯们的体质都在明显的下降，有些人已经卧床难起。身体尚好的只有班禅和荣高棠。班禅大概是因为"我佛在心，四大皆空"，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没人斗他，没人理

他，只让他陪斗过一次。荣高棠想得开，他有他的哲理："老子没做亏心事，不怕大鬼小鬼鬼叫门"。因此，积极锻炼身体，一放风脚下如生风火轮。

我想，有些人恐怕要在这里寿终就寝了。这时，又有战士报告，"四号彭德怀浑身痛痒，他的皮炎又犯了。"

我再次命令卫生员孙立达去看看。孙立达回来说："除了扑尔敏以外，没有什么好药，扑尔敏又不顶事。不过，我正写信给我老家的爷爷讨偏方。"

说实话，我们中央警卫部队河北、山东、河南籍的干部战士最多，这三个省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信阳事件"使总理暴跳如雷，处分并撤了一大串干部，因为某些人的官僚主义、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而葬送了许多庶民百姓的生命。大概就为这，我们对于敢于当拧脖子铮臣、即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更多一层感情。听到他皮炎又犯了，我情不自禁地又来到四号囚室。

彭德怀一向是安静地坐着，或看毛选、读《人民日报》，或沉静深思。这一天他一会儿也不得安静，皮炎折磨得他象个暴躁的狮子。他曾提出叫医生看看。这个最低的要求在最狂暴的年月是难以实现的。但今天，我决定试试看。因为党领导一切，一切都要经过支委会，做为支部书记的指导员，我当然地成了这个连队的小土皇上。

我把干部们全部请到连部，召开支委扩大会，以便统一意见后再请示上报。

麻庞艾不加思索地第一个发言说："我看没必要，皮炎死不了人！再说，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到这里来，就闹过皮炎，卫生员给他看了，还总没完没了。战士的药费里没有

他的份儿！”

其他人沉默着……

涎文见别人不吭声不表态，顺手从口袋里掏出毛主席语录，摇晃着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是拿枪的战士，更得注意阶级立场，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毛主席早就教导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说的很激动，背诵的又烂熟，慷慨激昂，象“五四”时期学生运动中的大讲演。他当过几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全师轮流作报告一百多场次，总算没有白学。

“说了半天就一句话，给他看看病，部队就不稳定了？就没立场了？”老连长管东春头也不抬，摘下眼镜擦着，象在自言自语，“你把部队看得这么不值钱？”

连长的话引起一点儿小骚动，到会的人彼此议论着，实际是产生了共鸣。

一九四七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址就离老连长家几里地，他是在开会期间入伍的，由于几代受苦，苦不堪言，他一入伍便在师部（当时是中央警卫团）跟师长刘挥山同志当警卫员。后来进京，数年后从警卫排长越格提升到五连当连长。他识不了几个字，我在该连当文书时，连他的家信都是我替他写。再后来送他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他象夏伯阳一样，对学习不感兴趣，说自己在那儿象“菜汤里的烂山药，没劲儿”。他又跑回来，先找师长诉苦，师长无奈又把他送到连队。几次运动，要不是师长保

他，早就列进了军队小右派名册。他爱骂人，骂起来张娘日姥姥的什么脏话都有。有一天到八里庄靶场进行手枪第一次实弹射击，战士宋肖池（现在的七班长）报一号靶，突然他从掩蔽沟里探出小脑袋，要看看打完了没有，老连长大吼一声："小兔崽子！活麻烦啦？快滚下去！"后来，大家总给宋肖池开玩笑说："小兔崽子？你活麻烦啦！"

老连长当兵多年，很知道爱部下，他象战国时期被乱箭射死的爱兵将军吴起一样，可以毫不犹豫地用嘴为战士吸浓包里的浓血。连队哪个干部战士调走时，都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依依不舍地流着热泪送别。我在五连当文书奉调到独立营部当书记官时，也是如此难舍。在干部和战士的心里，他是一个指挥官，又象个严父慈母。他在干部和战士的心目中说话向来是有份量的。

此刻，老连长的话起了关键性作用。庞副指 挨 了 一闷锤，咕嘟着嘴，不敢再说话。

三排长李壁无头无脑地冒了一句："是牲口还得给看病呢，何况人！"

李壁是个小白脸，文静静的，长得很俊，太阳光永远晒不黑他。战士们开玩笑称他李大姐。

二排长张保球是山西人，长着四方梆子头，战士们的爱称是：山西梆子。听了李壁的话，连连点着梆子头，操着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一字一句地生怕别人听不清似地说道：

"我们给两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大战犯、日本鬼子还看病呢！彭德怀总是有过功吧！"

一排长肖月珠是西北高原来的，但他没有大西北的豪爽粗犷。他眯着小细眼儿，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那句话，围

着地球绕千圈、人类发生什么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不会找出他的错。他对政治向来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冷不热，似乎他浑身长着眼睛。自从有了对象，一到星期六，至少用三十分钟擦皮鞋、洗脸梳头，一经修饰完毕，便拿上口琴，有时还背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手风琴，唱着“我是一个兵”去会恋人。从当战士时，他和李壁就常顶嘴，李壁骂他是万金油，他骂李壁是贾宝玉、陈士美，说他长相都象唱戏的陈士美。因为李壁闹过离婚。

副连长孙旺是有名的二杆子，他老子是军区副参谋长。他干脆说：“指导员，你和上边联系联系，这有什么了不起，放个屁也要开会、保密、统一思想，思想是强行统一的吗？希特勒统一多少年统一了吗？蒋介石统一了多少年统一了吗？孔子统了多少年统一了吗？日本鬼子的大东亚共荣思想，统一了吗？”

司务长陈青说：“凡事请示也不好办，凡事不请示也不好，说可办就可办，说不可办就不可办，甭想那么圆。请示的教训还不够呛！”

陈青说的请示，好似是指一九六四年三团发生之事。那时有一个连队在尖端科研机关执勤，一个持刀反革命在大院内行凶杀人，门口哨兵请示带班员该怎么办，带班员请示班长，班长请示连长，连长请示营首长……请示来请示去，那个反革命的刀下已经结果了四条性命，伤了三人。为此，一大串干部受了处分。他们的所谓“组织纪律观念”已经达到了愚腐不堪的程度，这叫木头兵。

我想，给彭德怀看病可不象制止反革命行凶杀人，这是政治，政治不流血，可比流血的还要严峻。

到会的包括战士支委在内，除庞副指导员以外，几乎都同意给彭德怀请医生看病。就这一点儿事，会议开了将近半天，总算大体统一了意见。

我骑着自行车到团司令部，找警卫股张股长。不出所料，他说要请示。由于我们执行的特殊任务，可以不经营部而直接和团首长联系。因此，我又直接找到政委李大胡子。

所谓李大胡子，不过是有一脸大黄胡子茬，其实他才比我大九岁，时年三十五岁，是一个十三岁入伍的小八路。

我在五连是他和老连长力主提的当文书，到独立营任书记也是他和老连长提名的，到团政治处当秘书又是他要去的，他认为我是年轻干部中写东西最好最快的一个小笔杆子，他对我的要求就是一条：严格、学习。我并没有辜负于他，我从入伍到现在，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节假日，我的全部业余时间是按他的要求读书，什么书都读，并不象他在会议上讲的，要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乱七八糟的不要看。他在人面前拿我做年轻人的小榜样，我也的确给他长了脸，从十八岁就执笔写了全师经验交流会上认为很好的先进材料，同年开始在报刊发表各类形式的文学作品。其实我笨得要死，我写的材料和作品的废品，叠起来真的要比我高得多。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原因，在他支左时又把我带了去，在指挥部做他的政工组长。物以类聚。因为做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的他，和做为政工组长的我，极不赞同叫那些老头子、老婆子们天天撅着屁股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他们一请罪，就是在主席像下低着头弯着腰，站几个小时，有的当场晕倒，在这些人里，有高级领导人、有闻名于世的作家、大艺术家。我从七岁上就立志将来娶个好媳

妇，当个名作家。我对作家既向往又崇敬。因此，我是李大胡子观点顶最拥护者。

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俩都神经衰弱、失眠），躺在被窝里说开了闲话，我对李大胡子说："象猫捉住了老鼠，不吃，先戏弄一番，那些戏弄人的人也真心狠，这叫哪家政治？哪家政策？哪家运动？难怪罗大将军自杀，要是我，我也不活着了，士就是可杀不可辱！"

李大胡子叹了口气，喃喃说道："这就叫人世沧桑，沉浮难测，反反复复，变幻无常。但历史有大规律。"他又叹口气，"看吧。"（李大胡子因为十三岁在部队文工队时，被日本鬼子追得钻了茅坑，因此受压多年。后边还会提到）。

但在第七天，就宣布解除了"撅屁股"，还解放了给彭真开车的司机——一个六十岁的白了头发胡子的老头。这个老头可爱的叫人流泪，他一被解放，把我们军、工宣传队人员的自行车都给擦了一遍，有毛病的都修好了。他除了不会修飞机，什么车都会修。

政治象家庭、邻居一样，说得来常凑一块，说不来各躲着各的，要不就是暗斗。我找李大胡子请示而不是找别人请示，为四号看病也当属自然了。我对他说："如有什么问题，叫我复员就复员！"

李大胡子见了我很亲，总是"小刘小刘"的，象他的小兄弟，象他的儿子。他听了我的汇报，沉思好长时间，眨着一双黄眼睛说：

"你想的太简单了！不是复员不复员问题。是能不能把事办好；为什么先想到复员而不先想想办法，如何给他看病呢？总理和傅司令叫我们看护好，这也是尚方宝剑，两把，

哪一把咱们也得听（另一把当然指的是后来证明的四人帮之流）。”

“不过，还需要和团长碰头，并要向师里报告，据理以报，这理儿就是主席讲的政策和总理的几条指示，你要写好报告，今晚就送来。就目前情况看，我估计还是有希望派医生去的。”

李大胡子又问了我班祥的情况，贺龙的情况，罗瑞卿的情况，他几乎都问到了。并特意嘱咐我，“无论什么情况，要特别注意政策，不许胡来（他知道我有小拧脾气，动不动就说大不了复员转业），有事直接找我和团长打电话。”

我从团部回到连部的路上，在五孔桥碰上了麻庞艾，不由心里一惊：他没有说过请假到团部去，也没通知他到团部开会，他来干什么？

庞艾下了车，推着车掉过头来到我跟前说：

“指导员，我到团部俱乐部（当时警卫师有俱乐部编制）找王主任，问问团里下个月对文体活动有什么安排。”

我心想，全是扯他妈蛋！团宣传股有电话，一问就行了，想必又是去告什么恶状。

宣传股的王再兴主任和团副政委符起我关系很好，他们的共性是不择手段地踩别人讨好以便爬得快点（实可惜副政委符起我后来支左，大白天利用职权先后搞了四个小娘们儿，被复员到东北一家小粮站，当了个九品不到的副站长。庞艾和王再兴都瞎眼抱了一条盲腿，也是活该）。

一路上麻庞艾的影子老在我脑海萦绕。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全师干部开展批彭和批娇、骄暮三气，并组织部队参观北京市四季青人民公社敬老院和东

北旺人民公社敬老院。回来后，老连长管东春说："好，好哇！真是不错，敬老院的枕头、枕巾、被单、床单、褥子全是新的，还吃着大白馒头，比咱们吃的住的都好！我就不信，鼻涕邋遢的，床单枕巾连个污点儿都没有。不知道搞这假名堂到底有什么用，共产党要老搞这一套虚假玩艺儿，早晚得脱离老百姓！"老连长是吃着饭随便讨论的。

不料麻副指（他那时还是三排副）偷偷把连长的话捅到团里去。为此连长在支委会作了检查，写了检讨，在营干部会上挨批，还压了他一个"豆儿"（他应该晋升上尉，结果还是个老中尉，到六二年才蹭蹭上到大尉）。

文革前，庞艾做为共青团支部书记，给团员上课，讲朱德的扁担，讲朱、毛井冈山会师，讲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讲彭真随毛主席赴苏联，如何是反修的彭铁嘴。文革以来，他的调子变得又急又快，象变戏法一样，朱德成了只会吃小鸡子的军阀，彭铁嘴也变成了彭老修，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也变成了"两把菜刀闹土匪"。总之是说起瞎话来眼不眨脸不红心不跳，底气比说真话还足。他笑起来象一朵盛开的牡丹，他狡辩起来围着地球绕八圈也是他的理儿，他的诡辩论水平实在是国际水平，因此，战士们暗地起号为"伟大的麻庞艾"，有时还和马克思连在一起：伟大的马克思，伟大的麻庞艾。

五九年团里号召打马草，三排一个月打了五百斤（晒干了称），他硬报八百斤。老连长点名批评了他，会后还狠狠地骂了他一通。

麻庞艾在生活上和在政治上耍的是一样的手腕。一九六四年，他在许昌地区一家文工团搞了个对象，头一天见面，

他就果断而勇敢地使用了国家最新产品保险套，谁承想那套套儿工具质量太低劣，一次便中。女方三番五次来信来电报要求结婚。他给女方复信说：我奉命得去台湾搞地下特工工作，不准给家写信，不准回家，一去就得十年，所以不能结婚。你自己打胎另选对象吧，不然耽误你青春，我庞艾于心不忍。那姑娘也不是善茬儿，接到信后，即于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一天从许昌来到北京，头一天，两人关于打胎散伙的协议没达成，打了一天嘴仗；第二天中午，姑娘便找到政委李大胡子，谁也没想到姑娘勇敢地豁出来了，她从口袋掏出避孕套，当着许多人举得高高的，嘴里不停地说："这是证据！不行我就到师里告他去！师里不准我到中央告去！"

庞艾原本长得挺漂亮，当兵不久在农村找过一个对象，转年回去结婚，一进门，那姑娘不认他了，说他是冒名顶替，其实是大练兵出了满脸汗，脸上出了一层"小坟包"，卫生员给他抹了红汞，一下子抹轰了，他住进医院，出院后落了一脸小麻子，大小象一层白色的臭虫皮。他揪住卫生员脖颈骂道："你把老子害苦了，老子找不到对象，看我日你妹子！"其实，他已和军营对面北京市橡胶厂一个女工胡混，那女人包括庞艾在内共有二十八个男密友。一个星期六傍晚，他们俩被人堵在了该厂女工宿舍里。还有一次在永定河边，被已退休钓鱼的老师傅撞见臭骂了一顿，说他们别象狗一样，是地方就干，找个僻静的地方去。

那年月，男男女女的事儿可不是好玩的，要是别人，早就背一堆处分打回老家了，可庞艾，凭借特殊本事，都闯过来了。而且，五九年中印边界反击战，六二年蒋介石窜犯大陆，要求全师指战员报名赴边参战，他都闻风住进了医院，

六四年部队干部大批转业支商，他又做为能说会道、能干的干部留下来。

他，总是凭借政治运动不断地捞些政治资本，这一次执行看押特犯的任务，大概又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时机。这使我不禁想起副连长孙旺对庞艾下的定语：伟大的马克思，伟大的麻庞艾，象庞艾这种人，请你注意下，虽然为数不多，几乎历来都有，到处都有，国家倒霉很可能倒在大大小小象麻庞艾这类人手里……

八、二 探 囚 灵

——他说，啊！隔绝不了，
你不是也留下了一些书吗？历代
烧书的多了，哪个隔绝了？

近来上边要求对特犯的监护越来越严了，他们打饭、上厕所都有战士持枪在旁边监视，一举一动也别想脱开警卫的眼睛。放风时间缩短了，生活用品除了伙食费、粮票以外，什么也很难转来。专案组提审也更加频繁，许多人被整得鼻青脸肿、一瘸一拐的，卧床不起的增多了。

我想，我不能再等了，谁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趁刘云山值班，我再次进入四号彭德怀囚室。

他的皮炎已经见好。团部卫生所军医马淑敏给他注射了几针不知什么药，在她的建议下，准许他在囚室里用脸盆洗了澡。马淑敏比我大两岁，二十八岁，人很温和善良，湖南人，长的很俊，又白又美，她喜欢我，我也很爱她。在我们同去河南午阳县接兵时，她总是偷偷给我熟猪肝和牛蹄筋

吃，那是待上站的新兵送给她的，好让她高抬贵手别说身体不合格。爱归爱，她有她满意的爱人，我有我理想的未婚妻，假如我没有未婚妻，我想，她一定是我的爱人，不论她比我大几岁。我觉得她心地善良，善良的不怕扣帽子而多多关照头上有一堆可怕的政治帽子的特犯们。

实在说，中央警卫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数人是在万般困难的情况下，尽了微薄的也是最大的努力的。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的濡染，就是在最严酷的政治斗争也难以冲绝人们心中的同情心、正义感。在照顾特犯生活方面，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但他的理智正直为他后来带来了无限的不幸和灾难。谁最正直，谁首先出头，谁就要倒霉的最早最严重。

我看着端坐着的彭德怀，心里想，他和他们知道这些吗？他们也许恨我们这些持枪的"狱卒"。

他仍然象过去一样，好象没看见我进来，仍然在看着一张《人民日报》，旁边是笔和纸，抬头写着"总理"，正文似乎在写大西南有一种什么矿藏，是罕有的极其宝贵的矿物……他似乎在沉思，我不愿打搅他。但他终于抬起头来，好象是告诉我，他知道我进来了。

"你好点儿了吗？"我低声问了一句。

他微微点点头，说了声："谢谢你。"

他虽然还是那样端坐着，很显然，身体远不如以前了，记得有一天，我做为警卫连的一个代表参加了一次批斗大会，他和彭真都站台上，身材高大的彭真被军区体工队的造反派们揪住稀疏的头发，一会儿摁下去，一会儿揪起来，不过一个小时，素有铁汉彭铁嘴之称的彭真已经大汗淋淋了。

若大年纪，那样高的身躯，经不住如此折磨。而彭德怀站了好几个小时，还是那样敦实、挺直，一种典型老军人气质与姿态，使你不能不暗自叹服。看着他，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我努力克制住自己感情，我旁边还有战士和其他参加批斗会的群众代表。如实说，那天，走出会场时，我发现许多人面部表情就象刚开过追悼会一样。我不能不提的是，那天批斗会场上一群一伙一个集团的不断喊着："摘口罩！摘口罩！"是的，我发现有一个不平常的女人戴着大口罩。人民自有人民的手段——他们以不严肃不认真不旗帜鲜明为由头来发泄、斥责那个戴口罩的女人，她是谁？人们猜出了八九分——她就是江青。我深深感到，人民是厉害的，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的人，违背人民意志的人，迟早会垮台。所以才有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历史名言。

现在，囚室的彭德怀，虽然还是那样端坐着，但已显精疲力竭，体质远不如以前了。除了心灵上的原因，我看他身体是支持不住了。

"你要注意身体，好好改造自己，以便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人们嘴上虽然不敢说，心里都有一杆称，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不能没有象你们这样的人……"

出乎我的意料，他带有训斥的口气说道：

"你这娃子，不要引火烧身，我是彭德怀！"

象他这样口气在特监训斥警卫连干部战士的，只有黄克诚，黄克诚就常大发雷霆，谁也不怕，他连中央专案组的人都敢顶。这里有一个秘密，黄克诚专案组的人不搞逼供信，不凌辱打骂，否则，黄克诚也早完了。他的专案组却不象黄克诚专案组。

听了他的话，我很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分明是怕连累我。这和他当年一见风声不对就早早打发秘书和副官远走高飞是一样的道理。这使我的脑海不由浮现出战士的母亲来队，娘俩见面先是抱头痛哭的情景……那年我们蠡县活活饿死了一千多人，可我们还得天天讲：形势大好，大好形势，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小指头的关系，是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是本质和非本质的关系。而且，人饿死了还要冠之以美名曰：非正常死亡……

而今，为我们呐喊的他却……我的鼻子一酸，眼睛又湿润了……

我们彼此沉默了足有三分钟。

"象许多人一样，我是咎由自取！"他平静地说。

我理解他的话，他是在说，是他自己要这么干的，他似乎早就预料这是必然的。他是依然如故的象在战场上一样看待政治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做为人类历史，要不断朝前走，那必然地要更朝换代，先进的要代替腐朽的，有生机的要代替没落的，如果人们都不愿不能不敢去碰，那么我们每个人脑后至今恐怕还在拖着大清帝国的三尺长辫呢！我激动地说：

"大串连，几次接见，天天游行示威喊万岁，不生产，不种地。农村也有的花钱搞武斗，一天两块钱参加武斗费，有的就为这两块钱送了命。国库的地毯也拿出来铺在楼道上供红卫兵使用。白馒头乱扔。人们刚能吃顿饱饭又瞎折腾，这样下去，我们又要回到六〇年去了，那是多么可怕呀！"

"我们犯了历史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欠下了历史的债，人民的债，谁个不痛心。"

我静静地听着，盼他快点说，盼他多说点活。听说，他象我这样的岁数，已经是驰名中外的大将军了。

"一个人要看别人身上的跳蚤容易，要正视他自己背上的疮难，难啊……"他象自言自语。

"就我知道的那些原因，和多次批判你的那些罪行，我不理解，我们许多干部战士也不理解……"

"林彪不是有句话吗，"他略有讥讽地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某些人眼里，兵士和人民都是木头，是不该有思想灵魂的。是可以随便愚弄的工具。"

彭德怀曾经提议叫林彪接任他的国防部长，十个大元帅林彪排第三。他哪里知道，他推荐的人正在他背后……甚至在他的名字上都大作文章，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慢条斯理、似乎无足轻重地说："他原名彭德华，是想独霸中华。"在现实条件下，林彪的地位、林彪的这背后一刀，不是比千军万马还会使眼前的这位彭大将军难以招架吗！当我想起这些时，我都有些心惊胆战。我忍不住说道：

"我娘来队曾说，老这么不安定，朝里准有奸臣，省里县里公社里大队里，都有奸臣。我娘先后送三个儿子当兵，一个当民兵，一个已经在抗日战争时期跟吕正操战死，她不会不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她听说我们是中央警卫部队保卫中央首长的，她叫我瞧准机会说说。可是我还不敢，我在团政治处时，有一个叫张旭的战士给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红旗杂志等，先后写过几次上万言的信，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问题。根据上级指示，是我亲自处理的，我极尽可能给师常委提出看法，说他是认识问题。师老政委在常委会上也为他解脱说，'一个小孩子，头脑简单，看问题直观，才十

几岁嘛！'尽管这样，还是叫他中途复员了，并通知当地组织注意他。我也曾经给我在天津达仁堂制药厂的未婚妻说过，想给中央写信。她劝我说，'鸡蛋碰石头，有何用？如有用也算值得，没用，硬要碰南墙，那你就是不想要我了，还不如先把我们宰喽再写呢！'”

他一边听，一边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

“给你娘捎个信，就说坏人可以挡道，决不会永远挡道！事情到一定程度，会向他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都在苦撑，就是有这个信念。”他说话每字每句都独成一体，铿锵有力。

我看了看表，进囚室已过二十多分钟。我告诉他，请放心，我进囚室是例行公事。门口哨兵是我的六叔，有事时可找全连最矮的个子我六叔刘云山和全连最大的个子九班战士翟民山，万无一失。

他摇摇头说：“我已经是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了，我已经什么'敌人'都够上了。我后悔的都已经晚了。我欠下了人民的债。几十年前，毛主席举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旗，一呼百应；要是举出'打土豪还挨饿要饭'，哪个还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拼脑袋……多少壮士的血啊……我对不起我召集起来的那些将士和他们的父老兄弟们……”

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只撤出井岗山断后那一次，我带领五百将士吸引敌人，朱毛安全转移了，我的五百将士却剩下一百零几人！”

又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至今我还落了个吞并王左的罪名在继续挨批。王左是怎么回事，这是中央十分清楚的！”

我想，以我们党的政策说，彭德怀还是应该也必然会站

出来的。我问道："你对今后形势怎么看，包括你在内。"

"难说。国家在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历史的考验。"

我告诉他："我对烧书不能理解，除了马列毛主席的书，几乎都列为黑书、黄书或不可读的书，勒令全部上交销毁。连里有个战士看了过去出的一张画报，上边有个赤背的女人，为此挨了一周的批判。可是，我当时做为负责收缴书报的组织干事，胆大妄为，给军械股余股长要了七个礼花箱子，请在天津达仁堂工作的未婚妻把我的所有书，包括'黑修养'，用达仁堂制药厂的小三码，在半夜里全部偷偷运往天津我未婚妻家里去了。那是我一个月七十块钱，省吃俭用花钱买的。我因为钱少，大部分是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的。它使我大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知识。我知道我违犯了纪律，可我认为，纪律和真理、法律和事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人手里，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否则，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是完全隔绝了吗！"

他忽然精神振作，头一次扭过头来，认真地注视着我，双眼放出从来没有见过的光芒，说道：

"啊！隔绝不了，你不是也留下了一些书吗？历代烧书的多了，哪个隔绝了！我这个没上过学的煤娃子、小河工也是后来才学字的。战争时期炮火连天的，我还读一读《石头记》呢，那是线装本，打起仗来，什么也可以不带，不带干粮也要带书。"

"许多人这么大年纪，革命几十年，有些连家属亲族都被杀害了，到头来还落个反党反毛，甚至侮辱体罚。我真不明白，毛主席他老人家究竟知道不知道？毛主席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毛主席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连武

斗、侮辱体罚都制止不了呢？”

大将军的头早就扭过去了，望着墙，露出一丝苦笑。

我不时地看一下那个小猫眼儿，那是观察阶级斗争的小窗口，我得时时提防那猫眼儿有人再去掀开它……

当我的目光再次投向猫眼儿时，我发现我该离开四号囚室了，我不能再给他带来新的痛苦与麻烦，我也不能为此而去蹲班房，我才二十六岁，我还没有结婚，正统的传统道德教育和部队的严格纪律，使我连和未婚妻亲热亲热都没敢呢；况且，少小立志，我还有升官和为这块苦难的大地和我的父老兄弟效力的强烈愿望呢；在我的心底深处，我完全同意目前正被批判的所谓“叛徒哲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然，我和副连长孙旺比，感到自己很渺小，和给上边写信反映文革问题的战士张旭比，感到更渺小，张旭敢说的敢写的，我不敢说，不敢写。

人，每做过一件事情，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我终于发现，和张旭比，我也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投机者，起码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含有政治投机的因素或者叫明哲保身？否则的话，每个人——大大小小的人——都象我们的战士张旭一样，这场大革命何至于如陈毅挨斗时说的：象大水冲了龙王庙呢！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四号囚室，一边走一边回想着孩提时代娘常教我的话：“做人要做正直人，不能伤天害理没良心，要不，活一百岁一千岁，死的时候也不会心安！”

九、周总理命令我们抢彭真

在警卫连干部战士中，一提“二彭”，大家都知道，大彭指的四号彭德怀。二彭，指的是六号彭真，战士们私下说话，一提彭真有时说六号，有时说彭铁嘴，有时说彭大个，因为在特别监狱里数他个大，其次是班禅额尔德尼。

四是彭德怀自从来到特监是悲剧套悲剧，一个接一个；而围绕彭真发生的故事，却颇有点传奇色彩。

有一天，正吃晚饭，炊事班炊事员王连山气喘嘘嘘跑到小楼上说：“连长，指导员，你们快去看看吧，我们班长和副指导员打起来了！”

老连长听罢，毫不动声色，一边继续啃着窝窝头，一边抬一下眼皮看看我。

我四下里一看，这才发现，连部吃饭的人就少副指导员庞艾。

从政治思想工作角度说，制止和劝解打架，当然首先是指导员的事，但按一般情况说，应该是连长首先出面；由于他讨厌麻副指，所以才撩下眼皮示意我去。

我扔下窝窝头，来到炊事班，只见副指导员一手端着饭

碗，一手把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嘴角上已经喊叫的溢出了白沫……

原来他俩打架是为彭真。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特犯，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特犯们每月也要向连队交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顿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全连加特犯共一百五十人，吃白面馒头时，一顿近四百斤面；吃窝窝头时，一顿只需三、四十斤棒子面。原因很简单，战士们逮着一顿白面馒头，象吃死主一样吃个没够，所以吃白面馒头的机会越来越少。特犯们自然是不能挑拣吃喝。但是，六号彭真晚上吃饭，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窝头，都要吃饱后再留下一个窝头或一个馒头。昨天，晚饭吃的白面馒头。炊事班长郑有田和战士王连山，一人提饭桶，一人提菜桶，旁边有代班员看着，象电影上狱卒给犯人分饭一样，逐个囚室一人一份。轮到彭真，他照例多要了一个馒头，彭真按老习惯在夜间十二点左右开始吃起来，恰巧被查哨的麻副指导员发现，他二话没说记在心里；今天吃饭，他端上饭碗一边吃一边特意跟着炊事班来到六号囚室，果然见彭真多留了一个窝窝头（一般发一个就够，给了他两个）。副指导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早就心中有词了，他跟着郑有田来到炊事班说：

“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窝窝头？”

郑有田放下饭桶，一个立正说：“报告副指导员，一个

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呀，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那我问你，昨天半夜彭真为啥吃的白面馒头？”

“这……”郑有田结结巴巴地答不上来。

旁边司务长陈青说：“彭真习惯吃夜饭，他提出留个窝窝头，我想，这也没什么，上边又没说……”

副指导员打断陈青的话说：“我没问你！看你领导的这些兵，我看你们炊事班也快染黑了。”……

此时麻副指一回头见我进来，一边举着毛主席语录说道：“指导员，机会教育，我领着他们学学。”

看来还未打起来，王连山是怕打起来才叫了我来。

麻副指又滚瓜烂熟地背了几段毛主席语录，不料，他又把毛主席“谆谆”教导念成“亨亨”教导了。他老是改不了。陈青直撇嘴，炊事班长也不敢笑，只好听他接着训斥：

“我说郑有田呐郑有田！你怎么老是忘了毛主席教导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呢！你是为了叫他吃饱饱的接着搞二月逆流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叶剑英摔断了小手指，谭震林夹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着他们干！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的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我心里想，你麻副指导员毕竟是麻副指，可以过分点，

可你也太过分了！

麻副指又转过头来说道："指导员你看怎么办，叫我说，往后谁再多给特犯窝窝头，就给他处分！"

炊事班长无论长相和秉性，都象帅克一样，白白的脸蛋八字眉，细眼睛，说话真真假假，嘻嘻哈哈，不急不燥：

"报告副指导员，您的指示非常正确，非常及时，非常符合炊事班和我本人的实际，今后我一定要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提高组织纪律观念，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跟着毛主席，跟着党支部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把两腿一并，又说道：

"不过，上边不是也讲过吗，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待呀，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就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咱们完不成这看押任务，怎么向周总理、毛主席交待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副指被郑有田噎得有点恼羞成怒：

"妈的你这哈哈郑，你少给我打哈哈！"

麻副指见我不表态，半真半假地当胸给了郑有田一拳，嘴里哼哼着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嘴里唱着，早把一铲子炒菜锄进自己碗里，边吃边走出炊事班。

连队的蔬菜很缺，有时吃咸菜或炒咸菜，炒菜轮到战士是很少的，说准确点，盖不过小碗底。

"一人不过半小勺，他来一大铲子，口头革命派！"

"马列主义，一到他嘴里全成了骗人话！"

"马列主义谁都可以用，反正是骗别人呗！"

郑有田和陈青、王连山等一人一句，十分不满。陈青摇摇头说：

“指导员，你都看见、听见了，他恨不得白面馒头他顿顿吃，别人顿顿吃窝窝头也就没事了！”

我是只喘大气，什么也没说走出了炊事班。要知道麻副指有一双和旗手握过手的手……

无论麻副指怎么闹，炊事班还是照样在晚饭时多给彭真留一个窝窝头，这事还传到了团部、师部直到北京卫戍区，但没有认真追究过；只有作战科长问过李大胡子政委和王夫团长，王夫是土八路出身，没文化，嘴也有点笨，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李大胡子说：“彭真有吃夜饭的习惯，拿一个窝窝头，吃半个，留半个晚上吃，从来没糟蹋过。战士们见他能吃，就给他两个，他吃一个，留一个晚上吃。副指导员庞艾以为他吃不了要扔掉，还强迫他当时吃掉。”从此彭真留饭的事就没人再追究了。其实，真正常常强迫特犯吃饭的是副连长孙旺。孙旺发现十六号邓洁、十三号陈克寒、十九号贺龙等人情绪极为低落，吃不下饭，就真真假假的斥责说：“吃！不吃靠什么活着，全部吃掉。你们这几个人，过去被捕坐监狱还吃饭锻炼身体呢，坐坐咱们的小班房就吃不下去啦？”孙旺的确是个什么也不怕的愣小子，他的话，常常使特犯们面对他琢磨来琢磨去，溢露出猜测的神态。

我在这里还要讲一个小插曲。我要说的是，历史现象不但常常重复轮回，而且，具有十分惊人的讽刺性的巧合，多年以后，当彭真等这些元勋们被解放以后，飘飘然不可一世的旗手又被警卫部队看押起来，战士们私下开玩笑说：“这倒不错，大家轮着来，象住娘家，看来，这也成了毛主席讲的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一大特点'。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旗手也和彭真一样喜欢吃夜宵，而且在饮食特点上极似大清朝的庄佑慈禧皇太后——特别爱吃发面包子，因此，每当吃包子她都千方百计多留一个。但她可不象彭真光明正大的留，而是偷偷地干活。有一个星期六晚上，连队吃白发面包子，旗手除留下一餐四个包子以外（连队大包子连皮带馅一个至少有四两）还当着战士的面，偷偷往袖筒里藏了一个，被当年的战士小诸葛宋根立——此时已是副连长了，一眼发现，掰手夺过来，斥责说："一个包子，你吃就吃了，还偷着来。你生活上都这样鄙卑，可见你政治上有多么卑鄙！"

彭真和旗手留饭问题，足以反映出了警卫部队人心背向。

而贺龙同志的老伴薛明同志曾在《瞭望》上发表文章，对警卫部队官兵产生了令人痛心的误解，说强迫贺龙吃药，强迫他吃饭，到伙房要白菜也遭斥责等等。这些我在后边还要提到事情的真象，请薛明同志和关心这段历史的同志再认识——薛明同志不知，我们的干部战士，在那种左的要死要活的情况下，为保护"特犯"，有的被停职检查，有的被提前复员或中途复员，有的为此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前途，连累了家属！如果他们知道了薛明同志是这样看他们，他们该多么难过！为此我在北京复兴路干休所重访老政委时，他曾对我说："你要抓紧好好写，把那段真实情况写出来，公布于众。"

现在转回来接着说彭真。彭真还经历了一段传奇故事，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旋涡里的一场闹剧。

有一天，突然接到团部命令（我们看押连队可以不经营

部，直接和团部发生联系），要组织连队三分之一的人去参加抢彭真。

原来以旗手为首的几个人未经中央同意，却打着中央旗号，指使造反派以接受群众批斗为名，把彭真抢走了，部队束手无策，因为有一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就为造反派开了方便之门。造反派象“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把彭真挟持到了北京西山山洪里，正等着造反主子对他们下一步行动的指示。这情况很快报到了周总理那里，总理非常气愤，情绪异常激动，脸涨的通红；他要通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他把茶杯使劲一蹾，站起来对警卫部队的首长大声命令说：

“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之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帐！”

总理还反复强调说，情况复杂，不可简单从事，“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回答说：“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傅崇碧深知和造反派打交道的难度，情况究竟如何，能不能抢回来，他根本没有把握，但为了不使总理着急，有多大困难先包下来再说。

当时斗争势态早已白热化，特别是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围绕把彭德怀弄回北京由谁看押问题，总理和旗手等几个人已尖锐地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由于总理的巧妙斗争艺术，把彭德怀交给了警卫部队而没有落进造反派手里。

但是，抢彭真却冒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风险便是，警卫部队官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份便接到指示，“调动一兵一卒，也必须经过毛林周”，而调部队，而且是调动卫戍区中央警卫部队抢彭真，却未经另两位。总理一来由于对造反派抢彭真很气愤，二来也鉴于造反派身后有人，所以总理才有开头说的那句自报山门的话。其时，虽然有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小字报，却没有罢免总理的风声话声。

傅崇碧在召开警卫部队有关师团首长会议时说：“必须按总理指示，把彭真抢回来，坚决抢回来，不惜代价的抢回来！凡是去的人每人带上一条背包带，做什么用，你们去想。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乱来。”

团长王夫是浙江人，一生气张口闭口“娘希皮”，在“抢彭真动员会”上，提着两个拳头眨着一双红眼睛说：

“娘希皮，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的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娘希皮的都对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娘希皮的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的欢，用小绳子一栓，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上再放喽娘希皮的！”

王夫似乎觉得自己说的太简单粗暴，又补充说：“你们动员时可不能象我这样说，你们知道这意思就行。”

尽管文革一开始上边就强调不得有倾向性，要支持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警卫部队的官兵，除个别人以外，都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性，他们尤其反对那种大破坏大捣乱大查抄抢和把人当牲口一样凌辱虐待。听了总理和傅司令

指示以后，觉得出了一口从不敢出的闷气，个个精神振奋，如临战场。

部队一到西山，便分三圈团团把彭真和造反派围住了。那些口口声声喊着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英雄们，一见干部战士个个虎视眈眈，怒气一脸，全不是平日那“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绵羊似的势态，便象撒了气的皮球，一个个缩手缩脚，有个别的偷偷溜走了，只有极少数大小头头还气壮如牛，斥责部队首长和谈判代表是来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

想不到卫戍区司令部有个年轻参谋不软不硬地说：

“完全不是镇压，是执行中央首长命令。可你说镇压就是镇压。今天，就镇压一回，你看怎么办吧？”

“如果不交出彭真，今天就要有好戏看！”团司令部参谋杨丽坤也软中带硬地说，但他说出话来缺力量，他象个小公子，造反派的女将眼光老是盯住他的小白脸。

警卫部队由于“软硬兼施”，并有中央首长的旗号，在指挥员巧妙组织下，终于边谈判边把彭真抢了出来。

造反派不甘心，当部队走出很远还在大声谩骂说：“我们到中央告你们去，到中央文革告你们去！你们这些该死的保皇狗！”

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被折磨的早已精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却风趣而语意双关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十、军心不可辱，民心不可欺

有许多迹象表明，特犯们的处境越来越不好，这和全国的局势是一致的。事情的发展，总与我们天真的想法相反。警卫部队排以上干部不断听到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某些人对有关特犯问题的指示，特别是对四号彭德怀，十九号贺龙，一号陆定一、十五号罗瑞卿、二十一号大麻子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等，说他们坏的没法再坏了。总之是绞刑、枪毙、千刀万剐都不过分。王关戚的讲话火药味更浓，矛头大有指向总理之势。有的战士骂这些摇笔杆鼓舌噪的人，是蘸着别人鲜血染红了他们的桂冠，这种小丑自古以来就没断子绝孙。

副连长孙旺和三排长李壁为此还在深更半夜，召开了一次两个人的皇帝讨论会，题目是：当我坐上了皇上……

我是这个讨论会的列席代表，因为我这个先前的小组织干事，现在的小指导员，是个连支左都支不起来的小老右，他们不回避我。

李壁说："皇帝只有一个，我首先声明，我坐不了皇上，我的子子孙孙也不会出个皇上。要是我坐了皇上，我先把一贯说瞎话为生的人割了舌头。比如六〇年，老百姓都快

饿死了，有人为了保官还说形势大好，这样的舌头不割掉留着干啥！”

孙旺说："我要坐了皇上，凡是光吃捧，半句逆耳话半点不同意见都听不进、不接受的人，全部剁去他的双脚骨！”

李壁说："团长讲话，娘希皮的，我要坐了皇上，凡是喝老百姓血的，叫他剖肠开胃条尸于市。”

孙旺说："我要坐了皇上，凡是诬害人，嫁祸于人的，我就象大清朝的太监阉割一样，叫他断子绝孙，割不净的再象割黄韭一样，反复扫扫茬！”

我终于忍不住插话说："你们两个也太过分了，象你们这样不也成暴君了吗？明太祖朱元璋最恨贪官污吏，他的《大明律》就规定：贪赃枉法，敲榨百姓过六十两纹银者，杀无赦。朱皇帝在位三十年，想把贪官斩尽杀绝，贪赃枉法的虽然少了，但至今断绝了吗？拿文革打砸抢抄来说，许多珍贵财物不是落在了少数造反官们手里了吗？”

李壁说："愿望总归愿望，现实总归现实，努力总归继续努力。”

孙李二位的"皇帝讨论会"不过是痛快痛快嘴，出出气而已，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终于有一天上午，来了一辆伏尔加，一辆军吉普，还有那辆大屁股B克，要押走四号，交造反派在群众里去批斗，并指令我们派一名干部、两名战士随行。

派谁去好呢？我正在琢磨，老连长管东春不加思索地点名三排长李壁，七班长宋肖祖、九班战士翟民山三人去。

他没派孙旺去，是怕孙旺容易动感情，生出是非。我知

道他派的人都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干部战士，但我为翟民山担心。记得翟民山去年在国防部所属的一个尖端科研机关执勤时，那些造反派英雄们一群一伙的堆在大门口，反复纠缠，硬是要冲进去。因为这个机关是国家最高等机密所在，绝对不能冲击，翟民山拉开架式，在门口当中一站坚决制止。造反小将们骂他是黄皮保皇狗！说这就要象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有人还抢他的军帽，扯他的领章，拧他的嘴巴，往他脸上啐着唾沫说：

“你这棵傻大葱，你在为谁卖命……”

翟民山再也不能忍受了，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金言玉语，全抛在了九宵云外，猛地一拉枪栓，大吼一声：“他娘的，我枪毙你们！！”

那些口口声声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刀山火海不回头的英雄们，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

翟民山事后对我说：“这下子我可知道了，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毛主席的客人，英雄小将们……”

这次批斗“特犯”叫他随行，我怕他出事，特意嘱咐说：

“你千万不要动感情，否则，你会给四号和咱们全师直到卫戍区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这些事你还不懂，你得听我的，服从三排长李壁指挥，不要胡来！”

翟民山答应一声，便匆匆上了大屁股车。

将近中午，我站在小楼走廊上，见他们回来了。四号精神疲惫，象负了重伤，象有病，在翟民山搀扶下，艰难地走向四号囚室。

三排长李壁强装无动于衷的样子，但阴郁的脸无法装得

若无其事。

炊事班长郑有田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炊事班。

战士们悄悄地看着，他们的表情与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五分钟后，翟民山也不报告，“哐哨”一声撞进屋来，张口骂开了大街：

“我肏他八辈祖宗！——指导员，你把我调走吧！不然……”

“别骂街！”我命令说：“到底怎么回事？坐下说。”

“她娘的，那个黄鼬精（指韩爱晶）最坏。他们逼他交待反毛主席罪行，被他驳得恼羞成怒，就对他拳打脚踢，还专打要害的地方，揪住他头往墙上撞，打倒地上，又揪住头往桌子腿上碰。批斗完走出教室门口时，门口堵住一堆人，右边一个小子照他肝部就是一拳，他一仄歪，左边一个小子又是一拳打在后心，在门口一阵拳打脚踢，我们三个人护不过来，一下子又冲不出去，打得嘴上脸上全是血，可他们嘴上还喊着毛主席语录，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翟民山把拳头攥得紧紧的，捶着桌子说：

“他真要是坏人，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这叫什么！这算什么革命！就凭他出生入死打了几十年仗，也不能对他这样！我就是不理解，我没法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我无法说服翟民山，也无法回答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再搬出林彪的“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话也毫无用处。我只好叫他先回去吃饭，不要乱说，要遵守纪律。

四号的情况战士们很快就知道了。战士们都很年轻，他们大部分在六〇年都挨过饿，吃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

水库的苦，所以对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当然就特别的崇敬。现在看到他被打成这样，不免内心都向苍天问一声，中国现在还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吗？

翟民山所在的九班一致要求向上级反映，反映到周总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他们说：伟大的党，英明的领袖，怎么会容许出现这种情形呢。

我好不容易把翟民山动员回九班去吃饭，炊事班长郑有田哭丧着脸进屋报告说：

“副连长叫给四号做面条，四号一口也没吃……”

值班员此时又进来报告说：四号躺在床上不停地唉哟，有时还骂街、发牢骚。

当天吃罢晚饭，副指导员麻庞艾建议我今晚组织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选了几条毛主席语录让我看，当然有他惯用一些条目，诸如：防修反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赫鲁晓夫现在睡在我们身旁，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不会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等等之类选段。

我自觉我的记忆力很好，我可以成段成章地背书，但我比麻庞艾就略逊几筹了。麻庞艾是个语录专家，他一口气可以背出几百条，一字不拉。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的确使他得到了实惠，他为此当了几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并提升了小军官，人家可以说完全是靠红宝书起家的。不过，当上边准备给他记二等功的时候，正是六二年蒋介石闹着要窜犯大陆，号召人人写申请，全师人人写了上前线的申请书，唯有学毛著尖子庞艾同志却装病，说神经性头疼住进了北京西郊中央警卫部所属的二六七医院。

神经性头疼！不信你去查吧，中国当时的医学还无力对付庞艾的假头疼。

一想起这些，我就厌情外露，我说：

“你想的很好！很周到！你去安排学习吧。”

我带上卫生员孙立达来到四号囚室。

只见四号面朝外躺在床上，微弯着身子，象一株历经风雨后卧倒的枯树，又象病卧残阳的一头老牛，他的头上、脸上、嘴角上还有未擦干净的血迹，面色灰白，脸上的老年斑更明显了，眼睛也似乎有些肿，背显得更驼了。他偶尔睁一下眼，往日明亮而深邃的双眼失去了光泽，不断地呻吟着。

我感到茫然，又感到他象我病死前的老父亲，他为儿女们的生计拼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我没有什么可要说的话，我感到什么话也没有用。我示意卫生员孙立达给看看。

卫生员没什么检查器械，只有一把听诊器，他听一阵摸一阵，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离开四号囚室，卫生员对我说：“指导员，摸到腰部，他有明显的反映，可能肋骨被打折了，也可能有内伤。”

我用专线将四号的情况，如实向团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做了汇报，并根据干部战士的反映和我个人的意见，提出请团部派军医来，或者送医院去检查。我得到的回答是：“待请示上级。要注意部队情绪，加强纪律教育，管好部队，严防政治事故发生，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连续几天，几乎每个下岗的战士都来找我，汇报四号的痛苦情状。的确，日渐瘦弱的身体，严重的创伤，心灵的痛苦，国运的焦虑，已使他失去了生存与抵抗的能力。他，毕

竟是接近七十岁的人了。

战士们来自农村，都有朴素的感情，他们自打生下来那天起，虽然很穷，但也接受着父母传统美德的濡染和党对他们的忠诚教育，他们对于有些人把“特犯”当牲口一样地肆意侮辱和残暴的殴打实在看不下去，他们看过《保卫延安》，听到过许多彭老总的故事，他们也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过彭大将军。如实说，心里的弯子他们从来就没有按上边的要求扭过来，他们是叫恨的，内心恨不起来；叫敬的，内心敬不起来，真真是，不以谁人的意志为转移。也许林彪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又提出了新论点：彭罗等人是小节好，大节不好，宁要大节好的，不要小节好的。这个论点和他提出的突出政治落实到哪里的大讨论一样，一到基层，越讨论越粗深。以至林彪不得不写一信给《解放军报》说，“突出政治就是要落实到革命化”，结果还是山炮对野炮，空对空，闹不清，没法闹清（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包藏祸心）。

对四号的伤病问题，所幸的是警卫部队最高司令部依据警卫战士的要求，客观地向上边反映了四号被残酷批斗的情况，如实地写上了某些人的暴行，并附上了三排长李壁、班长宋肖池和战士翟民山的原始目睹材料。

终于有一天，给派来了军医，初步检查证实，四号的肋骨至少被打断两根。但对于透视和送医院治疗的事，医生马淑敏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我又去找李大胡子，请他想想办法。

政委沉默了好长时间，不停地眨着他的黄眼珠，摇着头，一种隐痛使他的大胡子直抖。

“我和你一样，想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据我看，师里

和卫戍区首长都是如此。可是越是这样，结果可能越和我们的愿望相反。我想，恐怕咱们再也不能胜任这个看押任务了。你明白吗？”

他说着，使劲握住茶杯，好象要把它捏碎。

以前曾听说，大胡子政委当年十二岁在文工队，被日本鬼子追得钻了茅坑，头上扣上一个掏粪的瓢脱了险。因此，几十年来档案里一直挂着“怕死逃兵”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升迁。其实，他作战极为勇敢，一次战斗中他一人挑死了三个日本鬼子。师政治部干部科长朱铁峰同志在考察干部时曾对我说，要不是钻茅坑那一节，他当个师政治部主任、政委都绰绰有余。我想，十二岁的小娃娃被日本鬼子追的钻了茅坑有什么可非议，我真不明白。

回到连队，我还在久久地思磨着李大胡子的话，“恐怕再也不能胜任看押任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使得上边不信任了吗？是不是都因前几天四号挨批斗以后，战士们给上边写信造成的呢？那封信的内容，战士们给我说过，我看没什么大问题，大意是说：

“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要文斗不要武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有人往死里殴打四号——您多次称赞过的彭大将军。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认为，这不利于他的改造……”

这封信毛主席究竟见到没有？谁也不知道，也没有下落，也无从查问。

为这信，战士们还争论了一场，几乎打起来。素称小诸葛的九班战士宋根立极力反对给毛主席写信。他说，“这在过去叫告御状，犯杀头大忌。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已经定了

性，你们要写这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代他翻案？你们有几个脑袋？”

宋根立长着一副小白脸，尖鼻子，八字眉，象什么电影上的一个小神仙，所以除了有“小诸葛”的绰号以外，还叫“小神仙”。有的战士不听那一套，拿着写好的信叫他签名，他摆手说：

“诸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再说，眼时下可不象以前了，以前咱们当兵的写信不贴邮票，打个三角章就行；现在得贴邮票。以鄙人之见，还是省下这八分钱的邮票吧。没用！”

班长宋肖池说：“你徒有诸葛之名，孔明可不象你这么麻木不仁！”

宋根立一眯搭眼，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你们总想不斗，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吗？”他高举着语录本，故意模仿着庞艾的摇头晃脑的姿态，还伴随着吭哧鼻子声。

大伙儿象发现了新大陆，瞪大了眼睛……

“你混蛋！”翟民山一拳把小诸葛打翻在地，抓过信，咬破手指，“啪”的一下，摁下了一个大大的血印。

宋根立有老主意，仍不签名，但动情地说：

“打得好。佩服！佩服！”

宋根立的确认为这封信毫无用处，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他事后对我说：“有意义有作用就撞南墙，无意义无作用撞它何益之有？脱离现实只能适得其反。”

十一、难得战士心

——彭老总双手捧着红枣，注视良久，两颗热泪从身经百战、志如铁坚的大将军眼里滚落下来……

连队星期日是两顿饭，一为省钱，二为省事，三为休息。吃过早饭，已将近十点。此时，同年入伍的老乡王云汉来访。一九五九年他是一连文书，我是三连文书。三年困难时期，他在独立营教导班当副班长，我在营部当书记（秘书）。他在磨杨树叶时（做淀粉以充饥，那时叫瓜菜代，此处该叫'树叶代'了），因推磨饿得眼发黑，腿发软，偷吃了一个班长学员的两块粗点心。点心是杨树叶加少量白面和玉米面做的。因为教导班为全营做树叶淀粉吃，活太苦太累，所以，独立营党委决定，给教导班每人每天两块粗点心。王云汉偷吃学员的粗点心暴露以后，非常悔恨，痛苦检

讨。诸如，饿死不能做贼呀，对非常时期克服困难缺乏足够坚定的立场啊，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呀等等，纲线上得令人痛心，恨不能钻进地里去，大有“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之苦。营长是个山东大汉，一听偷就恨得不行，要给他处分。李大胡子看着请示处分报告，竟然哭了，“我们打了一辈子仗，掉头流血，为的是救老百姓，想不到……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啊……”

我想，这段历史，王云汉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没想到“大革命”一起，他转业在地方科研单位当了造反派头头，而且，凭他当了几年文书的笔下功力，想纱绷子擦屁股——露一手，亲自写了“和周总理商榷”的批周文章，大标题贴在了机关从东到西一百五十米的高墙上。这篇文章引起了一时鼓噪。如今他更有点得意忘形了，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虎子，去年底我可收获不小，我们在‘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广播之前，也就是夜十一点，就每人发了一袋洋白面，还逼着王病獐（名王炳章，国防部二院三分院院长）给了三十块钱，我买了个半导体……你听、你听……”

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罕见，但我厌恶得直觉恶心，当着通信员单石头的面我把他轰了出去。我说：“去！去！去！去造你娘的反吧！你问问你爹你娘，他们同意你这样做吗？”我想起了他偷吃点心的事，“想当年怎么没饿死你！”

他见我真急了，灰溜溜地走了，嘴里还不住地嘟囔：“老保，你革命，谁对谁非咱们走着看……”

战士们禁不住哈哈大笑。

小诸葛是个小秀才，当时就唱出了顺口溜，“我说王云

汉，可是不简单，一造反就有光沾，捞了个半导体，还吃洋白面。……明年看你小子怎么办……”

战士们正嘻嘻哈哈地议论着，突然开来了一辆伏尔加和军用吉普。

我以为又是提审或批斗特犯，想不到是突然来人押走战士刘云山。

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刘云山曾几次问四号有什么事需要他做，他对彭德怀说：“除了反对毛主席的事，什么我都能做到。”

四号听罢，注视着他稚气浓浓的小脸蛋，第一次露出微微笑容，但却摇了摇头。

刘云山又去问十八号赵建民。他为什么去问赵建民而不去问别人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和李大胡子搞支左“斗批散”时，认识杨君沫（即杨沫），她是北大校长赵建民的爱人，总的说我们对杨沫等人还算人道。此事我对刘云山提起过，也许有这么点儿干系。

刘云山眼睛瞪得圆圆的，等待着赵建民回答。

六叔虽然岁数小，但眼睛总是直光闪闪，正大光明的，人都说这是诚实的表现，再加上他平日对特犯一贯态度和蔼，赵建民似乎被他的真情感动了，毫不犹豫地托他寄一封“平安家信”，意思是告诉杨沫和家里人，我还活着，没事，你们放心。但地址他是不敢写的。

赵建民还给他邮票钱，他没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刘云山不敢怠慢，按照赵建民所告诉的地址，很快把信发走了。

做完这件事，刘云山感到心里痛快了许多，就象完成了

一件神秘而重要的任务。同时，通过给赵建民捎信，他也确信，人在这种时候，不会不想爹想妈想老婆孩子，他也确信，四号彭德怀也不会没有要捎的话、要办的事。

“他不相信我？”

刘云山有点发急，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道道儿来。

晚上，刘云山做为连里三个战士代表之一，到师部礼堂，看了一场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他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就记住了剧中一首歌——

大红枣儿甜又香，
送给亲人尝一尝，
一颗枣儿一颗心……

这首歌给了他很大启发。第二天午休时间，他独自来到后山摘了不少枣子，其中有脆甜的斑枣，清甜的灵枣，密甜的小背枣，还有大如小核头的老婆枣，老婆枣发糠，不好吃，但适合老年人吃。他摘了满满一裤口袋（这是违犯连队纪律的），挑了几十枚又红又大的，不敢到水管去洗，只用衣袖擦了擦，用小手绢包好，装进裤子口袋里。等到第二天零晨五点他上岗时，把枣子塞到了四号手里。他象小松鼠一样动作敏捷，一眨眼便站在了囚室门外的猫眼儿下，掀开小粗布帘子，睁大一双圆眼，静静地观察着四号的动静。

他那机灵而又顽皮劲儿，就象幼儿趁着母亲合上眼，偷偷地塞给母亲嘴里一块好吃的东西一样。

四号坐起来，双手托着红枣，注视良久，两颗热泪从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眼里滚落下来……

终于有一天，他交给刘云山一个小纸条，条子只有卷烟纸那么大，铅笔字，暗示他可能要和亲人永别了，不要再挂念他……

刘云山给赵建民发的信，不知如何旋转落到了上边手里（人们怀疑是庞艾搞的鬼，因为他不止一次主动寻机与专案组的人接触）。而四号的纸条，刘云山放在了语录本里，可亲可敬而又叫人生厌的语录本太多，什么各种版本、各种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本，《最高指示》本，《最新指示》本，《最高最新指示》本，《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本，《林彪言论摘录》本，《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本，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实在说不下将近二十种（有心人直到现在恐怕还存着）。这些语录本，大多数都是压膜红塑料皮的，一摸光滑滑的，又精致又漂亮，大概是中国出书史上的"顶顶峰"了。这些语录本可把刘云山闹乱了，等他请下假来，却由于粗心大意和心情紧张，忘记了四号给他的纸条放在哪个语录本里了。匆忙中无奈何只好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语录本全拿出来，放在床上，摆了一片红，他就在这一片红里面急急忙忙地翻找着，越急越渴越吃盐，急出了一身大汗。当他高兴地找到纸条时，一抬头却见副指导员麻庞艾不知何时已站在跟前。真他妈冤家路窄。

"拿的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着什么急出什么汗？"

"我……"

"到底是什么？"

"密电码！"他瞪大圆眼，象好兵帅克一样，打着哈

哈，试图蒙混了之。

庞艾上去就抢，刘云山急中生智，把纸条塞进嘴里，一伸脖子咽了下去。他到也算没白看电影，学了一招儿。

刘云山就这样被押走了。我想，麻副指意在对上边投机讨好，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早想取而代之当指导员，搞刘云山自然也是搞我。

按师里意见，叫刘云山做个检查写个保证，在军人大会上点名批评教育后调出五连也就算了，因为信和纸条都没什么问题，但上边抓住不放，要追查。

好在此案由师政治部保卫科处理。谈了多次话，写了多次检讨，他都说自已并没什么目的，只不过是自己“心眼儿软，肠子细，阶级斗争观念模糊，殴打这帮老头子们心里可怜的慌”。

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问题，师政治部保卫科把刘云山移交给了团政治处保卫股。保卫股的黄毕群股长更是个善心人，完全理解一个小娃子的心情，还总劝他不要怕，哄着他吃饭，给他开玩笑，逗他开心。

前后经过了三个月的审查，什么问题也没查出；但是，这件事被列为政治事件，叫刘云山中途复员了。档案里还偷偷给他坠上了一块石头：此人不可重用，不可安排工作，不可当民兵……

刘云山临走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他热爱部队，热爱共产党毛主席，他哽噎着说：“毛主席共产党为什么不要我了……”

我这个指导员，为六叔刘云山的事，在支委会上作了三次检查：思想右倾，政治工作薄弱，管理教育不严，请求处

分……

此后，我时时准备着调出警卫连，或者复员转业，这是历史的经验。

使我想不到的是，我这个“狱头”或叫“典狱长”倒当住了。

十二、乱 世 英 雄

——他大吼道：党在哪里？党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组成的，十个党员九个倒，十个党员九个臭，那还叫党吗？

物到极化，必出反象。在九班战士翟民山和四号彭德怀身上，就体现了这种颠扑不破的哲学原理。

翟民山是一九六四年入伍的，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穷苦不堪的家庭，使他过早的失学了。他的家在河北潴龙河畔的一个小镇。入伍前三天结婚，入伍后一直没有探过家。在乱哄哄的年月，他爱人秋菊突然来队了。秋菊生下来的时候，家里很苦，没有吃的，父亲给起个名字叫秋菜，母亲不同意，正盼女儿将来不要象他们那样生活可悲，因此，给女儿起名叫秋菊，意思是说，女儿日后将来的日子象金色的秋天，老有饭吃。

秋菊来队探亲，翟民山非常高兴。自然，新婚夫妇度了三天蜜月，一熬就是几年，怎不亲亲热热呢？当晚，不到九点小俩口就插门睡觉了。

将近夜十一点，我和老连长管东春从团部开会回来，小通信员单石头迎上来汇报说："庞副指导员又和翟民山打起来了，翟民山揪住庞副指导员的脖领子，直骂祖宗……"

老连长解下手枪皮带，往床上一扔说："小兔崽子们，吃饱了撑的，去！把他们全叫来……"

原来，当天夜里，翟民山小俩口又说又笑地上床脱了衣服，向来粗心大意的翟民山却在微妙处发现了问题，他指着爱人微微隆起的小肚子道：

"嘿！怎么回事？我没回家，它怎么就大了？！"

爱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翟民山断定有鬼，再三追问，秋菊只是哭泣。

"你倒是说不说？"翟民山从枕头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哗啦"一声拉了下枪机（其实枪匣里是空弹夹，没子弹），枪口正对着妻子的脑门，恫吓说：

"说！再不说我就毙了你！"

"你叫我说什么呀？"她乞求他别开枪。

翟民山略有所想地说：

"你看过《冰山上的来客》吗？"

她摇摇头。

"那我告诉你。你对天发誓，就说：在万灵的真主面前，我发誓，我要有背叛丈夫的行为，天打五雷轰！说，就照这样说！"

这话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主人翁那乌如子因怀疑

妻子古兰丹牧有外遇，逼妻子发誓时说的话，翟民山几乎是一字不拉地把这段台词用上了。他之所以记得这样熟，是因为战士们看了这场电影后，经常用这段台词开玩笑。

翟民山的妻子见男人用枪口逼着自己，抬起头说道："你打死我吧，我来找你就是想说说，我早就不想活了……"

她扑倒在男人跟前，抱住他的大腿大声哭起来。

事情真是扎手，原来文章又牵扯到造反派、大革命。

那是一个中午，折腾了一上午的造反派们太累了，各自回家去啃窝窝头了，唯独造反总部的女秘书，赫赫大名的钱毓英，她和造反司令却在生产大队一间办公室兼放农具的大黑屋里厮混起来。一个司令，一个秘书，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正在混得如胶如漆，如为一体，不料想，村里的小学代课教师李长拴，瞎摸和眼地一头撞进屋来。这也难怪他，一来老天下起雨来，半路上他要避雨；二来他戴着六百度的近视镜，看东西还是稀里糊涂；近视发展了，工资没发展，换不起眼镜，当然不能怪他了。

可名牌钱毓英不管这些，她见教师进来，慌忙把司令推到一边，提着裤子质问教师李长拴说：

"李老师，你看见什么啦？"

李长拴是个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下来的"臭老九"，多少年来早就被连治带吓的魂飞胆散了。听到钱毓英质问，非常害怕，腿直打哆嗦，结结巴巴说：

"我……我什么也没看见。"

女秘书以为他看见了，因为离得太近了，她还在提着裤子抽着腰。因此，不打自招，半招不招，说招也招，说不招

也没招的自我解嘲地说道：

“他感冒了，伤风头痛，我给他发发汗。”

她说的既笨拙又巧妙，毕竟是不能自圆其说。但她谅这个早就被捏服了捏软了捏怕了的臭老九是不敢往外说的。

“给他发发汗？”“臭老九”的思维能力一点也没有臭，他终于从她的口中弄明白了，原来这位造反大秘书对男人来说，在用她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司令当肉体发汗片呢。他明白了。

教师用右手扶着眼镜，连连称是，诺诺地退出。边走还边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这汗人家才发了一半，我就冲进来，真是不长眼睛……”教师一边擦着说不上是雨水还是汗水，一边责怪自己。

夜间教师就寝后，禁不住把这个桃花粉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患难的老妻。他们哪里知道，旁边七岁的儿子还没有睡着……

这下事情闹大了，未过三天，女秘书钱毓英正在小镇十字街心一个公共厕所解手，一群七岁不到的小毛孩子见她出来，叫齐了号喊到：

发汗片！

发汗片！

俺伤风感冒头也疼，

快来给我也发发汗儿……

钱毓英听了孩子们的现代童谣，估计一定是那臭老九教师李长栓把她的桃色粉事说出去了，在这大街广众之下，不

是横撕她这个造反司令部大秘书的白脸皮吗？她气得一边骂街，一边抽着裤腰带，一边追着孩子们打。

小娃娃毕竟不懂大人事，她越追越骂，孩子们喊的越欢，跑得慢的，小屁股上早挨了好几巴掌……

从此，钱毓英有了“发汗片”之称。传说还是特效药，以至小镇的“荣华”药店变得顾客盈门，许多人慕名来买特效药“发汗片”，问得售货员厌烦了，干脆写个黑字白条贴在药店门口：对不起，本店没有发汗片，只有消炎片、去痛片、安宁片、解热片……

这样一来，可就又轮到老右教师臭老师李长拴再一次大倒其霉了。教师为此被打掉了六颗大白牙，大冬天被扒光了衣服放在冷屋里，把脚冻烂了，他犯了“诬陷造反派罪”。

“英雄”们还不罢休，把所有的孩子们全都找来，逐个追查，究竟都听谁说的发汗片的事，其中，翟民山六岁的小舅子六生，被用绳子吊起来，还把半斤多重的秤砣用绳子拴在小鸡子上，结果连小鸡子带小蛋儿全都勒肿了。

这还不算完。

发汗片要报复，要“彻底消毒”、“扩散多大面，消除多大面”。于是，对司令情夫说：

“你们去六生的姐姐家，给我凑点儿趣来，好好玩玩儿。”

司令领了情人的令箭，带上两个打手，光天化日之下，来到翟民山的家里。他们对“军属”、“军人家属”这个词儿看得半文不值。

“来吧！好好伺候伺候我们哥几个，对于造反的功臣，

你要象劳军一样慰劳我们！”司令说着，就去抓翟民山的妻子。

秋菊大骂他们是畜牲，义正严词地说，“你们不是毛主席的造反派，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流氓投机派。你们这些畜牲，早晚没有好下场！”

司令狂笑加淫笑地说道：

“你别看你男人披着一身黄皮，不过是个保皇狗，你忘了一朝东一朝西这句话吗！现在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别说你男人是个大头兵，就是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罗瑞卿、贺龙这些人又怎么样？不一样被关进了小黑屋吗？……”

三个人说着就扑了上去，犹如三条饿狼撕吃着一只小绵羊……

翟民山的妻子不敢给家里人说，也不敢给翟民山写信。她想到过死，但不愿意死，她才二十岁。

打这以后，他们又来过多次，并威胁翟民山的妻子说：“你不说，我们不说，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样两好加一好，没人再敢欺负你们家。谁敢欺负，有造反派总部给你们做主。要是你说出去。对不起，就把你、你们全家和翟民山全家都报销掉。其实，就是你说出去，也没用，我们的造反组织连中央文革都挂着号，我们有江青同志支持，有毛主席一百个支持……”

…………

翟民山听了爱人的哭诉，一脚把她踢了个仰面朝天，他望着妻子微微隆起的白肚皮，就象有一窝毒蛇在里面蠕动……

家仇国恨使他的大脑快要崩裂了。他立即穿上衣服，带上五四式手枪，口袋里装上在石景山钢铁厂执勤时，外国友人赠给他的一支钢笔手电，偷偷去了永定门火车站……

他刚走到西郊公主坟一路汽车站，正在等车，就被赶上来的三排长李壁和副指导员庞艾带人截了回来。

在回来的路上，麻庞艾听了翟民山简短学说后，开导似地说道：

"我说翟民山同志呀，这事，你要正确认识，正确对待嘛！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全心全意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三心二意嘛！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要大公无私。咱们在看押特犯，任务艰巨、光荣而伟大，它关系到能否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问题，也是对毛主席忠与不忠的问题。"

翟民山紧闭着嘴，气鼓鼓地不说话。

三排长李壁抻了下副指导员庞艾的衣角，意思是示意他不要多说了。庞艾不知是装糊涂还是故意地，反而说道：

"三排长你拽我干什么？这事不是明摆着嘛！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特别是做为一个中央警卫战士，更应该懂得：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嘛！为了革命，为了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咱们的特殊任务，要学习雷锋，立足本职，放眼世界，正确对待，要舍得牺牲个人一切，直至……"

"直至什么？直至老婆叫造反派强奸、轮奸也在所不

理，无动于衷，心安理得，无所谓谓才是最有德性、最有觉悟、最最大公无私的好战士吗？”李壁心里不服。

翟民山早就气坏了，象炸雷一样突然骂道：

“我禽你八辈祖宗！”此时他再也无法抑制，一把揪住庞艾的脖领子，上拳下脚，继续骂着：

“麻副指导员！你去把你妹子喂他妈的造反派吧！叫她陪着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璧和另外两个战士一边拦着翟民山，一边心里也骂庞艾：“你这个麻嘎子，左种下的，你打个喷涕放个屁也是革命的，谁都不如你‘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说穿了，你不过是保位子、想升官吗？国家坏事就坏在你们这类人身上，老百姓倒霉也倒在你们这类人身上。奇怪的是，你们这号人，要真本事没真本事，要真能耐没真能耐，要苦干没苦干，可就是得宠、吃香、升官、得利……”

何止如此呢？麻庞艾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运用的也非常得手。前年三班有个战士丢了三十块钱，三班长在擦地板时，发现本班战士齐大乱的翻毛皮鞋里恰好有三十块钱，立即报告给兼任团支书的副指导员庞艾。庞艾找齐大乱谈话，齐大乱一拧脖子：“我没偷，我不知道这钱怎么到了我鞋里去的！”

俩人没谈三句就崩了，庞艾认为齐大乱太不老实，还敢顶他，转天就开团支部大会，叫齐大乱检查，齐大乱一个字儿也不说。庞艾当场叫大家表决，给齐大乱一年留团察看处分。庞艾说：“人证物证你还敢抵赖？我看你就不老实，我看你就象偷钱的。到一年期满后，再不认帐就开除你团籍，永远装在你的档案里 你齐大乱会永远是个小偷……”。事隔

三个月后，发现了真正的小偷不是齐大乱，而是本班另一个战士。他在偷别人钱时发案了，在他的包袱里，发现了各式各样的一大堆不属于他的物品，甚至还包括肩章、女人裤衩等等。

庞艾这下有点儿傻眼，找齐大乱道歉说："真对不起你……"

齐大乱这回说话了，"对不起人的事往后你少干点儿！你已经干得不少了，也给你子孙积点儿德，干点儿好事。"

在这次翟民山问题上，庞艾的革命闪光点又起了破坏的作用，他激化了矛盾，使翟民山增加了逆恨心理。

类似翟民山遇到的问题，文革前我做为组织干事，曾经经手处理过多次，一律得到地方党委和法律部门的重视，按破坏军婚案依法严肃处理。现在却无处申冤。做为指导员，我感到对不起我的战士，我无能为力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内疚中，我忽然想起四号彭德怀给我讲的只有几句话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他是小时候听外婆讲的——

一个猴子在一条小溪边照影，突然发现自己长的极其丑陋，它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竟是丑到这种地步。它非常生气，它怒不可遏地搅混了小溪，又在上游用树枝和石子垒了一道墙，企图把能照出模样的小溪截住，做完这一切，它蹲在高高的树杈上，一边吃着桃子，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翟民山问题如何处理，我脑子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

当天夜里，营教导员、团政委李大胡子和师政治部保卫科长共同找翟民山谈了三个小时的话。

李大胡子政委首先对翟民山家属出现的不幸事件表示同情与关注，同时也严肃指出未经批准携枪私自出走是严重的违犯纪律，要深刻的认识。并指出：

“现在许多地方党、政和公检法，由于受冲击不能有效控制乱了套，一个大红章可以抢来抢去，一个领导也可以被随便抢来抢去，揪来打去，彭真被抢来抢去你不是也经历过了吗？现在许多地方都是造反派掌权，有的非党造反派还掌握党政大权。等以后一定要配合地方查清事实，严惩罪犯。请相信党，相信各级首长，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切不可盲动。”

翟民山却说：“李政委，你说的都在理。可党在哪里？党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组成的吧？十个党员九个倒，十个党员九个臭，那还叫党吗？！元帅还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还有几个？部长、省委书记、中央局书记还有几个？我们的县委书记都被逼得用剪刀刺脖子自杀了，就连咱们执勤的国防部二院三分院的炊事班长都被挂牌子游街了……”

三个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八路，大眼看小眼、面面相觑，谁也无法回答。

根据师司令部参谋长和师政治部张副政委指示，把翟民山暂时撤下来，派两个战士陪伴他，实际是监视他，以防发生意外政治事故。至于翟民山的妻子秋菊，更是闹死闹活，要上吊跳井，只好找两个临时来队的干部家属，昼夜和她作伴看着她。

谁知第二天下午，翟民山说拉痢疾，还跟卫生员孙立达要了几粒土霉素吃，不到十分钟跑一趟厕所。因此，两个监视他的战士也必须陪着他到厕所闻味儿。偏偏他这痢疾一蹲

就是二十多分钟到半个小时，两个战士明明看见他使劲拉，脸胀得通红，拉不出来，这也的确是痢疾的一种反映。所以次数多了，又嫌在厕所熏得恶心，也确信他拉痢疾无疑了，便在厕所外边等着。至晚上七点，两个大活人愣把翟民山看没了。他从厕所的后窗逃走了。

到处找不到他，检查全连武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一支也不少。据班长宋肖池反映，翟民山口袋里的钱连买张火车票都不够，因为前几天才把仅有的十块钱邮给他娘，还生产队的帐了，他刷牙都没用牙膏。

我们判断他暂时还未出京，更不会自杀。

他到哪儿去了呢？

战士私自出逃，这是严重的事故，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做为指导员，我真象个热锅上的蚂蚁。在焦急中，五班战士宫士彩结结巴巴（他是个结巴）报告说："七点半时我上岗，看见翟民山晃晃荡荡地到四号猫眼儿，掀开小布帘子直往里瞧，过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以为他解除"软禁"了呢，也没在意。"

宫士彩正说着，给四号送饭的炊事班长郑有田报告说，"四号请指导员去，说有话说。"

我立刻到了四号囚室。没想到四号给我讲了一个重要情况。我急忙给上级打电话，建议迅速派人到翟民山的老家去（实际我们已经建议过了）。现在可以肯定，翟民山回老家了。因为他从四号囚室的猫眼儿扔给了四号一个小纸团，上边写着：

"战士翟民山要报仇雪恨，要替全国一切好人报仇。你千万不要死……只要青山在，百姓有柴烧！"

当派出的人到了翟民山的老家，一起轰动潴龙河两岸的非常事件已经发生了……

十三、三 探 囚 灵

——大元帅仰天长叹：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为翟民山的事，连队支委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点多，每个人都使劲抽着自制的“大喇叭”，有的人抽的是关东烟，有的人抽的是四川“老白毛”。“老白毛”劲特别大，满屋子狼烟雾气，不抽烟的人会感到呛死人。

一散会，我又合衣躺在床上，尽管疲劳已极，却久久不能入睡……

战士们联名给上边写信，警卫部队领导机关不断向上边报告特监情况，为特犯遭到侮辱和残酷殴打鸣不平，尽管他们在起草报告前反复斟酌，言辞婉转，而且精心选用了毛主席教导的话，但也不免被某些人看成是大逆不道；接着，刘云山替特犯“传信”，翟民山失踪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给警卫部队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已经波及到了傅

司令和周总理。

听说，江青早就对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部队和傅崇碧不满了。警卫部队都知道，傅崇碧是林彪起用的，想不到傅崇碧不听林彪、江青的，听总理的，离着倒霉不远了。还有，抢彭真有他的份，保护特犯有他的份，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倒霉才怪呢！他一倒霉，听他指挥的中央警卫部队也好受不了。

我想，做为直接看押"特犯"的警卫连指导员，我很可能要被调出中央部队了，至少是不适合在五连工作了。

我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和委屈。我去找我们团的老政委——师部张副政委。当我把我的心底话全部掏给他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地说道：

"小刘，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岁。"我答道，"连哪月哪日生的都不知道，家里穷死了，弟兄八、九个，丢一个我娘都不知道。有一次夜晚，我和一群小孩儿玩捉迷藏，我困了，躺在一家柴棚里就睡着了，那家老太太抱柴禾时发现了我，找到我娘说，'小七儿他娘，俺家柴禾棚里有个小孩睡着了，你看是你家的吧？'我娘一数差一个，这才把我抱回来。"

张副政委又问我："入伍几年了，什么家庭出身？"

我想，这些他都知道，为什么明知故问。

我还没回答，他却严肃地继续说道：

"全军几百万将士，就你明白！就你热爱党，忠于毛主席？彭德怀撞南墙，头破血流，至今还押着、挨斗、性命都难保，你算老几？现在不要说坚持毛主席的五不怕，你就是坚持一百个不怕又有什么用呢？就象一条船，已经被推到了浪尖上，还想保持平稳吗？"

“我真不明白！”

“也许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历史上不是有许多人，至死还是糊里糊涂地死了吗！不过，沉默不等于糊涂；沉默不等于麻木不仁；沉默的人或许是心里最明白的人。”

他不让我再说了，他把我轰出了他的办公室，走到门口，他又嘱咐我说：“要象个指导员的样子，不要象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人类有许许多多不明不懂的东西，人类的发展就是从不懂到懂，要是老不明白，不懂得，当然就谈不上发展了……”

他没有提哲学二字，但我觉得他对哲学的运用比某些哲学理论家要生动深刻的多，那些哲学家，只会干巴巴人云亦云，讲概念背术语，一接触实际就象黄花鱼溜边过去。这样的人，如其说是哲学家理论家，倒不如说是条泥鳅鱼更妥当。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仍然陷在哲学矛盾的迷宫中。睡梦中，我朦朦胧胧来到一座庄园，母亲就住在庄园里头，看守庄园的老头，已被野兽撕得粉碎，剩下的不过是一场目不忍睹的争食——我迷迷糊糊似乎看到了一首打油诗：

马争槽头料，
猪抢缸底食，
鸡啄仓中米，
狗啃骨头急……

我的心碎了，我大声呼喊着：

“母亲！”

我惊醒了，原来是一场恶梦。梦中的诗记得竟是这样清楚，说不上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拉开灯，把这首诗记在了笔记本上（至今犹存）。从那时起我才相信从书中看到的故事是真的——人在梦中是可以作诗的，而且作出的诗，就象喝醉了的画家画出的好画，甚至象梵高一样，精神失常了倒可以画出惊世之作。

我把这首自认为尖酸刻薄、寓意深刻的"鸡狗猪马"诗精心保存起来。我想，它也应该传世，它是那段历史形象的写照！但我没有想到，这首打油诗为我后来带来了不少麻烦，它几乎把我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送了。

我看看手腕上这六十块钱买的上海表，已经是凌晨两点。这块表总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愿走就走不愿走就不走的老上海，它使我经常误事，我除去它前后一个小时的差数，估计是在一点到三点之间。这个时间上边来人查哨的时候很少，这是睡觉最甜的时刻，谁都不愿在此时查哨。我选择这个机会最恰当不过。

四号已经三天没怎么吃饭了，我想，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站在四号床前，在昏黄的灯光下，足足站了五分钟。他终于睁开胧肿又深凹的双眼，说道：

"是你……"

"是我。我想……我们可能要分别了，再看看你，希望你保重。我看过一篇文章，记得你投奔毛主席，初上井岗山，便以五百人之师断后，掩护朱毛撤退井岗山，当时敌人在你四十倍以上，你是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去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死路留给了自己，把生路让给了朱毛。在延安，一

次你去坐车，警卫把你当伙夫赶走了。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你的故事，现在还象小时候一样，愿意听这些革命故事……

他艰难地坐起来，手捂住左腰部，但依然坚硬挺直。

喘息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道：

“战争时期，我曾多次横渡黄河，黄河弯弯曲曲，有时看上去向相反方向流，但终归是东流去……

自从七月八日在北航一间大教室批斗他以后，他因重伤一直躺在床上。警卫连和上级机关几次书面或口头向上边反映他的伤情和病情，但至今不给透视，不给拍片，也不准送医院。他瘦得象寒风中一棵只剩下枝杆的枯树。他的命运，真不如一个国民党法西斯战犯！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他在囚室里写的检查中我见过，小时候他当过煤黑子，六、七岁时“要过饭”，但他从来不伸手向人讨饭，他的小犟脾气是饿死不伸手讨饭。这一点我和他极其相似。我六岁时也曾跟母亲去讨饭，但我宁可躲在一边等着我的母亲，也不在人家门口陪母亲要饭，天底下的乌鸦并不一般黑，有个地主寡老太太，看我一天天饿着也不喊饿，居然每天给我白面烙饼吃，还叫我们母子住在他们家里，她出去，把她家的钥匙也交给我或我的母亲。这个村叫李岗，记忆犹新。

泪花在我眼里滚动，我尽力不使它流出来。

“你该吃点东西了。”我劝他说，“这是我们全连的愿望！我代表除庞副指导员以外的全体官兵请求你……没有任何人让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指示我们不准给你做碗面条。”

他嘴唇微微抖动着，有些吃力地说：

“当然要吃饭，战场上我们常常拿吃饭当任务来完成，

我还要看到明天……明天……不过，恐怕我不能了。”他喘息着说，“我多想看看明天啊……”

“是的，明天绝不会象今天一样。”我尽力安慰他，但我所知道，他明天的日子绝不会比今天好。

我立即指示哨兵，叫炊事班马上做碗汤面来。

“我们的总理可真是一个平民宰相。”我动情地告诉他说：“造反派围攻人民大会堂，非要叫交出陈老总批斗不可，总理耐心地做了好几个小时的工作，还与小将们同坐在台阶上，当说不通小将时，他也没有更多地责怪小将们，只是说，‘你们非要揪斗陈老总，那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人大会堂的警卫处长阿尔斯郎是蒙古族，很憨厚，他说‘小将们，你们不心疼咱们的总理吗？他将近一天还没吃什么东西。’许多孩子们被感动了，彼此劝说着才结束了这场围攻。”

他边听边点头。我还告诉他说，“为了把你放到中央警卫部队保护起来，总理和旗手闹崩了。你从大西南来京，是在丰台车站下的火车，绕道来到这里的，这不但是总理争来的，也是总理和傅司令苦心安排的。如果进北京站，怕目标大，被人抢去。”

我想起他曾给总理写信，不由问道：

“你给总理写的信，关于什么矿物质问题，总理给你回信了吗？”

他摇摇头，布满老褶子的脸露出满面忧愁和难以藏住的痛苦。

“我至今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罪。听三排长李壁和翟民山说，在北京航空学校，他们硬要你承认反党反毛主席，

里通外国，想联合老毛子打中国……还有，百团大战的事……”

我本来不该再勾引起他的痛苦，但我抑制不住地还是要问。

“如果非要说我有罪不可，我有三条大罪。”他说话，虽然声音很低，有气无力，但我听着却象在高山穷谷中震荡的回声。他望着并没有远方的远方——迎面的墙壁。

“第一条，罪在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

“第二条，罪在，在毛主席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和全军将士一道，赶走了日本鬼子！”

“第三条，罪在，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此外的罪，就是爱骂街，不会说假话！我在朝鲜战场上，有个军级干部都当面骂过，他贻误战机，使许多将士伤亡惨重，我还差一点要枪毙他。”他讲得那个军级干部早已转地方工作，有一次我们还亲眼见过这位彭大将军的老部下如何批彭的。我不解地问：

“那到底为什么要把你……”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他连续说了三遍。这是他自北航被批斗以来，反复说过的话。我记得这是岳飞被害前说过的；十二道金牌把他召回京城，反倒成了里通外国的汉奸，可怜一代壮士英豪连同他的女婿儿子与他同牢被斩了。

我想起二月八日以及在中央一次重要人物会议上陈毅说的话，我说：

“陈毅他曾说，‘朱德、贺龙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军

阀、大土匪！这能服人吗？人家不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吗？！'现在，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指示正好翻了个过，干部没有几个好的了，几乎都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毛主席、反文革、老右……奇怪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领着这么一帮坏人、阴谋家、野心家打下了一个红彤彤的天下呢？历史规律不通，逻辑学也不通啊？"

"天日昭昭！"他又重复了一句。

"我是咎由自取！"他又躺下去，歇了好一阵才继续说道：

"共产党毛主席都不是神仙皇帝，要是把毛主席共产党当成神仙皇帝，也就谈不上英明伟大了。旧社会，三岁娃娃可以登极当皇帝，金口玉牙谕示天下，能说他伟大正确吗？唐朝有唐太宗李世民，才有降臣魏征，没有唐太宗，魏征何存？魏征无存，便只有隋炀帝秦桧之流，和被任意宰割的臣子了……"

近来，他常发牢骚，骂街，有的话很难听。对此他象发现了什么新的境界，似乎毫不在乎这些了。但战士们怕给他带来新的灾难，故意没把原话记在特犯的言行生活录上。

这时炊事班长郑有田送来了一碗面条，面条擀的很薄，切的很细，象挂面，还炝了锅，碗里有两个荷包蛋，加了香油，囚室里立刻充满了香味儿。

郑有田扶他坐起来，用双手把碗递给他，他很快吃下了这碗面条，连汤都喝尽了，他显得有了精神，额头微微浸出了汗珠儿。

"百团大战，参战将士实际不足半百团，准确地说，是

四十三个团，但在日本鬼子不可一世、十分嚣张的情况下，它振奋了民族抗日精神，严厉地打击了亡国派、投降派。它的不足，在战后早就作了总结。现在又说什么破坏了统一部署，暴露了我军实力，招致了日本鬼子大屠杀，客观上帮助了国民党，真是岂有此理！如此说，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屠杀中华儿女，反倒是中华儿女和抗日将士请他们来侵略的？！请他们来屠杀的？！抗日有罪，卖国有功，昭昭天日，一派胡言！！”

他很激动，他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

我示意炊事班长郑有田退出，郑有田不但不走，反而给四号谈开了他自己的事情。

“彭老总，你给评评理儿！”

郑有田每天和另一个炊事员给特犯送饭，常常有意给彭德怀多打一点菜，为此也曾挨过庞副指导员的批评，郑有田则反驳说，一人一勺菜，多点少点是可能的吧，又不能用称称！

四号看着郑有田那天生一副笑嘻嘻的模样儿，亲切说道：“说吧，有什么事，我这犯人，也敢冒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不违，给你当个老朽参谋。”

郑有田看看我，迟疑地说：“人要是快饿死了，你说该怎么办？”

“那就要找吃的。我也跟着奶奶讨过饭，蚂蚁饿了，还要找吃的呢，我没出息，挨饿又不愿讨，惹得奶奶生气。从前，我们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把脑袋掖进腰里，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土豪分田地，此处才叫‘造反有理！’”说到最后他用拳头捶着膝盖。

"可是……"郑有田看看我不说了。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那是上星期日晚上，已经熄灯了，郑有田找到我汇报思想。

原来郑有田是河南省尉氏县人。他当兵还是我带来的呢，那个县极苦，大大小小的沙子窝，解放初期四十多岁以上的人，多数都当过所谓"土匪"，他们吃大户济贫民。解放后数年，人们生活有了改善，但到一九五八年一搞一大二公，成了一穷二白，到五九年下半年开始，家家挨饿，他的父亲，担着两半桶水就饿死在街上。母亲带着郑有田他们兄弟五人守寡，郑有田是老大，眼看全家人都要饿死，他的母亲一狠心扔下四个儿女，跑到山西嫁给一户人家，并生了孩子。母亲虽然人去了山西，仍然惦记着河南的孩子，经常给河南的孩子带些粮食，使他们弟兄五人勉强活下来。到了一九六三年生活略有好转，她撇下山西那个男人又回到了河南。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烧，打派仗，不种田，头头们花钱雇人搞武斗，斗一次给两块钱，老二为两块钱在武斗中死了。她的母亲眼看一家人又要勒脖子，便狠心又跑到山西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光棍，并且又生了孩子。之后，又是给家里捎钱送米，维持一家生计，因为孩子们都大些了，她不敢轻易回家，写信问孩子们意见，孩子们想娘，叫她快回来。但郑有田的叔父说，"她伤风败俗，有辱门庭，再回来打断她的腿。"

母亲又给长子郑有田写信说，"人家都骂我是不要脸的女人，可我不嫁人，这一窝孩子谁养活？谁管？难道眼看着都饿死不成！你来信说靠组织，靠政府，靠共产党，这政

府、这组织、这共产党在哪里？

我认为他叔父说的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决不可再认她为母亲。所以那天我告诉郑有田说："要叫我说，宁可饿死不吃辱门之食，这样的母亲不能再认"。郑有田又去征求和我关系不错的医生马淑敏的意见。

马医生说："你觉着脸上好看就认呗！"她说的更厉害，意思是认了这母亲就丢死人。

郑有田和母亲一起，自解放以来到入伍前，没过什么好日子，挨饿是经常发生的。他认为这错不是他的母亲，因此想不通，这才借着给四号送面条的机会，又把这事合盘托出来。

想不到四号听罢，紧皱着眉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过了好一会儿，这才说道：

"生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县里也管不了，省里也管不了，谁管？你叫他们全家眼睁睁都饿死？给两块钱就去武斗丧命，过去抓壮丁有时还不只两块钱呢！"

他问我："你看过老舍的《月牙》吗？"

我说："看过，是我五九年在永定路书店买的文学小丛书。我看了两遍，老舍笔下的母女命运真可怜，她们最后都走上了自己不愿走的妓女之路，可那是旧社会……"

"新社会就不吃饭？新社会应该逐步吃得更好。"他转向郑有田：

"你应该认你的母亲，把她接回来。按中国的传统，她不算高尚的母亲，但她是个伟大的母亲！就说，我们，包括我犯人彭石穿，对不起她。"

郑有田真的写信把她母亲从山西叫回河南了。数年后，

当这位受尽苦难的母亲怀着对彭德怀崇敬之情来京探望时，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已经含恨离开沧桑人世。

当夜，郑有田的母亲坐在床上，抱着一包袱家乡特产，自泣自诉地整整哭了半夜。

我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东西保存，我把郑有田为我代买的一个刮脸刀盒非常珍视地保存着，剃须刀更新换代多少次，这个刮脸刀盒至今还在我抽屉，我想，它应该进中国历史革命纪念馆，它能说明许许多多中国的事情……

十四、四月槐花白如雪

紫禁城旧历三月初是蔬菜青黄不接的季节。虽然已经实行暖窖式的塑料薄膜来保温促长，老实的菜农因为一来不准他们乱提价，二来还不善于运用早收早卖早得利这一经营秘诀，因此，市场上很难买到早期新鲜蔬菜，所能吃的仍然是去年冬储的已经糠得象藕一样的大萝卜和柴禾一样的大白菜，炒出来非常难吃，而连队的伙食标准，每月只有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当然不可能多的购买高级副食品诸如鱼、肉、禽、蛋等。每逢春天，战士们因缺菜吃，不得不吃咸菜，炒咸菜，而咸菜缸里的大白蛆，只有炊事员才知道有多么的肥胖（还有一人知道，那就是贺老总的老伴薛明知道）。对此，干部、战士们已经习惯了。但这样的伙食，使那些病残和年老的囚徒们，日渐难支。薛明为此常在小山坡上为贺龙挑野菜，这一点多么像长征、像大革命时期！

连队有伙食委员会，每星期六下午由副连长孙旺组织召开伙食委员会议，研究下周饭谱。这一次，老连长破例地参加了伙食会议。

当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实在想不出什么新招儿来改善伙食

时，老连长管东春不紧不慢地说道：

“解放战争时期，不要说改善伙食，有时候还一天一天的吃不上饭呢。有一次打仗，遇到紧急情况，我的老连长那时是罗荣桓的警卫员，半夜里愣把老乡的尿盆当饭盒给罗帅打了半盆饭，罗帅还是照样吃了不少呢。”

“那时候根本谈不上顿顿有菜。不过，过去总归过去。和平时期，我们总要千方百计地改善伙食。再不能总是‘苦不苦，想想两万五千五’。”

“当然啦，”他又补充说，“巧妇难做无米饭。”

他抽着核头大的烟斗，颇有点象贺龙抽烟的姿势，吐出一口烟，这才缓缓地说道：

“六〇年咱们搞过‘瓜菜代’，这会儿咱们干脆来个洋槐花代吧！”

洋槐花怎么代菜，许多人没听说过，不知道这东西究竟能不能吃，更不知道能不能当菜吃。老连长解释说：

“小时候在我们老家，一到春天，没菜吃，我们就采洋槐花儿，这东西，用途可广啦，生着吃甜丝丝儿的，用开水炸过后可加盐、醋、蒜做凉拌菜吃，也可作饺子馅、包子馅、烙馅饼，脆股八查的，比糠萝卜好吃多了。要是有营养学家（那时没有美食家这一新名词），分析分析，可能会有许多的营养成份。我劝大家吃吃试试。但是，听说必须用开水烫过，是怕有毒。”

老连长管东春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星期日是两顿饭。下午，我和老连长、炊事班全体人员，还有许多自愿来报名的战士，开始上树采洋槐花。

四月槐花香。特监小院周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洋槐

树，一到阳历四月十日以后，白色的洋槐花开得挂满枝头，飘得特监小院满院清香。小花洁白如玉，每一小枝上长着几嘟噜，每嘟噜由七、八朵到十几朵组成，一簇簇，一串串，美丽，清香，圣洁而纯真。放在嘴边叫人不忍拿开，我给她起名叫树上的白玉兰。高兴得我当夜给未婚妻写信说：古往鉴魁各着意，斯喜清香白玉兰。她比白玉兰花还香，我的未婚妻叫玉华。（我采摘一朵，压在书里，想做个留念，可惜，我的天津中学红代会副总指挥的小内弟带一帮小抄，翻走了我不少书，当然还有那支洋槐花。）

老连长三十八岁，上树已经很困难了，他站在房上采。

我小时候就喜欢上树爬墙掰干棒，一说上树，我的童心象火一样燃烧开了，我象小猴子爬竿一样，不用肚子挨树，"蹭蹭蹭"几下就爬到了高高的洋槐树上。我毕竟比他小十余岁。

我们采了许多的洋槐花，装了足足有两大长方形筐箩。在老连长指导下用开水烫过，剁碎调馅，加大肥猪油，包菜包子。

连队的大菜包子，小的有四两多，大的有半斤多。炊事班长郑有田每到一个囚室，就说一声："吃吧，洋槐花馅大菜包，保准好吃，这可是我们连长、指导员亲自采的花儿呢！"

大菜包子蒸的多，这是连长的指示，"特犯"可以随便吃。一般的拿两个，吃少的拿一个，吃多的拿三个。

做洋槐花馅大菜包，本来是为战士和"特犯"改善伙食的，没料到出了两起不算小的事。

一件是，三班战士崔广才一下子吃了十二个大菜包，刚

吃完又去做单杠，结果从单杠上掉下来，疼得如鬼哭狼嚎，送进二六七医院一检查，原来撑破了肠子。住了一个半月医院，从此落了胃病，一吃饭就吐，后来吐酸水，不得已中途复员了。

另一件则涉及到“囚徒”了。

炊事班长郑有田把包子送到九号班禅额尔德尼囚室，也照例说了是洋槐花馅的包子。九号从来没吃过洋槐花馅的包子，怀疑会有毒（实际上吃多了确实会脸肿），但又不敢说，只好勉强留下了一个。开始，他试着吃了几口，觉得很香，不由得把一个大菜包子吃完了；接着，告诉哨兵还要吃，郑有田又给他一个，又吃完了。他又要第三个，吃完了还没够，又吃了一个，总共吃了四个大菜包子，按份量说，快三斤了，超过他往常饭量的三倍多。

此时已是下午六点多，我和老连长，还有团司令部参谋王德录正在连部说话，哨兵匆匆跑来报告说：“九号在屋里转圈、跑步，制止他也不听，不知道为什么。”

王参谋说：“我去看看。”

王德录和我一样只上过几年小学，没文化，却戴着眼镜，楞拉巴唧的。

王德录不一会回来说：“你们想的倒挺周到，给特犯改善伙食，撑得人家满屋子跑。撑死了你们可要负责。”他半开玩笑地又添一句：“老班真没出息，撑坏了。”

我和老连长无言以答。他是半开玩笑说的。

不知怎么的，这事又被副指导员庞艾发觉。庞艾也来到九号囚室，见九号跑圈子，于是问道：

“你不老实呆着，在屋里跑什么！？”

九号停下来，喘着粗气说：

“报告班长——”他象在国民党监狱一样，无论见战士还是见多大官，都一律喊班长，“我吃包子吃的多了一点儿……”

“多了一点儿——”庞艾讽刺地说，“吃多少算多少？你到底吃了几个？吃多了一点儿就撑成这样！”

“四个。”

“真没出息！”

庞艾说完，又到炊事班，把司务长陈青、炊事班长郑有田一起批评了一顿。还说，今后不准这样浪费人民的粮食。他又卖弄地背诵开了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他走了以后，郑有田说：“小老鼠咬瓷缸，还口口有词儿呢！就你知道锄禾辛苦，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

一顿洋槐花馅包子，撑坏了一个，撑破了肠子一个，我想，今后可不能再这样改善伙食了，这还了得吗！

我以为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第四天，政委李大胡子叫我去，告诉我今后得注意点儿，并把庞艾写信揭发警卫连指导员和连长如何如何与特犯界限不清等等，大略内容透露给我。临走政委用《红灯记》中的一句台词半开玩笑说：“不要忘了时令不好……”

庞艾的揭发信，说问题严重也严重，说屁事不是也屁事不是。第一件，我和老连长派战士刘桂贤到九号家大红墙内去为他取毛衣。刘桂贤临走，他所在的一班长反复嘱咐，叫他遵守纪律，不要惹事，按时回来。刘桂贤连声“是是”。来到红墙大院门口，捶着门，他象擂鼓一样咚咚砸门，越砸越不开，越不开越砸，门砸了足有五、六分钟，九号的弟弟

才出来开门。原来九号的母亲以为是红卫兵造反派来查抄，不敢开门。到屋里以后，刘桂贤说：“快点，我来给老班取毛衣。”老太太听不懂，九号的弟弟直“啊啊”，原来他是个哑叭。刘桂贤比划了半天他们还是听不懂。刘桂贤心想，毛衣是毛线做的，毛线是羊毛纺的，羊毛长在羊身上，想到这，便爬在地上学开了羊叫，同时，让他们看自己穿的军用绒衣。哑叭这才明白了，从箱子里找出一件毛衣。刘桂贤临走说道：“我的妈，比跟洋人说话还难。”

在回来的路上，刘桂贤骑着公用菲利普自行车逞大能，追赶一辆摩托车，因躲行人撞在树上，撞了个乌眼青。把九号的毛衣还撕破一块。这既有政治事故苗头，又是行政事故。第二，九号身高体长，连队木床盛不下他，晚上睡觉两只脚露在床外，即使冬天也是如此。司务长陈青虽然喜新厌旧闹离婚不大应该，但他为人还是正直热心，他见九号睡觉露着两只大脚丫子，便找来木板，锯子，自己动手，为九号的木床接上了一块，为此还把右手无名指碰破了。九号感激的直向陈青双手合十。第三是，战士刘桂贤是个初中生，喜欢文学，想当作家，常狂妄地说，他将来要坐郭沫若这把交椅，因此，全世界大文豪的书他都读，连在厕所解手也读。有时连队大搞卫生，他拿本书一蹲就是两个小时。小说稿也写了一本又一本，可惜一本也不象小说，没人买这个大 文 豪 的帐。后来他认为自己的名字不好，又给自己起了许多名子，什么“黑金子”，什么“银箭”，什么柳巴银，因为有位巴金，他只好叫巴银了，等等。甚至还冒大家之名发稿。他总以为自己写得很好，是编辑部看人下料，因此冒名试试，结果编辑来信说：“请你先学学如何点标点符号……”

刘桂贤很好奇，还有点八个不在乎。他给九号取回毛衣，把毛衣交到九号手里说："请大法师给讲讲佛道是啥意思，我在庙里见过老和尚念经，他们究竟念的啥？"

九号不讲。刘桂贤说："那讲讲佛戒吧，我进寺院也好守规矩，这叫入乡随俗。不然，你再要东西我可不给你取了。"

实在架不住刘桂贤纠缠，九号给讲了念佛抄经和吃斋饭规戒。说道："你是解放军战士，听听罢了，可不要当真。规戒有：吃饭时不许说话，吃完一碗还想吃，不要叫喊，想再吃，拿筷子在碗中划，吃半碗划半碗，吃一碗划一碗，到时就象咱们这里，有人送，不许扔饭，不许糟蹋。念经、抄经要先净手、洁案、静心、入空、耳不闻外音、眼不见外事……"

副指导员把这条也列为政治事故苗头，说他违犯了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政治纪律。

其实，人往往是过高的估计自己，过低的估计别人。这个道理虽然都懂，做起来却实在不易。麻庞艾虽然告了诬状。但正象一九六六年七日陈毅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几年后，这位削尖脑袋不惜踩别人、害别人往上爬的麻副指，不仅没有升官，反而臭烘烘地复原了。因为他在支左时，也搞了类似钱毓英为人发汗的事。警卫部队的官兵们说："别人没升官不冤，唯独庞艾，拼尽所能却没升官是真够冤的！"。他临走，还私自多带一件军大衣，我们要不回来，被李大胡子点名硬追了回来。可以说，这个和旗手握过手的手始终没爬叉上去，白握了一双伟大的手。

十五、潴龙河水浪涛涛

九班大个子战士翟民山终于找到了，但他已经死了，他死在村野外一个小变电站里，是以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触电身亡的，这比起他的祖辈们由于各种原因被逼的用吃信、跳井、上吊、扑进潴龙河来结束生命，要舒服得多了，这也应该列入人类历史文明进步之例。

那是七月十六日深夜，翟民山装拉痢疾躲过哨兵从厕所后窗逃走以后，搭车潜伏回家。他没惊动他娘，只翻过自家矮墙，冲北屋叩了个头，在院里站了一会，便右手提一把利斧，左手拿着他在北京首都钢铁厂值勤时外国友人赠给的一个小钢笔手电，跃过发汗片钱毓英家一人多高的土坯墙，来个北屋门下，急促地敲着门。

发汗片的母亲首先惊醒，因为女儿在造反总部有个一官半职，她的地位也高了，说话口气也粗了，惊奇而不耐烦地说道：

"谁呀？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不会白天再说吗！"

翟民山在门外平静地答道：

"是我，我是宋庄来的，钱毓英的老姨病得不行了，叫

我送信叫你们快去看看。”

发汗片的母亲一听老妹子病危，急忙拉灯穿衣服，当她开开门看到翟民山一脸杀气和手中的利斧时，吓得目瞪口呆。

“听说你闺女发汗片，打砸抢发了国难财，票子一挎包、一挎包的往家拿。钱都放在哪？”翟民山一亮手中的斧子，发汗片的母亲翘着三寸金莲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说：

“钱……钱……在茅厕东南墙角下。”

她以为翟民山是来索取钱财的，没想到手起斧落，见了阎王。

发汗片的父亲听着有点不对劲，赤着双脚到堂屋，刚一照面，脑门上就吃了翟民山一斧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白浆直往外突突。他死得并不冤，他知道他闺女都做了些什么事，而且，充当了助纣为虐的窝主。

翟民山越杀越狠，越杀越恨。他来到里屋，只见炕上发汗片穿着红裤衩，光着上身，张着嘴，面朝天睡得正香。她的右边依次是她的妹妹钱毓敏和最小的弟弟钱毓展，都在睡梦中。

翟民山稍一定神，站在炕沿前用钢笔手电捅一捅发汗片的脑袋，她一愣怔，惊醒了，见翟民山手提利斧，一身血迹，吓得嚎叫一声，坐起来。浑身颤抖着直往炕头里躲。此时发汗片完全不象指挥武斗和打砸抢时那么威风，她缩作一团，也忘了羞耻，双膝一跪，连连向翟民山求饶。

发汗片指挥造反司令强奸了他的妻子，并且怀了孕，还惨无人道的折磨他的小舅子六生。此时仇人相见，自然地是分外眼红，翟民山恨不能立即结果这个害人的女妖，但是他

还有话要说。

“你们的狗司令欺负我的家属，是你叫去的吗？”

“是……是我，没想到他们……”

“逼得老书记自杀，是你们吗？”

“是……这都是上头的指示……”

“把我的内弟的小鸡子，用秤砣吊了两个小时，也是你们吗？”

“……”发汗片咧了咧嘴，再也说不出话来，赤裸的上身抖索着，早已失去了闺秀的特征。

“你们到底为什么这样惨无人道？！”

“造资产阶级反，造修正主义反，保卫毛主席……”发汗片装得很诚实，“上边还答应我入党，坐官，先当县棉麻公司革委主任，然后再当县和地区的头……我是典型……”

翟民山一拧眉毛：“你也入了党？”

“入了。”

“入的什么党？你凭什么入党？你当的什么官？”

“三忠于，四无限，五不怕……”

“放屁！”翟民山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们这号人入党作官当典型，全凭着投机取巧卖屁股，这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党，算叫你们给糟踏透了！马克思在天有灵，一定会大哭七天。”

“求求你饶了我，我要改邪归正。”发汗片无耻地企求着：“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答应，我们和中央文革韩爱晶熟，你要什么条件都行。我们和江青同志挂着勾……”

翟民山说：“可以。我就一个条件，看看你的心是人肉长的，还是什么贼子王八蛋变的！”

“不……别……”

发汗片简直无愧于发汗片，她居然也想在翟民山这个大头兵身上施展下威力无穷的为人发汗的功能：

“只要你饶了我，我跟你玩会儿也……也行……”

“呸！”

翟民山气得声音太大了，一声“呸”像打雷一样。

发汗片的妹妹钱毓敏和弟弟钱毓展同时被惊醒，躲在被窝里打哆嗦。他们既不敢哭也不敢喊——几乎吓傻了。

“黄鼬精们在上边害人，你们在下边害人。咱们县自大跃进以来，就老书记一人敢站出来替老百姓说句心里话，可你们，专门拿为老百姓着想的人开刀，你们和历朝的奸臣贼子有什么两样！”

翟民山扫一眼钱毓敏、钱毓展：“你也有父有母、有兄弟姐妹，有三亲六故，你的天地良心都他妈的喂毛驴了？！你说，你们这号人该杀吗？”翟民山揪住了发汗片的头发。

“该杀，只求你饶我一次。”

翟民山松开手，就在他一眨眼间，发汗片象条饿狼又象口退了毛的大白猪扑向翟民山，双手抢夺他手中的斧子。一时间一口白猪一条黑大汗缠在了一起。翟民山一时把她掀倒炕上，脚踹发汗片的胸脯，庄严地说道：

“发汗片你听着，我翟民山入伍三年，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要代表党，代表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处决你这个害人精！你们这些毒蛇杀一个少一个，留一个会分一窝！”

他说罢“忽”地举起斧子，“噗”地一声，发汗片五脏开花，血溅房顶，一股血腥味儿呛得翟民山直恶心。

“你不是外号发汗片吗，阎王和小鬼得了感冒，我送你

搂住他们发发汗吧！”

钱毓敏见姐姐丢了命，跪在炕上，抱着翟民山的腿连声告饶。

翟民山虽然杀红了眼，迟迟疑疑不忍下手。

钱毓敏跟着她哥哥、姐姐，以他们家为据点黑窝，干了不少坏事，许多打砸抢抄和批斗游街的决策首先是从这研究的，在全县许多人命里、伤残中，直接和间接的几乎都有他们钱家的份；发汗片还亲手用机枪扫死了一个复员的战士。但这钱毓敏和她哥哥姐姐不完全一样，和她那充当窝主以发文化大革命财的父母也不一样，她是一心一意地稀里糊涂地“三忠于”，她认为，只要是文化大革命需要，只要是毛主席的号召，就是杀人、放火、舍身卖肉都应该在所不辞，因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但她对于迫害无辜的妇儒不是那么主动，她也曾劝阻姐姐发汗片不要欺负翟民山的妻子和他的小舅子六生。翟民山也不想杀她，说道：

“你的人性还没有完全丢尽，你和野兽还有区别。就凭这点儿，我留下你一条命，往后再干坏事，把你的心活吞吃了我不怕骚气！”

翟民山杀气正盛，问道：“你哥在哪？”

“在东厢房。”

扔下钱毓敏，翟民山想去东厢房，刚到堂屋门口，就听一阵脚步声，用钢笔手电一照，只见发汗片的大哥钱轴子、二哥钱三多一前一后，各持铁耙和镰刀来到门口。三人一照面，钱轴子便举耙照准翟民山头上就是一下子，这耙落到头上，准是五个眼；翟民山手疾眼快，又在部队学会擒敌技术拳，他未等耙落，迅速把门一关，铁耙嵌进门板上。

正在钱轴子使劲拔铁耙子时，翟民山猛一开另一扇门，照着钱轴子的脑袋砸了三斧子。虽然第一斧子已经把钱轴子砸昏了，但还未等他倒下，翟民山已接二连三两斧子，脑袋成了红色的烂西瓜。

当钱轴子和翟民山动手时，因为门窄，站在后边的钱三多不便下手，此时见哥哥已倒下，举镰刀朝翟民山戳去，精熟擒敌技术拳的翟民山迅即把身子一闪，扔去斧子，出手叼住了钱三多手腕，镰刀被翟民山很轻易地夺过来。

“去你娘的！”镰刀砍进了钱三多右眼，紧接着，一脚踢中钱三多裆部，他怪叫一声，便断了气。

杀人可不象干活，杀过几口之后，会感到非常疲劳。翟民山一连杀了几口，眼前没什么可杀的了，便想坐在台阶上喘息一会儿。这时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大喊：“杀人了！救命啊！”

听声音是发汗片的妹妹钱毓敏。混乱中她趁机溜了出去。翟民山火冒三丈，拿起斧子，到街上把钱毓敏拖了回来。

翟民山把钱毓敏扔在台阶前，钱毓敏也不喊叫了。翟民山说：

“毛主席说，左中右，先进中间和落后，什么时候都有这三种人，我把你也分分类，不管你靠左还是靠右，靠前还是靠后，总归起来说，我想留下你，你倒好，到大街上大喊大叫叫人来，想抓我，你倒想害死我。其实老子一来就没打算活……”

自然地，钱毓敏由预备役替死鬼变成了中华造反派正式替死鬼。

翟民山这下可真杀红了眼珠子，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这一家一个不可留。因此又回到北屋炕上，去搜寻发汗片的最小的弟弟钱毓展，但找遍了屋子也没找到，又到院里找，当找到猪圈时，他用钢笔手电遍地照仍然没有发现；其时，发汗片的弟弟乘乱跑到院里，藏在猪圈，正好躺在靠猪槽子这面墙根下，是死角，翟民山没发现。

翟民山想再去结果几个造反司令，但天已经擦亮儿了，东方出现了鱼白加桔黄色的光芒。

他再次返回屋里，整一整衣领，整一整军帽，把敞开的风纪扣结好；然后，用食指蘸着发汗片的污血，在墙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杀人者——人民的儿子翟民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他立正站着，端详着自己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的歪歪扭扭的笔体，象完成了一件极其伟大的历史使命，遥望着远方，想着四号的音容相貌，长长地出了口大气……

临走，翟民山把所有的尸体全部拖到院子里，一律头朝南，以脑袋取齐，整整齐齐地按他们的辈份排成一队摆在院子当中，数了数，一共六条，除了钱家的小儿子外，一个不少。至于发汗片，还赤裸着上身，他无心去管。

这时翟民山已感到精疲力竭，他想抽烟，但口袋里既没有烟也没有钱。忽然想起发汗片家发的国难财。他来到茅厕，按照发汗片的母亲说的位置，一边翻一边自语："他娘的，什么时候都有吸老百姓的血发国难财的，搞运动时有，邢台闹地震时有，甚至受水灾发赈济款时也有；过去有，现

在有。将来他娘的也少不了有……”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挖出了六块手表和一大捆人民币。

他拿着手表和钱，穿过发汗片家西墙的一道小豁口，来到西院。

西院是生产大队的小卖部，小卖部里有本村的两个半专职半业余的售货员，白天卖货，晚上作伴睡在小卖部。一夜的鬼哭狼嚎，她俩听得十分清楚，吓得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堵在了门口，俩人抱在一起缩作一团。

翟民山对着安上铁条的小卖部小窗户说道：

“开门！开开门。你们不要怕，翟民山杀坏人不杀好人，请给我两盒烟，钱，找我的同学×××去要。这里有手表和一捆钱，这是人民的财产……”

不一会，从窗户眼里冒出一条保定出的“早霞”牌香烟，每盒一毛五。翟民山拿了两盒剩下的八盒又塞回屋里。

翟民山点燃一颗，一边使劲抽着，又回到发汗片家，把大门打开，然后，围着一排血肉模糊的尸体转了一圈，啐了口吐沫，便昂首挺胸，大步走出钱家大院。

他来到本村当小学教师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宿舍门前，敲开了门，同学一见他满身是血，脸有杀气，吓得六神无主，也不敢往屋里让他。

翟民山站在门口，把杀人经过告诉了同学，并嘱盼同学多多照顾他的母亲，替他尝还欠小卖部的两盒早霞牌烟钱，说罢，扬长而去。

翟民山来到村北五里井一间小转电站屋里，抽了一盒多“早霞”牌香烟，然后，触电身亡了，时年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零。

翟民山究竟是英雄还是罪犯？还是既非英雄，也非罪犯？还是既是英雄也是罪犯？至今，七说八不一，糊里糊涂，难以定论。但人民忘不了他，村里的光棍小青年常引用一句话：翟民山万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造反英雄和“民兵”们，一大早便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钱家大院，大门明明开着，每个人手中都有武器，但没有一个人首先敢于进去。最后，还是有个聪明的小头头，出了个绝顶聪明的小主意，由他喊号子，叫齐了号大家一齐上墙头往里看……

一年多以后，当我想把翟民山的情况和这个震惊潴龙河的事件告诉给四号时，也是我们奉命撤离这座特别监狱的时日。

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的见解。

但一泻千里的、斩不断也流不尽的咆哮的潴龙河水，是否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呢……

十六、牢笼雄狮（一）

——夜半歌声情悠悠，震撼了贺胡子一颗寒透了的心

在特别监狱里的一切特犯，虽然没有中共中央决议和高等执法机关的判决，但仍然是以“特犯”的名誉被看押的，尽管经过周总理百般努力，陈毅也曾为元帅们的遭遇而呐喊；傅崇碧、杨德中尽其所能给以照顾，仍难以回天，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被囚禁的元帅们的处境。难以改变某些人对他们法西斯式的处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非正常的政治气候下，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那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格言完全变成了欺世骗人的鬼话。

不过，由于周总理的执意坚持己见，特监里尚有一人得到了格外“开恩”，那就是人称贺胡子的贺龙老总。他所得到的优惠条件是起初允许他的老伴薛明在特监陪伴，这是特监里唯一的一个允许有亲属陪伴的人。

但是，薛明不知道，这是周总理冒着“老右”和对“大土匪”很关照的罪名争取来的；薛明还不知道，中央警卫部队也是冒着“不大可靠”的嫌疑，给予了可能的照顾的；薛明同志还不知道，某些人，特别是江青，如何指着傅崇碧和总理的鼻子，大声斥责“你们为什么保他们”的。

由于伙食标准低，饭菜很单调，经常是炒白菜，而且北京的磨帚疙瘩白菜净是筋，炒出来很难吃。贺龙体质差，又多病，想吃点生蔬菜。一天，薛明到伙房给贺龙要白菜和咸盐，生拌白菜。炊事员王连山是个烧火的，胖乎乎的，脸通红带黑，是个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他当时请示炊事班长郑有田，郑有田未经请示连首长，便答应了给薛明白菜和咸盐。

这件事情在监外本来不算什么事，但是，在特别监狱，“特犯”和战士吃的是一个食堂，任何人都不得另外要东西吃，至于“特犯”，那是当然地更不允许，仅此一点，如果被专案组的人知道，或被中央文革某些人发现，警卫连干部战士轻则挨批评，作检讨，重者就不可设想了。在那左的发疯的年月，针头线脑的小事儿也会上到要命的大纲大线上去。所以，事后我请示李大胡子政委：“往后贺龙再要拌白菜吃怎么办？”

李大胡子说：“人都快死了，要点白菜吃还不行？”

后来，薛明又要给贺龙在山坡上挑野菜，警卫哨兵也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贺龙哪里知道，周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他已经被阴谋家两面派包围了。

开始，杨德中受总理委托，还来特监看过贺龙几次，后来再也不见杨德中到云岗半山坡了。贺龙由于长期被关押，生活条件又不好，精神被无情地压抑，天天趴在小窗上看山坡

上是否来了卧车，他在盼杨德中，盼周总理的声音。其时，总理自己都受到了各种攻击。杨德中还能来么？即使来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贺龙病了，得了多种病，尤其是糖尿病很严重，但不准送医院。贺龙十分气愤而悲观，常常大喊“冤枉”。有一次连续骂了“栽脏”、“狗娘养的”、“见他妈的鬼”之后，用铅笔连续不停地写两个字：冤枉！冤枉！……他象白毛女一样喊着：“想整死我，想拖死我，杀人不见血哟。我不死！我要活！”看着一个威震敌胆的老帅发着这样悲凄地呐喊，我们只有暗暗叹息。

他开始拒绝吃药，薛明叫他吃也不吃。当时营部有个助理军医，部队习惯简称医助，名叫孙成辰，河北邢台人，小个子，八字眉，大嘴叉，人很直率、坦诚。有一天，卫生员孙立达说贺龙患糖尿病，不能送医院，他又不吃药。这以前，他给贺龙打过治糖尿病的针，并劝说贺龙吃药。现在听说他不吃药，孙医助当即来到十九号囚室，强迫贺龙说：

“吃掉，不吃不行！不吃药病怎么好！”

孙医助回到连部对我说：“他不吃药，我强迫他吃了。这么大年纪了，不吃药顶住要坏的。”

孙医助完全是一副好心，但不得不装着象“法西斯狱卒”的样子，因为贺龙正被林彪等人指责为“大土匪”、“反毛”，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和幕后操纵者，是三反分子。对有这么多吓人的“帽子”的人，别人不再踩上一只脚，应该说就算是大好人了。

薛明不了解内幕情形，因此往往对警卫人员产生误解。至于后来派去的“三服”医生——即服从专案、服从政治、

服从阶级斗争和审查需要的所谓医生，他们所干的种种现代法西斯事，则与中央警卫部队是没有关系的。

真理终归是真理。有一件事情，终于使薛明和贺龙了解了警卫战士心底深藏的秘密，尤其是贺龙，受到很大震动。

云岗的半山坡上，夏夜还是凉飕飕的，天空黑蒙蒙的，有几颗淡淡的星星，远处，有几点灯火。警卫人员已经进入梦乡，院里静悄悄的，哨兵在囚室门前漫步游动着。贺龙和薛明此时也已入睡。忽然，一阵歌声非常清晰地从院中传到囚室里。这歌声是如此熟悉亲切，薛明惊异地把贺龙推醒。贺龙爬在小窗前，仄耳细听，那歌声、那歌词、那音调、那感情，竟是如此清晰、亲切——

洪湖水呀，
浪呀嘛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清早儿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仓……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部队干部战士一九六五年以前看过多次，都很喜欢看，插曲也都会唱。但文革以来，一切电影戏剧都由江青“过筛子”，批点，《洪湖赤卫队》正被林彪、江青大批特批，被指责是为贺龙翻案。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看押着贺龙的特别监狱中，在半夜里，而且在贺龙囚室的门前，竟然有人敢唱这支歌！这是何等明显地为贺龙叫屈，为贺龙翻案！

为什么哨兵偏要唱这支歌呢？而且是在这种环境情形

下。贺龙完完全全明白了。他感到，人民没有忘记他，部队干部战士没有忘记他，他听着听着，一双深陷的眼眶里满含了热泪。

这一夜，贺龙和薛明几乎一会儿没睡。

但有几天，他近乎歇斯底里地说："枪毙我吧！枪毙我时，我就喊冤……"当他稍稍平静的时候，却又喃喃地说："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夜半歌唱洪湖水"的事，第二天便被副指导员麻庞艾侦知，这天恰巧是庞艾值班，他当即用专线电话报告给司令部作战值班室，说云岗半山坡执勤点贺龙囚室门前，半夜里有人唱洪湖水浪打浪，这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既然已经众所周知，团司令部毫不例外地如实报告师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如此层层上报，不久便接到上级传达下来的指示："查清楚是谁半夜里唱的"洪湖水浪打浪"，查清后先作检查，然后再视情况处理"。这个情况假如被中央专案组知道，不仅战士倒霉，也会给贺龙帮倒忙。

连队根据上级指示，作了调查，当时执勤的哨兵是九班战士外号小诸葛的宋根立。

我和老连长管东春问他：

"你上岗听到有人唱《洪湖水浪打浪》了吗？"

宋根立答道："听到了。"

"是谁唱的，你看见了吗？"我问道。

"可不许乱说。"老连长补充道："看清楚就说看清楚了；没看清楚就说没看清楚，这可不是小事情！你知道吗？"

宋根立外号小诸葛，那是多么聪明，他那白眼珠转了两

圈，说道：

“我听到有人唱了，好象是在东南墙角，我去看了，没发现人；这时，又听到北边墙角有人唱，我又转回来，还是没看到人，又不能走远。”

“贺龙听到了吗？”

“我看他爬在小窗上，认真地听。”

我们查来查去，没查出谁唱的，便如实上报，上边也无意再认真追查。实际上是警卫师司令部和卫戍区傅司令没有认真去追查。因为他们压根儿不信这些老同志都是反革命、反党、反毛的坏家伙。作为警卫连，虽然查不出谁在院里唱歌是严重失职，但上边不真究实挖，也便不了了之了。

究竟是谁唱的呢？事过半个多月后，风平浪静了，上边也不再问了，小诸葛这才偷偷告诉连长说：

“连长，实话说吧，半夜唱歌的人是咱们副连长孙旺。我已经发誓，死也不会出卖他。以前，翟民山叫我在给彭德怀叫屈的信上签字，我是没签，我当时认为，咱们不能瞎撞南墙，可不是我怕死怕受连累投机取巧见风驶舵……”

老连长一瞪眼骂道：

“小兔崽子，不许胡说八道！”

宋根立弄个鬼脸撒腿跑了。

其实，正在上边追查是谁半夜里唱“洪湖水浪打浪”时，老连长管东春就已经知道是副连长孙旺唱的了。孙旺毫不掩饰地对老连长说：

“连长，歌是我半夜里唱的，我去查哨时路过十九号囚室唱的，看到十九号囚室，想起贺龙，我不由地唱的。”

老连长问道：“你唱歌的时候，哨兵看到你了吗？”

孙旺答：“看见了。但不能怪宋根立，好汉做事好汉当。”

“那，你是有意唱的了？”

“也可以这样说，也不全是这样。我喜欢这个电影插曲，歌好，词好，感情好。一会儿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会儿又成了两把菜刀闹土匪，大土匪、反共、反毛，谁信？”

“你不知道《洪湖赤卫队》这个电影是被指责批判为贺龙翻案的毒草吗？你有几颗脑袋？”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要唱呢？身为副连长，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一个警卫师的小小副连长，还想把乾坤扭过来吗？”

孙旺可以说是既敏感又聪明，他回答说：

“我相信连长指导员不会把我推出去。即使上边真要追查不放，我也准备坐牢，当个小囚好了。说耻辱，也耻辱耻辱；说光荣，也光荣光荣！”

老连长说：“那你究竟为什么半夜里要唱这支歌呢？”

“不知道。我想唱。我想，他听听这支歌，也许会增强一点儿生的愿望。听我爸爸说过，在白色恐怖的时期，有一次，他为红军筹运军火，经过敌人关卡，挑夫抬着一箱快枪和弹药，他戴着墨镜，留着小黑胡子，戴着礼帽，手拄文明棍，未等敌兵阻拦，便手拄文明棍坐在军火箱子上发令道：‘过来！来检查！’敌人一看这气势，不仅不敢搜查了，还毕恭毕敬地把他放过去了。当时他才二十多岁。他一生是个传奇式的革命英雄，怎么一下子就从里到外坏透了！”

孙旺说着，非常动情，深深叹口气继续说道：

“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父亲说，他一家人不但冒死投靠了共产党，而且，还背负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带着数千家乡子弟，投奔了红军。他和家乡父老子弟兵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的姐姐被敌人俘虏后，用集束手榴弹放在两腿中间，人全炸飞了，连尸首都根本无法收。贺家宗族，死了不下几十口。到全国解放，他所带领的将士，活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现在把他当大军阀大土匪，放在特监批斗侮辱，国民党把他当坏人，咱们也把他当坏人看押，难怪陈老总痛心地说：‘这不叫人家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吗！’这样一个人现在受比洋人还洋的罪，要叫你心服吗？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心服吗？！真是天理何在！？”

孙旺近乎如泣如诉地说了好半天，小眼睛红得冒血丝，一边说一边使劲眨眼。老连长为之所动，提醒孙旺说：

“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你是个党员，是个副连长，你老子又是军区副参谋长，这种时候，不能不讲政策和策略，不要闯大祸。多亏上边追得不紧，否则，你也要尝尝蹲班房、挨批斗、遭侮辱的滋味了！顺着你这个小毛毛根一挖，便把你老子也就挖出来了……”

副连长孙旺是襄阳人，薛羽同志后来著文说唱歌的战士是沔阳人，这是她听错了。

事情就是这样让某些人不能顺心如意，你想要批的，群众不去真心批；你不想批的，实际上在群众心底里早就批了千百次。看来谁也难以永远地强奸军心民意。

至于后来，我们交出看押任务后，贺龙所遭到的更残酷的迫害，我就不得而知了。据给朱德当过警卫员的我的同乡王文跃事后说，在贺龙患糖尿病最严重的时候，不但不给他

治病，还给他打生理盐水，以致渴得贺老总喝痰盂里的水。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文字披露，原因是，有的人说披露这些，影响贺龙的形象，有损我们党的声望。但是，作为中央警卫部队的战士们却不这样认为，如实地再现历史真相才能使群众理解并接受历史的教训。

贺龙是人不是神，更不是木头，导致他喝痰盂里的水，并无损于贺胡子的光辉形象，只能说明，真 理是 多么 的珍贵！一切阴谋诡计、阴谋家、两面派和邪恶势力，是多么的可恨、可憎、可怕！

贺龙，将永远明朗地活在战士和人民的心中。这正如周总理对卫生部部长傅连暲所讲的：

“历史无情，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无情的。它不会向什么人献媚，你应该记住，最公正的是人民”。

谁想扼杀真理，谁迟早会被真理撞击得粉碎，只不过有个时间问题。

十七、党里出了鬼
中央出了奸臣

——排长杨树理背负着武汉司令陈大麻子跳窗逃出重围

江青在接见造反派代表会上和其它会议上，多次讲到，武汉司令兼独立师师长陈大麻子，是个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要拿他作个典型，重重的开一刀。

陈再道脸上有麻子，所以江青正如林彪说罗瑞卿手长是罗长子一样，恶狠狠地骂陈再道是“陈大麻子；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意思是脸上净坑，这是对人的侮辱。

陈再道究竟是否反对毛主席，是否是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等等，全无什么确凿的事实材料。对于一切被囚禁的党政军领导，对于他们头上的一系列罪名，警卫部队早已司空见惯。因此，陈再道被从武汉揪来北京，投入元勋们的囚室行

列，被审查、批斗，也就丝毫没有什么新奇了。

江青为什么要较早地把陈再道做个典型，来重重地斥一刀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陈再道当年是刘邓大军麾下的二纵队司令员，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被列为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部下当然地要按照“逻辑”划归为坏人了；其二是，陈再道拉不过来，拉不过来就要打，无论拉过来打下去，都具有典型意义。而且，陈再道明确讲过：打砸抢不行，国家和人民的财物不能随便打砸抢；战士手中的武器是党和人民交给的，是保卫人民的，抢枪更不允许，部队有权利和义务捍卫人民的利益。

陈再道讲话和打仗一样勇敢，不瞻前顾后，锋芒毕露，完全符合他一介武夫的直率性格。但他的讲话很快通过造反派的大小字报和各种材料，告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等人手里，陈再道进囚室自属必然。再有，陈再道直接掌握指挥部队，无论把他拉过来或打下去，对某些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拉过来，以示榜样，可以拉一批；打下去，也是榜样，可以起到“杀鸡给猴看”的重大作用。因此，陈再道被作为典型经过精心策划，在政治学院进行了一场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大规模大范围的批斗。

批斗，只不过是这场阴谋的序幕，继之而来的是预先策划地要把陈再道从警卫战士手中抢走。

这个阴谋其实早被警卫战士侦知，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也预先指示部队：“要接受抢彭真的教训，要有第二、第三方案，保护住陈再道，不准造反派抢走”。

政治学院礼堂里，喧嚣的高潮一个接一个，“交出陈再道”、“交出陈大麻子”，“交出镇压革命群众的凶手”的

口号声越喊越烈。到批斗会即将结束时，造反派象潮水般向后台涌，有几个人一直在围着礼堂转，通风的、报信的，联系的，监视的，各种神秘小人物都有，看情形十分危险。

警卫部队指挥员按照预先安排，除掩护的人以外，台前台后，礼堂坐椅中，都安排了人。当批斗会一结束，以排长杨树理为首的几个干部战士，立即连抢带拉地把陈再道顺利地架到后院平房中。

陈再道所以能够很顺利地脱离险境，也是由于我们吃一堑长一智，接受几次教训的结果。

有一次，周总理在西郊政治学院礼堂接见军队院校造反组织和部分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团长王夫点我和杨丽坤去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王夫对司令部的参谋杨丽坤和时为政治处组织干事的我有点偏爱，杨丽坤比我小三岁，我俩当时都未结婚。王夫平日总是拍着我们肩捞叫小杨小刘的。对我俩也很信任。因此，这次警卫首长，指派我俩在主席台上的电话间。这是总理在台上讲话时最近的近卫军。

会上，周总理主要讲了："批评是可以的，批判也是可以的，帮助领导改正错误是受欢迎的，言词有点过激也是可以谅解的；但要按毛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搞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一斗就油炸火燎，都泊炸火燎了怎么符合实际，也要允许别人犯错误。至于搞人身侮辱，搞人格的侮辱就更不对了，古人云，以人玩弄则丧其德，以物玩弄则失其志，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讲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总理还说，还有个生产和工作问题，不能抓生产抓工作就一概视为拿生产压革命。生产不搞，农业不抓，经济不抓，外交停摆，一个大国那怎么

得了？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我们不能忘了历史的教训……

周总理讲的，正是许多人心里想的，我和小杨参谋站在台上小电话亭子里，只顾看着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总理讲话，我还有个任务，要用我的记忆整理出一篇东西，王夫认为我记性好，但不能用笔。所以，听着听着就忘记了警卫战士的目光不是在首长身上，而是在首长周围。正在我俩听得入神之际，突然，从台下窜上一个人来，看年纪也不过二十五岁，当我俩反映过来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跳到总理讲话的麦克风前。我俩都吓出了一身汗，当我俩慌忙赶到总理跟前时，此人又已经跳下去。谢天谢地，总算没出事。

事后，我俩都写了检讨。团长王夫把我俩叫到他跟前，这回也不拍肩膀了，撅着嘴，瞪着小红眼睛说道：

“你们这俩鬼小子，干什么吃的！他人都窜到台上了，光台子也足有一米多高，少说也要六秒钟的时间，你俩从电话亭到总理跟前只需要二、三秒钟就可以，睡着了？一个警卫战士，睡着了也得睁一只眼，多想点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次再这样麻痹，交出脑袋来！”……

陈再道总算顺利地脱离了批斗现场，一到后院平房，我们就放心多了。

从正面看，后院的平房似乎已没有退路，造反派以为陈再道进了平房就是进了笼子，认为抢陈再道已有绝对把握了，因此在院里大喊大叫，人如潮涌，有些人大骂警卫战士是“木头”，是“工具”，是“可鄙的保皇党”，“保皇狗”是“麻子军”，“保陈大麻子决无好下场”。有的人甚至声泪俱下地向战士控诉陈再道所谓罪行，说“为陈大麻子卖命不值

得”。他们也从我军的政治工作中学会了一手“瓦解敌军”之术。

造反派虽然知道部队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但看到平房门口哨兵威严地持枪站岗，个个立眉横眼毫无惧色，也便不敢轻易猛闯，可又不甘心罢休，人越积越多，口号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难听，大有一拥而进之势。

我们虽然有电话可以直接和团部、师部作战值班室联系，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打个电话也会贻误大事。

老连长管东春头上冒着汗，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说：

“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很危险，得想个办法。”

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崔满仓说：“是得快想办法脱身。”他小声在老连长耳朵道：“走为上计……”

造反派不下数千，而警卫人员不过几十，真要用硬闯的办法把陈再道转移走，绝不会成功，如此坚持下去，迟早会被抢走。

我在军事上差不多是个白痴，还是老连长，擦完镜子，慢慢地戴上说：

“完不成任务拿咱俩是问，妈的，你就光耍笔杆子行。我看三十六计，溜为上计。快点！从后窗逃走。你跟着，我和杨参谋断后，崔参谋带人上院子去拖住他们。”

杨丽坤参谋是六一年入伍的，象个小公子，长得很精神，人也很和善，是保密员出身。其实他对军务指挥还一窍不通，只不过团长王夫很喜欢他老实，小伙子也帅，他一句话叫他当了参谋。此时见连长有高见，小杨参谋两只大眼闪着光说：

“还是老连长，不愧罗帅的警卫员出身！”

“你别瞎球捧了，快点行动！”

陈再道虽然身体尚好，但毕竟六十多岁了，他的个子也有一米七零以上，要跳半人多高的窗户非常困难，越窗后要快跑脱离小平房，走夹道，当然就更困难。这时排长杨树理说：

“连长，我背老陈跑，保证完成任务。”

老连长笑着点了点头，“非你不行。”

排长杨树理是个大个子，足有一米八三，身体也好，背陈再道肯定能行。

当即，杨树理跳出后窗，几个人连抬带抱地把陈再道从屋里扶到后窗上，外边有人接着，扶到杨树理背上，杨树理背上陈再道，掂了掂说：

“老陈，扶着我，坐稳当，咱们开跑！”

杨树理已经背着陈再道跑了，警卫连干部和战士们还假装陈再道在屋里，以便周旋拖延时间使他安全转移。

杨树理背着陈再道，一口气跑了四五百米，转移到安全地点，这才把陈再道放下，过了足有半小时，他才均匀地喘过气来，喝了一大白瓷缸子水。

陈再道见没事了，这才说道：

“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会记得你的。”

“我叫杨树理。”

“你的名字叫得好，树真理，不树谬论。树真理流芳百世，树谬误遗臭万年。”

“现在没什么真理可讲。”

“怎么没真理可讲。毛主席健在嘛，共产党还在嘛！别看有些人闹的欢，他们才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

“文化大革命把人闹得好糊涂！连朱老总家都被抄了，箱子被撬了，朱老总拄着拐杖找主席，主席安慰他了，可主席又为啥说他老右，老糊涂了呢？朱德毛主席他二人几十年来，在全国在数亿万人心中和口头上，从没分开过。难道朱毛就这样分开了？林彪说朱总只会抓小鸡子吃。再有，军事博物馆里，朱德那扁担怎么到了林彪的肩上？朱毛井岗山会师，又怎么变成了毛林会师？这党史军史怎么成了小学生作文，可以随便改来改去！”

“什么时候也会有斗争，什么朝代也会出奸臣。这史——我没读过多少书，不过我看当朝写的史，很少有经过两个以上朝代考验住的。”

“老陈您说这倒是真的，贺老总在囚室就拍着床板骂有特务有奸臣；彭老总也骂是特务害他，他用岳飞的话，仰天长叹：天日昭昭！”

杨树理想起江青的话，说道：“有人骂你是陈大麻子……”

陈再道挨斗时早就多次听到陈大麻子的叫喊声，大字报也有陈大麻子如何如何，此时听杨树理又提起陈大麻子，不免来了气，说道：

“麻子又不影响革命，一九四六年我跟刘邓大军当二纵司令员时，刘伯承司令员就讲过，一纵有个战士叫李殿明的，是濮阳县人，因为头秃，开始接兵的不要他，他说，不要他就跳井自杀。刘司令员还说：“带这样的战士打仗准能胜”。后来叫他入伍了，还当了班长，打仗很勇敢。刘司令员还说：“咱们二纵司令陈再道同志也是个麻子，人不错”。我陈大麻子并没因为有麻子打仗怕死，不热爱党，不革命。

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政治上搞，人格上也搞！”

杨树理说：“我看到专案组叫贺龙老总写交待材料的提纲，贺老总看了，气得胡子直抖，扔在了地上。那提纲上说：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都是谁，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让他交待投敌叛变的历史罪行。贺胡子吼道：

“真见了他妈的鬼！人都叫我枪毙了嘛！栽脏！完全是栽脏！他妈的狗娘养的！”

贺龙因病得厉害，送二六七医院时，陪伴看护的杨树理和战士宋根立对贺龙表现了深厚的同情，并告诉贺龙：情况不妙，又有好几位军人和地方领导被点名批判，有的也被投进了特别监狱，正在受中央文革专案组审查批斗。宋根立还说，叫你（贺龙）写交待历史罪行材料也是事出有因，康生当众讲过，你历史上就背叛投靠蒋介石。贺龙见宋根立很坦诚，感动地说道：“我们都老了，有你们这样的娃子拿枪，坏人、阴谋家和野心家想用你们搞阴谋夺权，是搞不成的。说我历史上叛变，那是放屁，鬼放的鬼屁，是奸臣、奸鬼。我是在共产党最背的时候，那时叫白色恐怖——投入的共产党怀抱。我姐姐为革命死了，我妹妹为革命死了，老贺家族百余口人死在了敌人刀枪下。烧了我们的房子，连我的祖坟都挖了，敌人出十万大洋买我胡子的脑袋！我何苦反党、反毛主席，搞他妈什么二月逆流！我在囚着，有你们天天看着我嘛！这逆流我怎么搞的？我连外人都见不到！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熊贡卿作说客要我投降，我事先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我见他，叫我摸清底细。当我知道是劝降时，老子亲

自下令枪毙了熊贡卿这个‘老朋友’，现在又成了投敌叛变，真他妈大白天撞恶鬼哟！”贺龙身体已经很不好，说说停停。“闹不清的鬼事！六六年九月十九日主席还对我说，吴法宪写信给主席告状说我是黑线人物反党窜权，还把那封信给我看了。主席说‘不要怕，没事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开会，主席还把我叫到他跟前坐，很亲切，不料两天后，江青就在群众大会上点名说我和薛明不是好人，叫群众造我的反。真他妈的魔鬼缠身，鬼人鬼事鬼透顶了！”

“老子当年二十挂零，那是一九一六年春天吧，用两把菜刀砸了芭溪盐局子，拉起了一个队伍……”

“可现在你这两把菜刀成了两把菜刀闹土匪，说你是大军阀大土匪。”杨树理插言道。

“党里出了鬼，中央出了奸臣！”……

陈再道听罢冷笑说：“怪事不怪嘛，都搞掉是他们的本意！”

杨树理背陈再道逃出重围，这件事本身足以使陈再道对杨树理十分感激，当然地非常信任，两个人谈了许多话，最后陈再道问杨树理：

“我的罪名也不轻，你们这样做不怕么？”

“当然有些怕，但也不怕。总理和傅司令让我们保护你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不到你也别怪；连总理、朱老总、贺老总、彭老总等都没办法，陈毅不怕受连累为你们争辩都不行，我们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执行命令是军人的职责，难怪你们。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如果能活过去，我们会见面的。你们是人民的好战士，先烈们总算没有白流血牺牲，我们的传统没有失传。”

其实，这位大麻子司令已经两次遇难不死，够上福将了。

早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不久，毛主席周总理就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到北京来谈事。叫他们住在了也是我们中央警卫部队负责警卫的京西宾馆，实际上是因为武汉揪陈厉害，把他们叫来北京保护起来。说是毛、周叫来谈事，实际都是总理艺术地处理政治罢了，我说总理是个艺术大师，是个伟大的政治艺术家。

不知为什么，这意图和陈再道的住址，竟被造反派发觉，有些人煽动组织了大约七千多人冲击京西宾馆，而且，由于人多势众，我们警卫战士又不能开枪，被突破了门外的警戒线，还有几百人冲到了楼上，几乎把个京西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抢老家伙”，是非常时髦的政治行动，一旦他们抢去，“治于死地”的目的也便达到了一半，情况万分危急。周总理得到报告后，命令傅崇碧司令员等首长先后赶到现场。总理用电话指示：

“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

当时警卫部队根据周总理和傅司令员的指示，增派了两个连队。在征得了总理同意后，把陈再道等同志藏在了一个停用的电梯里，使电梯停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并规定了暗号：咳嗽一声，敲击四声。老连长管东春对陈再道说：

“请你们记住：只有听到我们的暗号才能出来，否则，任何人叫也不要出。”

与此同时，许多领导反复给造反派做工作，劝他们退走。

由于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鬼，造反派有恃无恐，仍不撤去。老这样下去，陈大麻子和保护他的几个干部战士得饿死渴死，但谁也无计可施，那些人就是不走。

傅司令又打电话给总理，总理非常气愤，把戚本禹叫去说：

"你们要退兵！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毛主席作出交待！"他们动不动就说毛主席说的，总理也在实在没法时搬出毛泽东这个伟人吓吓小毛虫。

傅司令逐级传达总理对戚本禹的批评，大长了警卫部队的勇气。

就这样，堂堂一国之总理，抬出御圣才把一个戚本禹说走了。

等把陈再道从电梯里弄出来，警卫参谋杨丽坤小声开玩笑似地说："妈的，社会主义祖国，光天化日，却象躲日本鬼子一样……"

在八月某日一次批斗会上，我们亲眼看着，一个不小也不太大的"领导"，居然当众举手打了陈大麻子司令两个响耳光。这一"非常革命"的行动受到旗手的赏识和称赞，夸他："有造反精神，有气魄"。周总理却严肃地说："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把陈再道打坏了，怎么解释？"

福将陈再道要不是周总理和傅司令保护，要不是广大警卫干部战士的朴素的感情和冒险的救护，早就不堪设想了。

这种把元勋们抢来抢去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宋任穷在京西宾馆暂住的时候，一伙造反派因有内线，突然闯进京西宾馆，而且直奔宋任穷的住室，中央警卫部队

奉傅司令指示迅速赶赴现场。造反派一看抢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绑起来从楼上窗口吊送到地面。宋任穷年龄已大，楼房很多，万一出点差错就会摔死。当时战士们毫不犹豫地把造反派赶走，救下了宋任穷。有的战士当场骂大街说："他妈的，你们疯了？你们要疯了他妈的我们也疯咧，咱们疯对疯干一场！"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粉碎"四人帮"以后，陈再道、张爱萍、赵建民等党和军队、地方上的领导同志没有忘记战士，特别是没有忘记冒险保护和尽可能照顾他们的干部战士，他们颇费周折地打听他们的下落，当知道他们已经转业复员，有的生活上很困难时，还给他们寄钱去，有的被调回北京工作。排长杨树理就是在陈再道关怀下调到中央某部直属机关担任了处长。

副总参谋长张爱萍、陈再道等侥幸活下来的人说："对他们的关照，不是我们简单的关心报恩，是他们本身值得党和人民尊重，他们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关照和尊敬。如果战士们关心的只是个人利害安危，在那种情况下也就不会那样做了。这正是战士的伟大之处，他们心里装的是真理，不是谁怎么说，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能这样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的领导同志说："在那种左的发疯的特定时期，虽无力救人，但不咬人，不踩人也是好样的！"

十八、四 探 囚 灵

四号以前还经常看看毛选，读读《人民日报》，后来却很少看了，一个人孤独地面对墙壁，痴呆呆地坐着，有时一坐一两个小时，有时一躺一两个小时。他坚信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期内，倒退或倒半圈、倒一圈都是可能的。他似乎看透了这一点，悲愤、气恼、有话无处说的焦躁心理情绪时常发作，要么骂街，要么叹气，要么口中喃喃地提着总理等人的名字。

尽管他的处境和心绪如此不好，连队干部战士中有什么问题，只要传到他耳朵里，他还是热心地过问。

一天午间休息时，哨兵刘桂贤报告说：

“四号老在墙角里蹲着，不知干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进到四号囚室，只见彭德怀蹲在囚室的东北墙角下，正在专心地看着什么。我奇怪地凑到他近前蹲下来，只见地上有一条蜈蚣，我们河北叫它柳燕，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这条柳燕。柳燕腿多，爬得很快，其速度比一般的地虫要快几十倍，人要想抓它很不容易。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条大柳燕

却静静地爬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活着，又似乎死了。

彭德怀认真地看着这条柳燕，过了好一会儿，我还猜不透他究竟要干什么，在这条柳燕身上，我也未发现任何问题。

他手中拿着一根火柴棍，拨了拨柳燕，柳燕还是不动。终于他开口说道：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我们老家叫柳燕，它的大名叫蜈蚣。小时候我们常逮着玩，它跑的快，抓不住，我们就用脚踩，但一踩，又踩死玩不成了。”

他用火柴棍把柳燕翻了个身，柳燕还是一动不动，我猜想大概它是病死了，或者中了什么毒死的。

他似有所思地说道：

“其实人的生命力还不如小动物小昆虫的生命力强，一条蛇中间断了还能爬，一个飞蝗揪断两条腿还能飞，公鸡剁了脑袋还要扑楞楞飞撞一阵呢，这蜈蚣就是把它后半身砸烂，它还能用前半身爬，人要是有这样的生命力就好了。”

我想，他说这话是言有由衷的，他是多么想着盼着，有一天能恢复他彭德怀本来的面目啊！现在他大概是知道这种政治气候没有可能了，他的身体也不再可能支撑下去了，所以话中显得悲凉夹杂着悲愤。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很少看东西了，而囚室的孤独寂寞和精神苦痛，使他难熬时日，看柳燕大概也是一种时间的消磨或痛苦的自我解脱。

“你知道蜈蚣有多少条腿吗？”他问我。

“不知道，我数数看。”

于是，我蹲下来仔细地数起来，一条柳燕竟然有四十条

腿！

"这条柳燕有四十条腿，一边二十条，这么多！难怪它跑得快。"

"不是四十条腿，是四十二条腿！"

我不信。我又数了一遍，还是四十条腿。

他说："你看，柳燕有两条剪刀形的尾巴，和腿差不多，它实际上不只是起腿的作用，而且，还起掌舵、掌握方向的作用，要是没有这两条腿似的尾巴，他不仅跑不快，还要跑偏。所以，我说，应该是四十二条腿。"

他说罢站起来，坐到椅子上，叹口气说：

"完了。它先于我寿终正寝了。"

这一次我坐在了他的床上。

他问我："你今年几岁了？"

"周岁二十六岁。"我答道。

他又问我："你是哪年当兵的？"

我说："十五岁离家，十七岁当兵。我们家是冀中老解放区，可解放五、六年后还是连窝窝头咸菜都不能保证顿顿吃上，后来的三年困难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十五岁离开家，那时什么觉悟也没有，只想混碗饱饭吃，我不甘心过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吃不饱的日子。我升学没升上，差点从房顶上跳下来自杀，我还有点小野心，这小野心是想混出个模样，可我没有忘记，我娘从我小时就教我的：一是饿死不作贼。二是好好干。往后混出个大官小官干，让我们刘家坟头也冒冒烟。三是当了官要当清官，不要当脏官，不要忘了受苦的老百姓……"

我不知所以地发着感怀，他耐心地听着。

“看来你是有学问的，比我上学多吧？”

“上了几年小学，谈不上学问，但喜欢学问，从十二岁看了不少书，也试着写了点文章小说，从五九年开始也发表了几篇。我对什么都好奇，爱刨根，我不信这文化大革命都是正确的，所以我和李大胡子政委在北京市直机关搞“斗批散”时，曾对北京市文联的作家浩然、李学鳌说：‘这文革可不一般，你们要准备将来好好写写，让后人知道。’浩然大概看我是搞斗批散的解放军，有顾虑，只看了我一眼，没敢表态。”

“这样的革命是得好好地总结总结，好好地写一写，为了后人也该总结总结写一写，我想总会有一天吧！我捉摸了很长时间，这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心血来潮冒出来的一件什么孤立的事。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个人的，什么因素都有。”

“以后，假如连正视它的勇气都没有，就谈不上纠正，更谈不上杜绝，谈不上防止历史的重演！”

他的话并没有使我大彻大悟。他又说道：

“基本理论指导是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个不能象林彪那样实用主义的乱变。比方说，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同年十二月也讲过，‘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后来，几十年一个战壕里的老战友们都成了敌人，这首先是政治上乱了。”

“从组织上说，根本的一条是党内外真 正的 民主 集中

制，清除封建主义的余毒，上讲实在的民主，下讲诚心的集中，这是一切之关键；谁要把自己当成神，谁要把别人捧成神，都是事情走向反面的开始。大家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也有份。我说过，这也是我咎由自取，陶铸不是也说咎由自取吗？我看不少人也是咎由自取，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讲过，你操我多少年娘行，我操你几天娘就不行……”

我倒想起来了，在中央警卫部队排以上干部会上曾传达主席讲话，批判彭说：“他骂娘……”现在看来，彭德怀也是吃了嘴的亏，吃了阴谋家的亏，在人们心目中，他的确象个拧脖子铮臣；而铮臣，有史以来也的确没有几个好下场，所以当铮臣的越来越少。

我不禁大胆设想：

“要是都不举手呢？一个轿子都不去抬，那轿能起吗？一条船都不去翻，那船能翻吗？”

他说：“已经形成了，这是历史形成的，这就是封建主义的余毒，反封建反形式不反本质不行。做为许多人来讲，还有个顾全大局问题，我也不愿意连累他人。所以，当我马放南山，挂甲住寺的时候（住北京挂甲寺），傅连暲去看我，我说，‘你不要来了，我这里是是非之地，谁要看我谁会倒霉的’。我的参谋小景（即景玉珍）我看风声不对，早早把他打发走了，不然一块儿跟我倒霉，这叫株连，这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我们也带进来了，而且从长征前就有。人们总是好心企盼，总以为这次纠正了，下次不会再有了，其实不然。这恐怕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规律，不到一定时候，是不会根除的。规律吗，就需要时间，需要流血的时间……其实，不像你想向的，我就是‘海瑞’，‘海瑞’就

是我一个人，我亲眼看见有不少‘海瑞’大倒其霉了，有的人，是个老将军，在会场上论理就被当场戴上铐子抓走了。我是在心里流着泪目送他走出会场的。我真想与他同去，如果那样，我会再连累一大批人，也许会乱得不可设想。为了国家民族，把胳膊砍断装进袖筒。”

“既然把你当海瑞，海瑞又是公认的忠臣，为什么要批呢？既然人人恨奸臣，为什么奸臣朝朝代代都有呢？他为什么能存在呢？”我想起了他作为海青天代表被揪斗批判，被毛主席多次点名。

“百姓希望朝臣个个象海瑞，我不是海瑞，我是煤娃子，河工出身的穿军装的百姓；至于为什么还要批海瑞，不是讲的很清楚吗，当代海瑞要夺毛主席的大权！要反党反人民！”

“那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呢，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不论什么会议，什么问题，不论你面前是谁，大家都为了国家民族，坦诚地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口是心非！哪怕是意见错了，也真正没有帽子，没有棍子，没有黑帐。这就是真理和权利脱钩之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光明之时。做好的时候，就飞跃一下，做的不好，就会倒退。”

“可是，彭真说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不是也被作为一条罪恶关进了这监狱吗？口头的、报刊的，不是天天在批彭真讲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吗？小时候从懂事起，党就教育我们求真理，现在讲真理平等都犯罪，你觉得冤枉吗？”

他看了看我，似乎不明白我的话，我也有些后悔不该这

样再问，因为他早已多次怒冲冲说道“天日昭昭”的话，怎能说他不冤枉呢？

但是他却平静地说道：

“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革命不就是为了人民得解放而不怕牺牲吗，只要党和人民从教训中前进了，这说明流血牺牲受冤枉都是有历史意义的，有价值的。可惜的是，这牺牲要变成阴谋家的个人利欲！苦头中国吃了几千年，这教训恐怕以后够几代人吃的，吃透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吃不透这教训恐怕以后还会反复。”

“贺龙说有奸臣有特务；刘帅说不对头；陈毅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个两个特务，一个两个奸臣，就能把这么多老帅们搞成这样，几乎都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连贺龙也成了二月逆流的总指挥，可二月份他在西山云岗半山坡囚室里，是我们看押着他。”

“把乌纱看得比真理重要，真理就难以抬头！把金钱和名位看得比人民重要，什么革命、什么人民和同志，就一文不值了，当年我和贺龙、朱德等等，如果是这样，早就作了国民党的大官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往往真理成为谬论的牺牲品。”

“我也曾想给中央、给毛主席写信。我有了未婚妻，我把爱情看得很重，因此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鸡蛋碰石头，何苦作无谓牺牲，’她坚决不同意，说要写还不如趁早‘休’喽她呢！所以我一直没敢写，这大概是多数人的心理，谁不愿意过平安的日子呢？”

他问我：“你未婚妻在哪工作？”

我说：“在天津达仁堂制药厂，现在时兴革命的名字，

叫第二中药厂，是个小技术干部，名叫田玉华，每月三十七块五毛。”

他感叹地说：“爱情是宝贵的，年轻人的爱情更宝贵。可我，就把老蒲（蒲安修，他的老伴）给‘休’了，是我劝她跟我离婚的，当然是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离开的，她如果不走，会继续受牵连的，我对不起她。”

我看他眼睛有些发湿，忙把话头叉开。

我颇为难解地说：“现在不论什么法，什么传统，什么规矩，什么道德，什么文化艺术，都统统被视为四旧，封资修，统统砸烂、打碎，形式主义又吃香了，毛主席像章比大花碗还大，一个有一斤多重；语录本多得不得了，我去天津看我的未婚妻，买不上火车票，有像章和语录就可作交换条件；连进城掏粪的大粪车上也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种形式主义和大跃进是异工同曲，形式主义一抬头，就是把国家人民掏空的开始。”

“只讲形式不讲实际，只图虚名不讲实效，最后吃亏的还是党和国家，是人民，受利的是一小撮！有人就是靠这个保乌纱帽升乌纱帽，有爱捧者必有喜爱捧者。但是历史无情，迟早而已。我就讨厌这个，所以我说过，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也是我的一条罪。”

我看了看表，到了哨兵换岗的时间，我告诉他说：“我们团政委李大胡子不定什么时候想看看你，和你谈谈呢。”

他忙摆手道：“不要因为我再连累谁，熬着看吧，没有老晴的天，也没有老阴的天，我确信是这样，这历史和大自然规律一样，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总之不变是相对的，变才是永恒的。可是，”他叹息一声说：“谁知道我还能不能

熬住。”

我原来总以为他是打仗的，搞武的，文的不行，原来，他的道理讲的是那么通俗深刻，那些哲言哲理是从他身上的血液中提炼出来的，令人佩服。

十九、林彪选秘书

在特别监狱里，有三个人行动艰难，一个是十五号囚室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个是二十号囚室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还有一个就是双腿抽筋的北京市副市长兼宣传部长十三号囚室陈克寒。

陈克寒和罗瑞卿一样，被逼得去向他们追随了多半生的马克思报到，马克思"原封"退回，但腿摔坏了，而且双腿抽筋；刘仁作为解放前华北地下城市工作部的部长，被打成叛徒而戴上了脚镣，脚镣锁得很紧，连骨头都给勒出来了；罗瑞卿是在西郊宾馆被批判之后跳楼的，自杀未死，但双腿残废了。

罗瑞卿是后来押进来的。原来正是我们中央警卫部队二团某连保卫他的住地，现在由警卫他变成了看押他，虽然不是一个连队，但还是中央警卫部队。这样的弯子，使我们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形容也难以消除的滋味儿。

罗瑞卿开始住三十六号囚室，离厕所较远，每次解手都是哨兵或卫生员孙立达架扶着或背着去。后来考虑这样长期下去不行，便和陈克寒调换了囚室，因为从陈克寒住的十九

号囚室的北墙门穿过，便是后边的厕所，这里离厕所很近。陈克寒虽然双腿抽筋，但时好时坏，尚可去厕所。就这样陈克寒住了十三号囚室，罗瑞卿换到了十九号囚室。

可以说，这也是特例照顾。这种照顾，除了有一定理性，还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原因是：

第一，一九六四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当时我作为独立营营部书记，奉命从师部组织科抄回来了一页多罗瑞卿的讲话，上边指示：看后烧毁不作传达。那讲话明显是针对林彪突出政治落实到革命化、学毛著要立竿见影讲的。其中一句针锋相对：没有太阳，立竿怎么能见影，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军事业务工作中去。我看后觉得颇有道理，为什么当错误的东西批判？当时我拿着自己用铅笔抄的这一页多的罗瑞卿讲话，给营部卫生所长梅敬忠同志看，梅敬忠也和我的看法一样，两人议论了一中午。此后掀起的批罗，在部队中实在无法真正批下去，以致有的给解放军报写信质问：突出政治究竟落实到哪里。部队的反映到了林彪那里，因为反响普遍，林彪又讲了："落实到革命化"。当时许多人就说：空对空放空炮。这一点，部队认为罗瑞卿讲的是对的。殊不知，早在上海会议上，林彪已经给罗瑞卿定性，说"他封锁他（林彪），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

第二，在传达林彪批罗讲话中，林彪除了骂罗瑞卿是手长、罗长子、想夺权之类的话以外，没有实质性东西，举出一个例子说，林彪和罗瑞卿谈话后，罗瑞卿即走出林的卧室，在走廊说林彪站着茅坑不拉屎。关于这一点，凡有头脑的人都可分析，罗瑞卿再蠢，也不会在林彪的住处走廊上说这种话！

第三，罗瑞卿在中央警卫部队二团某连讲过话，中央警卫部队各团、营几乎都派代表去听了。大家认为讲的很好，很实在，干部战士都很振奋，受到了鼓舞。但在批判罗瑞卿罪行中提到这些讲话有一句话：引导腐蚀战士争名利地位，闹个人主义。实际是，罗瑞卿讲了这么一句："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好好练武，国家未来是你们的，你们中间的人将来要出团长出师长，出将军……"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怎么是腐蚀部队呢？

第四，中央警卫部队都知道，罗瑞卿是组织实施保卫毛主席得力的人，怎么忽然成了反毛主席要篡党篡军夺权呢！

所以，警卫连在对罗瑞卿看押期间，不但谈不上什么真心批判和仇恨，战士还搀扶、背着他去厕所，未经请示，便擅自照顾把他调到了离厕所很近的十九号囚室。

人是不一样的。副指导员麻庞艾劝我说：

"指导员，你是连队党支部书记，你这样照顾罗瑞卿是不妥当的。"

"怎么不妥当，他双腿残废。"我反驳。

"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知道。不论他是什么人，也是人，该抓抓，该杀杀，该吃饭，在枪毙之前还得让人家吃饭，既然吃饭，就得有地方拉。"

副指导员有点窝火，说道：

"指导员你究竟要倒向谁，究竟要干什么？我可是为你指导员好。"

"我倒向毛主席、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并没有说，这文化大革命可以不要党的

政策了，毛主席没这么说，恰恰相反。”

“可毛主席教导说，不能对敌人仁慈。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敌人你也太仁慈了。”

他讲语录我也讲语录，反正都是毛主席讲的，他用毛主席的话截住我，我也用毛主席的话截住他，我俩都把毛主席的教导作刺刀，直指对方。

庞艾气得麻子脸通红，小麻子坑直跳，我也气得两眼冒火。

这语录虽然我比不上他背得那么精熟无误，但我选“武器”选的也够准，唇枪舌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大发明。

哨兵看着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吵嘴，也不知劝好还是不劝好，围着我俩直转圈。

“你是老革命了，你拿脸盆当尿盆给江青用……”

庞艾火了，说道：“你好，林彪同志选秘书，你不是激动得几夜睡不着觉吗？”

麻副指的话给了我个大憋气。我们两个象斗乏了的两败俱伤的公鸡，也孤悄地暂时休战了。

我俩在院里吵架，被四号彭德怀听到了。当我晚上查哨时，他问起了我，他以为我要去给林彪当秘书，我只好如实地告诉他。

——那是个冬末初春的上午，也就是军委会在西郊宾馆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不久。林彪的大头副官奉林彪之命，来到中央警卫部队，要给林彪选一个年轻的秘书。我做为一个根红叶红的二十四岁的小军官，满心高兴地参加了这场“大秘”应选。

林彪选秘书并非难事，他可以在三总部和各大军区、各军事、政治院校任意挑选，为什么偏偏要到为数不多、文化程度也不高的中央警卫部队来挑选呢？

原来，中央警卫部队不但警卫业务精熟，而且在征集新兵时，政治条件要求是“特挑”。按过去的说法，中央警卫部队素称“御林军”。林彪认为，在“御林军”里挑选贴身的工作人员，才安全可靠，睡觉踏实。

林彪这次挑选秘书，比党和国家任何领导人挑选秘书的条件都严格的多，而且，要求条件非常特别、苛薄，他给副官口授了十个条件：

一要出身贫农，而且至少要三代贫农。在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中，不能有一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凡是有海外亲属、海外关系的人，以及受过各种处分的人，一概排除，要一人红，全家红，社会关系红。林彪善于总结概括，他归纳为一句话是：出身好，要三红。

二要年龄二十四岁以下，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军官。

三要耳聪目明，会说普通话，也就是说，谈吐要字准音纯，又要善于辨听不同人的口音，什么江浙话、川陕话、冀鲁豫话都能听懂，不能因为耳朵不灵误大事。他这一点，和大清末年慈禧太后挑太监、挑宫女是一致的。

四要面目端庄，相貌英俊，具有优良的军人风度。身高一米七〇至一米七五，高了低了都不行。

五要体魄健壮，没有疾病，象口臭、腋臭、脚气和其它皮肤病绝对不能要。

六要中共正式党员，政治上绝对可靠，思想上忠心耿耿，工作上不怕苦累，作风上雷厉风行。

七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机灵睿智，又能逆来顺受。

八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懂文学，知历史，字要写得好，尤其是要会写一手毛笔字。

九要未婚，也没有搞对象。这点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一则，只有未婚也没有对象的，才能集中精力效忠，二则，二则是什么呢？林彪没有说，副官也不敢问，但他领会是要为选姑爷作准备，因为这个年龄正好比小豆豆大三、四岁。

最后一条更出人意料，林彪一如既往地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即"一懂四会"：最好懂点中西医医道，会打针会扎针，会识药会推拿按摩。按说这都是保健医生的事，可林彪凡事想得深想得远，万一医生不在的时候呢？

这标准简直比封建帝王选附马选状元选妃子还要难上加难。

林彪的副官听罢，禁不住面有难色，他认为，小小年纪的人，哪有如此德才貌等等样样俱优的人呐！这十个条件，不要说在中央警卫部队里去挑，就是在全军几百万指战员里拔，恐怕也难以拔得出来。

林彪不用抬眼皮就看透了副官的心思，很不高兴。他历来反对部属在他这"常胜将军"面前口出"难"字。过去打仗时，他就是用十个连队的代价拼杀敌人一个班，也在所不惜，"以十顶一"，只要把对方吃了，就算是个大胜仗，他讲的是威风。这是林彪的"精神胜利经"，他这种"失败的胜利者"的亡命精神渐渐形成了"常胜将军"的桂冠。

"常胜将军"怎能容忍部下在"选秘"问题上畏缩不前呢！

他那耷拉的眼皮耷拉得更厉害了。他想起了自己发明创

造的“四个第一”。这“四个第一”是毛泽东亲口叫过好的，毛泽东说过：“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全军天天都在用“四个第一”，抓“革命化落实到革命化”（实质是空对空，当时戏称空对空导弹），这也是林彪的一大发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于是，引经据典给副官做开了思想工作。

“秘书嘛，自古有之。在东汉，它叫纪室史，也有的叫中书令、中书舍人，就是皇朝的秉笔太监，实际上也是秘书。这个秘书非常非常重要，用我的习惯语言说，是皇上的助手，是皇上的耳目手足，它的特殊地位决定它有特殊作用。”林彪用右眼的余光射了一下副官，加重语气说道：

“你查查古今中外的历史，捉刀代笔，假传圣旨、大搞宫庭政变的不是大有秘书参与其事吗？”

副官听得汗毛直乍，不知这样的指示该不该做笔记，根据他对林彪秉性的了解，如此“政说”还是不记为好。

林彪撩开了寻常看不见的双眸，盯住副官继续说道：“我军是个大学校，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炮可以有炮，没有人才可以出人才嘛，你到警卫部队去，去认真挑选，一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副官只得唯唯从命，走出林彪卧室，不由擦了一把冷汗，当即驱车，来到了北京西郊中央警卫部队驻地。

那时，我们中央警卫部队的年轻军官，都认为给已经红得发紫的林彪当秘书是无尚光荣的，凡是有点文化的，都想跃跃欲试，盼着选到自己头上，但一听说那十个包罗“诸子百家”的条件，便心灰意冷，连想也不敢想了。

不料想，鄙人被警卫部队政治部和那位副官视为最接近

条件的“大秘”后选人，因此，在一个星期六上午，我荣幸地被林彪的副官以及政治部保卫科刘科长就地‘召见’面试，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已经拿着我的档案，研究了整整半天。

当时我是中央警卫部队直属独立摩托营营部书记（即秘书），已是有五年军龄三年党龄和三年“官龄”的小小少尉军官了。当我们独立营李大胡子政委通知我去应试林彪的秘书时，我真是又高兴又激动，在高兴和激动中还夹杂着莫明其妙的恐惧。

我心里扑腾扑腾跳着，精心地整一整军容风纪，振作一下精神，敲敲门“报告”一声，进了“考官”办公室。

按照下级晋见上级首长的礼节规定，下级只需向在场的军衔最高的一位首长敬礼。我看副官中校、保卫科长四个花儿的大尉，该向他们谁敬礼呢？俗话说，先入为主，我为了讨个好印象，索性每人给他们敬了一个。我想，礼多人不怪，他们一高兴，还能责备我违反了礼节规定吗？

事情并不象我想的那么天真，看不出他们对我的初步印象如何，也不让我坐下，态度是不热不冷的，有点温吞吞，好象大集上正在谈生意的双方，没有谈成而又不愿罢休地鉴赏着货物一样打量着我。

我也趁此机会好好看了看那位令人羡慕的大副官。

以前我还以为首长的副官一定是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呢，其实他是个很平常的人，只见他年龄约有三十七、八岁，但头发象林彪一样秃得没有几根了，数一数也不过三、五十根，是大门楼头，鹰勾鼻子，大长脸，从他的眼睛、眉毛、体形，一直到一举一动，无不酷似林彪，刚才和他乍一着面

时，我还以为是林彪屈驾光临我营了呢！只不过他比林彪多一点阳刚之气。这使我不由想起了蒋介石、希特勒，还有中外历代君王们，听说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都有一个或几个人作替身．林彪的副官如此酷似林彪，想必也是这种替身吧！那么秘书呢？秘书在必要时想必也得……

此时的我面诚心乱，想入非非。

这时，那位副官开始问话了。他先问了我姓名、籍贯、年龄、出身，家里有什么人，有什么喜好，等等。接着，要检查我的文字能力和书写水平，叫我拿来我写的全营工作总结报告材料底稿，他粗略地翻了一阵，然后正式开考了。

我不知道以前举子们考状元是什么情形，但我尝到了挨考的滋味儿。我清楚地记得，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

“甲乙二人先在陆地互相拚杀，甲败于乙，甲受了伤，后来甲乙二人打到了水里，乙由于不识水性，有利变不利，乙转胜为败，而甲，却转败为胜。”

“你说说看，这在哲学上是什么观点？思考思考再说。”

我对哲学可以说是外行，不过，我也看过一些哲学著作。我很庆幸他提出的问题，就在我的知识面内。因此，我象有多么精通似的，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道：

“报告首长，一切事物依据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这回答我觉得不够完美，不够准确，于是又补充说：“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物极必反，这是事物矛盾的转化现象。”

大尉保卫科长满意地眨了眨眼。

中校副官露出了略带惊异的目光，点点头又问道：

"匈牙利有个长篇小说叫《一寸土》，你看过吗？"

真是太巧了！我想是我走红运了，我读过不少小说，总算没有白读，尤其是在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小说林中，我正好读过《一寸土》，我说：

"看过。我认为这书写得太散漫，整篇小说象羊拉屎，松散无力。不过，沙里有金，值得一读。"

"书里头有个叫红格茨的女人。作者有一句描写她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话，你记得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吗？"

没想到他出的题这么古怪冷僻，但他没有难住我，我激动地回答说：

"记得。'——如果把我皮剥下来做腰带，我也心甘情愿，只要他深深地爱着我……'"

那时我正年轻好胜，怀有一颗小野心，我曾拒绝了许多为我说媒的人，我要发奋图强，创造条件，以便以后找一个最漂亮，最有本事，最称心如意的姑娘做我的妻子，因此我不但苦读苦学，也很注意有关爱情方面的故事与精典语言。由于作者写红格茨爱情的那句话特别典型深刻而又富有风趣，所以我记得特别牢。而且我常常用这句话和其他参谋干事们开玩笑。尤其是电影队长张建明，也经常用这话开玩笑，密切联系自己实际，大加发挥。

这张建明五六年入伍，入伍前结婚，一年探家一次，虽然只有二十五岁，已有五个孩子。所以他常开玩笑说："我老婆比红格茨感情还深，我就是把腰带寄回家，她也能给我生个孩子。"因此我能背诵出红格茨的话，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这不过是"歪学正着"，却使大尉保卫科长惊叹不

已，那意思好象说：看，我们中央警卫部队里有人才！

中校听罢也似乎对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还是不让我坐下，越问越多，到后来，试题多是围绕着“爱情”打转转儿。

我真有点纳闷，“你是给林彪考秘书呢，还是给林彪当媒汉子选姑爷呢！”

“再问你个问题。”副官和保卫科长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的脸有点松弛了，口气也不象开始那样象法院的审判长，而是颇有点讨论似的。

“你认为古代的爱情诗里，哪一首写的最好？谁写的？为什么？”

副官的表情有点神秘。保卫科长对诗大概一窍不通，干瞪着俩大眼看着我，有点儿为我担心。

我心里也不免有点着慌，因为我忘记了一首我认为最好的爱情诗的作者，大概是狄仁杰写陈玉兰的吧？但是，在首长面前，在这样的场合说“大概”、“可能”是不光彩的，我灵机闪动，以巧补拙地耍了个小小花招儿，委婉地说道：

“报告大尉同志：名字我记不准了，诗我记得清楚。”

于是，我调理一下感情，动情地轻轻朗诵：

夫戍边关妾在吴，
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
寒到君边衣到无？

我有点狂妄的想，一块美玉埋在地下，没有机遇它永远

也发不了光，可一个人短短的一生，能有几何机遇呀？此刻林彪的副官来选秘书，而选到了我的头上，这不正是我闪光的大好时机吗？我可不要怕，我要大胆地施展。那个大名鼎鼎的外国人不是说过吗，管他大狗小狗黑狗白狗胖狗瘦狗，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大家只管叫就好了，谁也不必怕谁，谁也不必管谁，谁叫得最响，谁能逮住兔子才算是好狗……我这样想着，忍住内心的激动，不待他细问，就自作聪明地连解释带发挥起来，我说：

“我认为这首诗，是自世界有文明史以来，一切好的爱情诗里最好的一首爱情诗。她是说，你在边关服役，妾在吴地担忧。天冷了，寒风无情地吹到了你的身边，可我给你做的棉衣你收到了么——一句‘寒到君边衣到无’情真意切，简直妙极了，任何一个男人也会为她的感情所感动！”

我注意到，大尉和中校都在悉心地听着，我沾沾自喜，继续说道：“这诗暖人肺腑，撩人情肠，就是遁入空门的和尚老道也会为之动情。”

副官看我年纪轻轻，对答如流，十分高兴。但忽然间又变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冷不丁地又提出个问题：

“曹禺的《日出》，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我也冷不丁答道：

“‘太阳快出来了，太阳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我记得大意是这样。

我见副官长长地舒了口气，好象给林彪选“大秘”的艰巨任务完成了，他一下子喝了大半杯水，点燃一颗“中华”

抽起来，让也不让。

我的烟瘾很大，但我的“大战斗”牌不敢拿出来抽。因为呛死人，会叫人家看不起的，再说我此时是考生，抽烟是不尊重首长。我要给他留下一个既机灵又驯顺的小绵羊的印象。

“陪审”的保卫科刘科长，分明为着警卫部队出个林彪的秘书而感到荣幸，乘机补充说：“他的大哥是吕正操的秘书，他的二哥也做过十余年的秘书，他的三哥也是一个机关的秘书，可以说是个秘书世家呢！这个家伙还能写文学作品，《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战友报》、《公安部队报》都发过他的小说和小诗。”

副官赞许的点点头，在一个猩红皮的精制的小本子上写了点什么，然后抬起头来说道：

“愿意给林彪同志当秘书吗？”

“服从组织分配，愿意。”

“为什么愿意呢？”

“因为当秘书也是为人民服务，而且给林彪同志当秘书是更光荣更艰巨的为人民服务，有跟首长学习的好机会。”

中校和大尉相视一笑，示意我可以走了。

按保卫科长的形容，我是眉清目秀，一脸英气，如古人所云，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又虚心好学，是首长“大秘”的好苗子。

看情况，我有希望被选中了。

近两个小时的口试，副官一直不说叫我坐下，我便振作精神，一直并腿立正站着。我心里猜着，恐怕这也是对我的考验，难怪有人说，林彪治军严，用兵狠，从他的副官身上

也可以看出这点。真的，我的标准军人姿态受到了副官和保卫科长的称赞，但我从来没站过这么长时间，而且是在心情紧张的应考中。

我感到累极了，当晚九点多钟，便躺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挨考的情形，这时，我的老乡——独立营一连八班长王文要（他后来给朱德当了警卫员）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进门便插上门小声说道：

“嗨！我听说林彪选秘书选到你头上啦？还说要没结婚的，也没搞对象的。我看呐，这里头还有别的名堂……”

我心里不由一惊，这倒是头一次听说。

老乡叫着我的小名很严肃地说：“豆豆长的不错，小圆眼小蜜嘴，挺甜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林彪叶群长的都好。你要是去了，千万要小心呐，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你看林彪，去掉那三撇，不是个“虎”吗！”

“你简直是瞎扯！我是给无产阶级领袖当秘书，又不是给封建帝王。”

老乡却依然认认真真语重心长地说：“我可不是吓唬你，告诉你说，哪怕是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你也得注意。比方说，过去大臣上朝面君，连打哈欠，站错了位置也要杀头的！现在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人民军队，首长和下级是分工不同，可也有不少新规矩呀！比如说吧，你在大会堂会餐，在首长跟前说话，就不能着凉、拉稀、放屁，当着别人放屁不文明不礼貌。你该说啦，屁之屁也，五谷杂粮之气也，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不行！你就是有屁也得憋住，要放就到厕所或没人的地方去放，光天化日不准放屁。”

这个好心的老乡，给我絮叨了半天，我嘴上虽然责备他不要乱说，对于他那吓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但心里反而感到乐滋滋甜丝丝的。我知道，林彪有好几个秘书，最小的军衔也是个大尉，如果真作了林彪的"大秘"兼姑爷，那不是名利双收、两全其美的好事嘛！至于林豆豆的长相，我觉得她长得很文气，绝不象他爹那样鹰勾鼻子墨点眉。

好几天我象已经作了林彪的姑爷那样激动不已，甚至，连当了"大秘"兼姑爷以后，对林彪和叶群怎么称呼为妥也考虑再三、再四，直到想出了最佳方案为止，我承认我有个人奋斗的小野心，这也是人和木头和老黄牛的一种区别。

我一夜一夜地做着"大秘"梦，天天盼着来调令。过了大约七、八天的时间，来了消息：我落选了！我象是从十八层高楼上失身掉下来，感到一切都完了。

我想，我在什么地方出了差子呢？我除了不会"打针扎针推拿按摩"这一条外，其余九条我都沾边，而这几条，我相信在全中央警卫部队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年轻军官会同时兼备。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独立营营长张悦臣同志，在送别那位大副官时，无意中又冒了一句多余的话， 他说："小刘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小脾气。"

副官听了皱了下眉头。

是呀，林彪的秘书有小脾气那还了得！小脾气也好，大脾气也好，只有当首长的才有发脾气的份，不然，要是这小脾气一上来，连林彪也不放在眼里呢？！锅就这么砸了。

我的"大秘"梦没做响，姑爷梦也告吹了，思来想去，

我恨透了我们独立营营长张悦臣。我惋惜地对我的老乡王文要说："我天天自我奋发拼搏，特别是当文书和书记官以来，星期日和假日从没休息过，我这样苦习苦练，就是为了闯出一条前程似锦的路。好不容易林彪选秘书来了机会，想不到叫咱们营长一句话全给毁了，这个土八路！太求全责备了，他会什么！"……

四号听了我的简要叙说，沉默了一会，说道："留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对有些人来讲，都是身后事，是无所谓的。所以历史上，搞坏事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而另外一些人，是有盲从性的。有求生的，有求名的，有求权的，有求利的。所以真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很艰难的。"

我不知道他是在批评我，还是在表扬我，不知道他的话和我要想当林彪的秘书有什么关系还是另有所指。但有几年，我对营长一直心存芥蒂，耿耿于怀。不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几年后"九·一三"事件发生，那时，我已经是师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了。当我听到传达林彪叛国叛党摔死在温都尔汗时，我比其他人多打了两个冷战，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个一人之下，万众之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堂堂副主席、副统帅，却不过是如此斯人！我这才感到象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终于醒了，我不过是梦中的一个愚得无法再愚的痴痴信徒。

谢天谢地，这时我倒万分感激我们独立营营长张悦臣同志了，要不是他在副官临走时说了我句"坏话"，我有可能作了林彪的殉葬品，交待在温都尔汗大沙漠了，因为个人主义加野心加愚蠢，加迷信是最容易上饵钩的；也可能是坚守共

产党员的良心阵地，不与林彪为伍，从而撞死在林彪叛国的枪口上。真是万事如烟，变幻万千。一个人一生该有多少经验教训啊！今天道出这段轶事，在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也算是对林彪这个叛国 厉 鬼 的 一 篇“祭 文”吧！

二十、牢笼雄狮（二）

——黄克诚横眉冷对，宁折不弯
荣高棠紧闭铁嘴，青山永驻

在特别监狱里，受各种侮辱，肉刑最厉害的是十六号囚室邓洁、七号囚室的东北局书记马明芳和北京市副市长陈克寒等。这几个人的专案组，整人的花样最多，手段也最狠。战士们暗地里议论说：

“他们真狠，继承发扬了国民党法西斯的一套整人方法。”

“他们打人就象上了瘾。”

“就算他们是被俘的敌人，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一条不虐待俘虏呢！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他们无法无天无政策，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么大胆！”

由于专案组整人太残酷，许多人难以忍受，特别是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痛苦，使部分人产生了“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想法，七号马明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没完没了的折磨和各种手段的肉刑，马明芳被整得死去活来。他经常不吃饭，就是勉强吃，也吃的很少。从《特犯生活言行起居记录本》上看，他的确悲观厌世了。

防止特犯自杀，这是周总理和傅司令员交给我们的四条任务中的一条。因此，在某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有些不放心，端着碗到了七号囚室。

这天晚上吃的是馒头、炒大白菜和稀饭。只见马明芳双手捧着大白碗，正在喝稀饭，既不吃干的，也不吃菜，更不用筷子。饭不好吃，菜也没什么油，战士伙食费每月才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为了省钱，司务长陈青从火车站联系购买了部分砂子米（所以薛明后来著文说叫吃砂子米，就是这么来的）。

马明芳至今还穿着我们连给他的旧的绿棉裤棉袄，从来没拆洗过，又脏又破。他和邓洁一样，既没衬衣，没衬裤，也没有裤衩。我想他一定是和许多人一样，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没人给他送衣服和其它生活用品来，没有涮过牙。因为几个月不刮胡子，喝稀饭时，长胡子都扎进了稀饭碗里，活象一个常年漂流在外的又脏又老的讨饭老头儿。一碗稀饭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喝下去了。

我没什么高觉悟，我既没想过立什么功，也没想过现在是囚徒的马书记日后一旦站出来，我能攀龙附凤；我只是觉着他是个人，无论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他毕竟是人，我看着实在可怜。我眼前又浮现出邓洁挨打时的情形与

感觉：他，很象当年我那乞讨的老父亲。于是，我一边机械地喝着稀饭，一边说道：

“看你这胡子这么长了，也不收拾收拾？”

马明芳正要站起来去涮碗，听到我说话，又坐下来，一手摸着碗，一手抹一把沾满稀饭汤的胡子，叹着气说道：

“你看我到这地步了，还收拾什么……”

他说的“这地步”是指专案组往死里整他，整他的手段和那残酷的情形，我真不忍心说那是人干的：他们居然揪他的胡子！可谓古今中外的肉刑手段都尽可能实用了。当然，这种最革命的手段，大多是在专案组授意下，由掺杂在其中的群众组织的头头或代表干的——“群众的过火行动，是可以谅解的嘛”，由于这句时髦的格言，不知打伤、打残、打死、逼死了多少人！

也难怪马明芳想死，因为死神紧紧盯住他——不论春夏秋冬，他总是被打得血肉模糊，常常是审过之后，衣服、血汗和肉皮粘连在一起。我们的小卫生员孙立达，不得不给他用热水敷后才能帮助他把衣服脱下来，有时连皮带肉扯下一块。卫生员还是个十八岁的小娃娃，他见不得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因此，常常公开地自我壮胆地说：“按毛主席的教导，就算给俘虏看病呗！就是公园里吃人的老虎，有了病还得给看呢！”

与小卫生员比，我不知我是更成熟一点，还是更狡猾一点，还是觉悟高一点儿，总之，做为指导员的我，还不敢那样公开坦露自己。我只是劝马明芳道：

“你应该面对现实，这里有许多老帅受的苦比你不少，比你还惨，他们都没有悲观失望。有的人就说：党不会就这

样完了。死也要死个明白，看个明白，不然，死也死得不安心。你真要冤枉了，这样去死能痛快吗？而且，还会说你是畏罪而死呢！”

“我实在受不了了。”马明芳悲哀地说道，“受的这叫什么罪，还不如死了呢，你看我还有啥活头……”

我无话可说，我感到一切劝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谁也解释不清的问题，我能说清楚吗！

十六号邓洁受的罪更令人残不忍睹，脸上、胳膊上、腿上，直到全身，到处都是伤，打得最严重的时候，既不能躺，也不能坐，常常站着爬在桌子上，一爬就是半天一宿的，有时自己不能吃饭，小卫员孙立达便一口一口地喂。由于专案组刑逼诱供，邓洁几翻承认，又几次推翻，但是，承认也打，翻供也打，承认了再翻供打得更厉害。似乎他承认“出卖了几十个党员”还不过瘾，要承认出卖了全国的共产党员那才带劲呢？那才算专案组本领大、功劳高、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深、成绩大呢！所以，在邓洁的身上，除了缺乏希特勒的现代化刑罚手段，几乎无奇不有。以至逼诱得邓洁胡乱说道：

“我交待，我交待，我在上海出卖了几十个共产党员，使他们遭到杀害，因此，还晋见过日本天皇呢……”

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月，居然漂洋过海去晋见了日本天皇，试想，那该是如何地罪该万死！？鬼知道他怎么去的。

刑逼后，一回到囚室，邓洁便自言自语，自叫冤枉。

有一天，我禁不住问他：

“那时候你真的去了日本了吗！”

“没去过。”邓洁说。

“那你怎么晋见的日本天皇呢？你没去过日本，也没见过日本天皇，那你这不是自己要自己的命吗？”

邓洁几乎哭着摇头说：“反正就是想要命，不问背景根由，他们就叫这么说……我想，熬过一关算一关，毛主席、党中央早晚会给甄别清楚的。当然，死就死了，可是，背着黑锅死，人也是死不情愿的，谁不愿意活着等着弄清楚啊……”

他说得十分可怜，完全是无可奈何地。

我说：“既然是这么想，那就应该象彭德怀、黄克诚、贺龙、荣高棠、王尚荣他们那样，挺着胸坚持活着，反正怎么也是打呗。你看荣高棠，用拳脚木棍打得站不住坐不了，搞了七天，不是也过来了吗？陈克寒，被打得抽筋，疼得打滚儿，嗷嗷叫，人家也没想死……”

邓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默默不语。

邓洁被揪肿的两个耳朵象蛤蟆一样，一个月后才恢复原状，但过了一个月又被揪肿了，屁股上的血肉和棉裤连在一起，脱不下来，好长时间不脱衣服睡觉。看来，被逼得想死实在不是轻易的。我记得在那篇文章里，好象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杀也是对环境的反抗”。环境对人太残酷、太不公平了，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自杀也便成了一条超脱之路。“士可杀不可辱”话自古认为是有道理的。我同时还想到，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自称是搞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不是曾经几次以唯心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限定揪出多少敌人、坏人、叛徒、特务吗？这种唯心主义到了如此白痴的程度，人自杀还有什么新鲜！

当然，在这座特别监狱里，每个人都在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与“现实”较量，与命运争斗，他们拼尽最后一点气息坚持着，扼住命运的咽喉！

比如，佛门大师班禅额尔德尼，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才二十多岁。他每天早晨一睁眼，便象战士一样，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而且每天在床上盘腿打坐，但口中念的不是经文佛法，而是毛主席的教导。至于他心里想的什么，念的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与之有点儿关系，他除了被拉去公开地作了一次“陪斗”以外，几乎没有对他怎么样。他是特监里最为侥幸的一个。

有一天，他很不满地用半生半熟的汉语对我说：“造反派抄走了我的几万元的存折，还有几双皮鞋。”

我说：“你丢点儿钱算什么，丢了命的有的是。”当个别小战士对他无理时，他机警地用毛主席教导论争，并且说：“你们不是讲政策吗？”，有时听到他大吵一句：“你们不是讲政策吗？你为什么这样！”

而十号囚室荣高棠和二号囚室的黄克诚，则采取了另一种形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抗。

俗话说：睏也能把人睏死。也就是说，不叫你睡觉你就受不了。苏联朱可夫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反攻胜利后，他由于战时连续组织指挥的疲劳，一躺下便睡得如死了一样，任凭谁喊他拉他摇晃他，都叫他不醒，他一连睡了三天三夜。可见挨睏是什么滋味儿。

这个睏也能把人睏死的道理，大概荣高棠的专案组学得最活，领会的最深，运用的最好。一个唐佛脸对他的组员们说：

“荣高棠是体委主任，他不是喜欢体育吗？他不是身体很好吗？他不是要跟贺龙一起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疲劳战术，轮番轰炸，以体育之毒攻体育之毒！”

“摇煤球”，放高音喇叭、“坐飞机”连续批斗等等，是这场大革命的发明创造，许多人正是因为经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而在逼诱下顺杆爬“招供”了，有的自杀了，因此，也便盖棺定论罪上加罪，而成为文革专案组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了。

但唐佛脸没想到荣高棠能够坚持持久战，他总是据理以争，毫不退让，驳得他们张口结舌。专案组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说道：

“荣高棠软硬不吃，他的嘴不软不硬，软中还有硬，真是个难对付的铁嘴。”

唐佛脸生气地说：“接着审，一连搞他七天，不信整不倒他。”

就这样，专案组和体委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八里庄提审处，轮番对荣高棠进行了七天七夜的连续批斗，“摇煤球”、大喊大叫、拳脚相加、木棍敲打、放大喇叭、整整七天七夜不让他合眼，不让他休息，一刻也不让他安生。他是特监里被连续批斗审讯时间最长的一个，竟至司机都非常疲劳了，月光下误把路边一堆石子当成路面，差点儿翻了车。

荣高棠被整得头昏脑涨，既记不清春夏秋冬，也记不清日子，连黑夜白天都分不清楚了，但有一点他清楚：嘴不可信口而言。如信口而言，不仅伤了自己，也会伤害他人！

在特定的情况下，无言的反抗大概是最有力的一种手段。荣高棠后来干脆不予回答，颇有“此处无声似有声”之势。闹得专案组不好下台，只能叫荣高棠皮肉受苦，打得他站不住蹲不下，躺不了。

专案组也有些精疲力尽了。搞了七天七夜，没有撬开荣高棠的嘴，也没有熬倒他，更没有逼得他有自杀现象。相反，他活得满带劲。

放风时，荣高棠照例如获至宝地抓紧时间在院里竞走，他穿一身蓝衣服，留着小平头，脚穿家做棉鞋，高仰头，挺直胸，比年轻人竞走还快，简直象小跑一样。他象头雄狮，象一只展翅的大鹏，在小院里疾速地转着圈，似乎生命和光明就在前方，就在这方圆不足几十米的小圈子上，让人感到他要飞出特监牢笼，飞向蓝天。可惜，奉命给他放风的时间太短了。然而，就是这短短几分钟至十几分钟的时间，也是战士们为之逐级反映争取来的。因为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说：放什么风，一切服从专案审查……

几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了。我站在小楼上，只见荣高棠脑门上微微冒着汗，迎着斜阳，闪着亮光，叫人百感交集。我不由内心苦笑着，这不是有点象白公馆渣滓洞了吗？

没过三天，荣高棠又显出精神焕发，他象往常一样，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仍然是特监囚徒中最为干净利索的一个。他度过了难熬的七天七夜，战胜了最痛苦的时刻，因而，也增加了新的活力，正象在公园里锻练的老人，无顾无盼地独自专注地练着。我不由地又想起一句俗话，他这不正是留驻青山不愁柴吗！

荣高棠毕竟是年近六秩的老人了，由于伙食不好，残酷

折磨等诸原因，有一天他说肚子疼，疼得厉害，哨兵逐级地报告，卫戍区傅司令指示，送二六七医院。

我们接到指示后，当即用B克——那辆经常提审他们的运输车，把荣高棠送往中央警卫师医院，即二六七医院。这也是上边有意安排的，这个医院是我们警卫师的团级医院，百十个床位，又在附近永定路，医务工作人员都可靠。

原来荣高棠得的是阑尾炎，顺利地做了手术，参与为他开刀服务的，恰恰有我在独立营工作时的卫生所长梅敬忠的爱人——护士长贺端月。这个湖南堂客长得非常美，出身资本家，可她的心灵和她的外表一样那样美得令人可亲。事后她对我和梅敬忠说："我们可没象专案组和'政治医生'那样折磨人家，我们不管他什么主义，我们按毛主席教导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二号囚室的黄克诚，更象一个拧脖子铮臣，他以牙还牙，以硬抗硬。

黄克诚和彭德怀、周小舟、张闻天一样，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四人反党小集团"成员之一。现在也被囚在特望监狱，大家彼此彼此，新帐一堆，旧帐重提；但是这个被撤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黄克诚，一直是耿耿于怀，从未屈服过。

还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彭德怀、毛主席他们四人都是湖南湘潭同乡，三人距毛主席的家韶山冲仅几十里。而今，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又是老乡的周小舟，已经自杀结束了五十四岁生命。剩下的彭德怀、黄克诚却被关押在这里，彭德怀已经生命危险，黄克诚还在死顶硬抗。

有一天，提审黄克诚。专案组用概念模糊的词语问道：

“你和裴多菲俱乐部的反党成员们有什么密切关系？”

黄克诚粗声粗气答道：

“什么赔多非、赔少非，我不知道！我没读过书！我没做过买卖！我不懂得赔多少赚多少！”

“……”

“那，你揭发罗瑞卿的罪行！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他要抢班夺权，都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揭发他！”

黄克诚一瞪眼：

“我不认识罗瑞卿！我有什么好揭发的？”

一个中央书记，原总参谋长，说不认识继任总参谋长，不认识在一个战壕里战斗几十年的战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显然，这是一种旨在反抗的讥讽和蔑视的语言。

专案组无法问下去，便把矛头指向黄克诚本人：

“你要继续老实交待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大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搞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军错误罪行……”

黄克诚抬起眼皮，直视着专案组，大声怒斥道：

“我有什么错误？你去问主席！你去问主席好了！我有什么错误毛主席都知道！”

黄克诚根本不把这些专案大员放在眼里。

这个专案组作为例行公事，执行上边指示，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使警卫战士们佩服的一点是，不论黄克诚如何发脾气，他们都做到了动口不动手、文批不武斗。这一点在“武打”成风的年月，在特别监狱里，倒也是罕见的，说明这个专案组还是比较讲政策的。因此，我们的战士，对待这

样比较讲政策的专案组都是比较客气的。也有的战士说："黄克诚碰上了好专案组"。

黄克诚从开始进特监小院，就有一肚子怒气，他不仅对专案组的人冷冰冰死顶硬抗怀着敌意，而且，对看押他的战士也毫不客气。

有一天，哨兵宋肖池由于某种原因，尚未来得及给黄克诚放风。将近天黑，还没轮到他，黄克诚急了，他似乎忘记自己是囚徒，象指挥员下达紧急命令，对门外的哨兵大喊道：

"你过来！"

哨兵宋肖池面黄肌瘦，是个中等瘦个子，说话有点儿结巴，他急忙走进二号囚室，磕磕巴巴地说：

"你……你吵……吵什么？"

黄克诚说：

"你怎么当的兵？结结巴巴的。"又用手一指宋肖池脑袋说："打起仗来真要命！"

宋肖池最怕别人说他结巴，有点儿生气：

"你喊我究竟要干什么？你还真横，这小院子里头，你看哪个敢象你这样？你别忘了，你是彭黄反党集团成员，我们奉命看押的是反党分子！"

"你为什么不放风？"黄克诚怒斥道："国民党监狱还放风呢！"

宋肖池因为照顾行动不便的陈克寒、上了双镣的刘仁和视放风如生命的荣高棠等，而给他们适当延长了放风时间，因而，还未给黄克诚放风。现在被黄克诚一问，又开始结巴了，"这、这、这"了半天，还未说出原因。黄克诚说：

“出去！下次再忘了我……”

后来，黄克诚变得对战士很客气，嘴里还经常说声“谢谢”，因为他的怒气渐渐发得差不多了，而且逐渐看到警卫战士与专案组不一样，有的哨兵经常给他打水、倒水，让他在屋里洗澡，他觉得这些原先象工具、木头一样的战士是多么可敬可爱。有一天，他终于对一个战士说：

“我不该对你们发脾气，这都是他们闹的！我有气没处撒，请你们原谅。”

战士说：“没啥、没啥，陈老总说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二十一、牢笼雄狮（三）

——王尚荣怒斥专案组、贺胡子棒敲林彪像

在这场火烧油炸、大批大斗、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中，领导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五号囚室罗瑞卿的警卫员，就是因为偷东西受到批评而在“大革命”中反咬一口，成了射向罗瑞卿及其夫人的一支毒箭。

四号彭德怀的生活警卫参谋景玉珍，实事求是，缄口不语，使彭背后少了一支毒箭。

全国解放后的总政治部第一任秘书长、后来的解放军军艺院院长魏传统的秘书庄明德，无论造反派如何逼斗、辱骂他是小爬虫保皇派，他都实事求是据理相争。而且，偷偷地给囚室的魏传统隔着小窗户塞窝窝头（窝头眼里放咸菜，他每月七十二元工资，因打右派降了两级），为此，作为小爬虫

多次陪魏传统挨斗。他说："身体和精神虽然是痛苦的，但灵魂是干净的，心里是平衡的，既便死了也不受良心的责备"。

后来，他因受牵连，被调往天津后又复员。魏传统站出来工作后，又把他调回军艺。

背着武汉司令陈再道逃出造反派重围的排长杨树理说："我要想讨好、升官，象麻副指那样就行了，何必冒这个险。他陈大麻子是中央某些领导点了名的五·二〇事件镇压群众的凶手，谁保这样的人谁当然要冒险"。事实证明，"老保"也好，"小保"也好，后来都祸及到本人。

而王尚荣的一个秘书，居然成了王尚荣专案组的成员！这叫"反戈一击"。王尚荣对此恨恨不已，他虽然成了反党、反毛、反军、反文革的囚徒，依然象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气壮如牛，毫不退让，对他的专案组一句也没客气过，一问就翻，一审就顶。

有一天提审王尚荣。

王尚荣目中无人地在椅子上一坐，两眼瞪得大大的，有时干脆闭上眼睛。

专案组不论地方上的，还是军队的，都穿着军服，王尚荣的专案组大多是军队的人。

专案组提问：

"王尚荣！你要老实地继续交待，再不回头绝没好下场！"

王尚荣不说话。

"罗瑞卿擅自搞旨在反对毛主席、林彪同志的大比武，你做了些什么？起了些什么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王尚荣瞪了瞪眼还是不回答。

“罗瑞卿手长，都知道他叫罗长子，他抢班夺权，你老实交待，揭发他，和他划清界限，不然，你就是……”

王尚荣猛一拍桌子，怒吼道：

“我不认识罗瑞卿！”说罢，把脸一扭，拧着脖子看着别处。

“你真是顽固到底，你是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你怎么不认识罗瑞卿！？”

“我告诉你们说，我王尚荣根本不认识他！就像你们不认识我一样。”

这当然是绝妙绝顶的讽刺！一个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居然说不认识他的顶头上司总参谋长。这是在旁敲侧击他那个现在是专案组成员的大秘。

专案组对这样的特犯简直没有办法再问下去了。其实，问题决不在于此，如果这个专案组象邓洁、马明芳那样的专案组，不说就折磨、就往死里打，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可见，这个同是中央文革专案组的王尚荣专案组，毕竟不同于其它专案组。这也算王尚荣的幸运吧。不过，我想，即使碰上象彭德怀、罗瑞卿、贺龙那样的专案组，王尚荣还是王尚荣，这种人一定会象彭德怀们一样，死不屈服。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问题的根——他们所考虑的、坚持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危，如果是这样，在监外的、在位的、挂职的，象徐帅就不会面对面怒发冲冠掀桌子，叶帅也不会拍断小手指，谭震林也不会斗胆夹皮包就走，陈毅也不会当场劝阻别走，要“和他们接着斗”了！

他们见风驶舵不是安全无恙吗？何必要引火烧身呢？

大概这就叫真理的胆量，做人的骨气，忧国忧民的气慨！

可以说，在囚室里与王尚荣等“相映成辉”的是已经濒临死亡的贺龙。

一天傍晚，贺龙在连续不断地怒骂之后，拄着拐棍站起来，艰难地走到林彪的像前，用手杖的一头敲打着林彪的像，愤愤然说道：

“你这个家伙，你为什么不许别人干革命啊？你要上就上好了，为什么要踩着别人上呢？老子给你提过意见，批评过你，你就要往死里整！真没看透你……”

在特别监狱里，虽然有哨兵看守，但象贺龙这样公开的、袒露无遗地骂大街不只他一个，罗瑞卿、王尚荣、黄克诚、彭德怀、陈再道等，多次疯狂般地骂街。但他们大多是骂林彪、中央文革某些人和陈、江、王、关、戚等。他们说，中央出了奸臣，出了鬼，有特务，有汉奸，是被特务汉奸陷害。

还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虽然是文弱书生出身，但在特别监狱里，也表现了文人的骨气。他经常摊开报纸，戴着眼镜，左手持放大镜（放大镜也是我们给他捎来的），右手拿着铅笔，一边看一边嘟哝，一边划道道，作眉批。有一次，他看某月某日“梁效”的文章，一边看一边用铅笔批，一边自言自语说道：

“这叫啥子话呀！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这种东西……这是胡来嘛……”几乎每篇社论他都这样认真阅读作批。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都被他用笔把空间写满了，有许多地方划了杠，打了问号。

有时他一边看一边思索、摇头，叹息一阵，又拿起放大镜再看，再批；有时呆呆地看着房顶。

他们在特监的这些对他们说来十分不利的言行，如果照原样记录在《特犯生活起居言行记录本》上，那他们会“罪”上加“罪”，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实在说，战士们打了埋伏，没给他们记上，这足以说明战士的倾向性。当然，也有的战士象战场上发现了敌情一样，认真地记下来。

对特犯的言行究竟如何记录，连队还专门开过一次支委会，这一次会议副指导员缺席。

如果按中央文革专案组的要求如实记录上报，那对他们将是更大的灾难。不全部记录，又要担风险。向上口头汇报时，更是左右为难，难以措词。当时，团长王夫参加了我们的支委会，团长说了一句话：

“打疼了，喊喊疼也有罪……”

他这句表面看来是模棱两可，实际是颇带倾向性的话，给了我们启示。因此，凡是元勋们骂街的原话都没记，顶多写上“发牢骚”这么一句代用词。贺龙骂街是这样记的；彭德怀骂街是这样记的；王尚荣、罗瑞卿、谭政等等骂街都是这样记的。不仅如此，还相反地把专案组批斗会如何违犯政策、如何批斗、折磨虐待，被打得如何痛苦不堪，详细地记录下来，上报上去。

记得有一次，彭德怀被打得很惨，当我们用电话口头向上级汇报时，傅司令指示：“如实地、详细地写报告，不要以连、营、团、师党委名义，以看守战士亲眼所见的名义报上来，上报总理，不要修改，战士怎么写的，怎么说的怎么报。”

我记得，那一次根据哨兵原始记录，上报了一个专门材料。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被批斗回来后，根据哨兵在特犯生活起居言行记录本上所记的写出了如下的报告：

关于彭德怀被打的报告

昨天在北航开了三、四十个人的小会批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了七次，前额打破了，嘴角出血，肺部有内伤，明天说还要斗。我们问韩爱晶，为什么要武斗，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中央文革小组首长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还说，周总理指示的“五不”过时了，要执行中央文革最新指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

卫戍区傅司令接到报告后，气得大骂道：“狗日的，他们凭什么随便打人，马上报告总理，告他娘的！”

正是由于警卫部队内心从不理解，到同情“特犯”，因而冒险做了许多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帮助。例如，给彭德怀看病、买烟，给他在室内洗澡；给陈克寒按摩；搀扶罗瑞卿、陈克寒上厕所；为陆定一捎放大镜；为赵建民送“私信”；为“特犯”争取了一周洗一次澡；争取到开窗户透风，争取到每人发了蚊帐；为班禅取衣服；在伙食标准很低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改善伙食等等。因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受到连累，有的被整了数月后，被迫复员回家了。

警卫战士做了力所能及甚至“份外”的超出政治纪律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也便没有后来的许多领导同志打听当年“狱卒”下落的事情了。这正如当年逃出造反派重围时，

陈再道对背他的排长杨树理所说："我会记住你的名字的……"

后来，陈再道忘记了杨树理的名字，只记得一个杨大个，他终于找到了"背我的那个杨大个子"。杨树理调回了北京中直工作。

也正因为中央警卫部队上至卫戍司令傅崇碧，下至一个十七岁的小兵，绝大多数都有爱憎分明的倾向性，才招致了"旗手"对以傅崇碧为首的中央警卫部队的恨之入骨。在一次碰头汇报会议上，江青曾指着傅崇碧的鼻子训斥道：

"你为什么保他们？你为什么保护他们？！你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群众批斗？你当的什么司令？"

江青的每一句话都顶一颗重型炮弹，每一炮弹都足以置傅崇碧于死地，因为她是江青，而不是别人。事实上江青的质问不单单是对傅崇碧的，她的矛头实质上是指向当时在场的周总理的。

傅崇碧对此故作难状地回答说：

"江青同志，要随便抓人抢人，随便交出去给他们批斗，我们就无法按中央军委的命令执行任务了。"

傅崇碧的回答十分巧妙，江青挨了个软钉子，只好记在心里，为傅崇碧又记上了一笔黑帐。但她忍受不了软钉子，狠狠地说道：

"你傅崇碧眼里还有毛主席吗？还有中央文革吗？"

傅崇碧还想说什么，眨了眨眼，看看总理，总理似乎示意他不必再说了，傅崇碧这才把想要说的话又留在了肚里。

时隔不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一次有中央警卫部队团正职以上参加的在大会堂召开的万人会议

上，傅崇碧和杨成武、余立金便被宣布为反革命了。宣布这个命令的任务如果让别人去作又恐生出乱子，因此，最高"组织"决定还是让周恩来去做。周恩来忍受着正义、良心的鞭挞、受着顾全大局和国家命运的沉重担子的苦痛，一切心理上的矛盾，犹入卷进纵横交错的激烈战场的中心。他几乎是含着泪水，事先邀请傅崇碧谈话。

"你的眼睛怎么样？"

傅崇碧不解地回答："眼睛……我的眼睛好好的呀。"

周总理说："没有患近视吧？"

傅崇碧说："没有……"他有点茫然，不知总理为何突然问他的眼睛，他没有得过眼疾，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有眼疾。

周总理说："没患近视就好。要保重身体。不论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你都要冷静。"

周总理的意思是，要相信历史，不要只看到有人伐林毁树，还要看到有青山常在，有青山就会有树，有树就不怕没柴烧。

周总理说罢，苦涩而深情地恭恭敬敬地为这位正直的司令敬了一杯酒。

这毛毛雨下过以后，傅崇碧有了戴手铐的准备，他把挂满一床单的领袖像交给妻子说："你们好好珍存吧，这是我忠心耿耿一辈子的酬劳……很有纪念意义哩。"

其实，"杨余傅反革命事件"是林彪一伙精心策化的，林彪请傅崇碧出山，出了山又不跟着林彪一伙垒山头，"拉不过来就打"，这是历史上一切善弄权术的人惯用的伎俩。这种伎俩，并非是林彪曾自称的"爹娘给了个好脑袋"的原

因，而是他曾叫秘书翻阅整理出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详细地记述了历史上各类权贵玩弄权术的方法手段策略和用心。例如，一权在手如何运用，权力危机如何巩固，如何分而治之，如何各个击破，如何利用矛盾，如何打拉并用，如何软硬兼使，如何恩威并用；甚至到民国初年直至全国解放时，各个军阀的用人用兵用权的特点方式都分别系统的整理出来供他当党的副主席、副统帅、国防部长时信手用来。而搞杨、余、傅，不过是诸多伎俩中的一个小手段。在这里，我不妨引用聂荣臻老帅的一段话：

"所谓杨余傅事件，不过是林彪阴谋篡党夺权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那是1968年3月22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地有意封锁，以至军队中这样重大的问题和人事变动，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不得而知了。林彪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如此说，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事隔一天，即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聂帅只是扼其要所说，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放出许多置傅崇碧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如说："傅崇碧带着部队闯进江青办公室，在江青同志斥责下，吓得掉了手提包，提包里的手枪上膛，也掉在地上"。

聂帅对他们的卑鄙用心深恶痛绝，接着说道："因为我心脏病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3月24日大会堂会议我没参加，但他们打了三次电话催我参加。会后，叶剑英同志告诉我会议情况。这个会林彪一伙也作了精心安排，象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等这些政治局委员，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而是在台下。而中央文革的成员和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醉翁之意很明显，台下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可冲击打倒。这个会议以后，社会上就掀起了一股要把陈毅、李先念、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包括我）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他的两个目的可以达到了：第一个是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个是，借此打倒一批他要打倒但至今还未倒的人，消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

"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既没说是我，也没说不是我。我又给主席写信，主席批示说：荣臻同志，安心养病，勿信谣言。4月16日我到林彪处，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人也可以“自圆”其说，但历史不能为其自圆其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到会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直到1979年3月，“杨余傅”才真正恢复了本来面目。它应了在特监小院战士们的私下论断：“傅司令早晚得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但傅崇碧毕竟是历史的傅崇碧，枪口如果谁都不去撞，真理谁也不舍得拿命换，恐怕至今还在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日子哩！”

看来，贺龙身在牢笼敢于棒敲亲密战友、副主席、副统帅的像，绝不仅仅只因为个人受了委屈和一时冲动气忿，他在为历史、为人民举起了拐仗，就象早年他举起菜刀一样不可低估它的内涵。

二十二、以正义和人性良心为笔 以鲜血为墨写的报告

小小的什坊院，方圆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百米，在北京市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

然而，就在这座囚禁着许多元勋的小院里，每天都在发生着人生大舞台的幕后戏，不是鄙人把它写出来，留下这段铅字，恐怕后人、世人将永远莫知。因为就连那些已去世的和幸存的元勋们自己，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当年被囚禁在何处。

座落在北京西郊的什坊院，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原本是很好的，它潜伏在茂密的丛林中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安谧，冬日避风，夏日避晒，还能常常听到各种小鸟的啾啾喳喳的欢唱声。

很可惜，由于从上至下，从左到右，各方各面各阶层人等，都在忙于压倒一切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触及灵魂的大造反，所以，无人顾及什么清整环境卫生。热心抓生产的，已经落了个“拿生产压革命”的罪名，谁还再敢去落个“含旦

生压革命”的罪名呢！结果是，一到下雨，周围洼地积存许多污水和腐烂的树枝落叶。这样一来，苍蝇、蚊子便如鱼得水，大肆繁衍，伙房里的苍蝇多得成堆，在馒头边上，突然横扫一把，便可抓到三五个，苍蝇虽多，好在特犯们吃饭时看不见，他们老眼昏花，很难看到馒头上究竟有多少蝇子屎！实在是眼不见为净了。实可恨那些以吃人血为最开胃的飞行物们，最使特犯一筹莫展，只好束手待吃。有民谚说："七月十五杠嘴，八月十五伸腿"。但什坊院的蚊子大概是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到六月二十几日，就率先吃人血了，到八月十五它们不但不象民谣说的伸腿归天，反而返照回光，长嘴更硬，人血喝得更凶，甚至隔着厚厚的棉布衣裤也能穿透咬人。特监里许多人被蚊子咬得要么起了大包，要么抓破了，有的已经溃烂；有皮炎的，便合二而一，更加难熬了。

在华夏大地上，什坊院的蚊子大概应属亚军了，冠军是内蒙大草原的蚊子。所以无论战士和特犯，都称这里的蚊子为"飞机"。

夜间，囚室里整夜开着灯，"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且，先前还不准开窗户，不准洗澡，许多人无衣服可换，尤其得了皮炎的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邓洁、荣高棠、陈克寒、罗瑞卿、马明芳等，皮炎已经折腾得他们昼夜不安了，再加上那些专事喝血的小飞机，一到夜间便成群结队的向骨瘦如柴的囚徒们轮番袭击。黄克诚总是一边拍打蚊子一边骂道：

"妈的，人咬人，蚊子也欺负人。"

总参副总长兼作战部长王尚荣则说：

“这真叫龙游浅沟遭虾戏，虎入牢笼蚊也欺。”

警卫连许多干部战士实在看不下去，就议论说：“这些老家伙们太可怜了，最好也给他们发一顶蚊帐，不然，再这样怎能按照周总理说的保证他们不死呢？”

连队支委会听取了战士们的意见，以此为题专门研究了一个晚上，中心的意见是，要想争取上边给他们发下一顶蚊帐，就必须言词合适，不能造成为他们鸣冤叫屈的印象，如果露出鸣冤叫屈的意思，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对警卫部队影响不好。这个意见是战士支委外号小诸葛宋根利提出的。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同意。

按照支委会的意见，由连队文书首先起草，经我和老连长管东春反复修改，写出了如下的戴着一个大帽的正式报告：

关于申请特犯发蚊帐的报告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要斗私批修。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还劝导我们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司令部、政治处：

我连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看押特犯

的任务。

目前，夏季来临，我连驻地蚊子又多又大，咬人十分凶狠，因此，使特犯整宿不能睡觉，这直接影响着对特犯的提审和批斗，为了保证顺利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监护特犯的任务，我们经研究初步意见，建议上级准许发给特犯每人一顶军用蚊帐。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评指正

此报告

五连党支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于什坊院

这个为特犯申请发一顶蚊帐的报告，想不到很快就批下来了，并指示我们到团后勤处去领取。

团后勤处军需股长来电话说："取蚊帐，造名册，但不要写特犯姓名，写战士们的姓名……"

写战士的姓名是团长王夫和政委李大胡子的指示，以免特犯姓名被发现，不但发不了蚊帐还可能带来麻烦。

司务长陈青接到通知后造了战士名册，便立即和新上任的上士（给善员）郑有田从后勤处取回了两包白纱布蚊帐。也有个别的是绿的。

军用蚊帐，正如我前边说的，象一个长方形的小棺材，质地不佳，线粗，象纱布一样又厚又密，人睡在里头又热又憋气。尽管如此，尚可以挡蚊子，这对于特别监狱里的囚犯来说，实在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了。

陈青很高兴，笑嘻嘻地和郑有田抱着蚊帐逐个囚室发放，还为他们准备了挂蚊帐的竹竿和木头竿子。陈青发一件

说一声："感谢党和毛主席吧！"其实毛主席知道吗？党知道吗？

许多特犯看到给发蚊帐，都流露出感激的神态，有的千谢万谢，有的点头致意。但也有的不屑一顾，甚至和战士吵起来。

首先是班禅额尔德尼，接过蚊帐，点点头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了声谢谢，挂上后，试了试，又颇不高兴地说："太小了，有大的吗？"

陈青说："部队的军用蚊帐是武大郎开店，一般高，没大的，也没小的，只是有白的，有绿的，你们就凑合着用白的吧！你凑合用吧，哪有那多意见。"

班禅说："你们不是讲民主吗，我提出对不对你们参考。"

班禅额尔德尼是个大个子，将近一米九零，睡觉时，一伸腿，双脚就蹬出了蚊帐，脚被咬得挠破了几处。

过了两天，班禅对值勤的哨兵刘桂贤说：

"蚊帐太小，一伸腿就露出来了，咬脚……"

刘桂贤说："它咬你，你不会别伸腿吗，你伸出来，它还不咬你！"

班禅还坚持换个大的，刘桂贤不耐烦地说：

"你就将就着用吧，没蚊帐你怕蚊子咬，有了蚊帐你又嫌小，你总是不满足，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想过修正主义生活，当寄生虫啊！"

班禅说："我是提意见、提要求，你们不是讲民主吗，我提出来解决不了就算了。"

刘桂贤说："你还不知道，又没整你也没打你，又给你

修床加长，我还给你取衣服，我都成了你的勤务员了。你看这里头谁能和你比！”

刘桂贤和班禅吵过后，时间不长，又和黄克诚吵起来。

黄克诚嫌蚊帐太小，太密，不透风。对刘桂贤说道：

“你过来！”

刘桂贤平时很稀拉，两只鞋子都穿歪了，也就是两个外脚跟向外压，靠外侧的部分鞋邦穿成了鞋底。他懈里咣当地走进了囚室，憋着一肚子气说：

“你叫我干什么？”

黄克诚见刘桂贤如此稀拉，象散了骨头架，而且鞋子穿得不成样子，他象队前的教官训斥部属一样，恶狠狠地说道：

“看你这熊兵……”

刘桂贤也不示弱，反驳说：

“我熊兵，我熊兵看老将。看咱俩谁熊……”

黄克诚说：“这蚊帐不行，太热，不透气，有稀的没有？”

刘桂贤说：“稀的？鱼网稀，不挡蚊子，给你你要吗？”

黄克诚又骂了一句：“你这熊兵……”

刘桂贤说：

“我这熊兵不好，你这将军好！我看你是个官僚主义，这么多年，每年夏天我们都是钻进小棺材里，无论多闷多热也得钻进去，要是不钻进去，我们班长会开班务会狠批。你当了那么多年大官，还楞不知道我们用的是这种蚊帐吗？看来，你到这里头住住，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

黄克诚再也不说话了。似乎他觉得刘桂贤说的有道理，

表情不那么生气了。

刘桂贤又说道：

“这蚊帐，还是我们写报告给你们要来的呢，要不然，你连这也没有。有人只嫌整不死你们呢，还给你发蚊帐。感谢总理和傅司令吧，还有我们王团长。”

黄克诚若有所思。

刘桂贤说：“看起来好象你什么都知道，实际上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二不知其三。你好好想想吧！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我们不能做的也斗胆做了很多。”

刘桂贤什么也不怕，上无父母，下无妻儿，大不了一打背包回家。

特犯里当过兵的都懂得，睡觉前，下头如何把小蚊帐掖在褥子下边，上头如何把蚊帐压在枕头下边，这样就伸长了。可班禅额尔德尼却不懂得这样做，因此，双脚老是睡出来挨咬。有一天，正执勤的战士刘桂贤一边帮他掖蚊帐，一边说道：

“老班呐，我看你挺聪明的，比方说，你天天早晨一睁眼就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老读毛选。怎么连小蚊子都对付不了？你看，这样不就好了吗？”刘桂贤说着，已替他把蚊帐掖好。

班禅笑了说：“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刘桂贤以前常拿大活佛开玩笑，有时开玩笑是命令式的口气。班禅常读毛选，也知道军队有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因此，常和刘桂贤吵嘴，自从刘桂贤给他从家里取过几次毛衣等用品，又主动帮他掖蚊帐，班禅终于改变了对这个战士的看法。他用试探的口气问刘桂贤：

“你上我家去，你知道我妈妈怎么样了？还有，我弟弟呢？”

刘桂贤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多严肃的事情也是开玩笑的口气，听班禅问他弟弟和母亲的下落，一会儿一惊一咋，一会儿又嘻嘻哈哈地说：

“你是大活佛，谁敢怎么样你们家！不过，这场大革命可不管什么神仙活佛，都在造反之列。”

班禅着急地问：“我妈妈和弟弟怎么样了？”

“你妈好好的嘛！”刘桂贤说道，“你还挺孝顺。你妈也惦记你，问你的情况，我说，他挺好，我们都侍候他，吃饭有人做，熟了还给送。”

刘桂贤说到这，又没正经话了：“我看你家大红墙，大高门，阔气的大院落，比我们一个连占的地方还大。要不是你囚在这，我这小兵子要进你家门，准比上金銮殿还难！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人不能老是居高临下，瞧不小民。”

班禅说：“是，是，班长，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我弟弟呢？”他还在惦记他哑叭弟弟。

“你弟弟别看是哑叭，人家自食其力，现在正在一家工厂糊纸盒呢！是街道给安排的。要不是这文化大革命，你那被红卫兵抄去的几万元存折，准够吃几辈子的。我们一个月是六块钱，要叫我重孙子接着再当兵，加到一块的工资也挣不了一万元！”

刘桂贤借机大发了顿牢骚，而班禅心悦诚服地说：“我今天真受了教育，是真的，班长。”

二十三、马明芳抚伤哭先烈

七号囚室的马明芳，本是西北局书记，他和刘少奇的秘书兼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孟用潜先后被押进什坊院。

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头号的走资派以后，马明芳和孟用潜被整得就更凶了。尤其是马明芳，被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不死不活的样子，使许多干部战士生出恻隐之心，因此，常常偷偷私下议论说，怀疑是叛徒也罢、修正主义也罢、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也罢、反对文革也罢、反对中央文革也罢，总之，在中央没有正式通知之前，大搞刑逼供、残酷的侮辱、殴打，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不人道的；即便是中央给他们定了性，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也不是马列主义的。可是，错误的，非马列的行为，为什么偏偏在全国风行，如此猖獗呢？

谁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许多人心灵上难免罩上一层模糊的阴影。

我从小没上过几年学，大概是由于我很无知，因此使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好奇的东西弄不懂，我就难受，寝食不安。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的一个皮作坊听“洋戏匣子”，里边

有人唱，有锣鼓声，有“洋人大笑”。我就纳闷，那么个小匣子，比我娘用的针线笸箩大不了多少，里边怎么能装那么多人，那么多东西？那里头的人得多小才装得下？还有锣鼓呢？放在哪？”

我问大人们，他们谁也不给我解释。我决心看个清楚。有一天，趁没人，我就用改锥、钳子，把个神秘的“洋匣子”全打开了，就象大卸八块一样。原来里边既没人，也没锣鼓，只有一堆破铜烂铁旧螺丝钉，而且老得都长了锈。我在“原来如此”之后，反而更加奇怪了，“这么多死玩艺怎么叫唤得这么响？”

破匣子被我打开了，但想装上它可就难了，我又怕挨打，又怕人家叫我赔钱，急了一头大汗，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用一张烂羊皮，把这堆破零件盖上，撒丫子跑了。

从此我也知道了，人原来有这么大能耐，能耐得使死物说话。

我这种从小对什么也好奇的劣根性，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了部队，劣性不改，于是，有一天我终于对马明芳刨根了。

那是快过年了，在一个吃罢大白萝卜馅包子的星期天下午，我借查哨的机会，来到马明芳囚室。

我象没事人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又象有事人一样察看一下马明芳有没有自杀的先兆。这些都做过以后，突然问道：

“你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修正主义分子，又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嫌疑，你说真话，你究竟是不是，你承认了吗？”

我虽然是指导员，但毕竟才二十多岁，实际上头脑还很简单的，我真的自信，他会跟我说心里话的。

以前马明芳不大爱说话，挨了斗，挨了打，只是呆呆地在囚室呆着，也不象彭德怀、黄克诚等发牢骚、骂街。这次他听到我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居然慢慢地谈开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以及和他一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的战友。

他显得很沉痛，似乎在慢慢地回忆中。过了一会，唬了口气，慢慢说道：

“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共产党员，他们搞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他说到这里停了好长时间。我不由得联想，我们这里是否也在闹宁错搞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呢？不然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人？

我说：“你那时在做什么？”

马明芳道：“也象你这么大岁数，一九三三年，我在西北，代理特委书记。大约是七月下旬，我们开了个特委扩大会议，记得参加会的有毕维舟、王兆卿、常学贡、崔逢云、马文瑞等人；后来，常学贡叛变了。会上决定扩大武装，建立三个支队，开展游击区，对抗白色恐怖。会后，特委委员和其他同志们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毕维舟等路过镇川堡，晚上住在区委书记崔道明家里。不料，有个特务混进党内，就和一个叫高庆恩的党员住一个院，这个特务探听了党的活动情况和行动踪迹，带着敌军先后逮捕了王守义、高庆恩、毕维舟、王兆卿、崔道明、高禄孝。敌人对他们六人突击审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都没有屈服。后来就用烙铁烙，压杠子，灌辣椒水，跪火铁棍，敌人用尽了酷刑，他们

六人始终坚贞不屈，没透露一点秘密。敌人没有办法，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某日把他们杀害了，他们临死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了河里，河水全被血染红了。他们死得英勇壮烈。以前我很少想起他们，现在蹲了小黑屋，倒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一想起他们，就非常难过，总觉着自己没做好工作，对不起他们。”

马明芳说到这，不禁流出热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象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说道：

“可是我还不如他们死了好呢！他们死得壮烈；我死也不怕，受委屈也不怕，可死了算什么？”

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说道：

“他们受刑是受的国民党的刑，我受的刑算是谁的刑呢！我是叛徒，千刀万剐活该。我不是叛徒，中央也清楚、也早就调查作过结论，马文瑞他们都是知情人，都可作证……”

我心里说：你到哪里去找马文瑞呢！你找到又有什么用，马文瑞他不能自身有保呀！

“那次我没有被敌人抓住，敌人抓走了王兆卿等几个同志以后，又到处抓我、马文瑞和常学恭等。那天我们正在一个姓姜的家里清理文件，敌人偷偷进了村。由于有在门口放哨的姜妈妈报警，我们才逃出村脱了险。我身为特委书记，对六位烈士的死是有责任的，我们防奸不够，又出了叛徒……”

我看着他那长长的胡子、憔悴腊黄的脸和深凹下去的双眼，有气无力地劝慰说：

“你要想开点，你看孔原和荣高棠，不管怎么斗，坚持

活着，而且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留得青山在……只要不是叛徒……”

他象天问，也象自问道：

“可是，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死又活不成，死又不甘心，想不到到头来死活都难啊，还不如战死在沙场呢！”

我想弄个明白，可我越弄越糊涂了。糊涂让问号更鲜明了：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生命吗？马明芳讲的六位先烈所受的刑，他马明芳所受的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国民党整共产党，后者又是谁在整谁呢？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呢？毛主席的话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为什么就不能制止这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痛心的法西斯现象呢？

我不知道这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问号象千斤重，压着一个身为看押连队指导员的沉重的心。

走出马明芳囚室，我不禁想起贺龙的话。

那天贺龙一边看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边象自言自语，又象给哨兵说话：

“不对头啊！这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要是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道理都不懂了吗？命这样革下去，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贺龙的自言自语，也有点象“天问”，问苍天，问大地，问不出答案。

我不由联想到，邓洁被逼得说因出卖共产党有功晋见过日本天皇，那么，马明芳这样被逼下去，可能也会被逼得无中生有地说晋见过希特勒呢？

围绕着邓洁和马明芳受残酷的肉刑，战士刘桂贤和外号小诸葛的宋根利还进行过一场“地下辩论”。

宋根利说：“要是我，我没干，打死也不会说；宁可让他打死也不会自杀！自杀是软弱的表现。”

刘桂贤说：“不见得，我先把你两个耳朵提起来，象邓洁那样，揪成胖蛤蟆一样，你试试，我也象专案组和造反派整邓洁、马明芳一样全面整整你，到那时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你小子要不顺竿爬，我刘桂贤就姓宋。要说自杀是软弱的表现，鲁迅说过：‘你把自杀看得那么轻易？你也自杀一次试试？’你以为驰骋疆场的罗大将就那么轻易跳楼自杀？这不是骨头软硬问题，这是人受不了侮辱。”

宋根利说：“照你这么说，过去在敌人监狱里至死不屈的烈士又怎么解释？”

刘桂贤说：“过去是过去，那是面对国民党日本鬼子、法西斯、死而无憾；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你怎么把国民党法西斯和共产党等同而论？照你这么说，那光荣呢？英明呢？正确呢？伟大呢？政策呢？谁偷吃了？！”

他俩的辩论被我和老连长撞见臭骂一顿打住了，老连长说：“不许放屁！”

我也说：“你们听见了吗，连长说，不许你们放屁，要着了凉快去暖暖肚子！”

是啊，老连长够得上爱兵如子了，这样的“屁”放出来，传出去，再想收回来就难了，在这种年月，想当个反革命、反党、反毛分子，只一句话几个字就绰绰有余了。

两个人挨了骂清醒了一点，每人给老连长敬了个礼跑了。

老连长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对我说："你这指导员，在上课时该重申下纪律了，就是：不许放屁！'不许放屁'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然，咱们俩可对不起这些阶级小兄弟了，他们好登高爬梯，摔着他们可没法交待……"

我说："是啊，我也预感很危险，听说要换咱们连，可后来又听说是换下来整训，再后来又听说咱们甚至整个中央警卫部队不得力。"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听天由命了。

二十四、大胡子夜访海青天

——铁骨铮铮　针锋相对

人世间的事，也象种庄稼一样，要留下真理的种子——李大胡子后来语。

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人民传统赏月的日子，这个节日对于合家团聚的人来说，都要在院里放上小桌，摆满鸭梨、月饼、毛豆角等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看那明亮透澈的皎月，为孩子们讲述着嫦娥奔月的故事，仔细辨认着月里的白兔、纺车……那是十分美好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时刻。但是，如果一家只孤单一人，那种滋味将是淡漠如愁的，试想，身陷囹圄，独囚小屋的特犯们，此时此刻将会是怎样的心情？国家的前途、妻儿的命运，他们自己的生死，都会在中秋之夜一涌而出，折磨着囚徒的心灵。越到节日，越是如此，这是我每到节日所观察到的情景。

我们连连鸭梨都买不起，老连长咬咬牙，一人给买了一块月饼。在周末的伙食委员会议上，他下了这个命令：买1

一人一块，叫大伙都解解馋。其实，月饼的价钱并不算贵，好一点的才七角多钱一斤，差的只有六角钱，一块月饼还不到一角钱。当我拿起这块小月饼馋得张嘴吞吃时，我又象往常逢年过节吃肉时一样，想起了大跃进，那可怕的公共食堂，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这个小院的特犯们，想起了四号那为民请命的呐喊诗……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馋虫一下子飞跑了，那甜甜的月饼就象棉花团儿一样，在我嘴里咽不下去。

此时正是中秋明月的八点整。

我象预感到有什么事似得，急忙抓起突然响起的电话，——啊，我知道了。李大胡子政委通知我，今夜他要来。

他早就说想要来，他果然要来了。

他没有带车，一个人骑自行车来的。

四号透过一扇小窗，正在呆呆地望着遥远的明月。那月亮洁白如洗，叫人恨不能抱在怀里，使劲地亲一亲。

她越洁白，越增加人的愁怅。

我说："我们政委来了。"我非常激动，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满足了一个人的愿望，我感到是一件既可怕又十分荣幸的事。我对照看过的革命历史小说，悠然生出一股斯如"地下党"的滋味儿。

四号回过头来，打量着李大胡子说：

"啊，好象见过一面。你就是小刘说的那个李大胡子吧？"

不错，一九六六年底接他来的那一天，他们见过一面，他的记忆还是很好的。李大胡子笔直地站着，规规矩矩地敬个礼，说道：

“是的，老总，你受苦了，我们没尽到责任。”他说时眼里已经含满了泪花。

为了他们能安心地谈谈，我要退出，李大胡子示意我不要走。

四号坐下来，示意李大胡子也坐下，说道：

“我都知道，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自从卫戍区王金岑参谋给我谈过以后，我天天在看，天天在闻味儿。他们象狗一样闻着，我也象狗一样闻着。我都清楚。你们师的崔满仓参谋和这个连的大个子，为保护我，都挨过打。”

他指的大个子就是战士翟民山——那个结果了发汗片一家性命的罪犯加英雄。

李大胡子语意双关地说：

“现在还是大好形势，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好，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很普遍，很深刻，真正触及了人们的灵魂，看来形势会越来越好！老总是否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没什么准备，要说准备，早就准备着，能活下去做个草民。我也想给你说说，其中包括感谢你们。其实，我也是多余，任何最高级的特级的绝密也难永远封闭在历史的保险柜。这个真理，是掩耳盗铃的，人永远不会接受的。”

他好象要急于说话，似乎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张口了。

“我要告诉你的是，第一件，庐山会议早已确定的统一了的反左，是经过全党上下调查研究，全党和老百姓的呼声产生的。我写的那个个人意见，成了意见书，称为突然袭击。因此，不顾全党人心背向，一下子转到了反右，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毛、里通外国等等；我想告诉你的第二点

是，一致呼声的反左，一下子成了占绝对优势的反右，这说明，许多人是因为种种原因违心的。澄清这个历史，揭穿这个本质，不知何年何月。我给战士们、给人民留下一大堆问号，是我的罪孽，也是一切责任者的罪孽。”

李大胡子试探地问：

“我们全党有一千多万党员，高级领导党员干部数以百计，扩大批判会就更多了，难道，经过战火锻炼的英雄和大无畏的马列主义者们，都成了懦夫？”

“不然！”四号断然说道：

“风向不等于真理和规律。否则的话就没必要有黑风恶浪、逆风逆流这个政治名词了。而且，这种斗争也有讲手段的，有看时机条件的，有不愿意在先反左后反右、实际应反左的斗争中，再作反左的牺牲品的。当然，还有舍车保帅的，有以人体作人梯的，象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之流就是。他们要投其所好，他们要借机捞政治资本，他们要借我的血和全党全国人民的血，染他们的红顶子，这也是陈毅说过的话。吸血染顶子，拿别人作官梯，历史就有。”

他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浑身的血在沸腾。此时，如果条件允许，我会大喊一声，拼上一死。

“并不象你想的那样，都是懦夫。”他接着说，“有许多不可抑制的人跃跃欲试，结果比我还惨，先于我消声灭迹了。想起他们，我的全部肋条都被他们打断也是无所谓的！他们不就是才给我打断了三根嘛！我相信人民和历史迟早会算帐的。不然，我们到九泉之下，也愧见万毅、钟伟这些将帅们！”

哨兵啐了口痰，接着听到了敲门声。

此时，炊事班长郑有田进来了，手里托着两块小月饼，一块递给四号，一块递给李大胡子，然后，看看我无言地走了。

我想，这稀有的月饼一定是他偷偷藏起来的。

郑有田的母亲已从山西接回到河南，这是四号关照的结果，他对四号更有深一层的感情。

郑有田走后，四号问道：

"他的母亲怎么样了？"

我说："按你的意思，已经回到河南了。他很孝顺，省吃俭用，每天刷牙都不用牙膏，把每月的几块钱津贴都给他母亲邮去了。"

我想让李大胡子多给我们干部战士拨点家庭生活困难补助费，乘机如实说道：

"李政委，他们家生活太困难，至今，我们俩还合用他替我买的刮脸刀，那是一元八角买的（为了留作纪念，他为我买的这个刮脸刀盒，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写字台里）。我们连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多，因为河南、河北籍的多。"

李政委斜着黄眼珠子，和蔼地说：

"以后再说吧。"

四号象个失去生活着落的老农夫，听着我俩对话，只是低头默默无语。月饼已经在他手里捏得粉碎了。

看着他的情形，我的心里再一次跳动着要崩断的心弦——这主义那主义，只有吃饱吃好才是好主义！

是呀，我禁不住又在暗想：一个做父母的，看着自己的子女总是挨饿受冻，就那么心安理得、逍遥自在吗？那是父母吗？！还配做父母吗？！我小时候因家里很穷差点被送

人，也讨过饭，我的父母没有那种“不吃嗟来之食”的风骨，他们养不活我，就想让我去逃活命，没有把我拴在自家的木桩子上等死。

四号手里的月饼全成了粉末，从他的手缝落到了地上。他象一尊石雕。

大胡子的上下眼脸直往一块挤，一种隐隐作痛的表情。

三个人好长时间彼此默默地凝视着。

我忽然忍不住心里苦笑了：这三个大大小小的人物，此时间不又是三人裴多菲俱乐部了吗，而且在四号囚室！

我想打破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说：

“左呀右呀，反了几十年，在我们河北老家叫‘窝里反’这窝里反是不是我们党的一大土特产？”

“这特产土洋结合。”四号把一把月饼渣放到桌子上又说：

“有从老大哥那里学来的，有创造，有发明，有发展，有前进，象这文革摇煤球、坐飞机、剪头发、挂铁板、挂破鞋，等等群众专政，不是创造性的发展了斗争的学说吗，希特勒、狗特勒们都望尘不及。”

“老大哥”指的是苏联约瑟夫、斯大林，我想无疑。

“左这个东西象个幽灵，紧紧依附在共产党的肌体上。”我大胆地插话说，“我在独立营时，三连三排长因为晚上连续开批彭会太疲劳，会上几次打呼噜，也差点混个右派。当时我们李政委是独立营政委，设法保他，对上边的‘督战官’坚持说，他白天训练，又来了新婚媳妇，太疲劳。政委说，年轻人，贪色过度。这才帮他混过了政治关。”

不知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又都陷入到无言地沉默中。

我非常痛恨左，因为我看到许多人悲惨地做了左的牺牲品。有些地区，有些人左得发了疯，右得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我们李大胡子政委多年来也受尽了左的折磨，虽然他还穿着军衣。

老政委终于眨眨黄眼睛，说道：

“左这个东西真是害人害己害革命害国家。我十二岁参加八路军……”接着，他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在十三岁那年的三伏天，我随文工队到部队演出，不料和一小队日本鬼子在村口遭遇。我们退到了一家大院，被逼在北房内。保护我们的一个警卫班全牺牲了。日本鬼子把大院团团围住，大门口、院墙上都架上了机枪。我们文工队长和指导员各有一颗手榴弹，此外，再也没有一件武器。小鬼子通过汉奸不断喊话，叫我们投降，文工队十四个人集体研究决定冲出去。突击的办法只能是同时扔出手榴弹，乘爆炸冒烟之际跳墙逃跑。我们的队长吕大姐是个女同志，也只有二十五岁，她叫我拽紧她的衣服跟她跑。当两颗手榴弹爆炸之际，我们呐喊着往外冲。

但是没有一个人活着跑出院外的。我跟吕大姐跑到东南墙角厕所时，她已经身中数弹，倒地牺牲了。十三岁的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我掀开了茅厕坑的两块砖，仗着人小体瘦，钻进茅坑里，又把两块砖原封盖好，把一个掏粪的瓢扣在头上。我就这样一直从午间蹲到午后三点多，直到敌人全部撤去。我被乡亲们从茅坑中救出来，但浑身已被蛆咬遍，有些蛆已经打了洞，在肉里蠕动着，我昏迷了。醒来看到老奶奶大娘们还在用筷子、柴火棍儿为我挑捡身上的蛆虫。

回到部队，我跪在师长面前哭诉，我要吕大姐。师长把我抱起来，热泪同时流下来。但是，从此，我成了怕死鬼，几次审查，多次政治运动，说我一个堂堂八路军钻茅坑，把中国人和八路军的脸丢尽了……”

我们政委打仗勇敢得很，后来在战斗中拼刺刀，挑死了好几个日本鬼子。他那时才十三岁，不钻坑，难道等死？活下来接着打鬼子不是很好吗！我禁不住问道：

“老总，你说，左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呢，许多人都痛恨吃了左的亏，可左为啥老有市场？”

四号点燃一只烟慢慢地吸着，平静地说道：

“从本质上说有三点，一个是有私心有野心，要保官要升官，要投其所好，象庐山会议康、林们就是；一个是无知，乱搞唯心论，实质和封建迷信一样。还有一个是有些人历来坚持宁负万人，不负一人；宁负百姓不负朝廷；宁负下级不负上级。因为百姓和下级既不能提他升官，也不能罢他官。

人人自危，则必看风使舵。‘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不过是一句形象词、口号。

历朝列代，皇帝出游，人们见过上百个皇帝，历史记载有谁敢当场跳出来去把皇帝从马上拉下来！你拉拉试试？真正有的，我倒是见了两个，他们比我彭德怀要光明、磊落、无畏得多，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伟人。我不是可敬的，我是可悲的，可鄙的，我在真理面前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的幻想太多，我在扮演悲剧角色中又不自愿地欠了人民一笔帐……”

四号的话我有的听明白了，有的听不明白，有的听着很

吃力。我想，他讲的“在扮演悲剧角色中又情不自愿地欠下了人民一笔帐”，大概是指他被逼违心地多次检讨，为自己扣帽子吧？他为什么如此，他说过，他为党的声誉，为毛泽东！为中国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地位，一句话：为了谬误要牺牲真理，这无疑象吞钢针，他吞了。他不是气功大师！其实，这帽子不是他自己要扣，是人家准备好了，叫他自己往自己头上扣的，扣也得扣，不扣也得扣。

李大胡子也点上了一只烟，我也点上了一只，三个人一颗接一颗，把个小屋抽得雾气腾腾的。

老连长进屋转了一圈，说了声“政委来了”，便敬个礼退出去。他在为我们观风。

李政委说：

“老总，你说有两个人比你光明磊落，是真正的伟人，他们是谁啊？”

“就是钟伟和万毅！当然还有许多人，反正是有正义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有好罪受。”

他开始激动了，失去了刚才的平静，大概是记忆又把他推到了暴怒地状态，他几乎是狠狠地一字一字地述说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下山来继续召开扩大会，批彭、黄、张、周，因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嘛！但那个日子叫我悲愤中受到了教育，受到激励，我死而无憾，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八月二十二日。会议是小组分头揭发批判。

我和黄克诚是重点，因此，总参与中办为一个小组，组长是中央候补委员、总后装备部长万毅同志。

万毅是东北行武出身的一个中将，为人正直。他这个

组长不好当，因为开了三天会没人发言揭发批判。生不好交待。

他说，既然都不发言，那我们就再拿出彭德怀的意见书'示众'再学习讨论，看他的意见究竟错在哪，是不是右倾反党。我们党的政策就是有错必纠知错必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听了万毅的话，大家对照意见书联系实际，发言热烈，有人特别提到了机关组织干部到天津市新立村参观亩产万斤水稻，实际是把快熟的十二亩地的稻子栽到一块，上有'太阳灯'（即灯泡），下有吹风机、木架。这样的稻田全国种得起嘛？有条件吗，弄虚作假都弄疯了！还有人例举参观安国县农村公共食堂，结果看到的是人们吃红薯叶、棉花籽、稀汤粥，人都快饿疯饿倒饿死了，还谈什么卫星上天，人民公社就是好，一大二公好得不得了！

万毅最后说：'大家例举的事实是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吗，是一个指头吗？这是否是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得热泪盈眶。'我万毅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净做好梦，头脑发昏，全然不顾老百姓受苦受罪。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儿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吧！我宣布，赞成彭总意见的举手！

人们都举起了手，庄严肃目，象入党宣誓一样。

'看来没什么可批的，全组通过。我作为组长，集中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各自分头去学。'万毅自觉真理在手，事实明摆着，毅然宣布。

有老战友十分担心地说：'老万呐，这可不得了哇，要招来麻烦的。'万毅气愤地说：'他们才是找麻烦呢，一

封正当的信成了反党意见书，岂有此理！我万毅打了一辈子仗，心象枪筒子一样，只知道直来直去。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披着别的皮的党！’

事实正象好心人的规劝，万毅虽有共产党人的正直良心，却是鸡蛋打石头。会后他便作为彭的‘狗腿子’被押起来。几乎是同时，洪学智、邓华等都被勒令检查点名批判，‘跳出’一个擒一个，看你们那个还敢跳。

彭德怀说到这里停下来，喘着大气，抽着烟。

李大胡子的烟蒂烧着了手指，随手扔在地上，使劲踩了一脚。

“一九五九年那时候，我是独立营政委，还没资格听到详细的内部文件，只知道传达说，有个万毅跳出来，还有个将军当场被铐起来。党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叫什么事！”

“钟伟是被当场铐起来的，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铐他的保卫人员，我真象刀子扎心一样，恨不能一头撞死在‘金鸾殿’上。”

李大胡子说：

“煮豆烧豆萁，相煎实太急！何至于当场铐起来呢！”

四号继续说道：

“这就叫你死我活，小组批判会与上头事与愿违，遂改为大会揭发批判。康、陈这些带毒的儒子和政治投机者们，开始带头号召，胡说八道，无中生有，造谣鬼话一个接一个。我不得不反击说：我看你是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是投机分子！你呀，谨慎点吧，防止哪一天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后来事实证明，彭大将军所断一点儿不差）。那

个号称老夫子的陈伯达，又抛出捏造的'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和组织成员名单，并一而再地逼我说出其它成员名单。我无法忍受虾狗之欺，拍着桌子说："开除我党籍吧！枪毙我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来报名，还有谁？！快上来呀！！！

这时，吴胖子双手抱着麦克风说：'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杀害了一位连长！'

这时候，林彪阴阳怪气地接上火说：'他恨不得一下子吃掉一军团，统统杀尽，因为一军团是英明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

他们说的那个连长，是个临阵脱逃的叛逆，而且还要拉走战士，被捉住后，按战场军纪由钟伟下令枪毙了。现在说我有意想统统杀尽一军团，这就惹恼了一个人，他就是钟伟。

钟伟是北京军区的参谋长，听了林、吴的血口胡言，在台下大声斥责说：'胡说！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在！彭总根本不知道。这种战场上逃跑反水者，就是交给你林总，你也会枪毙他的！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嫁祸于人！居心何在？'

钟伟是犯死罪的忠臣死谏，铮铮铁骨，誓死如归。他又大喊一声：'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鹬蚌相争，鱼人得利！'

将军沙哑着嗓子几乎是呐喊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把我枪毙吧！'

钟伟讲话后不到几分钟，我看到两名持枪卫兵冲进会

场，'咔嚓'一声给钟将军戴上了手铐，架出会场。他走出很远，我听到他还在大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泪水在我眼里滚，刀子在我心中扎。他为我，不！他是为全党和全国的老百姓鸣冤叫屈，拼死呐喊！

彭大将军说到这里，长长地喘了一口大气，继续说道：

此时此刻，我不能再说什么。我不是怕死，我已经历经多少个死。我再说什么，无疑只会加重他的'罪恶'。

钟伟，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才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我们都能象万毅、钟伟那样，我们人民就不会挨饿受苦了！

李大胡子为四号倒上一杯水说：

"老总，你歇会儿再说吧。我记住了这段历史真象。你不要太难过，你在我们的心目中，什么时候也是我们的老总。"

四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缓慢地说：

"我不难过，我不痛苦。有些人会比我更难过更痛苦，因为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整害过不少人，然后，象陈毅说的，时候一到，该轮到他们自己了。我只有被欺的痛苦，而不会象他们那样有欺人的痛苦。"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早就移开了小窗。

我提醒李大胡子政委说：

"政委，时候不早了。"

…………

二十五、宴 请 陈 青

——特监里有一个包龙头

战士崔广才骂司务长陈青是负心郎、陈士美，事出有因。陈青和爱人小宋闹离婚二年，战士们常开玩笑说："走资派还在走，陈青离婚还在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青一边说没感情闹离婚，一边叫爱人揣上了大肚子。

法律也说不清楚夫妻的性生活算不算感情！

俗话说：冷不在三九，热不在三伏。真正最热最难耐的却往往是三伏前夕。

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上旬，北京的太阳火暴的灼热头皮。就在入伏前夕，陈青的爱人揣着大肚子来队了。

晚上，陈青除给爱人放一张床外，自己又加了一张床。老连长管东春知道他闹离婚闹得正凶，听说夫妻各睡一床，把陈青叫到连部，骂道：

"混蛋小子，既是夫妻，睡两个床干什么？又不是牲

口，一头拴一个桩！”

陈青对闹离婚避而不谈，只强调说：“她怀孕了。不拴两个桩不行。”

老连长说：“怀孕不怀孕也得睡一个床，妈的，撤下去一个！”

陈青不敢违抗连长的命令，叫炊事员王连山帮助撤走了一个床。但是连续几天不和爱人说话。

小宋怀揣六甲，千里迢迢，从苗乡来到京城，一来要看爱人，二来打算多住几月，在京城生孩子，以便更安全。陈青却连续几夜视如恶仇，不予理睬。

终于有一天半夜里，两人从文斗到武斗打了场恶战，陈青的脖子、脸颊被小宋挠出了一道道血印；小宋被陈青打得鼻青眼肿。

小宋一边哭嚎一边数落着：

“陈青啊陈青，你这负心郎，狠心贼，陈士美！谈恋爱的时候，你甜言蜜语，恨不得舔我脚指头。你还叫我听你心跳声，你说你激动得幸福得心都要跳得象打雷，你说你海枯石烂不变心，你说你要变心就不得好死……呜……呜……可这会儿，你的心变了，凉了，死了，烂了，臭了！你这个陈士美呀，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我呀……呜……呜……你这个不要脸的马郎客呀……”（苗族男子出走游乡寻偶，叫马郎客。）

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的道德是不容忽视的，战士们对陈青闹离婚很气愤，自然是议论纷纷，这个说她是当了官忘了本，那个说他是喜新厌旧看上城里的漂亮姐，有的说得更难听：“好看的东西不一定好吃，好吃的东西不一定好看；

好看的花兴许有毒，不美的花才结出好果。现在所以陈世美多，是因为黑老包少了，甚至黑老包也变成陈老包了！”

由于战士们议论很多，连不少特犯也知道了那个小白脸陈司务长在闹离婚。

特犯们对连队的事情一般都不闻不问，也不敢闻问。只有一人，却常常过问连队的一些普通事情，他就是四号囚室的彭大将军。

彭德怀对司务长陈青印象较深，这是因为陈青经常帮助炊事班和值班员为特犯打饭，并且，他和其他干部战士一样，对彭老总极为尊重，尽心照顾，还亲自为彭老总跑到永定路商场买“熊猫”香烟。有一段时间，永定路商场的“熊猫”香烟脱销，他就骑车子跑了半个北京城，最后在东安市场买到了“熊猫”。彭总的皮炎屡次犯病，他和卫生员孙立达又多方寻找偏方。

彭老总得知陈青闹离婚时，曾问我，小陈究竟为什么闹离婚，帮助做了工作没有？我说：“做了，做了多次，做不通，这小子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他自己也这么说。”

彭德怀不相信，“一个小穷娃子吃了饱饭，穿了军装，当了小官，要做陈世美”。他特意叫我把陈青找来，要和他聊聊。

把陈青叫到四号囚室，我便离开了，我想我不在场，彭老总更便于和他谈话。

第二天，陈青耷拉着脑袋，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指导员，我对不起你，你那么苦口婆心我没回头，这回我服了，我撤回离婚申请书……”

我不解地问："你服了什么是服彭老总吗？"

"我服了彭老总的道理，我不离了。"

我说："不光是道理吧？道理我讲了多少遍，难道我讲的道理都不沾边吗？"

陈青摇摇头内疚地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彭老总的话不能不听……"

我故意逗他说：

"不是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吗，那么，正遭批斗的彭德怀的话，可能是一句顶九千九百九十九句了？"

"不！不！"陈青有点着急了，"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四号说的意思叫人掀肠翻肚。他的话不能不听。"

我有点怀疑，我和老连长做了那么多工作，毫无效果，彭德怀和他谈了一次话，他马上就变了？我说：

"陈青，彭老总怎么和你谈的？"陈青颇动感情地说：

"彭总的话我真的不能不听，他说：

'有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亦悲。我不论政治上，还是身体上，都要死亡了，一个即将死亡的人，能不对人说坦诚话吗？'

彭老总深情地象慈父一样看着我说，感情这东西，除了先天的，主要是人为的，象猴皮筋。一有第三者，一有喜新厌旧思想，必然地要出现感情破裂，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个公式：喜新厌旧等于感情破裂，感情破裂等于符合婚姻自由法，就可以离婚。实际上这是一个少有积极因素，多有消极因素的可鄙的公式，解放以后，土八路当上了各级的官，有不少人就这样抛掉了患难之妻，这是有些人变化的开始。我也有前妻，但战火纷飞的，多少年找不到她的下落才又找的

浦安修。李自成的将相何止抛，甚至抛掉后再抢人妻，结果坐了几个月土皇上就完了。所以主席引用李闯王的事很多，七届二中全会还告诫全党要防止糖衣炮弹。我听说，你曾说，在糖衣炮弹面前，我把糖皮扒吃喽，我把炸弹扔喽。哪有那么便宜事？毒药往往是和蜜掺在一块的，不然怎么会上勾？”

我说：“你就服了？”

陈青说：“彭总还说：‘假如你现在不是个军官，你还在要饭，你会闹离婚吗？假如说，你因为什么关进了监狱，你还闹离婚吗？事物没那么平衡的，你条件高了就看不起低的了。你要作了团长、师长、军长、总参谋长，那得升一次离一次？”

陈青停顿一下，继续说道：

“彭总还说，你们可能都知道了，我是和浦安修离了，可这是为她，我不能再没完没了地连累她受不堪忍受的待遇。而且当时学校也动员逼迫她离，我们俩离开的时候，她一边为我整理衣服、用具，一边泪流不止。

彭总还问我，她作贼了吗？我说，没有；那她养汉了吗？我说，没有。是父母包办的吗？我说，不是。那她虐待公婆子女吗？我说，没有。彭总说，是呀，她一没作贼，二没养汉，三不是父母包办，四没虐待公婆子女，你闹离婚不是喜新厌旧又是什么呢？老包铡陈士美，你说，在封建王朝，仅仅是因为千岁爷杀了人吗？不是，他杀几个人不会铡他的，老包所以铡他，从根本上说，是在铡邪恶，要记住：糟糠之妻不下堂啊！”

陈青说到这里，象个小绵羊一样，小白脸红成了紫萝

卜，请求说："指导员，给我撤回离婚申请书吧，我陈青再闹离婚不是人。"说罢，把半壁店大本营驻地附近亮甲店菜店的女售货员的照片，还有一封什么"情书"递给我。

我看那女人的照片，倒有几分姿色，但美中也确实溢露着水性杨花之气，而且脸圆得象用圆规划的，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个祸害。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赶忙给李大胡子政委去打电话，因为我已经写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建议说：陈青喜新厌旧不回头，建议上级给他个处分，叫他复员，打回老家算了。

我这个报告可不是轻易写的，这是我和陈青作了一次激烈的辩斗之后决定的。要不是彭总，我这个指导员算是失败了。因为我作为连队政治工作核心人物，连个负心郎也拉不回来。

政委李大胡子没有放过我，说我为什么这么轻率，为什么变得这么快，我的思想工作究竟是怎么做的，真正做了没有。

我只好写下了彭总和陈青谈话情况和下边这份宴请陈士美的详细报告，以便换回那份处分陈青的报告。

在我和老连长多次做工作无效之后，我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我这个指导员比别人更恨喜新厌旧的负心郎，因为我的姐姐早已深受负心郎之苦。我在一九六四年因公携枪出差，专门在那个可恶的负心郎单位门口潜待三天，我要枪毙他，当然是我的脑瓜子发热，发热的脑袋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法律值个屁！法律不但是人定的，而且是人掌握使用的，在不同人的手里，它也象个猴皮筋。由于那种法律纵容了一个人而害了一大片人。所以我对法无望才要枪毙他，至

于枪毙后，我怎么办，一句话，没想那么多。然而我一再延长出差期，却没有等到他。

法律没有制裁他，我也没有制裁他，后娶的小老婆却把他治得死去活来。我和我的姐姐、我的外甥男女、我的母亲等等，这时倒非常感谢先前这个小狐狸精了，是她倒给正义出了口气。真是可叹可恨、可鄙可笑，什么也离不开迟早地轮回报应，这大概是大规律。

就是因为这，我比谁都希望把陈青拉回头。陈青除了喜新厌旧闹离婚，他在别的方面还是个好同志。

星期日上午，处理完一切杂务之后，我来到陈青的办公室。

我走路是轻快的，尤其是穿胶鞋，又快又无声音。到了司务长办公室，见他正倚在床被上，欣赏着一个女人的照片，正象一个收藏家发现了一件酷爱的老古董那么精心会神。以至我进屋他都没发现。我咳嗽一声，陈青一愣，忙把照片装进口袋。

我知道他看的是菜店那个售货员的照片。

我压住气不冷不热说：

"陈青同志！人家是毛主席著作随身带，有空读起来；你是老婆的照片随身带，有空看起来，你老婆就在这嘛，抱着她好好去看就是了，何必再看照片呢？大活人不比照片更清晰更可亲更生动？"

陈青红着脸说："指导员看你说的，你老是用写小说的语言。这是我老婆婚前的照片。我真不知道，她越长越stupid估，一比变成了老太婆。"

陈青和我年龄一样大，但结婚已八年，我还没结婚他就

连揣着的带生下的一共三个小孩了。他工资五十二元，比我少十八元。但无论多少，他却不给老婆钱，有人说他把钱给了亮甲店菜店小狐仙王扁扁。

我说："陈青，咱们常年累个臭死，一点娱乐也没有，今天没事，咱们到永定路大饭店我请客。"

陈青疑惑地说："这……指导员请什么客呢，再说你也不富裕。你不就是比我多十八块钱吗？

我说："你办了几件好事我高兴，比方说，千方百计改善伙食，给老家伙们要蚊帐，给他们寻药治病，还到西直门火车站买来了便宜米，等等吧。这不是为连队做了许多好事嘛。我应该请客。"

永定路商场有一家唯一的大饭店，所谓大饭店，不过是一大间大平房，内有近二十张大方桌，小木凳象 剃头 的 凳子，四脚八叉着。两个年轻的，应该说，也都是比较英俊的年轻小军官，一进饭店，挺引人注目。因为平日当兵的到饭店吃饭很罕见。许多人似乎用好奇地眼光看我们，至于年轻女子的目光，我自我感觉也许她们还掺杂别的因素。她们的眼睛总是动情的，闪着说不出来的光。

头一次进饭店嘛不好意思，我俩像个小偷一样，急忙找个角落坐下来。

我要了四个菜，一个汤，两瓶啤酒，一瓶 青 白 干。总共才花了三块多钱，一个木须肉，满满一大盘才四角钱。如此便宜的饭，我却觉得很贵。我知道一个农家一年也没有这么几块零花钱。

陈青比我能喝，一瓶白酒喝到一半，这才想起还有一样东西，急忙从书包里掏出来他的茴杯。

陈青说："用苗杯共饮，像征友谊、信任，这是我们苗族传统。"说着把两个苗杯斟满酒。

苗杯有一尺长，雕着花，两端各有连木杯碗，约盛二、三两酒。这种杯因为一木连结，必须同举同饮，否则会洒掉。

陈青站起来，叫我举杯同饮。

我说："陈青慢着，既然是友谊和信任的像征，那咱们先谈谈，符合就共饮，不符合就各喝各的，扯淡。"

陈青用另一个杯子，自已先喝了一杯，又坐下来。

苗杯里的酒，透明透明的，映照着我们俩拉长的脸。我们俩个彼此先不说，谁也清楚来干什么。惹得饭店里酒家肉客不时投来难以捉摸的目光，有的人还一手举着筷子，一边捻捻点点小声议论着，甚至隐约听到有人说："这两个大头兵……。"

我的火又旺了。我说：

"陈青，酒席宴上无虚言。你小子她妈的说实话，你承认不承认喜新厌旧变了心。"

"没有，没有。"陈青夹口菜装得很平静。"我俩却实没感情了。"

"没感情？既是没感情，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大肚子是怎么来的，是别人的？"

陈青耍懒说："她和咱们师部电影队长张建明同志一样，把腰带给她邮回家她也能生出一个，繁殖力强，一窝一窝的，这是中国穷人的特点。"

我忍着气说：

"陈青同志，你怎么这样说话，她是母猪，那你必是公

猪！公猪难道就比母猪高贵吗？”

他似乎有点醉意了，小白脸喝得煞黄，越喝越黄，而不是越喝越红，这是能喝酒的人一大特点。

“我说实话吧，”陈青有点摇头晃脑说，“我见她就恶心，八字眉、罗圈腿，黑不溜秋，小瘪嘴，一对奶子象两个大鞋底，哪象人家生机勃勃，突突有声。”

他的话越来越不象话，我不禁一扔筷子说：

“人不能永葆青春，这正说明她整日劳作，风雨辛苦。叫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有了孩子，就是感情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青很不以为然：

“那猪一窝一窝的生，也有感情？麻雀一连生几窝，也有感情？也有交情？”

“猪和麻雀也有感情，只不过是个低级、高级程度的问题；何况你不是猪吗？你是人！”

我从注目而视的人群中发现，我的声音太大太激动了，吃客们以为两个大头兵在“打仗”。

“你喜新厌旧，还要辱侮人！亮甲店那个卖菜的小狐仙迷上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连她的名字都知道，她叫王扁扁，你大晚上在菜堆里干的好事，要不是我心软，早他妈的把你打回老家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三团有个战士因为多看了看大美人画报，就责令他在班务会上检讨几次，说他是资产阶级坏思想？你忘了那首童谣吗：大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坏思想。连穿皮鞋都被指责是资产阶级坏思想，更何况……”

陈青倒安静，用乞求的口吻说：

“指导员，说实在的，我爱上了她，她是党员，菜店经理，她看我好，我看她好。她说，复员转业逃荒要饭也喜欢我跟着我，所以，所以……”

“党员？经理？”我几乎要啐他一口，“可我听说她是光靠着卖屁股入的党，作的官！”

陈青不以为然：“那是谣传。所以，我早就在菜堆里色胆包天，突破了她四道防线，可是，我对天发誓，第五道我没有。”

我有些糊涂，“没打仗，出来什么防线？”

陈青说：“你连这都不知道。第一道，一块看电影，第二道一块压马路手拉手，第三道就是……就是……亲亲嘴……总之是百依百顺……。”

“怪不得你不给老婆邮钱！怪不得老连长说你是狗的屁股邪门。陈青！你好危险，当今之下，这个左可是全面开花。许多贡献卓著的英雄将才，就是因为搞个臭女人，就一败涂地，一落千丈，一辈子背个臭黑锅了。结果那些勾勾引引的女人没事。倒霉的都是男人！”

“反正她爱我，我爱她，死也爱。”陈青又喝了一杯。”

“一个大闺女嫁给了你给你生了孩子，操持家务，侍候公婆，养儿育女。我听说当年是你当马郎客，住人家寨口，是你点燃了人家感情的火焰，现在你因为一个狐狸精，又要一盆冷水泼灭这爱情之火，你的良心何在？”

我举起了茵杯命令地说：

“来！咱们共同举杯，发誓，再也不要闹离婚了。”

陈青把脑袋摇得象安上了电，高频率地摇个不停：

“要发，你发，这誓我不发。”

我气急了：“我给你处分！”

“处分也不发！”

“我叫你复员转业，看你小子去离！”

“复员转业也不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你真是王八吃称砣！”咚地一声我把他的茴杯扔在了地上，茴杯哐哐哨哨打了几个滚，滚到了旁边一个桌子底下，砸着了一个女人的脚，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那个桌上吃饭的一个老先生把茴杯拾起来，放在老花眼镜前，端祥着，“这是勺子吗！啊……不像……”

饭店的人几乎都站起来了，有的人甚至前来劝架，有的人讥讽说：“还是解放军呢，喝个烂醉在这打起来了……”

我早忘了我是指导员，气冲牛斗的离开饭店，骑上自行车，回到连队。

不过半个小时，永定路饭店来了电话。

原来我们还未交款，司务长又没带钱，人家以为我俩在耍把戏，合计好先溜走一个，过后再溜走一个，吃饭不给钱。有的人说得很难听，说这两个解放军人模狗样的，长的挺漂亮，可心不干净。

餐馆的人把陈青围个水泄不通，你一言我一语。他的解释没有一个人信。在文革中，属于反军派的又抓住了发泄的机会，闹得陈青好苦。直至我派通信员单石头送去饭费，这场风波才算告结。

这一气不要紧，我当时就写了叫陈青复员的报告。我也铁了心。

想不到彭德怀和陈青谈了一次话，居然使他心悦回心转

意了。

我也更没想到过了半年，师政治部又通知我写个典型材料，叫我在纪念毛主席发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庆祝会上介绍防止糖弹，做好思想工作的经验。

我心里苦笑了。我特意到四号彭德怀囚室，对他说：

“老总要不是你在囚室，这次你可以当个先进典型了……”

他也苦笑了，淡淡地说道：

“我过去就是好急躁，爱骂街，吃了大亏，撞了大墙。事情都有它的规律，人难凭主观扭转。小陈讲的所谓感情问题其实是个观念问题，比方说，一个很丑的人可以和一个很漂亮的人结合，而且结合的不错，他们之间的各方面条件悬殊很大，这不是观念问题吗？你说好他说坏，你说丑他说美，同样的事就不好统一，谁有谁的追求，也可以在追求中找知音。革命也是追求，追求到了一块。这样的例子自古到今很多，以前我就遇到过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确很漂亮，她比浦安修要漂亮的多。战争时候，我那时也没功夫，没条件找伴，人家找上我了，我却骂了她一顿，不和她搞，这要说感情就是感情问题了；其实，这也出自观念，首先我看她不行，不能要。可我太过分了，我骂了人家。”

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道：

“也不知道浦安修怎么样了。”

他还在惦记着一位被迫分离的老妻。

我想，只此一点，也足以教育陈青之辈了。

二十六、班禅挥泪表心迹

特别监狱里的囚徒，不论职位多高，官有多大，名声有多么响，除极少数以外，一般地都很规矩，绝不敢乱说乱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刚刚投进特别监狱的元老们，对于"监规"都不敢有丝毫的违犯。就连夜间睡觉，也要按规定在灯光照耀下面朝外躺着。他们的"情形"，和我从《红岩》小说中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

他们所以那样俯首听命，是因为早已经领教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具有创造性的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儿。此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内幕原因。

第一，每个人都在暗暗地企盼风雨必过，相信绝对没有老阴的天，老下不完的雨。因此，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他们象失足跌落到深渊但抓住了一根山藤，抱着必胜的信心，拼死坚持等待救援。可以说，凡是没有自杀的，都在象老和尚念经一样，心里千百遍地重复着一个信念。这是他们生命的所在。正如十号囚室荣高棠所说：留驻青山不怕老。

第二，他们到了特别监狱，通过和战士一起生活、偶然的交谈、现象地观察，完全确信人心背向的分析是正确的。因而忍辱忍苦在所不辞。

第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多次直接受到周总理和卫戍区、中央警卫部队的保护，而且，在临近投入特别监狱之前，有些人还当面或间接地得到周总理的坦诚相告或者暗示：把你放在那里去，就是为了保护，为了躲避他们，风大，那里可作个“避风港”——也正因为他们在“避风港”里，抓不到他们，周总理和傅司令多次被江青一伙追逼指责。所以，在当时他们关注总理安危甚至胜过关心他们自己。

因此，他们在特监小院，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心里有数，万般皆可忍。这正如司务长陈青给身高体长的班禅额尔德尼加长了床板后，班禅感动地道出的真情是一样的。

那天，班禅看着陈青为他加修床板，左手无名指被碰破了，急忙跑过去，寻问伤重不重。

班禅发誓似地说：

“无论我死了，还是活了，都是忘不了咱们总理的，也忘不了你们，我有许多话要说……”

班禅说着，早已泪流满面。这使陈青有些吃惊，因为班禅五大三粗，红光满面，从来是一种阳刚壮气，进了特监后，很少愁眉苦脸。

陈青说：“老班，我虽然是个小小伙头军、司务长，你有什么话尽管说，一但有机会，我会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也得把你的心情转告咱们总理。你放心吧！”

班禅用蒲扇似的大手擦着泪说道：

“前年八月底（即一九六六年八月），有一天，中央民

族学院的部分红卫兵跳墙进了我的院子，闯进了我的住处，指责、谩骂、私设公堂，人格上、肉体上对我折磨，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我推荐送来的民族学生呢，整得我要死。总理知道后，叫你们卫戍区把我转到了这里。当时有一位年轻军官和我谈话还称我'首长'，说：'是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决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所以请首长委屈点，现在只能把您秘密藏在这里，暂时不能回家，不能和你父母、兄弟见面，也不能和外边人接触，要是走漏风声，叫红卫兵知道了，前来冲击，万一出了事，我们失职，不好向首长、向总理交待。'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哭了，我从青海灵童到布达拉宫，还没哭过呢。总理真是咱们的好总理，他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

陈青被大活佛说得也有些鼻子发酸，眼睛发湿，但不敢陪他流泪，只是半转话题说道：

"你原是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后来当了大活佛对不？"

班禅说："是，我小时候也不知为什么。"

"你说的年轻军官，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他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他的职责，他不要我什么日后报答。我以前对你们当兵的感情不深，这次以后，可大不一样了。你们的心都是纯正的、可爱的、可敬的。"

陈青说：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告诉你说吧老班，那个年轻军官叫王金岑，他是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作战处的参谋。在保护你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位是我们师司令部作战科的作训参谋崔满仓同志，为保护你们，他们两个当了周总理和傅司

令的联络员。而我们师的崔满仓，是王金岑参谋的助手，这家伙是河北人，敢做敢当，王金岑是南方人，办事认真，干净利索。”

班禅若有所思地说：“啊，原来是王参谋，王金岑，崔参谋、崔满仓。”

陈青这个小子很嘎，也许是故意给班禅额尔德尼调理一下情绪，也许是“别有用心”，他一改过去的口气、称呼、颇有点弦外有音地说道：

“我说副委员长、大活佛，别看你这会儿记住了王金岑、崔满仓，等到你出去以后，你恢复了职务，你就难说记得他们了，到那时候，不要说你记不住他，恐怕要见见你比登天还难呢！所以我们苗乡有句俗话，要见官，赛登天，这也是历史的教训。当然啦，话不能说绝，不是全部的，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列。”

班禅一双大眼一瞪，红脸膛涨得更红了，好象在对天发誓，但声音很低，生怕人听见：

“陈司务长，我班禅决对不是那种人。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知道，以前我和彭德怀一样，写过“万言书”呢，我写的调查报告和分析意见，比一万还多呢！我的那些意见，有许多基本观点和彭德怀一样，跑得太快摔跤，忘乎所以挨饿，左的象幽灵缠绕国家。我几次修改，几次转交，几次寻问下落根不得上边知民情，瞭民意。结果，我这个材料也成了罪证被批判。不过，因为我是大活佛，是少数民族，是宗教领袖，是敏感线上的人物，没有象彭德怀一样吃那么大苦，受那么不堪忍受的侮辱。庐山会议，我别的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和道，开始的时候，都是反左的，几乎完全一致，

连主席也是这样，不出数日，跳出了彭的意见书，一下子变成了反右，而且集中在彭身上，即使彭错了，如何都一下子从反左到反右呢？就是彭错了，整个形势也估错了吗？我感到很惭愧，我和彭想法一样，彭挨了死整。我常想，要是有可能，我愿意替他挨几拳，替他站几个小时。”

做后勤工作的对政治往往学习少研究少，尤其是连队的司务长、炊事班等后勤人员，只知道把工作做好才行，什么政治、路线，都是上边的事，上边叫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批判这种观点，他们又会说，上边叫怎么干不怎么干行吗？上边叫这样干，你想那样干行吗？司务长陈青就属于这种三个“明白人”驳不倒“一个糊涂人”的人。

陈青听了班禅的话说道：“什么左呀右的，我看都不是好东西，特别是左，老百姓挨饿全怨这个要命鬼！所以我认为，什么这主义那主义的，叫老百姓不断吃饱吃好才是不左不右的好主义。彭德怀不就是怕老百姓挨饿，才写什么万言书的吗？所以他在我们连队，我们中央警卫师，北京卫戍区，甚至全军全国，才最受人们尊敬，你看他在我们连，谁大声呵斥过他一句？他的错误是错误，他的心是好心，当官的要是都象他那样，老百姓没有不拥护的，可是不明白，为老百姓叫屈，又说他是拢络民心，想篡党夺权，那以后谁也不要为老百姓说话了。谁替老百姓说话，谁就是右，谁就是反党。”

班禅说道：

“话不能这么说，还是按主席教导的，要为人民服务，你们不是在为人民服务吗？总理叫你们保护这些人，有的人想害这些人，你们听总理的，努力保护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

什么。”

陈青说：“许多问题可以装一箩筐问号，谁来给说清楚。”

对班禅的回答陈青不得其解，所以才有此论。班禅叹着气，搓着大手，搓着的大手又逐渐变成双手合十：

“是呀，给后人留下一大堆问号，是这一代人的耻辱，我想迟早会清楚的吧！”

一个无神论的年轻共产党员，一个有神论的大活佛，谈得很投机，现实使两个“思义”“相悖”人彼此都失了真，融为另一种只可思议而不可明言的神秘物。

陈青慢慢地对于政治、对阶级斗争、对现实的一个个不理解变得失去了讨论的实质，转个话题说：

“我说大活佛，我不明白，你们藏族人穿衣服，何必伸一个袖子，闲着一个袖子，如其这样，还不如截去一个袖子省下几尺布呢，这不是白白浪费吗？”

班禅头一次在囚室哈哈大笑了，他忘了自己是囚徒，他笑得竟是那么响，这在特监小囚室里简直是奇人奇事。

哨兵崔广才听着笑得邪乎，咚咚从院中跑进来，大声呵斥道：“老班，你真是胆大包天！”

陈青说：“你出去吧，我俩没谈政治，在谈家不长里不短。”

崔广才是个严肃认真、凡事一丝不苟的人。对于并非直接上级的上司、后勤司务长，大不甘示弱：

“司务长，家不长里不短也不能大声喧哗，这是纪律，如果我在特犯言行纪录本上给你记上：司务长陈青和班禅在囚室嘻嘻哈哈谈笑风生！你说，这算什么问题？我们班长发

现了怎么办，要是叫副指导员庞艾同志知道了又会怎么样？”

提别人没关系，一提庞艾，陈青害怕了，因为庞艾是善于打小报告的。陈青被问得语塞无措。

班禅吃不住劲了忙从床上站起来说道：

“报告班长，我错了，这个不怪陈司务长。”崔广才说：“得了老班，在特监对你够特殊照顾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活佛，大活佛正是封资修中的第一个，封建迷信。这年头谁还管你活佛不活佛的，小心点吧。”

陈青不愿给班禅惹麻烦，急忙退出九号囚室。“闲一只袖子”的问题也只好搁置了。但对崔广才刚才的话，也难以咽下口，出了门，似无恶意又似无有意地说道：

“崔广才同志，你做得对，好好干吧，以后你入党，当班长、当排长会有希望的，干工作吗，就是要有这种认真劲，对敌人吗，正如副指导员讲的更不能仁慈。”

崔广才听着不是味，等司务长走出很远，这才嘟嘟囔囔骂开了街：

“负心郎，还来教训我！”说着，来了两句戏剧《铡美案》中的道白：

“打去他头上的乌纱帽！

脱下他身上的莽龙袍！

陈千岁……

包明宫……

陈世美！

黑包贼！”

这时，九号囚室传出一声呐喊：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这是班禅额尔德尼在喊叫，他天天如此，特别是每天早晨一睁眼，便象每日按时念经一样必喊无误。这是从社会上学来的。

班禅貌似呆头呆脑，其实他非常机敏。象这样的“忠于红太阳”，执勤的战士们就必然地在特犯生活言行起居纪录本上明记不误，一定会龙颜大喜。

慢慢地，战士们也概括出了特犯们的特点：

老彭顶（彭德怀），

老黄横（黄克诚），

老班机警装忠诚（班禅额尔德尼），

彭真垂眉坐囚室，

贺龙拐仗敲龙颈，

刘仁脚镣锁出血，

高棠放风走如风（荣高棠）

……

孔原不说话，

用潜在用功（梦用潜，总是研究文革文章），

老陆提笔批“红旗”（陆定一）

老王还象督三军（王尚荣、副总长兼作战部长，经常斥责专案组）。

……

二十七、大囚犯给小狱卒起名字

秋凉了，秋风扫着蔫黄的枣树叶、槐树叶和白杨树叶，黄叶飘落到特监囚室的房顶上，飘落到院里，沙沙作响。秋风为小院送进的不是秋爽和秋天丰收的喜悦，送来的是特监里的人惦记着家人，家人惦记着监内的亲人的忧愁。他们有的彼此知道下落，有的从进来那天起就不知道家人在何方。象贺龙及薛明，就一直在谨慎的设法打听孩子们的下落，他们的亲人作为大土匪、二月逆流、反党反毛的罪魁骨干分子的妻子和儿女，会有什么好的处境呢？每个人都不愿往坏处想，但又不能不做着承担最坏的痛苦折磨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捎来的一张照片，一件物品，一个小纸片，一个字，对他们来说都是万分亲切的，是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对此，没有娶妻成家的年轻战士们有的理解，有的则缺乏足够的理解，因此，一有特犯信函物品，有的象报喜报信一样，及时送到特犯手中；有的则不当回事，他们看不出一封信、一件物品对特犯的极端重要性。

有一次，给养员去半壁店大本营，为贺龙捎来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案板上就去卸菜筐，然后又去做别的事。那封信被冷

在炊事班。当他想起来时，那封信不翼而飞。给养员深感愧对贺龙，但又不敢对我和老连长说，也不敢去核对，生怕因为自己疏忽给弄丢了没法说。后来得知，这封信回到了贺龙手里。

此后，连队支委会决定，特犯家属送信、送衣物，都要有干部接待，谨慎接待，但不得乱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见到了部分特犯家属、子女和他们的信。写信最多的，是万里的小儿子小五。万里也尽可能给回信。万里每写信抬头总是："小五子或小五儿。出于例行公事，也出于好奇，我每次都仔细看看，研究研究他们的家信。万里每次给万小五的信开头总是说：小五儿，我很好，身体很好，吃的也不错，在这里不打也不骂，不坐飞机，不摇煤球，你们就放心吧。你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好好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洗礼……。"

后边每每都有一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看着这封信，我忍不住苦笑。我想，万里在一手写这封信的时候，另一只手一定在反复抚摸着心灵和皮肉的伤疤吧。他们宁可把痛苦吞下去，不说出来以便减少亲人的担心和痛苦。

当然，这种信物交往，也为他们带来许多不可估量的精神安慰。有一次，小五给万里捎来一个半导体，我看他双手托着，如获至宝，放在耳边听着，竟象小孩子一样笑了，他那张被整得痛苦拉长了的变了形的脸，象老松树皮一样，全开了花，叫人看着大不是滋味儿。

人，一个个从皮肉到灵魂都被整扭曲了。

我也接待过特犯们的家属，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兵头官

尾，在他们眼里，亚赛面对一个执政多年的暴君，唯唯从从，小心谨慎。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亲人。

但也有神情还算泰然、不卑不亢者。

她，就是荣高棠的老伴朱春燕。

有一天，小战士朱小秃报告，荣高棠家属送衣服来了。

我到了所谓接待室的连队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进屋，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从椅子上站起来，朝我走了几步。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衣服，不是她的长相，也不是她的个头，而是她那闪着光芒的双眸。确切说，不是我看到，而是她的双眸奇迹般地笼罩了对方。

乍看上去，她是貌似坦然无虑的。但是，我确信谁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她眼不敢斜视，头不敢抬起，说话不敢有一点高声，走路象有谁画了一道线，或者似乎随时提防着陷坑蛇咬。我断定她是被群众专政"专"怕了；我断定她的一切小心完全是为了荣高棠。

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看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在风华正茂的上乘容颜中掩耐不住内心的忧愁。

"你叫什么名子？"我象审问犯人。老实说，这不是我情愿的口气和心理表现。

"朱春燕。"她的眼睛一亮。

"你给谁送东西？"

"荣高棠。"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妻子。"

象司法机关的审讯员一样，明知故问地逐项问了一遍。

她看我没有什么可问的了，这才把包袱交给我说：

"请转交给他吧。"

她好象有话。过了一会儿，终于试探地问：

"我能见见他吗？"

"不行。"我摇摇头，尽量把口气放缓和。"这是规定，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请你谅解。"

"我完全理解，谢谢你们。"

我说："要谢，谢总理，谢我们卫戍区傅司令。是他们叫我们保护。"

她点点头，露出一丝由衷的笑容。在这淡淡的一笑中，我发现她是一个俊俏且气质温雅的夫人。

我想，她也应该走了，或者叫应该告辞了，但她分明对我的话还是不十分放心。又试探地但力图不使我感到是试探地问：

"他身体还好吗？他在你们这里怎么样？"

我知道她在试探是否挨饿、挨整，担心他是否病了、伤了没有。这是许多特犯家属都担心的。

我必须撒谎。一个解放军小军官，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旨撒谎，不能撒谎，我便不是一个好的警卫连指导员，起码是不能在这担负这样的任务。因此，我毫不脸红地答道：

"他在这里很好，吃得饱、吃的好，身体好，天天锻炼身体，走路跟小跑一样，谁也没有他身板好。夏天有我们连给发的蚊帐，脏了可以洗澡。至于其它的，也没有什么。"我想起她最担心的我还未回答，"谎"我要接着高水平地撒："这里不打不骂不侮辱，但有点文斗不武斗。"

所谓不打不骂不侮辱，是还没有打死骂死侮辱死。中央

专案组和国家体委的个别人，连续批斗了荣高棠几个月，有一周不让合眼，给他搞"疲"斗，而且皮鞋、大棒、膝盖撞都用过。我想，我不能在朱春燕心灵的伤疤上再撒上一把盐，谎话既已出来了，就必须一谎到底，这是政治需要。不然，我这个指导员能做何解释？

然而，我又进一步觉察到，我的谎言水平越高，她的相信程度越低，她越听越显出担忧的表情。我欺骗了她，我感到受到了良心的严重谴责；可是所有欺骗人的人，都能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悔自愧吗？

"他没闹过病吧？"她终于又进了一步。

看来，我该真真假假、真假结合，到了该抛出点真的时候了，不然谎言快似马，也难追事实呀。我说：

"如果你还不放心，我给你讲两件事，你自己捉摸。说实话，他得过阑尾炎，我们把他送到了我们师的第二六七军医院，就在永定路，不信你问问。在军队医院动手术，完全是为了他的安全，他早已出院了，这是傅司令指示的，不叫送别的地方医院。"

这回她真地笑了，不住地点头，眼里不时闪着那种令人可亲的光芒。如果不是在特监这种特殊环境下，我很可能老实而恭敬地喊一声大姐、大嫂或大婶。

"还有一件事，我当故事给你讲讲，不可对外人讲，否则，你就把我们害了。"

"我不会的。"

她说话的声音是淡淡的，但叫人放心。

人要想撒谎往往是难以撒圆的，我发觉我说走了嘴，我的那句"不可对外人讲，否则，你就把我们害了。"这不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不是已经告诉她这里形势斗争很残酷很严峻又很复杂吗？

她看我有点不自然，真的笑了，就象大人在旁一个玩捉迷藏玩得很笨拙，露出了尾巴的孩子一样。

左氏天下风靡全国，对“特犯”的家属当然是不敢称“同志”的，我只好称“你”，或者含糊其辞。

我告诉她说，我们连有个小战士，十七岁，小圆脸、小圆眼、小虎牙，他和老荣交上了朋友。他叫朱小秃，是我在河南舞阳县带兵时，怀着偏爱之心带来的，他两次体检验光，眼睛不合格。我很喜欢这个小东西，特意告诉军医马淑敏同志：“你高抬贵手吧。”第三次验光果然合格了。

我颇有点自豪地说，“他简直成了老荣的小通信员、服务员。”

我不能细说，再细说就露了老荣挨整的马脚了。

朱春燕说：

“谢谢你们，谢谢这位小战士。”

她总是恬静地听着，细心地听着，极少插话或打断我的话。这更使我明确了我应该对她说什么，不应该对她说什么，我应该使她“探监”后，回去睡个不做恶梦的安生觉。

我继续说道：

“有一天夜间，朱小秃站哨。那是半夜十二点多，屋里睡觉开着灯——这请你放心，怕他们对在这里看护产生误解想不开而自杀。朱小秃进到屋里，扯下一根笤帚苗，蹑手蹑脚地到老荣床前，用笤帚苗捅老荣鼻子眼。老荣一翻身，揉揉鼻子又睡了，朱小秃又捅。老荣一惊醒了，坐起来。朱小秃咯咯笑了。不等老荣开口，朱小秃直来直去说道：‘老荣，朱

小秃不好听，小秃小秃的多难听，我又不是秃子，你给起个名字吧！起个好听的。老荣想了想说：'就叫朱赤吧，赤是红色嘛。你看好不好？'朱小秃说：'好，好听，好叫，比朱小秃强一百倍。我爹和我娘没文化，不会起名，农村就会起球啊蛋的，要不就猫啊狗啊秃儿的，将来我要当了团长、师长、军长的，毛主席一喊，朱小秃！多不好意思？今后我就叫朱赤。'

朱小秃从此改名朱赤了。战士改名字也用不着向上级再申报。但是，我们连长严厉地批评了朱小秃。连长说：“小兔崽子，老荣那么大年纪了，大半夜的，他刚睡着了你就开玩笑捅他，你这个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你违犯了纪律，我要给你处分！

朱小秃以为真的要给他处分，又去对老荣说。老荣在午饭时看到我，说道，小孩子，开个玩笑不算什么。别给处分了吧，这怨我平时自我要求不严格。

连长是吓吓他而已，当然无意给他处分。我作为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也不会同意给我偏爱的这个小东西处分的，因为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

我注视着朱春燕的表情，说到这问朱春燕：

“你看，老荣在我们这里比在社会上如何？我们会慢怠他吗？我开始说过，周总理指示我们保护好他们，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周总理吗？”

朱春燕得到一点安慰，但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打消她的担心。因为周总理都处在明枪暗箭中，他有多大能量，保护得过来吗。

我怕她还听不明白，带上更大的担心和痛苦回去，又补

充说：

“你还知道，周总理虽然无力回天，但他是特别爱护老干部的呀！”……

朱春燕站起来，真诚而充满信任的低声说道：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了！”

她似不在意地瞟了一眼小包袱。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把衣物转交到老荣手里。”

……

二十多年后，当我专程北京崇文门再访荣老和朱春燕同志时，一进门他们便用双眸紧紧盯住我，似乎在寻找失去的影子。朱春燕同志还提到了那次为荣老送衣服的事。荣老也记忆犹新的再次讲到朱小秃改名字的情况。

朱赤，一个令人尊敬、令人怀念的小战士。

二十八、五 探 囚 灵

——他预断毛林必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已是林彪发表“五、二〇”声明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部队干部到师部礼堂去参加庆祝发表“声明”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会议活动。

做为指导员，我应该去。我向副连长孙旺学习“先进经验”，给政治处打电话请假说：“我头疼，留营值班。”

我的确患过神经性头疼病，严重时一夜一夜不合眼睡不着，吃东西就和嚼棉花套子一样，我的体重达到正常线极限以下，仅八十余斤。我装头疼病没人不信。

我想，我的确离着“滚蛋”不远了，我要在滚蛋之前，多谈谈，多看看，这对于一个写小说——不，是试图客观记述历史事实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先进了“阎王殿”是去看阎王。

“阎王殿”是指毛主席和江青多次严厉批判的中宣部，

中宣部的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既是中宣部长，当然是阎王殿的阎王了。自从陆定一被拘押在小院之后，战士们既不提一号囚室，也不提陆定一，而是以阎王殿代称一号囚室，阎王爷代称陆定一。当然这都是私下的称呼。

陆定一出身书香官宦门第，祖上多人坐过清朝藩台署道的大官，书香之后多文采。陆定一到囚室后，只有两件事做：一个是批文章，一个是洗衣服。他经常戴着老花镜，左手持放大镜，右手拿支红蓝铅笔，凡是文革的文章他都反复读，反复批注，有的文章划满了道道，嘴里还嘟哝："不象话，不象话，这哪是马克思主义！"。战士刘贵贤，就是那位自称要当大文豪，将来坐郭沫若这把交椅的连队大文人，一见陆定一划道道，就开玩笑说："要是都重要，还不如用把笤帚沾墨水划呢，这多省事"。

我来到一号，却没见陆定一划道道，而是在缝被子。他戴着老花镜，一针针，一线线，那针角密密实实，简直能赛过一个巧手大姑娘。我大不如他，我缝的针脚有一手指长，有时夜间睡觉，大脚指把针脚线都挂断了。我不禁惊叹道：

"没想到你还有一手好针线活？"

他停下手中的活，摘下老花镜，见我在面前，微笑说：

"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能拿枪，能拿针，不算什么。"

我说："你是阎王殿里的阎王爷，你在这里有我们保护，可你那些小鬼们呢？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陆定一也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道：

"那还用说，阎王倒了霉，小鬼们还有好，无非是死的死伤的伤，臭的臭，香的香。"

"怎么会有香的呢？"

"反戈一击不就变香了吗？"

平时看他文文绉绉的，其实他挺幽默，很自信，从没表现悲观失望过。

他估计错了。没过多久，有一天，来了几位穿军衣的人，叫我们把陆定一叫到值班室，其中一个大个子拿出了一张纸叫陆定一签字。

陆定一接过那页纸看了一下，脸立刻阴沉下来，一时发愣。来人催他快签，他没带笔，我急忙掏出钢笔递给他。

签完字，笔还没出手，两个人"咔嚓"一声已经给陆定一戴上了手铐。

"毛主席逮走了阎王爷！"

从此，我们第一号囚室的主人便更名改姓，又换上了"新鲜血液"这个书生看来他真的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对阶级斗争的严酷，还不如我们战士学得透！……

因为陆定一正在忙于家庭妇女的针线劳作，我只好离开一号囚室。

四号囚室好像是块磁石，又把我吸引进去。

结巴战士宋肖池在站哨，完全信得过，但我也不免嘱咐一句："好好看着！"

宋肖池正在要求入党，入党的关键人物当然是指导员、支部书记，对他来说我是说一不二的，他们认为，连长、指导员掌握着他们的小命运，是否复员留队，是否入党提干，生活困难是否补助，是否表扬立功都是他们的切身利益。

在这样的部属面前，这样的官有什么不好当，有什么话他不听！

彭德怀很少看毛选了，大概是真的领会透了。

他在看着一份老报纸，即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批判旗帜》

那篇社论我们也学过多次，茅头直指刘少奇，要“彻底肃清”。那“彻底”的味道组织上、人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有什么体系上，我想是等等吧。

人们都期望一年二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真是异想天开。他就不想想离着“彻底”离着“肃清”还差得很远呢！

彭德怀见我进来，张口就说：

“也不知道肃到什么程度，肃到什么时候才算肃清了……”

我说：“老总，这你还不明白，主席不是早就讲明白了吗，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各个战线，绝大多数在修正主义手里；还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他叹了口气，这叹气和贺龙一样，分明叹出了“国家和人民怎么办？”

我说：“老总，不要烦恼了，说说过去的事吧。”

“过去的和现在的有多少差别！”

忽然他象发现了什么真理宝贝，眼睛一亮说：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六年多时间，忽然找我谈话，要我到西南大三线工作。那次和我谈话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刘邓彭来之前，主席先和我谈了陈，按主席的话说，谈得很投机。也不提过去他坚持说我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了。主席原话说，你讲的三条保证头一条我记不得了，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的

事已经过去了，我们都不要再想老帐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对你的事，看来是批判错了，等几年再说吧。”

他说到这里，一改不寻常的口气：

“那次接见我，我激动的要死，我总是对人毫不怀疑。结果如何，我又在这里占居了一间小屋子！”

应该承认庐山会议以后，一边批彭，一边接受彭与全党全国人民意见，纠正错误，因此回升很快，所以到一九六五年，主席写了“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潺潺流水”“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的著名诗句。既骂了赫鲁晓夫，又批了悲观者，也证明了一片大好形势，又是继续对三面红旗有异意的一个有力回击。

其实，回升很快不是搞了刘的三自一包，人们各自为战，各寻生路？试想再“一大二公”下去，又是如何。可以说刘的思想当然不是他一人，救活了一个战壕的元勋们，但文革中又成了一条罪状。

现在看来，彭德怀“也不知肃到什么时候”的哀叹，是对事物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

“我和主席争论过几分合作、几分不合作的问题，当时是想，多争一分，我便有可能继续合作。现在看没有必要争。从‘结体’到‘解体’，再从解体到‘结体’，再‘解体’，就是这么个过程。有些人也是这样，但我和他们与主席的合作，结体不一样，象林、康、陈（指林彪、康生、陈伯达）他们庐山会议的结合不过是投政治机，文革是庐山会议的继续的一个方面，但他们这种结体因为根基不正，我断定迟早也会解体……”

“我相信他们解得会比我更残酷、更可悲，更可耻于人类！历史上能耐再大的人有的是，哪个能欺骗历史？希特勒的一个文参叫什么拉尔的说，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会使人们认识，会被人们相信，这是放屁，屁放到国际上去了。谎言就是谎言，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认为，解体的时候，就是谎言彻底暴露的时候。”

我尽力用心记住他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旦有一天，一旦有可能，我要把他那颗一会被弄滚烫了，一会被弄冰凉的心，全盘托给敬慕他的人民，全盘托给我们多灾多难的党，多灾多难的民族和我的父老兄弟们！他们浴血奋战，舍生忘死，本来是为了自己和人民过上天堂的日子，到头来，天堂不仅距离他们越来越远，而且人人自危，在和平的时期却老绷着身家性命安危的弦。他们太苦了。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话总是撩起我童年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思考。

他在一颗接一颗地抽着烟。我听他说过，他本来早就戒烟了，庐山会议这场暴风雨，使他又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很凶，好像在借烟消愁，借烟解闷。

“我早想回家乡当个百姓，去种地；主席不让，叫我到大西南。揪回来，是一九六六年底，去时也是个年底（一九六五年底）。不是巧合，是历史讽刺。

在大西南三线工作的时候，西南局李井泉他们，还有成都军区的负责人都欢迎我去，他们一个师长还说我咱们老想过去老打胜仗，这回到咱们这里来这是好事，我们真心欢迎。他们确实对我很照顾。有一次我到峨眉山，听说峨眉山附近僧道相面、算挂、占卜都很准。我不迷信，为了消遣一下

情绪，我找一个老道谈了小半天。临走的时候，我问他，“大主持都说你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能不能断断咱们国家的前途？”

老道笑着说：“虚传，过誉了，不可信。人老了，经的多了，看事或许更接近点真迹。说罢，吟出两句诗‘试看山下云深处，似有人间路不平。”

“请仙道明教？”我说。

他说，这是明朝刘道一的诗句，一个僧道多次给官不作，实为有远见啊！

老道又说：“‘结之不洁，必然解之’”。

四号说到这时笑了。

“我刚才给你说的结体和解体的话，就是从他这学来的，有道理。他说的是，结合的基础不好，总有一天要分离。按照唯物主义观点看，这是符合辨证法的。

我点燃了“大战斗”，他送给我一支“熊猫”。

“庐山会议，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们，追逼我承认访苏和赫秃子达成了什么交易。我气得要炸，驳斥他们说，我访苏有工作人员，有翻译在场，可以调查作证。他们无中生有地一个接一个扣帽子。他们不惜人格的尊严搞投机，投所好，投所需，所以庐山会议、文革搞得都很紧密，明白人一看一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一点，连峨眉山老道也看清楚了。”

我说：“交通闭塞，信息不通，连报纸都难看到，几乎与世隔绝，他会知道什么，许多人身临其境还糊糊涂涂呢。”

“总之，他的预断叫你感到不是没道理。特别是对林的

预断，我想也是这样子的。”

“他预断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讲的不过是隐语罢了，不象咱们说话那样明白的。”

“他讲的什么呢？”

“他说，鳞既不生毛，毛焉附于鳞？”

“是啊，鳞和毛怎么能共生共存呢？”

四号看看我，似乎在问我是否明其意。我很高兴，我完全听得懂，我忍不住笑了，说：

“皮之不存，毛讲焉附，鳞鳞直上，何生于毛？”

我眼前忽然浮现出象小学生一样高举红宝书，唯唯诺诺于主席身后，随时准备开读的情景——这是他特意嘱咐夫人，夫人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凡是露面场合，千万要提醒带上这本赖以升迁的宝书……

我象偷坟解木盗窃国宝的人一样，怀揣宝贝，心里咚咚跳着；又象一个科学家发现证实了一个新的实验成果，激动、兴奋、害怕、担心地离开了四号囚室——我发现了人间一大秘密。

对我来说，这就足矣。我在北京旧市直和文联搞斗批散时，我就曾对浩然说：

“这文革可大有可写的，要准备写呀。”我傻呵呵的，直接了当，因为我当时是有这个准备的。我天真的象个大傻瓜。浩然当时确无动于衷。

二十九、已约年年为此会 故人不需赋招魂

陆定一走了，戴着明晃晃的手铐。那手铐几乎透明锃光，听说那是进口的，用进口的手铐，以共产党的“执法人”身份铐走了一个老牌共产党人，一个为中华民族奋斗了多半生的业已日薄西山垂阳入土的老人。

他走得并不悲凉，我想应该用悲壮来形容，可“悲壮”这个词，历史是用来形容共产党被敌人杀害的。不管怎么说，他的神情、行动是悲壮的，他留下的一句话也是悲壮的。

为他简单收拾一点东西，有关人等便“送”他上车了。走在院子的时候，我听到他喃喃的同时看着东南方，吟出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诗。看来他是出自肺腑的自言自语，并不需要别人听到。但我连猜带蒙听出来了，看起来悲壮，听起来却是那么悲凉——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需赋招魂’。

我努力回忆着，但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这是谁的诗句，但凭我的记忆，我敢肯定，这是一位古人朝官，在被贬之

后，与落魄的同仁谈话时吟出来的。这样的诗句，应该说正是他的心境写照。

看来，手铐一上，他便豁出来了。否则的话，这样的诗句被“执法官”听到，听明白了，不是还有许多苦头要吃吗？

他也是不发不痛快。

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呆呆坐了很长时间，我谈不上是忧国忧民的文人墨士，做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一个已在部队受党教育多年的小军官，对这种事情难以顺理成章的接受。眼前，禁不住浮现出文革以来，一个个老帅们的身影和他们身撞南墙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真个是发动起来了，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士，可以说都拿起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不到一年，揪抢、游斗、抄砸、体罚，关笼子、蹲小屋、扣痰盂、剃光头等等无所不有。煤炭部长张霖之夫妇被逼自杀了，陈老总夫妇痛苦不已，陈毅象个暴躁的狮子，在屋里叉着腰来回转。继张霖之之后，继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九月末不到两个月，光北京市就被整死、打死一千八百多人。如：华北局书记李立三、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作家老舍、艺术家马连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恒、煤炭部长张霖之，还有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等都被整死或自杀了。邓拓（即马南邨）的《燕山夜话》文笔极佳，如无偏见和恶意，大可视为字字如宝，他把中国和老百姓的事都写到骨子里去了。因此，老舍在不堪忍受被逼被辱的情况下跳湖自杀时兜里还装着邓拓的那本《燕山夜话》。

别看老作家毫无束鸡之力，但他装上“夜话”是想告诉

人们，舒舍予的生命要与真理同在！

运动来的快，搞的凶，他们去的也快，谁不张目结舌，惊魂落魄？

一个初探文门的大头兵，也非常喜欢《燕山夜话》，但我没有老舍的处境，我不会装上《燕山夜话》去跳营房附近的永定河。

许多人，当官的、为民的、教书的，甚至幼儿园老师纷纷找朱老总，有的一天打几次电话。他们深知朱毛关系，几十年来在全国人民心中素有朱毛他二人不离之说，主席也曾这样高兴地对朱说过，请他放心。因此，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朱老总身上，相信只有他能在"班长"面前说话有份量，有影响。

朱老总的心情沉重，进退两难。他在庐山会议上，为彭德怀的事，已经遭到过主席讥讽性的批评，甚至带有挖苦，说他老糊涂了，说话不得要领，对彭德怀是隔靴搔痒，是老右。

一个早就失去信任的人，此时去奏本，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朱德左右为难，何去何从思想斗争多日。朱总和康克清商量了几次，康克清催过他几次。

老脸不要也要国家，为人民。"你打了那么多年仗为什么？"康克清的话坚定了老帅上朝奏本的决心。当必要时，他也要决心学一学历史上的咽衿死谏。

他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给主席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去谈谈。恩准。

八十老翁象小孩子一样激动不已，戳打着拐仗奔主席卧

室，主席在门口热情招呼，让座、沏茶、问寒暖。

朱德尽量使自己情绪平静，寒暄几句后，以缓和地口气说道：

“润芝呀——”

这样的称呼是最亲切的。他试图唤起他们“班长”几十年的深情，同志情，战友情，患难情，甚至并肩手足情。

他仔细观察着班长的神态，继续说道：“这样子下去可不行啊！成啥子哟！都倒了谁来干呢……”

主席不等他说完，也以平和夹杂着安抚的口气说：

“放心哟老总，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保养身体……”

重要的问题很快就避而不谈了，天南海北，真正的是隔靴搔痒了。

朱德出来，觉得话又投机又不投机，说投机又说不上在大问题上的交换思想，说不投机又“请放心”。

老帅毕竟有了几十年战火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结论是，话不投机是主要的。

他没有“噤衿死谏”，因为避而不谈，没有全说啥！不投机是主要的。

但是他终于也是怀着一种再不用赋招魂的心境踌躇而去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某日，也就是副连长孙旺在贺龙囚室门前唱“洪湖水浪打浪”的一个多月之后某天，贺龙从医院看病回来，我到了十九号囚室。当谈起“二月逆流”事件时，贺龙戳着拐仗大骂狗娘养的，栽脏陷害，并且声色俱厉问我说：“你说，一九六七年二月我不是被你们看着吗？！”

贺龙一骂街，我便提起傅崇碧司令员。傅司令员，也是

妒恶如仇，只要一听说侮辱殴打元勋们，他就骂街说：

“他妈的，你们去告他们狗日的！反了他们！”

贺龙这个直率的老军人，从不拐弯抹角子，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他也误吞了一颗空心丸，但不出数日，就被拐走为大土匪。接而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当病情危机身患糖尿病，却给他打生理盐水，他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透过铁窗只看到一只乌鸦在天空盘旋时，他也明白了“贺大胡子今生勿需再招魂定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神州大地 许多 地方 还在喧嚣，私设的公堂正在和法西斯手段试比高低。毛主席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住室谈话。

主席态度和蔼可亲，使刘少奇感到二人之间丝毫没有什么不愉快之事。刘少奇说：“国家主席不能干了，常委、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当了，到湖南到延安去种地，愿意做一个普通的百姓。”

他几乎用乞求的口吻说的。

主席一时没有回答，不住地抽烟，似乎在沉思。他忠于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不置可否。而是改变“主题”说：“多读点书吧，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临走，又客气地送到门口。但不过数日，刘少奇、王光美就被揪到中南海小礼堂批斗，造反的工作人员还把刘少奇的大皮帽子打翻在地，机敏的王光美赶紧拾起来，巧妙地说：“给他带上吧，要不病了就斗不成了。”

同年四月六日，开始勒令刘少奇就地劳动改造，打扫卫生、洗衣服等。

同年八月五日，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一天正是举

世闻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是历史的巧合吗，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即超越政治局权限的领导成员江、康授意。

同年八月七日，刘少奇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并告：我已失去自由。

他的信如泥入海。但同年九月三日王光美被捕，不久刘少奇在完全失去自由中开始遍尝何为“残酷之极”的滋味儿。不知他心境如何，但他吞的空心丸，也很快被那句故人不用再赋魂所代替了。

这些几十年拿枪弄棒的老帅们，也许是摆弄枪管受到了长期影响，只知道象枪管一样直来直去，他们跟不上也不懂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仅在打仗时可以说百战百胜，在和平时期，在治党、治国、治军、治人、搞建设上，也活灵活现地行之有效地运用了“突然袭击”、“各个击破”、“瓦解敌军”、“重点突破”、“以逸待劳”、“声东击西”、“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反败为胜”、“以守为攻”等等军事科学理论。主席每个时期都成功了，无论战略上战役上直到每个人身上都如愿以尝了。尤其是，在要害问题上和主要人物身上，毛主席高瞻远瞩，谨戒了宋襄公半度不改的“蠢猪思想”，而坚持不懈地发扬了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气概。

这种气概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在东方巨人的眼里，早已不需要再招魂，可悲的是，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三十、我 要 走 了

我终于得到确切的内部消息，我真的要走了。

这对于我这个入党较早、提升较快的年轻小军官来说，感到非常悲凉。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就如此罢了。

这个早就预料的问题，是干部干事李永坚告诉我的。这使我猛然想到，当年我在独立营营部当书记官时，我的同乡、文化教员陈宝丰同志对我说的话："你的性格，你的为人，我断定最多当个'芦施卡'中尉"。

芦施卡中尉是《好兵帅克》里的人物。陈宝丰只是说明，我在部队最多熬个小中尉。

他的话对了一半。由于张政委的努力，又决定调我到天津部队，而不是转业或打回老家。

我想，我谁也可以不告别，但不能不向一个伟大而倍受我们尊敬的"罪人"告别。

"我要走了……"

我叫了一声"老总"，虽然没有哭，却说不下去了。我和他朝夕相处了二年。一个囚徒、罪人，居然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旁人莫知的。他是警卫连特监小

院的秘密顾问。

他吃惊地看着我，终于说道：

"我也长不了了。"

我说："我走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司务长陈青。别看他闹过离婚，闹得挺厉害，他是个好人。可以通过他找我们政委。现在是，越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人，越有点人性。现在的人性，有许多都不如狗性，狗还不反戈一击乱咬人呢，除非是条疯狗。"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使劲握住，握得我好疼，好象他的一切言语，一切肺腑心声，都通过这双大手传给了我。他看着我，仔细地盯住我，仍然使劲的握住我的手，我终于忍不住那被指责、谩骂了多少年的人性的泪水……

"如果有可能，我会回来看你的。"

他突然放开手，说：

"你到哪里去？"

"调天津警备区，据说叫我到警备区政治部当秘书。那里有我们中央警卫师原副师长魏传连同志，他现在是天津警备区副参谋长，是我们政委通过他把我调去的。"

"魏传连？"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师的前身，就在中央警卫团呆过？"

我答："是。听首长们说，那时中央警卫团长是刘挥山，这还是主席给起的名字呢。进城后扩建中央警卫师，刘挥山自然升级当了师长。魏传连一直在中央警卫师工作，他是一九六四年调去的，是总政第一任秘书长，文革前夕任解放军军艺院长的魏传统的叔伯兄弟。"

"啊，是他，你见了他请替我问好。"

“是！”

二年来，我没给他敬过礼，称呼也随便，我毕竟要走了，我规规矩矩地、一丝不苟地头一次敬了个军礼。

他在我的心中还是我们的老总，还是为我们请命而大难临头的彭大将军。主席说他是海瑞，他就是我们的海瑞，人民需要海瑞，而不需要奸臣贼子。

我暗暗地发着誓：

终有一天，我要把这座特别监狱写出来，做为我对彭大将军和许许多多的元勋们的万不够一的报答，做为一个特殊的“狱头”向江东父老的交待……

再见吧，囚室里的元勋们，你们要多多保重啊！

附　　录

九曲跌宕　百折不回
昭颂先辈　激励子孙

——访当年曾被监护的
中顾委常委荣高棠

朱明盛夏，我怀着颇有些激动的心情，专程北京崇文门西小街，再访了分别二十四年的荣高棠荣老。

二十四年前，也就是公元一九六七年，华夏神州大地，燃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惊中外也震惊宇宙的大火。那场大火，铺天盖地的燃烧着，疯狂了的人们，把扭曲了的历史和现实推到了疯狂的“顶峰”，神州大地的每一根神经，犹如注入了超量的高级毒素，整个大地在癫狂着，痉挛着。

就是在那种特定的年月和特定的情况下，包括彭德怀、

贺龙、罗瑞卿、彭真、万里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诬陷，先后被“监护”（实际是看押）起来。当时，正在年富力强、任职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同志，也被关押起来，与彭大将军、罗瑞卿等，同被关押在北京西郊什坊院，每人一间小黑屋，窗户糊得严严的，从此成为以军营代临时特监的囚徒。

我当时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一名基层指挥员。我们这些素称“御林军”的官兵们，忽然间成了看押革命元老的“狱卒”。干部、战士们象许多人一样，对这场大革命及其“深度”、“广度”、“力度”、“惨度”大惑不解。因此，当逐级反映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以后，才有了林彪那段“划时代”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阶级斗争论和整人的一大发明；后来，他又有了所谓“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应该，坏人打坏人是乱了敌人，坏人打好人是锻炼了自己”等等“乱就好、打就好”的乱打谬论。

虽然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对元勋们极尽诬陷迫害和侮辱体罚，但中央警卫部队，凭着党和人民多年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以及傅崇碧司令员的嫉恶如仇的明确的观点，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予保护和照顾，甚至不惜冒着危险。诸如：周总理命令我们从造反派手里抢回了彭真，夜间偷偷给彭真留夜餐；排长杨树理背负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同志，跳窗逃出造反派重围，根据傅司令指示，规定了暗号，把他藏在了电梯里，从而使陈再道同志免遭伤害（他们扬言要把他砸成麻饼子，烧焦炸透）；小卫生员荀良达同志背着专案组，每天给打伤致残并腿抽筋的陈克寒同志（北京市副市长

兼宣传部长）推拿按摩，背着他去厕所，当有人指责、恫吓他时，他用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来据理力争；战士齐运岭为赵建民、彭老总传递家信；有的干部为了安慰贺老总，半夜里偷偷在他窗前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当有人暗里报告，遭到中央文革专案组指令追查时，中央警卫部队以“查无下落”应付了之。“特犯”们和连队干部、战士吃的是一个食堂，一个伙食标准：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由于元老们被折磨得体质很差，老连长建议改善伙食。春天没有蔬菜，只好吃糖萝卜；四月槐花盛开，发动全连战士上树采洋槐花，做洋槐花馅菜包子，让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有，警卫部队为“特犯”申请到每周洗一次澡的权利，因此，彭德怀、荣高棠等皮炎病方见好转；还为“特犯”申请发了蚊帐，撕开了糊住的窗户等等。

当我和荣老谈起当年特监里这些往事时，荣老既感慨又平静地说道：

“那时候专案组和造反派某些人整人有术，皮鞋踢、棍棒打、‘摇煤球’，连续搞了我几个月。”

我插嘴说：“有一周连续不让你睡觉，不让你休息，不叫你合眼。”

荣老说：“是呀，闹得我都不知道是黑天还是白天，更不知道几月几日了。可是，我从来没想到过死，我相信党，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所以在那里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精神不衰，意志不退。”

荣老的话倒使我耳边又回荡起彭老总在特监经常击桌子说的话：“我不能死，我不死！我的问题不弄清死不合眼。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我读过点儿史书，那是岳飞说过的话。特监的元老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当我在沉思中抬起头时，却见荣老已从沙发上站起来，以金鸡独立的姿势，双手抱住右膝说：“那时他们就这样用膝盖猛撞你的肚子，你想会有多疼！”

用膝盖撞肚子，一撞一个跟头，小时候我们常玩这种游戏，我们河北省老家叫“撞拐”。专案组和造反派可不是做游戏。荣老就是这么被折磨的得了阑尾炎，根据周总理和傅司令的指示，我们把他送到了属于我们中央警卫部队的二六七军医院，这样就避免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荣老安全地作了手术，并顺利地出了院，又回到了特监小院里。

荣老现今已年近八秩，还象当年那样青春不老、干净利索。二十多年前，在特监小院里，他是最干净利索的一个，每到“放风”，便如鱼得水，两脚生风，在不到几十平方米的小院中紧走紧跑，常常走得满头大汗。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却说他是“活命哲学”、“想和无产阶级打持久战”，责令我这个二十啷当岁的小小代理指导员，组织全连批判他“与无产阶级打持久战”。荣老谈到这些，不禁笑了：“批是批，执行是执行，该照顾你们不是尽心照顾了吗？这说明人心背向。让你批你不批，你这个小指导员恐怕会比我更惨。”

我说：“那时你给我的感觉是，留驻青山不怕老。”

荣老赞同说：“你说的对，留驻青山。当时有一个信念，党和人民是心明眼亮的，出去还要干革命。”荣老说到这，忽然想起当年“特监”里一个曾经“看押”过他的小战士，那个小战士只有十七岁，是我从河南舞阳县带兵带来的，名叫朱小秃。提到他，荣老记忆犹新，他在“囚室”里

和荣老大开玩笑。荣老动情地回忆说："那个小战士很可爱，我被打得走不了路，蹲不下，是他背我去厕所，扶我蹲下。有一天半夜里我睡着了，他用柴禾棍捅我鼻子眼儿，和我开玩笑，把我捅醒了。他却挺认真地说：'老荣，朱小秃不好听，我又不是秃子，你给我改个名字吧，起个好听的'我就给他起名叫朱赤，赤是红色吗！"荣老又补充说："这些小事，甚至包括开玩笑，不是看到了战士的心灵吗？"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事后连长曾批评朱小秃说："老荣被整了那么长时间，睡着了你怎么乱开玩笑！"

小朱赤现在你在哪？我和荣老都很想念你！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无辜的老帅、元勋们得以昭雪，他们打听我们干部、战士的下落，并在政策范围允许的条件下，帮助解决生活和工作困难，有的还调回北京工作。元老们说："当年他们冒险照顾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个人报恩，他们理应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在那种年月，他们能那样做，说明他们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痛恨，有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

荣老是中顾委常委，还担任中国桥牌协会主席等职务，社会活动也很多，但不求名誉利禄，总想在晚年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在我们交谈中，就有两起请他做什么董事长、理事长之类的事，他都断然拒绝了。他还说："我们侥幸活下来的人，不能忘了我们死去的那些人……"

在荣老的眼里，我还象当年一样是个娃娃；他若大年纪，和我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将近六点，而精神始终那么饱满旺盛，并在激动与兴奋之余赠以题词，鼓励我把《特监轶事》写好：

九曲跌宕　　百折不回

昭颂先辈　　激励子孙

那字体浑厚苍劲，神韵如壮年阳刚溢露，毫无老态拥睡和抖索迹象，看了令人振奋。我想：这题词，既是荣老自勉，也是对我辈之激励——惨痛的历史教训万不可重演诶！

后　　记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我怀着象游子归故里一样激动的心情，从天津出发，重访了离别将近二十年的中央警卫师。我在蕴酿着写我们亲身经历的《特监轶事》。

在北京，我们的老政委张锦泰和他的老伴杨大姐，在北京卫戍区复兴路招待所，也就是他们的家里，亲切地接待了我，摆了满满的一桌酒席，还用电话邀来了当年我们团的李副政委和当年参加监护元勋们的一位连队干部。当老政委听说我在准备写一部当年元勋们在北京什坊院和半壁店被监护的长篇纪实作品时，他连连说道："好！好！早应该快点写出来呀！这很有意义。咱们中央警卫师执行监护任务，看押了那么多党政军领导，他们在囚室里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里的情况对于党史、军史、文革史都有参考意义，不写出来就是一块空白。"

满满的一桌酒菜，谁也顾不上吃。思绪的回忆，感情的波涛象潮水一样涌流出来，我和老政委说着说着，几乎动情地哭了。

我说："半夜里，在贺老总囚室前唱'洪湖水浪打浪'

的事，你们还记得吗？”

老政委说：“怎么不记得，上边追查的很紧，不过，他们（指中央文革专案组）也不好硬往军队里插手，否则，你们连当时也要出个‘反革命’了。”

杨大姐又端上一盘烧茄子，见情景劝说道：“快吃吧！看你们，都岁数不小了，还象小孩子一样。”

老政委说：“那时斗争那么尖锐复杂，谁的指示也不能不听，想当个好人可不容易呀。有人还误解了我们的战士，这也难怪。抢彭真、救陈再道、发蚊帐、给他们洗澡，卫戍区和警卫部队当时都是冒政治风险的，傅司令为此受陷害，战士也被审查复员，这些，外人都不知道内情。你真实地写出来，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嘛！这也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警卫师还有个大笔杆子叫刘春华，他是三团的，但他是个写诗的，也已经转业到军队一个出版社，他又没有参加监护。如果你不写，就没有人写了，我老了，文化低，不然我还要写一写呢！”

我说：“我早就想写，不写出来总觉好象欠什么债似的。想当初我就是准备有一天要写一写的。不然就辜负了囚室里的元勋们的期望。

当我提出，是否可以再看看师司令部作战科保留的当年看押连队的原始记录时，老政委叹息道：“原始记录本来是连队战士记的，你们看都是可以的，不过，我已经离休了，原中央警卫师的同志几乎都离休或转业了，只有一个保密员现在是招待所长，要想再看材料怕是不可能了。”

我也不便再为难老政委，我说：“凭记忆写吧，有些事情真的象文革时说的，触及灵魂，渗入血液，想忘也忘不

掉。”

在餐桌上，几位首长和老战友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况，荣高棠如何被连续整了七天七夜；邓洁如何被专案组和造反组织代表把耳朵揪肿了；黄克诚、王尚荣如何骂街，彭总如何横眉冷对；贺龙如何棒敲林彪像；陆定一如何批“红旗”（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篇文章）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某些人如何往死里整人；小战士如何为“囚徒”通风报信；周总理如何历尽心血，千方百计地保护老帅们等等，我急速地在卡片上记录着，这又使我唤起了许多新的回忆。

当我告别老政委时，他把我送到复兴大路边上，一边招手，一边叮咛我说：“书出版后一定要寄给我一本啊！”

我连连答应。又忙转回身来，说道：“我想给这部书起个名字，叫《兵戒岁月愁》。您看行不行？”

老政委想了想说道：“不好，我看叫《特监轶事》吧！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别监狱。承认它或不承认它都是事实。”

就这样，我把这本书名定为“特监轶事”了。

第二天，我和战友傅良信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人大喊：

“刘志星！”（我的本名）

我侧过头一看，原来，从路边商店门口走出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快步走到我跟前说：

“还认识我吗？”他瞪大眼睛直视着我。

我一时想不起是谁，只是彼此紧紧拉住手端详着。啊！我终于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位表面总是紧绷阶级斗争的脸，内心比鸡肠还软的方副连长，他长得白脸、黄眼睛，象俄国人，战士们开玩笑地称他“老毛子”。陌路逢故旧，我高兴

得不得了。

当晚，在他住的一个又脏又破的小招待所里我俩谈了半宿。他也早已转业，转到了河南省一个检察院工作，是来京办事的。他问我在哪？我说："我被打到了一个又脏又远的水泥厂工作，干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谁也没人理谁也瞧不起的连八品不到的小闲差，我当时的地位连一个满嘴炉灰渣子的所谓的工人都不如。"

我俩谈着谈着，鼻子发酸了，眼里含满了泪水。当年我们都很年轻，有理想，有抱负，有热情有拼劲，现在面对面看看，颇有点凄然，一切都变了。

他说："我半夜歌唱洪湖水，要不是首长们保我，我也会蹲班房被打得皮开肉绽，也许咱俩今天见不着面了呢！"

我说："当年，我那首：'马争槽头料，猪抢缸底食，鸡啄仓中米，狗啃骨头急'的打油诗，害得我好苦，要不是政治部主任保我，我也早蹲了班房！"

他劝我说："指导员！他妈的，他还是以前那种说话的风格，现在好了，你就好好写吧，用心写，用泪写，用血写，写出来才对得起死去的老帅和咱们的小战士，谁要说这个写不得，那他屁股坐哪了。"

他还象当年那样直桶子脾气。看来，我们党象陈毅这样的拧脖佬是后续有人的。这是我们党的生命所在。

他还提起为彭德怀治病、打水，给陈克寒按摩，背罗瑞卿上厕所的小卫生员孙立达（他本名叫苟良达）他说，"六九年你走了以后，他也复员了，他的政治鉴定不好，说立场不坚定，叫他复员回山东老家了，至今不知在什么地方，要能见到他就好了。"

他还告诉我，背陈再道逃跑的杨树理在陈大麻子关照下，早已调回北京了。为赵建民送信的战士齐运岭也调回北京在中央一个部里工作。保护副总长张爱萍的那个战士，首长也打听过多次，首长们没有忘记他们，还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寄钱、四人帮粉碎了，改革开放了，可他们在偏僻的山村还很穷，我们国家爬得太慢了……

我们各靠工资吃饭，身不由已，半夜里，我俩互相留下了地址，依依惜别了。我的眼窝很浅，我又一次流泪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这感情的实质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总是有点既幸运又有点“新情总不如旧情”的感觉。

使我吃惊的是，第三天上午，我在马路上又碰到一位分别二十年的老战友，他叫王振欣，他从河北省高阳县来京办事，真是天意使然，巧得使我甚至认为屈死的元勋们在天有灵，有意安排，使我又碰上一个当年的“狱卒”以便更多的掌握情况，写好《特监轶事》。这是迷信吗？

是的，只有我们和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回忆过去时，才能有这种难以形容的思想感情。

“监护”或者叫“看押”特犯，我仅仅经历了两年就离开中央警卫师了。当时人家看我还年轻、能干、能写，扔掉有点舍不得，不扔掉又不使用，有人甚至形容说，我象个金刺猬，抱着扎手，扔了可惜，因此决定叫我到座落在北京山区的昌平县武装部去工作。

老政委说：“小刘的爱人不是在天津达仁堂药厂工作吗？照顾一下，调到天津警备区可以嘛，让刘绍同志去给联系联系。”

一把手的一句话，对我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至今

感激他，让我们不再作牛郎织女了。

当年，当我离开中央警卫师时，我骑了三个小时自行车，到二团去找正在该团某连蹲点的老政委，我俩并排坐在院里的石头上，迎着斜阳，说了许多惜别的话。他鼓励我说：

“人生在世，很难不遇到问题、挫折，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

我不禁想起诗人的名作：桃花江水深千丈，不及王伦送我情。他送我宝贵的同志情，政治情，否则，我那首鸡狗马打油诗也早就足以使我蹲班房了。

我就这样在天津部队又拼了十年。我所写的文章材料是可以称为等身云高了，但从又没有象我写《特监轶事》一样一次次流着忍耐不住的热泪。

我写的《特监轶事》主要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的事情，前后经历两年多一点儿。

我还需要向读者和老首长、老战友们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写作时，有的人我用了真实姓名，如救陈再道的杨树理等，有的人用了化名。为了叙述的方便，我还把“监护”的元老们按原号统一编入了“囚徒”序列，原因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拘押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小小的一个什坊院早已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因此，什坊院有，半壁店部队大本营有，云岗也有，八里庄也有，但多数拘押在什坊院和半壁店。而提审批斗时，有时在驻地，有时在罗道庄，有时在八里庄。而在押的元勋们全部是真实的姓名。当时我的未婚妻在半壁店营房里看见有持枪带刀的两个战士，双双看押着李井泉去厕所，吓得直捂双眼。我小声告诉她说：

“你要看到他们受肉刑的情形，你还会吓疯喽呢！你会把这场大革命叫做现代法西斯！”

我的未婚妻从此便退出了她参加的他们厂的什么“只争朝夕”造反队，我的那个正上中学的、成了天津市中学红代会造反副司令的小内弟，跃跃不可一世，戴着象锅一样的大柳条帽子，腰挂尺把长的大手电，手持查抄来的美国弹簧刀。有一次正赶上我去天津外调，他对我说：

“姐夫，你看怎么样？”

我说：“满好，满好，象个地地道道的土匪！”他双眉一拧，大眼一瞪，说道：“要不看你是我三姐夫，我非拧断你的脖子不可！”

是的，他时年虽然只有十五岁，但长了个大个子，拧断我的脖子自然是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凉。可我的不识字的老岳母当天便一手拿个面棍，一手拍打着“副司令”的肩膀，把他送到了居住区小王庄派出所。他得救了。

至今，原小王庄派出所的王所长还常作为趣谈。解说这里发生的事和特监特犯没有关系吗！

我举以上的例子，是想说明，谁真正明白了这场大革命的实在意义，谁也便会嘎然收住。正象我们看押的战士，对某些人从恨之入骨、爱之入骨，到逐渐走向事情的反面，再大再高明的骗子也难以永远地欺骗“智力低下”的群众。

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说，文革的事情太刺激，不要再抖弄文革的事了，免得受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受不了刺激。其理论根据是要向前看，家丑不要再外扬了。

我想，要向前看，但无论如何、千千万万不要忘了向后

看，不然，会老在一块石头上摔跤，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罢了。一个国家民族，如果弄不出真正的教训，根本的原因，怎能避免不再摔跤呢！怎能避免历史会以不同形式重演呢。

至于说什么怕受刺激，而想回避它，忘掉它，甚至抹掉它，那，不是偏见便是无知，否则便是有意，这才是对历史、对后人的不负责呢。试想，文革中那样疯狂的残无人道的刺激都刺激过了，当应该揭露和记取教训时，反而会受不了刺激了？把人当牲口对待，把人都整残了整死了都不怕刺激，当揭露认识丑恶时，反倒怕刺激了，倒怕丑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逻辑，恐怕死去的、活着的元勋们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有良知的群众是决不会同意的。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的典型不是有眼共识吗！

再进一步说"家丑"莫外扬，则更有点笑话，世人皆知，所谓"家丑"早就丑遍全国、丑到世界上去了，问题的关键不是再外扬不外扬，而是如何把丑质弄弄清楚，使我们党、我们国家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更加健康地前进。否则，谁敢保证历史的惨痛教训不会再以不同的形式重演呢？谁敢保证呢？！所有百家姓的尊姓大氏，恐怕没有一个人敢于保证！

一个最能善于总结自己缺点错误和教训的党才是最有希望的党，一个最能正视自己弱点和差距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党，在这方面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

我想，这些就是我写《特监轶事》的根本目的所在。一九八九年上半年那场政治风波，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写《特监轶事》的必要性。而且，当我写了些片断章节发表和转载在海内外报刊——如《周总理命令我们抢彭真》、《在看押彭德

怀的日子里》、《彭德怀给警卫战士讲故事》、《彭德怀等在特别监狱》、《特监纪实》、《林彪选秘书》、《江青视察记》。等以后，受到海内外读者广泛好评，并建议我全部的写出来。当时由于正写另一部长篇《狼精》才延误至今。

这部书完全是利用有限的一点业余时间写的，肯定会有不足和差误，有的时间日期可能不够准确，有的是作了必要的艺术上的剪裁，有的不得不把真名实姓改一改。我企盼老首长、老战友对拙作批评指正。我不必再顾虑说一句错话、作一篇文章、出一部书就可能被斥为毒草或反革命了。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政治生活上的一大进步，这是多么可贵！

我更盼望有一天，能在屈死的彭总、贺总等元勋们的墓上献上这本拙浅的书，道上一声：

“安息吧，为中华民族献身的元勋们！那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已经受到了惩罚，他们有的已经西去黄泉，你们在马克思面前再去揭露那些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吧！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

让我也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表示感谢我的老首长、老战友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们，如天津警备区政委兰保景同志、副政委杜根盛同志、中顾委荣高棠同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陈昊苏同志、天津市南开区文化局局长米新华同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政委张锦泰同志、李怀森同志等，都给予了无私的鼓励和支持。

刘　烊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建军节之夜

匆就于天津中山路武警大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特监轶事
作者=刘烊
页数=314
SS号=0
出版日期=1992年10月第1版